

港人踴躍參加悼念六四晚會 港府施政不當 加劇社會深層次矛盾



中國腐敗和社會矛盾劇烈化

大自然的警笛

中國人民何以要捱居住難之苦

第四國際第 16 次世界大會決議特輯

泰國民眾鬥爭專頁

沉痛懷念王國龍老戰士 (1914-2010)

政改方案是邁向民主政制的方向嗎？

仲明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公布《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建議方案》，建議增加立法會議席至70席，分區直選和功能界別各佔35席。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1,200人，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人數相應增至150人。

唐英年說，通過這個方案，可為立法會日後全面普選訂下方向，包括不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並以全體合資格選民作為選民基礎，體現立法會選舉最終要符合普及、平等的原則。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政改方案就一如其名，祇談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其它的就一概都沒有了。這根本上完全迴避、沒有回應香港市民對普選的普遍要求。

甚至連中共官僚宣稱的，二零一七及二零二零年可以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狀況，《建議方案》隻字也不提如何從現在過渡到那兒。理由是二零一二年以後的政改，將交由下任特首和下屆立法會處理云云。

為了那一丁點兒的改良而要勞師動眾，無怪乎這個政改方案被人稱為『爛方案』。

五區公投運動的衝擊

五區公投運動就是衝著政府這個政改方案而來的。五名立法會議員在各自的選區辭職，令全港五個直選的地區均出現一個議席的空缺，從而觸發全港選民均可進行一次補選投票，令五區公投運動的五名候選人以統一的雙普選政綱，呼吁選民投票支持一次形同對雙普選的公投。

用意就是要向特區政府沒有普選內容的政改方案說『不』。

本來泛民主派在剛提出五區總辭之初，反應尚算正面。各方均提出由哪五位民選議員辭職較為恰當等討論。但當民主黨在去年底宣佈不參加五區公投運動後，泛民主派之間便出現一連串的分歧。如多個泛民政黨不支持、不動員等情況。至本年初，在516公投之前，不支持五區公投的泛民主派，更組成「終極普選聯盟」，開展其與中共官僚接觸談判之舉。

五區公投運動除了未能整合泛民主派的力量以外，它更受到兩方面的夾擊。

中共官僚從一開始就視公投運動為死敵。這當然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最慣常的表現。中共官僚一向視人民的力量為顛覆的勢力，又豈可容人民公開地透過選票來決定社會的大事？在國內固然沒有機會讓中國人民公開表態；在中共官僚眼皮底下的香港，任何涉及全民公投、或甚至連這次516的『變相公投』，也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在香港的中共政治買辦，從最初摩拳擦掌準備參加「五區補選」，到一百八十度轉變為附和中共官僚說提出『五區公投』便是違憲、違法等，因而不派員參加。而特區政府更開創先河，在中共的叫罵聲中「依法」舉行五區補選，但又在投票前夕，由行政長官宣佈他不會在五區補選中投票。

因應北京、西環，以至禮賓府的杯葛，最終祇有17.1%的選民在516投票日投了票。大約有五十萬人投了五區公投運動的候選人，令五位在一月辭職的立法會議員重新當選。

向專制政權說不卻變成被人「溝淡」的民主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特首曾蔭權宣布，行政會議接納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改良方案』，並在立法會秋季復會後，提出本地立法建議，以「一人兩票」模式，產生二零一二年新增的5個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

曾蔭權指出，民主黨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他表示，在調整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後，立法會新增五席功能組別將由區議員提名，由不屬任何功能組別的選民投票產生。在二零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選民將會一人兩票，一票是地區直選，一票是功能界別。曾蔭權表示，在立法會通過議案後，當局將諮詢立法會和公眾有關取消區議員委任制度的意見。

曾蔭權表示，這個調節方案能提升選舉的民主成分，為普選鋪路。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立法會以46票贊成，13票反對，超過三分二贊成票，通過二零一

二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二零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將共有一千二百人。選委會四大界別，即工商及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及宗教界，以及政界，各增加 100人。而特首候選人提名門檻由過去100人增加至不少於150名選舉委員提名，才能參選。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立法會以 46票贊成、 12票反對，通過二零一二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決議案。立法會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各增五席，全部議席由 60席增至 70席。新增地區直選五議席仍由地區直選、以比例代表名單制產生。新增功能組別五議席由區議會功能組別組成。五席區議會功能組別產生方式，由 400名民選區議員互相提名，再由全港約 320萬沒有傳統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產生。特區政府未有交代具體選舉方法。

曾蔭權將於稍後簽署政改方案，再報請人大常委會同意；立法會秋季復會後，再透過本地立法接納民主黨建議的一人兩票安排，讓市民在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選舉中各享一票。屆時政府將會向立法會提交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

生辦法的兩條本地立法條例草案。

在涉及這麼重大的有關政制民主等問題上，香港市民可以做的根本就不多，從來都是十分被動的。對於政制發展，他們能夠做的多份是隔岸觀火，而非直接的參與。今次的政治討論多了五區公投運動的討論和投票動員，但卻又遭中共官僚大舉遏制，令至少部份人對「變相公投」持觀望態度、甚或反對。

不過，對部份長期支持民主運動的活躍份子來說，最晴天霹靂的是，普選聯的終極普選方案，最後竟然會急轉直下，變成了民主黨的三個堅持自行『溝淡』至區議會改良方案。就這樣地，一個被以為是堅定不移的信念：爭取二零一二雙普選，竟然在最關鍵的時刻，被民主運動的重要領導者棄之如敝屣，來換取與中共官僚的對話。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祇會狐疑，這是與虎謀皮的見識而已。

在民主運動的重整過程中，領導的危機的確令同行者迷失，邁向普選之路恐怕還很遙遠。

二零一零年六月



5區公投 全民起義！

關於民主黨的「改良方案」

涓滴

特區政府提出的2012年政改方案，沒有雙普選路線圖，沒有終極雙普選的期間，也不交待廢除功能組別的問題。提出後受到泛民主派的反對、排拒、要求加以修改，才在立法會進行討論和表決。

但特首曾蔭權在距離6月23日預定表決前10多天，卻表示當局不會修改其政改方案；而在民主黨提出改良方案以補充當局的方案後，他就迅速改變為可作相應的修改，以迎合民主黨的建議了！這樣的轉變，顯示特首的出爾反爾、望風轉舵的迅速！

民主黨提出的改良方案，是「普選5名區議會代表」、或稱「一人兩票方案」，將當局原來提出的新增5席區議會代表由區議會選出，改為由全港選民選出，是稍作改良的辦法。但參選的提名人只能是功能組別的議員，參選人（即候選人）只能是400人左右的民選區議員。它不提廢除功能組別問題，反而主張功能組別議員提名候選人，是保留而且增加功能組別，變相地令功能組別合理化，優美化。難怪自由黨黨魁劉健儀表示贊同，認為它可以將功能組別永遠存在。這是改良方案最大的缺點。

中聯辦最初曾指民主黨的改良方案不符合人大規定；後來，據說中共最高層已接受這個方案，它便迅速表示，確認這個方案不抵觸《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規定，且屬本法立法範圍，因而「持積極支持的態度，並樂觀其成。」

中共中央為要拉攏、分化泛民主派，同意稍作修改讓步，既可以換得港府的政改方案得以在立法會通過，不致被否決；又可造成泛民主派中的溫和派與被稱為「激進派」的社民連等之間的不和，以至互相鬥爭，這樣的收穫更是非常大。張文光近日公開宣稱：中聯辦自今年2月以來，已多次約見民主黨負責人。這說明雙方的商談已有相當的時日。

民主黨在今年3月中決定不參加五區總辭，顯示她在2月開始與中聯辦密商後，已決

定把政策更轉向溫和，以迎合中央的意旨。而北京在表示反對社民連在香港進行公投後，社民連仍聯合公民黨提出五區總辭再進行補選，從而造成「變相公投」；結果補選有50多萬人投了票。

在投票前，儘管建制派對補選極力反對，加以杯葛，更會合多方勢力試圖封殺、打擊（如鄉事會拒絕借出場所作投票站，增加許多選民前往投票的困難，因而減低投票率）；補選結果仍顯示公、社兩黨候選人大大拋離其他參選者，幾乎都以高票當選，反映出當選人頗得選民支持。加上今年2月底3月初中文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四分之一受訪港人認同用激烈鬥爭（這也可引伸為全港會有153萬人贊成用激烈抗爭）要求政府回應港人的訴求。

中央當局對於中大這項民調結果不會不加警惕，從而要更加防範香港的激進黨派會有擴大勢力趨勢，更須加以阻遏。因而需要運用統戰手段，拉攏民主派中的溫和黨派，分化他們。這種統戰手段，是中共幾十年前已經運用，富有成功經驗的。

俗語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民主黨這次違反自己2008年的承諾，就類似於背信棄義，已經引起許多人的指責，失去大量的舊日支持者。這種惡果，將會很快浮現！幾日後的七一大遊行，民主黨籌款暴跌至4.5萬，比去年的30萬元蒸發了85%，但社民連則籌得26萬元，便是這種惡果的明證。

2010年7月10日



(來稿)

人至察則... —— 一個出路建議

吳萱人

所謂兩個選舉新方案，已於二千零十年六月廿三至廿五日，經三天政辯之後通過。一如人們事前所料，沒有意外結果，當局在數夠票之下，可以皇皇然謀劃他們下一輪的步驟。

說實在，由於本港民主路長夜漫漫；人們雖仍舊抗爭，但看眼前並沒有「凌駕性迫切」需要，已在電視機前見到和跟着來的各類行動，不外乎再演一遍或照樣煮碗。讓各方各取其需或騎劫利用，以當籌碼，為下一趟議事堂內的角力本錢。

無疑，未來的社會舞台屬於新世代。可祇見新世代們聯名發表文宣：《追求的應是民主，並非民粹》；議事堂內觀眾席上喊：「還我港人治港」；矇眼苦行多區街頭的，在地上寫粉筆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集會台上詩唱遊、喊口號、有頭面的人物或失敗了的代議士演講，甚或爬攀圍欄、衝出馬路、撒錢、燒香悼亡、潑水洩憤，那又如何？這回警力學乖了，事先威嚇，擴大佈防，終場毋須大動武。新世代的最大號召能耐，在充份運用網絡。恰恰也是網絡，新世代學者發出警示：

「……這種肆意謾罵的情況甚至蔓延社交網站，月旦時事，表達個人意見亦可能招致敵視目光，危害重視多元的民主精神，公然挑撥離間，作不負責任抹黑的行為愈來愈普遍。」又指出：「……長此下去，祇會令公眾討論的空間淪為一小撮人的謾罵場所，令社會的聲音更趨單一。」（《信報》2010.6.25）

其實，網絡如水，能載舟覆舟，而且髒水居多，易浸死人。動員能力強，內耗能量也不弱，朋網處處，不容他人「民主多元」闖入，早已成事實現象，不是一篇文宣示警可以回天。

反而是，新世代真的相信天掉下來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豈曾事先為之流過足夠汗水？明明是用來安撫和堵塞悠悠之口的區區本子上寫的字，便當了真，奉之如

圭臬，極權集團的許諾也可信，且要弄假成真。

要真的「弄假成真」也可以，新世代頭腦要從頭清醒。清醒甚麼？清醒沒有免費的民主代議午餐，清醒任何政團都命定地要講求利益。一旦利益與民同沾，他們便說不負所託，又一旦疑點重重，他們說放長眼光，或是「今天失敗了，七·一記得上街」。零三七·一，歷史來了大大的驚奇，事先任誰也想不到五十萬人至六十五萬之眾，但是，大家以為歷史的效果會重演嗎，當局會推倒、撤消兩案？七·一當然要共同上街，這回上街，可考慮用全新面目。

甚麼全新面目？

每年七·一不都是「民間人權陣綫」主辦的嗎，我們最具分量和重要的人權，便是公民政治權。公民政治權具體地施行的，主要部分在「創制、選舉（包括出選、被選、提名）、罷免、公投」等諸種不可或缺的完整權利，而不是新出現的「超級功能組別」的單一投票機器；我們做無言無能的單一投票機器太久了。

今後要團結的不是甚麼政治光譜內的甚麼甚麼，而是選民自行組合，小組合團成大組合，告知代議士，我們要的是全民主化。既要一人一票不設高門檻的選區長（即本行政區之長），更要立法議席全部民選直選，把舊有煩瑣的「功能組別」拋進歷史垃圾桶，把小撮特權者的利益歸還廣大民眾每一人。

改變或和平革命，當然又不會明日便出現。它將會無比困難。假若現時在街頭以至網絡媒體上抗爭的人，真的有抗爭者的氣概，明年區會重選，我們便不蓋印於哪一圓圈內，而是把我們全民主，行使公民政治權的要求，和平而莊嚴地，寫在每張選票上，攝下來，放上網，告訴全世界，香港正在做一樁大事，人至察則……有未來。

2010.6.25黃昏前

港府施政不當，加劇社會深層次矛盾

振言

曾蔭權在05年當選特首時，曾許諾要在香港建立和諧社會，但5年來的施政與這個許諾背道而馳，使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抗爭更加激烈。這充分表現在港府的房屋政策上。

明顯的事例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推行三高（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政策，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幫助大地產發展商操控樓價不斷飆升，天價日益創新，瘋狂獲利，財富暴漲，許多人都躍登世界極少數巨富之列；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從中得益，稅收大增，每年都有大量財政盈餘，巨額儲備累積也名列世界前列。

但另一方面，中下階層廣大市民飽受其害，為居住等問題付出無數代價和血汗，許多家庭都被迫擠居板間房小室。港英時代殖民地政府曾大規模興建徙置區公屋、廉租屋，容納幾十萬居民，但特區政府卻不肯動用其部份財政盈餘多建公屋和居屋，最近出售居屋、夾屋的剩餘貨尾幾千或幾百個單位時，卻有四十倍的申請者爭購。在這種供不應求的時候，要求復建居屋的呼聲四起，一項調查顯示，8成受訪市民贊成復建居屋。但政府高官卻以港府早前已決定停建居屋、退出房屋市場為藉口推搪，一些大地產商也公開發言反對，認為興建居屋會破壞香港經濟，影響社會穩定局面，危言聳聽。

不久前，當局又推出強制收購舊樓的方案，降低地產商收購的限制，從原有的須得到九成業主的同意降低到八成，顯示政府公然幫助地產商以賤價強搶民產。這項立法得到建制派議員投票贊成通過推行。

如果把面積和人口都與香港相近的新加坡作一比較，則可見香港政府的施政失誤或「不足」是多麼嚴重（儘管新加坡政府基本上也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今天的新加坡人口約有8成是居於政府興建的「組屋」（類似於香港居屋），人均居住面積遠較香港大，大部份的家庭為單位的實用面積接近1000方呎；香港

的公營房屋（公屋加居屋）約佔香港房屋總單位數的一半，大部份單位的實用面積都少於500方呎；樓價方面，新加坡一手組屋單位售價約147萬港元，二手約189萬港元，也較香港便宜。（詳見今年4月12日《明報》報導）港府高官一直要比新加坡佔優勢，但在這方面卻大大不如！

港府以不干預自由市場為藉口，不願復建公屋和居屋，這實際上是推卸本身應負的力求使市民安居的責任，以免影響地產商的壟斷房屋市場。在最近樓價狂漲之後，港府高官只是推出無法律約束力的「9招12式」，要求地產商「自律」，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又誇大說立法要需時3年，難以立法例監管。即使在立法會議員罕見地只有地產及建造界的石禮謙一票反對下，大比數通過要求政府立法監管住宅物業的銷售，但鄭汝樺仍堅持要自律成效不彰後才考慮立法，實行拖字訣。嗣後，特首更宣佈，要就資助市民置業問題，進行約5個月的諮詢，但諮詢的做法馬虎苟且，諮詢的問題將興建居屋標籤為負面選擇，引導市民視興建居屋為奪去興建公屋和私屋的土地，要政府以公帑幫助買居屋者，挑撥市民間的爭拗，港府又可以拖待變。

擴大了貧富懸殊

在樓價急升帶動下，香港的住宅租金也「水漲船高」，業主紛紛加租。4月26日《明報》報導，本港私樓過去一年平均租金已勁升27%，呎租突破18元，升幅直迫樓價升幅。

即使是買了樓的兩成港人，也不少已淪為「樓奴」，為了置業和供樓而要節衣縮食。工聯會調查發現，80%的受訪市民認為目前樓價已超越市民能夠負擔的水平，約20%的受訪市民的住屋開支（包括租金或供款）佔家庭總收入40%以上。（見4月26日《文匯報》）

此外，交通費和物價等也日益高漲。但自由黨的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員張宇人卻公開主張把最低工資壓縮到每小時20港元，大開倒

車，幫助店主盡力剝削。

香港的貧富懸殊的情況嚴重。聯合國09年10月公佈的報告指出，香港在全球27個先進經濟地區的貧富懸殊積分最高。另據中大亞太研究所榮譽研究員何永謙表示，近年香港社會表面越來越富庶，但窮人整體收入不升反跌。

香港現時的失業率雖比以前下降，但有工作的人不少是「在職貧窮」的。據社會服務聯合會的資料顯示，有多達123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他們大部份三餐不繼，住在籠屋與板間房。

港人不滿大增

港府的很多倒行逆施是得到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多數通過實行的。從而重覆地證明：特首和立法會議員必須由普及而平等的普選產生，才能真正的代表絕大多數港人意願和利益，因而爭取雙普選的實現，便成了當前頭等重要的急務。

但政府最近推出的2012政改方案，沒有普選路線圖，也完全不處理功能組別的問題，保守且倒退，又一次使更多人失望，更加激發抗爭的怒潮。

由於港府多項施政不善以至失誤（上述房屋政策只是其中之一），拖延民主進程，助長官商勾結，從而加深了官民矛盾——香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之一，與中央領導人要曾蔭權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的訓示恰恰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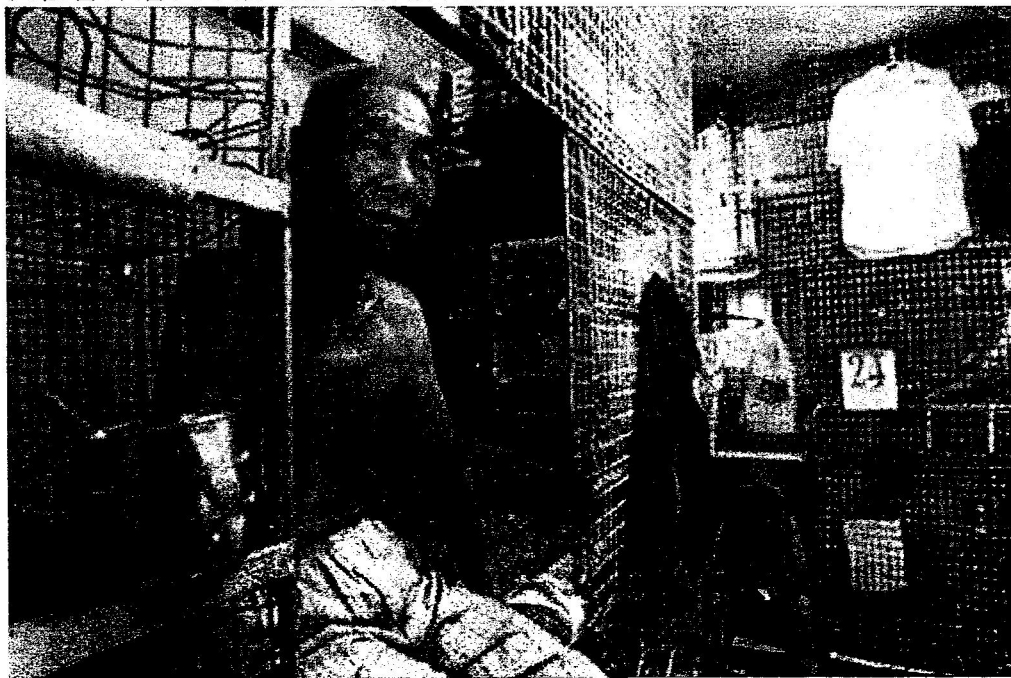
由此造成的惡果反映在中文大學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中。該所今年2月底至3月初訪問1005名市民，僅26.5%認為現時社會和諧，比兩年前的37.5%跌逾10個百分點，和諧度今次的評分只2.98，跌破3%和諧度的基準，即港人首次認為社會不和諧。

受訪者對政府促進和諧的各項表現更全線下跌，四項的不合格比率高於合格比率，其中44.7%認為政府推動民主政治不合格，比兩年前的34.3%高約10個百分點。

這次調查發現，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有56%認為嚴重／非常嚴重，較06年(34.6%)和08年(31%)顯著增加。這是政治體制深層次矛盾在快速加劇的反映。

該研究所副所長王卓祺指出，以上因素導致越來越多人認同激烈抗爭。25.9%受訪者同意用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比兩年前的21.4%高，增幅超過20%，以本港成年人口推算，他估計全港153萬人認同激烈抗爭。香港今天有四分之一人口贊成激烈抗爭，這充分顯示出市民對當局和現狀的強烈不滿。80後反高鐵青年在立法會門外的肢體衝撞，是激烈抗爭的事例之一，也是港府施政不當加劇了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表現。

2010年5月8日



港人踴躍參加悼念六四晚會

微波

香港民眾在維園悼念六四屠殺21周年的晚會，雖然今年不是5或10等特別年份，但出乎一般人意料地卻有15萬人參加，平了以前人數最多的1周年和20周年的紀錄。特別是警方的數字，它本來對每次的群眾遊行、集會人數都是大大報低，多數是報低為2或3成的，但這次也稱有11.3萬人參加，比它估計最多一次的六四一周年的8萬人還多出3.3萬人。

在擠滿偌大的維園的地上，今年還坐着非常多的80 后年青人生力軍，意味着「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願景在逐漸實現！這些都是可喜可賀的。

人數意外的多和眾多青年人參加，與下述兩件事大有關係：

一是在晚會舉行前3天，支聯會擺放在時代廣場先供公眾觀看的兩座新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門屠殺浮雕，竟被警方搬走，要加以沒收，同時拘捕13位支聯會負責人，控以莫須有的罪名，實行政治打壓民主和自由人權。

二是與此同時，中大校長劉遵義以保持政治中立為藉口，拒絕中大學生會在晚會後擺放兩民主女神像和屠殺浮雕於中大校園內，但遭學生會強烈反對，指出其「理由荒謬」，而劉遵義本人是政協委員和港府行政會議成員，並非政治中立者。在學生的堅持下，校長被迫讓步。學生會得到勝利，準備在9月復課後舉行全校公投，以決定是否永久擺放於中大。

以上兩宗打壓和試圖收緊政治自由的事件，激發起市民的非常不滿，許多人會因此參加悼念晚會，成為集會人數大增的原因之一。這表明香港原有的民主自由權利是不容打壓，如有打壓就勢必遭到市民的抗拒、還擊的。

另一個原因是：港人對港府的許多倒行逆施造成不良現狀（如樓價高漲等）、對它的民主倒退政改方案和雙普選改革要拖到2017、20年才實行一小步等等，深為不滿甚至惱怒，要參加集會來抗議。

港人參加晚會，更是要追悼89年民運中死難的大陸同胞，要求平反六四，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見不同人士（如劉曉波）和維權律師（如譚作

人）等，取消中共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這些訴求都在晚會上表達出來。

許多參與集會者會通過集會、遊行，走上參加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的道路。

越多人參與晚會，就越能表現出眾志成城、爭取上述願望實現的力量，可讓大陸同胞通過各種渠道得知港人此次晚會而得到鼓舞，要加以效法，也好讓北京中央知道港人的訴求，感受到民間強大的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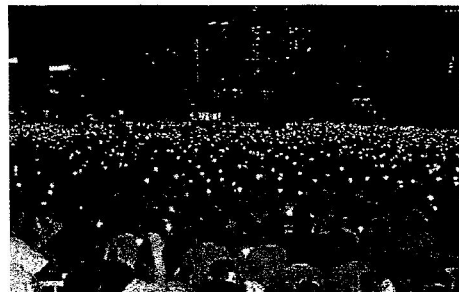
今年六四在大陸，雖然處於高壓之下，也已出現紀念六四情景。據報導，《南方都市報》曾用漫畫形式影射出六四，深圳衛視在新聞時段出現「六四要平反」的字句，福建街頭發現「平反六四，結束專制」、「平反六四，解除黨禁」的標語。（引自6月5日《蘋果日報》載李怡的《蘋論》）。

有理由相信，平反六四等要求遲早會實現，但是要靠人民力量充分發揮出來才能早日爭取到。

在維園的燭光漸熄後，幾百名中大學生、校友和市民護送兩民主女神像和屠殺浮雕到中大安放，有2千師生在場迎接。中大學生參加香港的民運、社運方面，一向都是積極、主動和團結的。各屆的中大學生會都非常盡責，帶頭行動，就如這次一樣。這些都表現出中大學生一貫的寶貴傳統，彌足讚揚！

在集會結束後，80後青年還會有不少行動，比如在維園舉行「我們的春夏之交——政改討論會」；6月底，一群年輕人將會演出舞台劇，向21年前走在前頭的死難者致敬，更暗喻在生的人面對堅持和放下的抉擇，帶給年輕一代深度的思考。

2010年6月6日



六四21周年有感

秋月

人類生活的必需包括：衣、食、住、行。

「衣服」，是勞工製造的，但是勞力過多，失業者眾，生活困難。

「食物」，是農民種出來的，可是現社會的農民處於最下級，難生存。

「住屋」，建造工人沒有樓居住，也多數失業，生活同樣困難。

「行走」，古時的人用牛馬代步，現代的工人要遠離住處去工作，只能用最廉價的交通工具代步。但富有的人則有私人的汽車，甚至有私人的飛機、遊艇，不勞而享受人生快樂！

總之，「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發展到現在，尤其是中國官僚野蠻的超級剝削工農，造成官商極之富有，人民極之窮困，貧富兩極化。所謂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掌握了政權時就無恥地背叛、剝削工農無產階級，實際走的是資本主義（毛語：走資派）。

在全球資本主義臨死掙扎的現時，中國官僚更出鉅款四萬億救市，不救自己國內人民處於天災人禍之災難，同時又厚顏無恥地要外地人捐贈救濟國內災民！

明天是追悼天安門六四屠殺21周年紀念，支聯會舉辦燭光晚會。

希望大家能高唱『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工農！

起來！全世界的窮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會創造的光明！

誰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國際革命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2010年6月3日



英烈冷傲百年 ——一座無名墓

吳萱人

新世紀的第一年，一月十一日下午過後。

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賽馬場對開是好幾座歲月悠久的墳場，其中「香港墳場」由市政部門管理，以前是英據時期的「官方墳場」，原名殖民地墳場，一般稱之為紅毛墳場。中午過後，一行廿多卅人，在偌大的近千座墳墓之間，拾級尋向那座唯一的無名墓而來。報章在早一天刊登了整版致敬廣告，當天人們列了祭奠花環，誦了祭文，酌了祭酒，上了百年第一炷敬香。

都在這斷柱重墓，無碑無名的墓前。



百年來，墓主祇受過三遍祭文，一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二在七十年代，三在當天。

第一遍祭文，沉重無比。原來，墓下躺着的，竟是如斯與我國近現代國體變天大大有關的先驅。一個長於斯死於斯的香港中國人，死於三響冷鎗，倒下於百年前的中環結志街五十

二號二樓，成為轟動一時的開埠以來首宗政治謀殺凶案，殺手派自「兩廣總督」巡府衙門。

讓百年後的港人以至全國認識墓主罷。沉重的首篇祭文，結束時以「贊」體寫着：「嗚呼！公其身永別耶；公是其不滅耶？紀公者亦道之陽光，而北極之冰雪也。民國基礎，乃公之骨，民國犧牲，乃公之血。於是公殺身成仁以去，起世人之悲切。而或堅數十險而仍生，又無有一日之愉悅？公何易而彼何難，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逸而彼何勞？公何優而何劣？豈不可以公之遺忘，必賴多數人而後成，又而數人之旁功，必籍公而點綴之哉？……」

首祭文寫於民國十六年六月穀日，都有四分三個世紀前的事，文刊本港《大光報》，撰者來後才知道是尤列。

這座無名墓，有幸香港擁有至今。

家國百載，蹣跚難艱；今天「中華盛世」，香港恢復國土又將五年。歷史的血緣臍連重認，好一位香港地區的國士級先烈，長年躺在墓下，長年無名冷冷。

我們幾乎失去「埋忠骨」的機會，所以說香港有幸。

一九一零年十月，武昌起義成功，孫文返國途經香港，下榻英皇酒店，墓主的次女訪晤，曾商移墓往內地恤葬。但其時變天剛開始，孫文唯唯以對。第二次，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的《華僑日報》上，有摯友投書陳情，望廣州成立的革命紀念委員會，將烈士骸骨迎回禮葬，但時勢不合，墓主反遭文譏。再到一九五零年，又有遷墓廣州黃花崗一帶興中會墳場之議；奈何日寇方過，民國政府則已播台，

新中國的政府未暇管及前朝遺事。

大好青山，才有幸可埋忠骨。香港這南國明珠，二千零一年由政府銳意重整的旅遊業資源，旅遊發展局配合辦了「香江故事共尋覓」活動，徵求民間的、地方的和罕為人知的故事。無名墓墓主事跡，遺址參觀考察路線，幸運地成為十五個入選故事之一。（註）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瀏覽到discoverhongkong.com內的墓主生前種種。

香港畢竟是我們的家，畢竟懂得尊重珍貴歷史的資源。港島中西區區議會，在一九九七文物年，便設立「中山史蹟徑」，與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建議古蹟辦事處設立的中西區文物徑，齊保留了百年前的革命烈士的行蹤。到了一九九九年，文物徑的上環線重整，列出墓主遇害的遺址。

更重要的是，香港首度由官方認出了一位「革命烈士」。

認出的意義非常深遠。即是說：我們開始蛻去殖民地時期，與本國不親的舊殼，嘗試與國家百年變天的歷史接軌。這，是，多實在一步呀！

不必庸俗地要求香港人愛國，單向的向下一代塞入民族國家觀念——百年史實告訴了大家：香港，由來有這個可貴的傳統。而且是驚天動地的；憂國，便以身報，完成人生最難追求的大愛。

現存於香港墳場內，編號六三四八的無名墓，便是最活，最具說服力的寫照。

凡志士者，都非求名而為，躺在無名墓下的主人，英烈冷傲百年，豈會介意無名再百年。

原文寫於二千零二年一月十一日

楊衢雲先生報國成仁百零一周年

修稿於二千零十年以迎辛亥革命百年

（註：該得獎故事《楊衢雲先烈事蹟》由筆者提供，編刊於中、英文兩類故事冊及網上正、簡體中文、英文版。二千零十年四月三十日，市建局宣佈將耗資四千萬，活化中環百子里楊衢雲創立輔仁文社遺址。但無名墓仍然無名，無受任何垂注，那怕是一塊小牌。〕

勘誤表

本刊上期(總第227期)有如下錯漏，
敬向讀者致歉：

頁數	欄位	行數	原有字	需更正
27	右	9	玖己丑	零玖己丑
36	左	18	斯裏蘭卡	斯里蘭卡
37	左	尾10	新方案	新綱領
37	左	尾10	兩年	兩屆
38	右	尾9	在國際幹預	在國際干預
39	左	尾17	或馬裏同志	或馬里同志
50	左	6	實現存在	現實存在
72	左	1	執行局	國際委員會
72	左	尾2	說明瞭危機	說明了危機
72	右	14	進退維穀	進退維谷
73	左	12	所有機製	所有機制
75	左	尾9	複國主義	復國主義
75	左	尾14	說明瞭	說明了
75	右	7	複國主義	復國主義
75	右	10	的議案	的決議案
76	左	17	工黨	勞工黨
76	右	13	說明瞭	說明了
77	左	尾8	平衡等的	平衡的
77	右	9	傾向以	傾向
78	左	12-13	社會國家	社會福利國家

腐敗和社會矛盾劇烈化

張開

中國學生、工人1989年釀起反對官僚專制、反對貪污腐敗、爭取民主人權的鬥爭要求，雖然給當局血腥鎮壓了下去，但21年來的中國現實卻不斷證明這些要求的正確和急迫需要。而且從反面證明：正由於被鎮壓了，才加劇了後來的許多惡果，如官僚腐敗更加嚴重等等。

反貪腐成了民眾關注的首位

就社會的腐敗來看，儘管官方口頭上說要反貪腐，實際上，官員貪腐卻是越來越嚴重、猖獗，更成為今天公認為最嚴重的弊害。

內地一項年度民意調查顯示，接近六成受訪國人認為，官員貪污腐敗是2009年最有損國家形象的行為。官員貪腐已連續3年位居損害國家形象行為的榜首，今年的受訪者比例亦是近年的新高，反映民眾對此的不滿程度升高。(1)

同樣的，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和人民網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反腐倡廉連年位列民眾「關注榜」首位，貧富差距、調控房價取代了09年的食品安全、醫療改革成為第2、3位受關注的問題。(2)

據統計，2009年因涉貪落馬的內地省部級官員多達19人，人數創歷年之最，而其中最為人熟悉的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公安部部長助理鄭少東、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以及廣東、山東、貴州3省的政協主席等。

這項統計自然是不完全的，也只是被拉下馬的貪官一部份，還未拉出來示眾的貪官則數不勝數。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報告：2009年立案偵查涉及國家工作人員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10218件，立案偵查貪污賄賂大案18191件，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670人。件數與人數都比上年增加。

在1010年開始，河南周口市檢察院檢察長李長春涉嫌挪用基建會上億元被「雙規」，是司法界高官的另一新例。

當局一方面高喊要肅貪倡廉，但行動上卻不是這樣。舉例來說：近年來，無論是全國兩會或是地方兩會，一直被指勞民傷財，甚至連官方喉

舌也不斷質疑，要求改革。內地媒體曾估計，每次全國兩會在京召開，數千名代表委員，吃住行等開支至少花億元；今年加上送手提電腦，預計直接支出高達1.27億元。(3)向5224名與會代表、委員派發手提電腦，會議結束後，電腦不必退還大會，歸個人所有。此舉引起內地民眾不滿，批評當局用納稅人的錢「大慷其慨」。有學者更指，當局的做法會令兩會代表成為受賄者，是打着美麗之名搞另類腐敗。(4)

黨政官員幹部不但生活上腐化，而且錢權結合，私人財富暴增，很多幹部都索性「下海經商」，成為「紅色資本家」一部份。

而與此相反的，廣大勞動人民卻未能分享到經濟蓬勃發展的部份成果。

勞動者收入低最不公平

儘管中國經濟保持了多年8%以上的增速，但是居民勞動報酬佔GDP(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卻連降22年，從1983年56.5%的峰值已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佔GDP的比例上升了20個百分點。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非常懸殊。有專家指出，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23倍。(5)

這就是人民網前述民調顯示民眾「關注榜」的第2位是貧富懸殊的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勞動者收入偏低，加劇了貧富懸殊，也就是加劇了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再據北京大學一位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業良撰文稱：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財富，表示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從30年前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還在繼續上升，財富集中度遠超過美國，成為貧富差距最嚴重國家之一。(6)

工人不滿的反應

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指

出，近些年來中國出現了一些由勞動關係矛盾引發的群體性極端事件，其重要原因是普通職工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據前兩年的不完全統計，因收入分配和保險福利問題引發的勞動糾紛佔勞動糾紛的65%以上，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7)

連中國官方領導的工會高層也這樣公開承認，可見勞動群眾不滿的強烈，所給予工會壓力的巨大！

實際上，勞資糾紛的群體性事件（不限於是否被官方標籤為「極端的」）正在日益大增。

筆者在08年曾援引08年3月15日《明報》的報道：僅據全國總工會屬下的企業調解委員會統計，2007年全國的勞資糾紛約高達40.6萬件，這還不包括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司法系統的統計。全總的副主席張鳴起透露，近年的勞資糾紛案數量急劇上升，每年增長速度達20%。（詳見本刊總第224期）。

在2008年，據《中國勞工通訊》資料，中國爆發的工人階級「群體事件」便有127,467宗。（同引自本刊總第227期）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在今年3月向全國人大會議報告：09年各級法院申結勞動爭議案件31.7萬件，同比上升10.8%。

社會矛盾激化的顯現

中國工人階級除了用積極的罷工等行動來有效地爭取待遇改善之外，近來，還有一些工人由於不滿工作環境和精神壓力巨大，對前途悲觀絕望便走到自殺。僅僅在深圳台企富士康公司，在今年1月23日至5月26日的4個多月內，便有12名員工相繼跳樓，結果10死2傷。該公司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經營，生產管理嚴格，控制工人週密，其管理模式已時常被人指責為非人性化，高度苛刻，將員工視作機器，員工缺乏私人生活，心力交瘁，每天工作12小時，每月基本工資將近一千元，被迫要加班工作。該公司內部等級分明，上級對勞工缺乏尊重，特別常見的是，管理員動輒責罵工人，當眾侮辱工人。員工之間關係也非常冷漠，使他們不但要承受沉重的生產工作壓力，更要面對疏離冷漠的人際關係；所有這些都使許多員工會產生無助、悲觀、絕望的心理，甚至有一死了之的念頭。

富士康這些事例，只是中國各地工人苦況的

冰山一角。在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後，就是工人在血汗工廠的辛勞悲慘掙扎。

在工人不斷跳樓之後，富士康資方於一周內兩次宣佈增加員工月薪共約一倍，從950元加到2千元左右。與此同時，深圳和全國許多城市的當局也紛紛宣佈增加最低工資標準1至2成，從每月8、9百元加至1千元上下。

這些發展刺激起各地工人爭取改善待遇的罷工浪潮。僅僅在6月6、7日，便有4間外資中型企業工人罷工；而廣東佛山的本田汽車零件廠的罷工，更持續了近20天，資方最後同意增加34%工資才告一段落。內陸有一間工廠在爭取改善鬥爭中，由於警衛打傷了一位女工，更加刺激起近千名工人騷亂，搗爛生產設備，放火燒廠房。

可以預見，這樣爭取改善的罷工浪潮，將會一浪接一浪席捲全國。

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反映出社會深層次矛盾，另一種矛盾反映就是有些人用砍殺無辜的人，特別是小學生的校園血案，以發洩個人的怨忿，甚至復仇。這種校園血案，僅在今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便接連發生了6宗，共造成近百人死傷。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指內地社會現時怨氣太深，認為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反映中國的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他們的伸冤權、上訪等權利没有得到保障；第二方面，反映一些底層人物報復社會的心態。他們報復社會卻是選擇更弱者來報復。



此外，內地「官逼民瘋」個案屢見不鮮——浙江紹興市女村民09年7月因上訪反映遭拆遷問題但遭拘留，其間房屋被鎮政府強拆，兒媳婦受驚嚇至精神失常；山西省呂梁市年長農民馬繼文上訪反映土地被佔，結果法院判他「敲詐勒索政府」入獄3年。像這些官民衝突一日得不到解決，就等於間接制造出一個又一個校園血案兇手。

在連續發生許多襲擊兒童事件後，總理溫家寶表示，政府不但要加強治安措施，同時還要解決造成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包括處理一些社會矛盾，化解糾紛，加強基層的調解作用。

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一的總理，應該對這一切情況和造成的原因知道得很清楚。這正是他們的官僚制度所造成的，這個制度產生官僚的政治經濟特權，官僚貪污腐敗，他們制定並實施資本主義路線，帶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害，如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造成社會分化、貧富懸殊、工

人失業、樓價物價飆升；當局的許多政策措施，又加深這些情況，加劇社會深層次矛盾。因此，要有效地解決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就必須徹底地改變目前的這個官僚政治制度。

2010年6月9日

註釋

- (1)2010年1月4日《明報》
- (2)2010年5月24日《文匯報》
- (3)2010年5月13日《文匯報》
- (4)2010年3月3日《蘋果日報》
- (5)2010年5月14日《明報》
- (6)2010年6月9日《明報》
- (7)2010年5月13日《文匯報》

~~~~~

## 中國人民何以要捱居住難之苦？

軍行

### 樓價狂飆

中國經濟在應對了世界經濟衰退影響而重新蓬勃發展以後，樓價也不斷地狂飆；雖然國務院和幾個中央機構自09年12月9日至今年4月中，頻密地發出10多項政策措施，企圖壓抑樓價過快漲風，但難令樓市降溫。

據國家統計局4月4日公布，3月份內地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按年上升11.7%，為歷來最大升幅，當中海南省三亞、海口的樓價升幅超過五成，為全國最大。

其實，真正的漲幅，相信定會超過11.7%。5月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2010年房地產藍皮書即指出：去年全國樓價平均上漲23.6%，超出民眾可負擔的上限。單是在北京市，今年4月上旬二手樓均價突破15,215元，同比09年同期上漲了66.8%。（上舉北京事例詳見 4月13日《文匯報》）。

這種發展導致同日的《文匯報》刊出洪嘯在「小議神州」專欄的評論指出：今年中央「兩會」後密集出台的樓市調控政策彷彿隔靴搔癢，內地

的主要城市樓價近來的狂飆似乎更為瘋狂，甚至遠超2009年。儘管專家學者不斷用租售比、泡沫論來警示開發商，和購房管中央各種調控樓市的政策進一步明朗，而樓價一天每平方米上調4,000元、項目剛開盤即被搶購一空的戲碼卻上演，中國樓市似乎陷入越調控越上漲的怪圈。

### 狂飆原因

總理溫家寶認為這與地方政府執行措施不力有關。不錯，各地方政府負債逾7萬億元，債台高築，地產樓價越高，對地方政府財政越有幫助；即使在北京，今年首季的土地出讓總成交486億元，比09年同比大增21倍，土地溢價率高達120%，同比上漲60倍。至於老百姓因此而更加受苦，地方官員們並不會關心。

當然，樓價日益飆升，還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黨政經官員手握巨大權力，與地產商勾結，給予地產商貸款等炒樓方便，自己

則從中得利。幾乎所有的中央企業更從事地產業，兼為大地產商。此次中央限令78家央企退出地產業務，但後者仍把房地產業務轉給與自己有關的企業，使退出變得名難符實。

第二，是由于實際上的通貨膨脹，帶動樓價上漲。中國一些地產專家認為，樓市突然在近幾年出現了強大的購買力，無不與通脹有關。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金岩石分析，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二三十年，最終的動力來源於貨幣，從1992年真正有中央銀行開始，廣義貨幣的印刷數量保持每年不低於23%的平均速度。（4月13日《文匯報》報導）

### 政府難辭其咎

第三，是由於國家銀行的寬鬆貸款政策，使得地產商、開發商如魚得水，利用充足的資金去炒買炒賣，囤地捂盤惜售。據4月22日《文匯報》轉引《第一財經日報》報導：中國央行4月20日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房地產貸款繼續增長。其中，個人購房貸款新增5,227億元，季末餘額同比增長53.4%，比上年末上升10.3個百分點。這是央行罕見的就單個季度發佈金融機構貸款投向報告。數據充分說明：一季度房價高漲背後，信貸資金推動因素明顯。

去年，寬鬆的貸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無疑包括房地產業，根據不久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完成房地產投資36,232億元，比上年增長16.1%。其中，國內貸款11,293億元，增長了48.5%；這部份資金大部份來源於銀行，這種情況，在今年一季度得到了延續。除了個人房貸，央行數據還顯示，一季度房地產開發貸款新增3,207億元，季末餘額同比增長31.1%。以上的報導表明：國務院等此前發出的許多措施並未能遏止銀行這些貸款。

而銀行和金融機構之能夠運用巨額的資金發出貸款，則與國家的4萬億元投資有關。雖然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人大記者會中聲言，09年政府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中，沒有一分錢進入房地產行業；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近日在接受上海證券網訪問時表示，國家的4萬億投資計劃中，與房地產業有直接關係的佔32%。（4月7日《文匯報》報導）王珏林的話是最好的證明，也暴露發改委主任張平公然說謊，王珏林的數字，與上引國家統計局的地產開發投資中

的國家投資貸款11,293億元也大致上相若。

歸根究底，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種制度必然產生通貨膨脹、物價（包括房價）高漲、貧富懸殊、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社會的思想意識和行為是追求私人財富，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不擇手段。

### 人民受害最深

這種發展的直接受害者是全國的絕大多數人民，尤其是低下階層，他們想買樓房安居，但價昂唯有望樓興嘆，無力購買；即使勉強貸款買入，也要長期節衣縮食，把收入的頗大部份連利息分期償還，從而變成在國內現時流行稱呼的「蝸居房奴」；至於無力買樓而要租住的普羅大眾，則往往受樓價高漲帶動租值上漲的影響，也要捱貴租、加租、被逼遷等痛苦，除了看病難、就業難、求學難等之外，還加上居住難。至於許多原有住地的家庭，在房地產業一片興旺聲中，慘遭地產商勾結當地政府強行拆屋逼遷的悲劇，也到處發生。他們中有許多人越級上訴，甚至到北京上訪，也難有較合理的解決，不少求助無門而怨憤絕望的被逼拆屋者走到自殺抗議也時常發生（僅在今年4月22日，即有四川峨嵋山市發生因拆遷引發8名村民集體自焚事件），從而增加了民間的怨憤，最後會引發騷亂暴動。

北京中央政府對此可能前景不無顧慮，至少已認為樓價貴是中國經濟的「攔路石」，可能成為中國經濟健康復蘇的最大威脅。因而在近半年的連串措施不見效後，被逼要再發出通知，要求商業銀行可根據風險狀況，暫停發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當局企圖以此封死利用銀行貸款買樓的炒樓客。這個措施雖暫時遏制了瘋狂炒樓的勢頭，但如果引發瘋狂炒樓的前述種種重大因素依然存在，則房地產價仍會恢復上升，人民還要繼續付出沉重的代價，捱受居住難的痛苦。

2010年5月6日

~~~~~  
李白有首詩叫做《靜夜思》，有網民在這首名詩的四組詞句後面各加三個字，使之變成：「牀前明月光——沒有窗；疑是地上霜——門未裝；舉頭望明月——屋頂敞；低頭思故鄉——很受傷。」

大自然的警笛 破謎

中國近幾年‘天災’頻仍，既有汶川大地震與東北雪災，又有西南旱災，乃至湄公河下游乾涸。大自然的警笛此起彼伏，長響不滅。



西南旱情

根據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劉寧指稱，截至2010年3月30日統計，全國耕地受旱面積1.16億畝，其中作物受旱9068萬畝，重旱2851萬畝、乾枯1515萬畝，待播耕地缺水缺墒2526萬畝；有2425萬人、1584萬頭大牲畜因旱飲水困難。劉寧指出，旱情有四個特點：一是主要集中在西南五省（區、市），耕地受旱面積達9716萬畝，占全國受旱面積的84%，其中雲南與貴州兩省占全國的一半以上。二是人畜飲水困難十分突出，全國因旱飲水困難人數是常年同期的2倍多，其中西南5省占全國的80%，為1939萬人。三是旱情持續時間長，旱災損失重。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區旱情已持續半年之久，且仍呈發展趨勢。四是北方地區旱情露頭。¹

面對‘天災’，政府全方位動員救災。據悉，中國民政部下撥一億多救援資金，國家防總和有關各部委已提前下達今年計劃內與抗旱有關的建設資金63億多元，並重點向西南重旱區傾斜。² 雲南省投入各級抗旱資金23億元，組織1000多萬人投入抗旱救災，實現抗旱澆灌面積2044萬畝次。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發出乾旱橙色預警，啟動三級抗旱應急回應。攀枝花市上升為紅色預

警，啟動二級抗旱應急回應。貴州省共投入抗旱人力89.7萬人、抗旱資金6391萬元，解決190.7萬人、97萬頭大牲畜臨時飲水困難。廣西啟動自然災害救助二級應急回應，共投入抗旱人數263萬人次，投入機電井1.355萬眼、泵站2320處、機動抗旱設備13.88萬台套、機動運水車輛1.39萬輛，投入抗旱資金9865.44萬元，抗旱澆灌面積227.04萬畝。³ 此外，澳門特區政府將分別向三個省份各捐款2000萬元人民幣。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財政委員會申請1.5億元港幣賑濟內地旱災。

雲南速生林

江迅在〈亞洲週刊〉撰文指出，有學者質疑雲南百年一遇大旱的直接誘因乃大面積砍伐原生生態林，種植速生林：橡膠林和桉樹林。據說桉樹是‘抽水機’與‘抽肥機’，又是‘霸王樹’，致使其它物種消失，生態遭受嚴重的破壞。雲南省林業廳副廳長王德祥則認為，乾旱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種植桉樹和橡膠林造成的。他辯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雲南省世界銀行貸款造林專案規模種植過桉樹。目前，印尼金光集團在雲南省的普洱、文山兩州市共種植桉樹86萬畝。到目前為止，雲南省桉樹面積僅占全省人工林面積百分之五，因此在雲南種植桉樹對乾旱沒有大影響。

不過，江迅引用其他資料說明，雲南橡膠林面積達600萬畝，桉樹林面積已有近100萬畝，規劃面積多達2,000多萬畝。印尼金光集團在雲南、海南、廣西、廣東等地，與當地政府簽約租用大面積土地，將自然林改造為人工桉樹林。該集團總資產達200多億美元，是當下中國境內最大的造紙企業。另外，雲南省雲景林紙股份有限公司是雲南規模最大的紙漿國有企業，也是大量種植速生桉樹林發展造紙業。

雲南昆明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侯明明教授認為，西雙版納在北回歸線上是唯一一片綠洲，是熱帶雨林生態系統，如果大規模的工業化種植桉樹和橡膠，把這一片綠洲全部變成桉樹

¹ 人民網，北京，3月31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6800/11265982.html>

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3/100331_china_climate_drought.shtml

³ 〈多策促春耕 抗旱保民生——桂渝川黔滇科學應對罕見旱情〉，2010年03月19日

林、橡膠林，這是人類一場大悲劇。“現在西雙版納可耕面積中，三分之一種上橡膠林了，令人憂慮。我們的研究，已經證明砍伐熱帶雨林，改種成片桉樹林、橡膠林這類純林，對未來氣候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熱帶植物園專家馬友鑫也贊同：‘地理資訊系統監測表明，大規模的橡膠林、桉樹林種植已經影響了這個地方的氣候，十年內平均溫度升高了零點四到零點五度。’

侯明明教授又分析：‘2001年，我就在西雙版納勸說不要再這樣種植橡膠林了，否則會改變地下水系結構。當地林業官員不同意我的說法，說任何一棵樹都是“抽水機”，熱帶雨林的樹和橡膠都是樹，樹都有根，根都會吸水，樹葉都會蒸發水分。老百姓看到橡膠樹能賺錢，就紛紛大規模種植橡膠樹。2008年，當地百姓發現地下水沒有了，才想起我多年前講過的話。桉樹是高耗水、高耗肥的植物。社會生產對自然生產幾萬年、幾億年的資源積累消耗得非常快。爲了造紙纖維，種植那麼大規模桉樹，對整個森林生態系統的破壞，對植物、動物、微生物各種生態系統破壞，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是全球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樣本，對泰國、老撾（寮國）、越南、緬甸等周邊很多國家有示範作用，在雲南省大規模種植桉樹和橡膠，這是很可怕的。’⁴

水利荒廢

西南旱災也暴露了水利長期荒廢的根本問題。江迅引述前水利部長錢正英（1923- ）晚年的反思。錢正英歷任水利部、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部長，曾是中國最年輕的女部長。1988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曾參與黃河、長江、淮河、珠江、海河等江河流域的整治規劃，負責水利水電重大工程的決策性研究。她反省自己早年工作中的失誤：‘我過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個錯誤，沒有認識到首先需要保證河流的生態與環境需水；只研究開發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與效益。這個錯誤的源頭在我。’又說：‘進入九十年代，黃河開始斷流，引起了國人的關注和焦慮。我也在思考，我一輩子同水利事業打交道，

⁴ <前水利部長錢正英揭密中國旱災禍根>，江迅，<亞洲週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c&Path=367592581/14ae1a.cfm

參加過治理黃河、海河等河流的工作。我們多年來一直強調治河、用水，沒想到居然使黃河水斷流了。後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內陸河流也出現斷流。我逐漸認識到，過去的水利工作存在著一個問題：粗放管理，過度開發。’⁵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中國工程院委託她組織各方面專家，研究“中國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她帶著專家組抵達塔克拉瑪幹沙漠北緣的塔里木河邊，看見塔里木河下游的終點台特馬湖，天然綠洲已經化爲沙漠，沿途那些耐旱的胡楊林都枯萎死去。她說中國幾十年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開展水利建設，海河、遼河等河流的開發利用率已經大於百分之四十，超過國際公認的合理值，影響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續利用。⁶

其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水利建設便一直被忽視，一部分建好的水庫和灌溉系統，由於缺乏管理與資金投入而荒廢。市場改革後，水利設施承包者短期逐利行爲嚴重，將水利設施改作他途。全國大面積的耕地一旦碰到乾旱，則無能爲力。像廣西東蘭縣東蘭鎮田洞村村黨支部書記韋宗恩說：‘除上世紀70年代有過一次類似的旱情，近30年了，還沒碰到那麼旱的天。’他們19個水櫃只剩兩個勉強蓄了點水，全屯23戶110人的飲水得靠政府運水解決。⁷

另外，三農問題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接受電視訪談，指出：‘正常情況下，小型水利工程，他並不只是應急的時候才用，他平時就在用，他和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是高度相關的。我們以前70%的投資是投到爲城市服務，或者是電力設備上。我們很少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開展水利建設，我們投到村以下的小型工程上。這是一個重要的投資方向問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政策導向問題。’

⁵ <前水利部長錢正英揭密中國旱災禍根>，江迅，<亞洲週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c&Path=367592581/14ae1a.cfm

⁶ <前水利部長錢正英揭密中國旱災禍根>，江迅，<亞洲週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c&Path=367592581/14ae1a.cfm

⁷ ‘多策促春耕 抗旱保民生——桂渝川黔滇科學應對罕見旱情’，2010年3月19日。

溫鐵軍教授進一步分析：‘全國的水利投入都有大問題。你注意一下華北大地區的水利投入，我們這些年越來越少的做歸積天然雨水。因為是東北季風，有天然措施把天然來水保存下來，一可以補充地下水，二用於日常的生產生活消費。現在我們這些措施都不做了，就打井，就好比我們在祖國母親胸膛上打了成千上萬個窟窿，結果華北平原超採水80%以上，地表沙化、鹽鹼化，這種惡性循環，實在是讓人感到非常痛心。’⁸

湄公河下游乾涸

世界自然基金會曾經於2007年3月發佈《世界面臨最嚴重危險的10條河流》報告，指出受氣候變化、污染等因素的影響，世界上10條主要河流正面臨日益嚴重的乾涸危險：亞洲的湄公河、怒江、長江、恒河和印度河，歐洲的多瑙河，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北美洲的格蘭德河，非洲的尼羅河，大洋洲的墨累—達令河。

這10條“人類的血脈”正遭受人為破壞：河水被抽乾，水壩破壞生態系統，污染嚴重，而生活在流域中的人類和野生動物也面臨威脅。全球大約41%的人口居住在這些流域，1萬種淡水動物和植物中至少20%已經滅絕。長江主要威脅：污染，捕撈過度；湄公河主要威脅：捕撈過度、149座規劃中的大壩、森林採伐、污染；怒江主要威脅：16座申請中的大壩。⁹

而這次中國西南的災情便引出湄公河下流乾涸的問題。素來有東方多瑙河之稱的瀾滄江（湄公河）流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是亞洲一條重要的國際河流。中國是唯一在湄公河上游（中國瀾滄江段）修建水電站的國家。學者、媒體和環保組織指出，中國在湄公河上游的瀾滄江興建水壩，截流發電，導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半個世紀以來最低水準。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宋濤出席泰國湄公河委員會峰會時解釋，中國政府在開發利用瀾滄江水資源的過程中堅持奉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開發與保護相平衡，堅持自身利益與下游各國利益相

統一。通過水壩削峰補枯的調節作用，瀾滄江水電開發還能改善下游通航條件，有益於下游防洪抗旱和農田灌溉。當前瀾滄江（湄公河）流域乾旱問題系由極端乾旱天氣造成，湄公河水位降低與中國瀾滄江水電開發無關。中國也是此次大旱的受害者。¹⁰

不過，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2007年出版的《發展湄公河：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的區域主義與區域安全》報告表示，中國早在1970年代已擬定計劃要在瀾滄江展開大型建壩工程，不過湄公河下游國家到了1990年代初才得知中國的此項計劃。當時因為處於冷戰階段，中國和東南亞沿岸國家之間缺乏溝通，而中國則視境內瀾滄江的水力開發為境內問題，無須與他國商量，也並未考慮到工程對下游國家可能造成的影響。

該報告還提到，處在下游的東南亞國家在各方面發展都遠不如中國，正是中國的經濟政治實力迅速擴張，讓這些國家擔憂中國會為了自身利益不顧及鄰國，繼續在瀾滄江發展建壩工程。

中國學者宣稱，湄公河只有13.5%的水量來自瀾滄江，所以中國興建水壩對下游沿岸國的影響不大。然而，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報告卻指出，儘管中國官方不斷強調來自瀾滄江的水量不多，興建水壩不足以對下游國家造成影響，但是雲南—老撾段的河水來源完全從北部的雲南省流入。到了老撾首都萬象，仍有60%水量來自瀾滄江，而流入越南以及金邊的瀾滄江水量分別為15—20%以及16%，在四月份，柬埔寨也有約45%水量來自瀾滄江。

湄公河委員會成立了15年，中國至今沒有加入，也沒有簽署具有約束力的《湄公河協定》，而且過去一直拒絕為委員會提供水文資料，直至2002年才同意在洪水季節提供相關資料。在湄公河委員會峰會中，泰國要求中國就水壩一事提供更多資訊，與沿岸各國配合。在各方的要求下，中國終於同意向委員會提供雲南省其中兩個水壩的水文資料直至‘旱情結束’為止。峰會結束後，中國及其他與會國發表了《華欣宣言》，表示要促進和協調水資源開發對話和可持續發展。¹¹

⁸ 訪談視頻：
<http://news.sohu.com/20100326/n271125963.shtml>

⁹ <世界十大河流面臨嚴重危險>，《人民日報》2007年11月15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3434>

¹⁰ ‘湄公河水位降低與瀾滄江水電開發無關’，2010年04月06日，人民網《京華時報》
<http://env.people.com.cn/GB/11297526.html>

¹¹ ‘湄公河旱情：都是中國惹的禍？’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0/04/100407_mekong_gianxiaohui.shtml

反思“發展”

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與湄公河下游逐漸乾涸，乃大自然的警笛。我們全力抗‘天災’、求生存之際，其實應該從基本上，反省從國家政策到個人只求經濟發展、追逐利潤而置大自然乃至鄰國／鄰居的生存而不理的心態與行為。惟有追究根本，反省‘征服自然、私利本位’的‘野蠻’行徑，人類才有未來與希望。



轉基因作物爲害人間

青岩

2009年8月，中國農業部批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同年10月，中國生物安全網公佈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華恢1號”和“Bt汕優63”名列其中。

農業部宣稱：“此次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水稻品種是由華中農業大學張啓發院士等科研人員培育而成，是高抗鱗翅目害蟲轉基因水稻品系”，並且聲明“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及《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獲得安全證書後，還需通過品種審定，並獲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後，方可進入商業化生產”。

轉基因作物在中國漸次通行的另一個紅頭文件乃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央一號檔)，其明確推廣轉基因商業化的目的：“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

消息傳出後，引發激烈爭論。連歐美發展國家也未敢投入轉基因主糧的生產，中國已急不及待，‘身先士卒’，實在令國內外都嘩然。對普通老百姓來說，雖然聽不懂艱澀的生物科技專有名詞，但只要看到轉基因破壞自然規律、跨國糧商控制本地經濟、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農民損失慘重等案例，就會明白過來：轉基因作物絕對不靠

譜。

傑克·海勒曼博士(Jack Heinemann)，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遺傳和分子生物學教授、挪威圖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態學高級兼職教授、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員，引用多國案例，證明轉基因有害。1998年，匈牙利籍英國科學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電視節目上宣稱，用轉基因馬鈴薯餵養大鼠，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急劇下降，免疫系統受損壞。普斯陶伊教授因此受到排擠，被迫離開英國羅威特研究所。但是很多科學家出面爲其辯護，而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也重新發表其文章。

2007年，法國科學家證實：孟山都公司出產的一種轉基因玉米對人體肝臟和腎臟具有毒性。2008年，美國科學家於《農業與食品化學》雜誌發表研究結果，證實長時間給小白鼠餵食轉基因玉米，其免疫系統受到損害。2009年12月22日，法國生物技術委員會最終宣佈，轉基因玉米“弊大於利”。

根據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首席專家薛達元所說，加拿大多年種植轉基因油菜後，發生基因漂移，產生耐受多種除草劑的超級雜草；墨西哥農民種植的美國轉基因玉米，其花粉污染了當地野生玉米基因，產生基因重組，破壞遺傳結構；此外，轉基因玉米花粉致使北美的珍稀瀕危物種——君主蝶大量死亡。

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專案組主任方立鋒舉例，自上世紀90年代阿根廷開始種植轉基因大豆，美國孟山都公司已經完全控制阿根廷的大豆生產，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阿根廷完全依賴生產及出口孟山都的專利轉基因大豆，國民經濟與食品安全岌岌可危。孟山都公司沒有為轉基因大豆申請專利，不過，與阿根廷的種子公司簽訂專利使用權轉讓協議，並要求支付使用費。因此，轉基因種子比一般種子貴2至4倍，更糟的是，阿根廷幾乎無法獲取非轉基因的種子。轉基因專利協議禁止農民‘留種’，只能在每次播種季節重新購買。一些大型生物技術公司已經明確，拒絕向未能履行轉基因種子專利條款的發展中國家出售種子。孟山都公司已經從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中獲利，還通過法律手段要求歐洲進口阿根廷大豆商戶支付專利賠償金。

另外，轉基因大豆品種單一化，使得基因資源大為減少，隨著生物多樣性失傳，伴隨而來的就是病蟲害襲擊增多。同時，基因漂移引發基因污染。一般來說，導入轉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進同一物種的非轉基因作物，污染當地非轉基因品種。再者，基因污染還影響野生資源。野生品種在抗病蟲害、抗逆、優質和高產上具有重要的農藝性狀，基因受污染則導致寶貴野生遺傳資源喪失。

與阿根廷一樣，中國也在全球大豆的產銷系統中受制於跨國糧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副教授周立，在2010年《綠葉》第3期撰文〈轉基因利益集團〉指出，從2004年至今，中國‘丟失大豆產業的主導權，跨國糧商實現了“巴西阿根廷種大豆、美國賣大豆、中國買大豆”的全球化戰略後，賺取的是全環節利潤，而中國的豆農和豆企，分別只在生產和收儲加工兩個環節上生存。四年之內，中國就由曾經的世界最大的原產地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3以上的大豆依賴進口，其中轉基因豆油佔據了80%以上。’

不僅國外的案例證明轉基因作物不可取，國內也有出現轉基因棉花種植的失敗案例。據2006年8月4日中國科學院官方網站發佈消息：中美兩國科學家歷時7年，研究中國481戶轉基因棉農，研究結果表明，儘管Bt轉基因棉花有效控制棉鈴蟲，但長期種植導致其他害蟲肆虐，使棉農的經濟狀況不如理想。

調查發現，轉基因棉農的第三年經濟效益最大，平均殺蟲劑用量比普通棉農低70%，而收入要高36%。但是，從第四年開始發生逆轉，轉基因棉花儘管抑制棉鈴蟲，但無法殺死盲蝽等其他害蟲，導致盲蝽侵害棉田。因此，殺蟲劑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農高3倍，而他們的收入卻降低8%。到第七年，轉基因棉農所使用的殺蟲劑，已明顯高於普通棉農，加上轉基因棉花種子成本高，收入大幅下降。

2009年，根據江蘇省種植轉基因棉花的實際案例表明，轉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黃萎病和枯萎病，減產嚴重，收入大降。揚州大學的科研小組研究證明，轉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應對高溫條件。

另外，2005年湖北省出現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之後，海外市場對中國米製品採取控制措施，發現中國的米製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要求產品撤架、召回賠償等。中國從事米製品生產和貿易的企業都受到影響，造成經濟損失。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從整體農耕文明的角度探討‘轉基因種子’的問題。根據農作物種植的科學法則，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種、密、保、管、工”八個方面，轉基因僅在“種”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則以生態和人為因素為主。可見，轉基因僅占糧食構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術”。他指出過去30年來，中國耕地退化程度已遠超過幾百年，恢復地力需要大量有機肥還田，精耕細作。他批評轉基因是在大農藥、大化肥、專用除草劑的基礎上做“種”的文章，會讓人越來越懶，地越種越瘦，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農作物種植惡性循環。

既然國內外已有案例力證轉基因作物禍害人間，但若果還是一意孤行，與跨國資本同流合污，強制推銷有毒糧食，如此禍國殃民之舉，日後勢必民怨沸騰！

參考資料：

- (1) ‘轉基因水稻安全性引發爭論 學者擔憂污染原稻種’，〈瞭望〉，2010年02月08日。
- (2) ‘專家稱轉基因存在三方面不確定性’，〈瞭望〉，2010年02月08日。
- (3) ‘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答問’，〈瞭望〉，2010年02月08日。

【無常行】 之書情記 ——也學代寫情信

伊藥

我把情書寫到街上
寫在遙隔法院前街
你似在圍住困不了的被告位置
越過時空挺立
立成人樣
我倆雖隔卻近
街道上人塵裡我不羞怯公開苦話
大半生後不再譚情 原來
這刻纔激始
我又從黑白的照片中走出來
給憤慨的人們以出其不意的安慰

說從不幻想上訴減刑
入牢前 無淚話夢
祇想來個通身如麻的擁抱
——咱倆
今生幸會，來生再逢應識(甬理哪裡)
好呀不好?

(壹零) 庚寅人日過後補作

(後記：歲前得蔡炎培贈新詩集《代寫情書》，擬徐悲鴻孫多慈及胡蘭成張愛玲。我胆敢學步，擬王慶華和劉霞，無奈給坐牢漢子道情。)

【無常行】 之珍希記

伊藥

竟接到新寫了消息的兩頁存用舊箋
我們匆匆捧起青綠幽幽一束來見
妳似雅心歡喜如持節入臂彎
補說桔梗 是花也是藥
(前卅年多病的時代 夢藥也唏噓)
一路上 自家門往慈雲新住的中心
一路上 被捕的人懷了砒霜
忡忡還要入多少回牢獄
隱隱黃大仙暫棲似再生
妳明堂寬宏仍然

恬靜着自如 把一切一切都吞下肚裡
陪在旁的祇是一杯不動的普洱
小友鹵莽間試說綜援
回以不老革命者的本色
(他返家該重讀加簽了的苦難風雲不悔末頁)
——共英產格主納義雄耐的爾世界
就一定要實現

庚寅芒種翌日拜會老大姐有感

深沉悼念王國龍 (1914 - 2010)

楊林



1945年我初中畢業的暑假，正值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我沉浸在八年抗戰勝利的激情之中。一天我到老師周仁生家徵求報考高中的意見，第一次遇到王國龍先生，他正在分析當時的局勢和闡述抗戰勝利後中國的前途。他認為抗戰勝利的國際大背景是美國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勝利促成的。中國人民從前門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這隻惡狼，後門卻闖進了美國帝國主義這隻老虎。中國將要淪為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國只有組織工人階級團結全國人民，推翻蔣介石專制政權，趕走帝國主義，走社會主義之道路才有真正光明的前途。他的闡述使我異常驚奇，頓時眼前一亮，對他的敬佩油然而生。

我上高中時，常到溫州《地方新聞社》聆聽他的教誨，從抗戰勝利到1949年春，他一直是《地方新聞社》的主筆，使我有機會了解他非常不平凡而值得紀念的生平。

王國龍先生於1914年7月23日(農曆六月初一)出生於溫州市南門的一個貧民家庭。父親王漢宗原籍平陽，農民出身，到溫州城里做豆腐為生。大姐王蘭芳溫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在溫州當小學教員；哥哥王國芳，溫州藝文學校畢業。後來家境困難，王國龍和他二姐只是高小畢業。在家中，比他大十歲的大姐不僅教他讀書，還教他做人。大姐在女子師範讀書時，正值“五四”運動，她在教師影響下，成為運動的積極份子。當時參加“五四”運動的大姐的同學和朋友常到家中談論運動的情況，使幼小的他（五歲）就受到“五四”運動的薰陶。

小學畢業後因家境困難他輟學在家，這時北伐軍十七軍到達溫州，軍政治部舉辦政治訓練班，大姐就叫他報名進訓練班學習。上課的教材

是鄭超麟翻譯的《共產主義ABC》。當時他只12歲，是班中年齡最小的，對老師講的不完全懂，但在這裡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洗禮。

1929年春他到上海東寶興路江東書店當學徒。這是一間以賣外文教材為主的書店。也賣社會科學書籍，如馬克思的《資本論》英文本，日本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出於業務上的需要，他在小學英語基礎（他就讀的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英語）上勤奮自學英語，他閱讀社會科學和歷史的書籍。1928年冬溫州暴動失敗後的一批共產黨人常到書店來碰頭聯系，時任中共中央秘書處幹事的曾猛，更是書店的常客。曾猛1925年六月從溫州去廣州黃埔軍校，參加過省港大罷工，入黨介紹人是鄧中夏和李啓漢，1926年7月隨周恩來北伐。1927年10月被中央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從而知悉蘇共黨內鬥爭的實情。當時托洛茨基有很高的威望，是他一手領導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期間，他被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當時列寧不在，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武裝起義，是他領導了彼得格勒的工人，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後，因為反動勢力在國際資產階級支持下掀起內戰，在緊急關頭他擔任革命軍事人民委員會主席要職，組建了紅軍，粉碎了鄧尼金等叛亂隊伍，拯救了蘇維埃共和國。內戰結束後，經濟建設命脈的鐵路運輸徹底癱瘓，又是他兼任鐵路人民委員，使鐵路運輸恢復生機，創造了一個“只有上帝才能創造的奇跡”，使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威望僅次於列寧。

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要中共參加國民黨。就在蔣介石將要發動“四·一二”大屠殺時，斯大林還認為蔣介石是最革命的，要中共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的勝利果實交給蔣介石。

“四·一二”大批共產黨人慘遭屠殺之後，斯大林認為汪精衛代表國民黨的左派，要中共參加武漢政府，結果三個月後就發生“七·一四”武漢政府對共產黨人的大屠殺，導致大革命失敗。曾猛在中山大學了解到當時托洛茨基關注中國的革命，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主張共產國際應援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裝，在革命高潮時要建立蘇維埃。但托洛茨基的正確主張被斯大林封鎖，不讓

中國共產黨知道。斯大林反而把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罪名嫁禍到陳獨秀頭上。中山大學的學生當時分成支持斯大林和贊同托洛茨基兩派。曾猛選擇了托派。1929年1月中共中央提前調曾猛回國到中共秘書處工作。他利用江東書店向王國龍等人傳播托派思想觀點，介紹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材《政治經濟學》和《西洋史要》給他閱讀。王國龍在江東書店近兩年中讀了不少英文小說和社會科學書籍，在思想上基本接受了托派的政治觀點。

1931年王國龍回到溫州，當時上海神州國光社的《讀書雜誌》刊出中國社會史論戰專欄，發表各派文章，他贊成李季、杜畏之的托派觀點，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曾猛從上海連續給他寄托派刊物《火花》。1932年秋，溫州警察局查到寄給他的《火花》，以“危害民國罪”將他逮捕。其實王國龍當時並未參加托派組織，只是思想上接受托派的觀點。在看守所關了一年多，才由法院宣判徒刑兩年六個月，刑滿時縣黨部派人與他談話，說劉仁靜都已靠攏國民黨了，你還不……，王國龍回答說：“他是叛徒。”就憑這句話不僅不釋放，還將他押到杭州反省院待了七個多月才放出來，他在看守所的拘押期兩天抵一天刑期，這樣前後共坐牢四年。在這四年中，他在監外的朋友支援下讀了大量英文小說和歷史書，如韋爾斯的《世界史綱》、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袁樞的《資治通鑑，紀事本末》等等。出獄後以當家庭教師為生，教英文、中文、古文。

1937年深秋王國龍參加了曾猛等人建立的溫州托派組織，進行抗日活動。溫州托派成員和外圍份子都參加抗日團體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抗日救亡。1938年春節溫州托派組織經選舉產生領導機構第二屆幹事會，曾猛為書記，王國龍為七名領導成員之一。成立外圍組織救亡大同盟，出版刊物《工農兵》。溫州民眾教育館舉辦對市民的時事講座，聘請王國龍每星期講一次，分析抗日時事形勢，指導民眾抗日運動。聽眾中的葉學廉和葉樹芳，原是上海針織廠修理工，上海淪陷來到溫州針織廠工作，他們深受日寇侵略之苦，主張抗日，對王國龍講的抗戰知識和理論很感興趣，要求王國龍對他們廠中當前遇到的問題給予指導。針織業工會在大革命時期是很活躍的，大革命失敗後屬於黃色的總工會，只向工人收會

費，不為工人謀福利。抗戰期間溫州針織業有較大發展，女工人數增加到三千多人，但工資極低。於是王國龍在曾猛指導下，和幹事會成員錢川深入到針織工人中，向他宣傳托派抗日觀點，號召工人要團結起來，向資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資，要求改選工會。工人推選葉學廉等人為工會代表與資方進行談判，結果談判成功，工資增加了，葉學廉、葉樹芳得到工人信任，工人鬥爭積極性提高了，致使工會改選成功，葉學廉被選為針織工會理事長，錢川擔任工會文書。王國龍參加到工會工作中，在曾猛協助下在職工會中建立托派外圍組織救亡大同盟，進行抗日活動，組織女工參加軍訓和救護等戰地服務工作，針織業工會活動更加活躍，引起資方恐慌，要求國民黨縣黨部取締工會，遭到工人反對。縣黨部對工會不好動手，就把王國龍抓起來，關押在警察局看守所。縣黨部知道王國龍是托派，但逮捕的具體活動證據不足。曾猛通過社會關係對王國龍實施營救，關押了兩個多月後獲釋。資方見工會活動日趨劇烈，遂採取關廠，停止生產，轉而開店銷售從上海購進的袜子，迫使工會解散。曾猛提出應付措施：全體工人在廠內靜坐罷工，並監視資方的行動。葉學廉等人發現資方購進的袜子是假冒上海袜廠的日本貨，於是開展抵制日貨的鬥爭，致使日貨被沒收，挫敗了資方的陰謀。

縣黨部為制止針織工會日益高漲的工潮，逮捕了工會理事長葉學廉，引起工人強烈反對，憤怒的女工自發組織，衝進縣黨部，砸了辦公室，然後宣佈罷工。曾猛一邊進行營救活動，一邊透過葉樹芳，組織工人到防守司令部請願，並爭取其他工會工人支援請願遊行。當天針織業三千多工人，加上其他工會聲援的工人，遊行隊伍塞滿了司令部前的整條街道，聲勢浩大，震動了整個溫州城。司令部參謀長答應派人到警察局讓葉學廉與工人見面。葉學廉登上桌子，鼓勵請願工人繼續鬥爭，直至答應我們的條件……“你們千萬不要散掉。”在工人的壓力和曾猛的營救下，葉學廉不久獲得釋放。溫州托派第二屆幹事會期間成立了包括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城市平民運動的工作委員會，王國龍為其成員之一。他除了參與針織業工會等工人運動，還參與指導平陽鄭樓師範學校反特務校長王德懋的罷課學潮，聯系指導多個農民小組，宣傳抗戰形勢，提出農民當前應該怎麼辦。在土地問題上，托派主張地主的土

地歸貧農，獲得農民的擁護。

1939年5月王國龍代表溫州托派去上海向托派臨委會報告溫州的組織活動情況，見到托派領導人彭述之和劉家良。彭述之要他留在上海參加建黨訓練班，由彭述之講課，內容是從第一國際開始一直講到第四國際。在訓練班裏認識了蔣振東、籍雲龍、毛鴻鑒和後來在重慶中美合作所被殺害的王振華等托派成員。一個多月後回到溫州，由于叛徒告密，曾猛、王國龍、陳又東、余嘉等六人被警備司令部逮捕。過了一個多月，曾猛和王國龍兩人被解到金華警備司令部監獄。關押兩個多月後金華軍法官通知對溫州情況不了解，不受理他們的案子，又解回溫州，先在警備司令部後又關押在溫台防守司令部監獄。至1939年冬，王國龍患惡性瘧疾，連續二十多天高熱39-40度，監獄的醫官是他的小學同學，用盡了各種藥物均不見效，遂請甌海醫院內科主任胡長庚醫師診治。胡醫師是王國龍的朋友，他看後說要馬上保外就醫，否則必定死在牢中。從而保外出獄，當時身體極度虛弱，兩條腿已不能行走了。這是他第三次被捕。

在家療養了半年，至1940年夏能走路了，彭述之叫他去上海，要他先專心讀些托派理論書籍，給他兩本書：伊羅生《中國革命悲劇》英文本和美國黑人托派寫的美國出版的《從第一國際到第四國際》，並要他在上海過組織生活。劉家良代表臨委會參加他們的小組生活會，介紹臨委委員對抗日戰爭性質的不同意見：鄭超麟認為中國的抗戰是日本天皇和中國蔣介石之間的戰爭，應採取“失敗主義”。王凡西開始認為抗日戰爭是進步的，但在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日戰爭變成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的一部份，抗戰就變質了，於是同意鄭的“失敗主義”。彭述之和劉家良認為抗戰始終是進步的，應支持抗日，不能採取“失敗主義”。他們之間的爭論成為托派後來分裂為少數派與多數派重要的理論根源之一。

1942年彭述之徵得蔣振東同意，任命王國龍為托派臨委會祕書，處理中央事務工作。在日寇占領上海期間，上海與溫州之間交通極為不便，且充滿危險，王國龍既來回奔波于溫州上海之間，要從事溫州托派工作，又要承擔臨委會各種具體工作，包括同志被捕後的應變，藏匿文件檔案書籍，安置領導人家屬，指導法文日報館排字工人罷工和刻印《鬥爭》報等等，直至1944年冬

回溫州。

溫州托派組織自1939年初秋曾猛、王國龍等六人被捕後，幹事會瓦解而停止活動。1942年彭述之委派王國龍進行恢復溫州托派組織的活動。當時上海托派臨委會已分為多數派和少數派，在溫州堅持托派思想的成員中，以曾猛為代表的一部份人認為在弄清多、少數哪一派正確前，是無法恢復組織的。因此恢復活動一時無進展。後來王國龍決定，先把同意恢復組織的人組成小組，在組織生活中再討論多、少數派的是非問題。其間，受留蘇回來溫州中學教書的安明波托派思想影响的周仁生表現突出，活動能力很強，王國龍找周仁生談了溫州托派組織沒有恢復成功的原因和恢復組織的迫切性。周仁生與安明波商討，於1945年秋提出不用屬於上海臨委會的名義，另取名《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經有關人員討論。同意用《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的名稱恢復組織。曾猛沒有參加。挺進社建立後，在中學生和小學教師中發展了一批外圍組織成員。至1946年秋周仁生等人去上海參加彭述之舉辦的訓練班，然後參加托派多數派，另一部份挺進社成員到上海參加托派少數派，而留在溫州的王國龍等挺進社成員都為多數派觀點，從而溫州的托派組織便由《馬克思主義挺進社》變為托派多數派的溫州支部，挺進社的外圍成員在1947年2月成立溫州托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並發展其外圍組織《讀書會》，使托派思想在溫州各中學學生和社會青年中廣泛傳播。

王國龍自1930年底離開上海江東書店回溫州，為革命事業，從未考慮為自己謀求有工資收入的正式職業，雖在溫州有一定名望，但生活非常困苦，直至1945年受聘于溫州高等商業學校任歷史教師。一年多後，托派錢思敬在上海暨南大學參加學運被開除，回溫州無工作，生活困難，王國龍就將自己的教師工作讓給錢思敬，自己騰出白天搞托派活動，利用晚上時間寫稿，兼任地方新聞社主筆，但微薄工資還不足夠家庭開支。後受聘于溫州普華電燈公司，工資較高，遂將地方新聞社那份工資給了僅靠地方新聞社工資而家境困難的同事，自己仍擔任主筆直至1949年5月。由這兩件事足以看出王國龍品格之高尚。

自《馬克思主義挺進社》成立後，王國龍領導的溫州托派活動的主要工作是學生運動，在青年中發展托派組織，擴大托派思想影响。1946年

“沈崇事件”中，托派號召學生積極參加反對美帝國主義暴行舉行的示威遊行。1947年“六二”反饑餓反內戰的運動中，托派提出反對內戰，反對國民黨政府徵兵徵糧，號召學生罷課、舉行示威遊行，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支持學生運動。到鬧市區張貼反蔣標語，自編反饑餓反內戰歌曲，在遊行時伴隨口號歌唱。

1948年1月，溫州托派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溫州塘河僻靜處的船上，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王國龍出席作形勢報告，指出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對內勾結地主階級，實施買辦資產階級的官僚專政。民族資產階級無力反抗帝國主義資本輸入，也無力反對地主階級，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因此只有組織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未完成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過程中附帶完成，即走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所指引的道路。

1949年5月7日王國龍從溫州到上海參加托派江浙臨委，錢川將從溫州到上海參加多數派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交給王國龍領導。他遂將這批人按住所分成北區中心和南區中心兩個小組，為解決其中一部份人的吃飯、住房困難，發動托派黨內有工資收入者募捐。當時暫停對外活動，組織兩個中心成員學習討論，從理論上認識中共領導的這場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至當年10月間，南區中心的葉徵慶告密，錢川、趙養性首先被捕，王國龍等江浙臨委和北區中心的成員大部份相繼被捕，關押在學校等單位，時間不長。最長的錢川、趙養性關押12天，短的如王國龍等人24小時被釋放，釋放前經過個別談話，對王國龍講的內容為：這次不是有計劃逮捕你們，是你們自己暴露的；希望你們遵守紀律，不能再活動了，否則就不客氣了。這次被捕很快釋放表明中共中央還不準備逮捕托派，但亦表明公安機關已掌握了上海托派多數派的情況，江浙臨委中雖然還有兩人沒有被捕，但不可能再活動了。托派多數派江浙臨委隨之瓦解。錢川等人去了香港，王國龍等仍留在大陸。時隔三年，1952年12月22日，中共對托派全國大搜捕，不僅托派黨團成員無一例外，連參加過讀書會外圍份子甚至同情者和一些親戚、朋友、同學也都波及，只是後者大多以學習班名義關押半年左右釋放。托派黨團成員分別判處徒刑，王國龍判無期

徒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重刑一號監關了20年，其間曾在監獄翻譯組和鄭超麟、杜畏之、周仁生、喻守一等托派一起翻譯外文。王國龍翻譯過有關彩色電視機生產設備技術資料，北歐國家的無線電、助聽器等技術設備資料。1972年9月28日，鄭超麟、王國龍、喻守一等人轉到周浦玻璃廠，周仁生等人到上海青浦勞改農場。這時開始給生活費，可以買馬恩全集和列寧全集學習。其間，王國龍、周仁生、喻守一三人合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事務概覽(1959-1960)》，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七年後，1979年6月5日，鄭超麟、王國龍、周仁生等十二位托派終於被釋放，前後共羈押27年。

出獄後，王國龍和周仁生回到溫州，周仁生在溫州教育學院任英語教師，深受學生歡迎。王國龍配合批改作業，翻譯國外報刊雜誌文章，着手翻譯世界傳記名著伊薩克·多伊徹《先知三部曲》第一卷，周仁生譯第二卷。第三卷共六章，周仁生譯前三章，王國龍譯後三章，全書譯成後，因出版問題，幾經周折，中央編譯局同意出版，但第三卷要採用編譯局施用勤等三人翻譯的。全書于199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在新華書店發售。1999年被評為全國十本好書之一。細讀第一、二卷，品味譯者對原著描述的事件政治背景和論述的透徹理解，文字表達的確切、清晰、流暢，表明譯者的精深中、外文功底和素養，真可謂爐火純青。

九十多歲的王國龍，仍一直關懷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形勢和動態，在資料極端缺乏情況下，努力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視力越來越嚴重減退，還堅持用高倍放大鏡艱難地閱讀中、英文報刊書籍。就在他去世前一個多月我拜訪他時，還與我商量待天氣暖和一些去做白內障手術，希望視力恢復到能翻譯文稿，繼續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沒想到2010年4月4日，九十六歲的老人王國龍遽爾悄然地走了。我們為失去他這位誨人不倦的好老師、無產階級忠誠的老戰士而深沉悲悼和惋惜！

王國龍從童年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熏陶以來，躬身力行，一貫堅持革命信仰八十三春秋，置個人與家庭安危於度外，致力傳播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思想，坐穿國共牢底三十二寒暑，堅貞不屈，不愧為無產階級堅強的職業革命家。他所選擇的道路千辛萬苦，而前程光輝燦爛！

（轉載）

一位純粹的職業革命者 ——悼念王國龍先生

段躍

2010年4月4日，溫州城的一座老人院裏，有位老人逝世了，其名王國龍，終年96歲。

在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革命史上，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情：中國早期托洛茨基主義革命者就此絕跡。

中共元老也是托派元老的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相繼在1983年、1998年和2002年去世。2006年，我採訪王國龍老人的那一年，他已經成為僅存在中國大陸的托派中年齡最長者；如果把中國托派分為四個歷史時期，他應該是第二個時期的元老級人物。

我採訪王國龍老人那年，他已經92歲了。當時，老人講話底氣十足，出口成章；每次開場，從不寒暄，坐穩後，總要先說一句：“下面我們開始工作”，然後就是他極有條理的敘述；三個小時下來，他能一口氣講到底，我幾乎無法打斷。後來溫州的另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邱季龍先生告訴我：“我參加托派時還是中學生，王老是溫州托派領導人”，“那時我們經常劃著小船在溫州城彎彎曲曲的河道上開會，王老坐在船上，借著月光給我們上黨課，講‘不斷革命論’，講共產主義理想，講馬克思主義，講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他那時的演講就是這樣的聲音，富有激情和煽動性，令我們著迷……”

（一）

王國龍出生於1914年。他的童年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氣氛中成長的。當時，比他大10歲的姐姐正在溫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在一位女老師的引導下，王國龍的姐姐成為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這位女老師就是溫州早期共產黨

員，中共溫州獨立支部的創立者胡識因。那幾年，姐姐經常帶著他參加溫州城內激進人士的遊行、集會和討論，見到過許多後來成為共產黨人的革命者，王國龍回憶道：“因為我姐姐的關係，很小我就曉得五四運動了”。

1924年，小學畢業後，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王國龍沒有繼續上學。姐姐通過朋友把他送到北伐軍十七軍政治部在溫州舉辦的政治訓練班，他當時只有13歲，是班裏年齡最小的。他的老師就是日後著名的文化老人蘇淵雷先生。在為期半年的學習中，王國龍接受了共產主義啓蒙教育，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個馬克思主義，中國有一個共產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王國龍所欽佩的幾位革命者慘遭屠殺，他回憶：“到了‘四·一二’時，我自己認識的一些朋友，還有個老師，看著他們被國民黨殺害，我在感情上是非常難受的，這不是什麼思想上的正確認識，而是感情上的”。訓練班隨著北伐的結束而解散，王國龍只得輟學。

1929年冬天，王國龍被送到上海江東書店當學徒。這家書店實際上是溫州一帶左傾激進青年在上海的聯絡點。學徒期間，王國龍結識了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早期中國托派曾猛。那時曾猛還是中共和托派雙重身份，是中央秘書處幹事，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也結識了第一個中國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陳亦謀、梁幹喬等；還結識了中共溫州獨立支部時期的一批黨員，如鄭馨、王國楨、施德彰等，他們大都是在溫州的城市暴動或農民暴動失敗後逃亡上海的。革命者經常聚在書店討論時局，策劃暴動，

傳遞情報，17歲的王國龍在這神秘、莊嚴又恐怖的革命氣氛中耳濡目染。

我曾問過他，你在青年時期接觸過中共，也接觸過托派，為什麼沒有選擇中共呢？這個問題我問過兩次，他始終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我的這個思想已經貫穿在口述中了”。於是，我從口述裏尋找，果然發現一條清晰的邏輯：王國龍少年時代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啓蒙，相信中國革命的出路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大革命失敗後吧，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啓蒙，得知十月革命勝利後，在社會主義這條路上出現分歧——斯大林之路和托洛茨基之路；斯大林之路朝向個人專制，而托洛茨基之路朝向“不斷革命”。他說：“托洛茨基最打動我的理論就是‘不斷革命論’”，而他所嚮往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也正是“不斷革命論”的勝利。

（二）

在王國龍的一生中，共有6次被捕經歷，其中兩次被判刑。他的第一次被捕是在1932年，時年19歲。其罪名是“危害民國”，證據是經常收到從上海寄來的“反動刊物”（中共的《紅旗》和托派的《火花》），刑期2年。當刑期屆滿時，王國龍堅持不認罪，說：“我現在不是共產黨，也不是托派，但我一出監獄就正式加入托派組織”。因為這句話，他被加刑半年。以後，他又被捕過3次，兩次是在組織工人罷工時被拘留；另一次是因為叛徒告密，托派身份暴露。他被押送浙江省軍法處候審。在民國司法中，中共和托派是沒有區分的，一概稱做“共匪”，所以他在第三次被捕時曾與中共黨員關押在同一間牢房。輾轉幾個監獄後，他患了急性瘧疾，生命垂危，在托派同情者的幫助下，保外就醫。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共坐牢四次，時6年有餘。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後，王國龍兩次被捕。一次是1949年10月，拘留一天後釋放，王國龍回憶：“那次被捕還沒有稱我們是‘人民

的敵人’，只是告誡我們，‘要少數服從多數’，停止一切活動”；第二次被捕是1952年12月22日。但“那一次，對我們的用詞就改成‘人民的敵人’了。”1953年他被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無期徒刑，關押在提籃橋監獄，直到20年後，轉送上海郊區的勞改農場7年。加起來共27年。

算一算，在王國龍老人96年的生命中，有33年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且集中于人生的青壯年期。

（三）

溫州的托派是中國托派中較為活躍、人數較多的地方組織。創建於1937年抗戰前夕，王國龍是溫州托派的創始人之一。

在溫州托派最活躍的時期——抗日救國運動，針織業工人運動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學生運動以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革命運動中，王國龍都是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在溫州托派組織被當局破獲，並沉寂一段時間後，他開始了艱難的組織恢復工作，不久，托派組織再次活躍於溫州的中學生、教師、職員和工人中。同時，他還為浙江省其他地區的組織恢復工作做了許多工作。

在1939年到1949年的十年中，他往返於溫州與上海之間，一方面參與托派中央的事務性工作，另一方面繼續學習托洛茨基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期間他幫助彭述之辦理論學習班，聯絡托派同情者和工人組織。當時托派中央機關經常因有人被捕或時局變化面臨危險，領導人及其家屬和文件經常急需應變，托派中央兩次重要應變的具體事宜都由王國龍一手操辦。1942年，在托派內部第二次分裂的艱難處境中，王國龍擔當起秘密油印中央機關刊《鬥爭》報的工作。實際上，他是彭述之的工作助手。1949年，托派中央機關遷往廣東、香港後，他擔任了由中國托派多數派組成的江浙臨委委員，實際上是中央機關的臨時執行機構，這個機構只工作了幾個月，就自行解散了。

從1932年第一次被捕到1949年革命勝利，共時17年，王國龍沒有一個穩定的職業，真正穩定的職業，唯有他心目中神聖的革命。

（四）

當我通過上海的周履鏘老人，聯繫採訪王國龍時，王國龍回信說：“我不是知識份子……我只是小學畢業學歷，我的文化、理論修養和外語，都是自學的。”

在江東書店，來來往往的革命者都曾是王國龍的良師益友，他回憶道：“曾猛除了口頭給我講托派的道理，還給我看書，就是中山大學的教材，我記得有一本是《政治經濟學》，還有一本是《西洋史要》。我的自學就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記得我還看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如日本河上肇的書”。“書店裏還有一個叫何止錚的人，是溫州師範的，參加過大革命。中共‘五大’以後，他和曾猛一起到蘇聯。1931年後回國，一到上海就被曾猛拉到托派裏面去了。他住在江東書店後，我們整天在一起，他在江東書店裏翻譯了高爾基的《母親》，那個時候俄中字典還沒有，我記得他是用《俄和字典》翻的。翻譯以後，是我抄的，全部抄下來”。後來這本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是《母親》中譯本的第一個版本。

江東書店的這段經歷，使王國龍的求知欲得以開發，從此，自學成為王國龍終身的習慣。他回憶說：“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先後被捕四次，一共坐了6年多牢，我的英文和古文等許多知識，都是那段時間自學的”。以至在他第一次被捕的最後一年，監獄管事竟請王國龍擔任自己兒子的古文和英語老師。1949年前，王國龍在溫州的師範學校、商業學校當過教師，在溫州一家報社當過主筆，撰寫和編輯了許多文章。在提籃橋監獄服刑期間，他曾被派到翻譯組，翻譯過一些無線電、助聽器等技術資料；1979年後又翻譯出版了《國際事務概覽》（上海譯文出版社）、《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中央編譯出版社）。閱讀他翻譯的《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不得不欽佩

他在英文與中文方面不凡的造詣。

（五）

王國龍和所有職業革命者一樣，一生居無定所、顛沛流離。

1949年以前，王國龍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這是因為他的經濟來源必須隨革命活動的需要而定。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個人收入微薄，即使偶爾收入豐厚，也要拿出一部分接濟比他更困難的同志和朋友。1949年革命勝利到1952年被捕，他沒有職業，沒有經濟收入，靠親屬和朋友們的幫助過日子。他回憶，“一直到我到了周浦以後（1973年），給我生活費了，我才能給家裏寄錢回去”。

王國龍1941年結婚，生育過三個子女，子女的幼年時期他都在為革命活動奔忙，無暇顧及。當我問到他：作為托派，您給家屬帶來怎樣的影響時，我看到他慚愧、內疚、痛苦的表情。他說：“第一個，我老婆的神經病就是1952年我在上海被捕時發病的，她就在我姐姐那裏瘋了。我的姐姐沒有辦法，只好把我的老婆送回溫州。到溫州後，她和娘家人住在一起，慢慢好了，但是神經一直沒怎麼康復，所以她一直到老，這個病根子還時時發作。

第二個，我一逮捕，我家裏還有三個小孩子，生活怎麼辦？是我老婆的弟弟承擔了我們全家的生活，而且他又培養我大女兒讀到高中。他本來是準備幫我的女兒繼續讀大學，但是因為我的關係，我女兒不能考大學，唯讀到高中為止。因此他無力結婚，他到死沒有結婚。並不是他不想結婚，沒有能力結婚啊！這就是我的舅子，我舅子，他是一個工人。

我的兒子唯讀到初中，初中還沒畢業，在工廠做工。我的二女兒也是初中沒畢業就做工了。我老婆在街道的一個工廠裏面做工。我的大女兒也在工廠做工。

我被捕的時候，我大女兒大概是9歲吧，一個反革命家屬在社會上該怎樣生活？還不僅是

不能讀大學，對她的影響……到現在還心有餘悸”。

我發現，王國龍老人在回答這類問題時，總是很簡練，很不情願，有種既然提起，就儘快說完的不堪，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不安。

考察王國龍老人的個人生活，革命與個人利益的關係是背離的，革命沒有成為他獲得個人利益的目的和手段，就此而言，稱他為純粹的職業革命者，當之無愧。

（六）

在辛亥革命、北洋和民國那段歷史中，中國的政治革命一直都是由形形色色、能量各異的革命團體攪在一起，對近代中國社會共同發生作用的。在我所能夠閱讀的文獻中，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的革命更像是亭子間裏的革命，按照托派元老王凡西的話說：“它不過是一個帶有宣傳性的革命小團體”。王國龍老人也在口述中明確說：“中國托派在組織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沒有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說明了它自身的缺陷”。

有朋友曾經問我：“何必花那麼多時間關注早已被遺忘的托派？如果中國革命按照托派的主張發展，照樣沒有出路”！的確，朋友的好意不無道理，如果按照托派的理論和組織方式去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去解決中國發展道路上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有太多局限，但這些是不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呢？是不是改寫甚至抹去這個歷史事實的理由呢？

王國龍老人96年的生命史，十幾歲開始的職業革命生涯，向我進一步訴說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紛繁的中國革命舞臺上，中國有一批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存在過，他們以革命的名義和方式存在過；他們在向中國民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啓蒙中作出過重要貢獻；他們在抗日戰爭和推翻舊政權的運動中是革命的積極行動者。這

是不能更改的歷史事實。

王國龍老人的逝世不應該成為這個歷史事實的絕跡，而是還原歷史真相的開始。

在這篇悼念文章的結尾，我引用一段王國龍老人生前的譯文以示紀念：

“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從革命編年史上一筆勾銷或即使留著他的名字也只為使其成為大叛徒的同義詞，斯大林的宣傳機器已瘋狂地工作近30年了。對蘇聯目前這一代人來說（而且不僅是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經歷已經像一座埃及古墓，人們都知道墓中埋葬著一位偉大人物的遺體和用金字鐫刻的有關死者生前功績的記錄；但經過盜墓及盜屍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蕪淒涼、一無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過去藏有記錄的痕跡。照目前這種情況來看，盜墓之徒持續不斷的反復洗劫甚至對有獨立見解的西方學者和史學家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儘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經歷的記錄還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現在大多已被人遺忘的著作和他的檔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敵對的當代人的大量回憶錄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間和革命以後出版的俄國期刊的合訂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保存在黨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逐字逐句記錄的報告中，而且幾乎所有這些檔資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圖書館裏找到，雖然其中少數資料只能在私人圖書館中找到……”

——摘自《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波）伊薩克·多伊徹 著

王國龍 譯

2010年6月於北京

【編按：本文作者為中國一位大學學者】

沉痛懷念王國龍老戰士

李冰

王國龍老戰士於1914年6月19日出生在浙江溫州市區南門，父親是製造豆腐謀生藉以養家的城市貧民。他很不幸在2010年4月4日逝世，終年96歲，我們對他的逝世深感難過。

他自從信仰馬克思——托洛茨基主義以後，儘管歷盡艱難險阻，飽受國民黨及其後中共政府打擊，但矢志不移，信念無改。這種無產階級革命家氣質，是很難能可貴的。

他在1926年小學畢業時，正是中國處於1925-27年第二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他年僅13歲，便參加北伐軍政治部在溫州辦的政治訓練班，了解到共產主義思想，學習半年後，即發生蔣介石反革命的「四一二」事變，學習班解散。

1929年初到1930年底，他在上海江東書局當學徒，這段時間學習英文，閱讀共產主義書籍，接觸到大革命時期中共的黨員曾猛，曾猛在蘇聯留學時，接受了托洛茨基對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意見，認為是斯大林領導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所造成的，因而參加了左派反對派，回國後在溫州發展托洛茨基派，使溫州托派組織後來成為中國托派的重要地方支部之一。

1932年，王國龍因經常收閱《紅旗》被國民黨拘捕，以「危害民國」罪判處2年6個月徒刑，因拒不認罪，增加刑期，前後共監禁了4年，在獄中自學英語和中國古代經典著作，研究世界歷史。

1936年出獄後，他在溫州城當家庭教師，教授英文、中文等，以維持生活，並且自覺傳播托派的思想主張。次年下半年，開始參加溫州的托派活動，成為托派的溫州支部頭兩屆幹事會的成員，是溫州托派的始創人之一。期間參加永嘉戰時青年服務團的抗日工作，後來被中共負責人發現其托派身份，開除了出團。

1938年春，因參與組織了永嘉針織業工會選舉、罷工等工運，第二次被捕，關押了兩個多月後，因證據不足獲釋放。次年秋，第三次被捕，至冬天因病重保外就醫。次年又因罷工

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拘留4天。

1939年5月，他代表溫州托派組織到上海，與托派中央聯系，嗣後10年間奔走兩地之間工作。

1952年12月22日，與全中國的托派同志同一時間，被解放軍軍管會逮捕，3年後判處無期徒刑。直至1972年9月末，他和仍被監禁的最後一批托派黨員被宣佈釋放，但釋放證立即收回，王國龍被送到上海周浦玻璃廠（勞改單位）勞動，由監禁改為管制或軟禁，不過每月領取到生活費。

在提籃橋監獄服刑期間，他參加監獄翻譯組的工作，參與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國際事務概覽(1959-1960)》；80年在家翻譯了伊薩克·多伊徹的《先知三部曲》三卷集的第一卷，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此書出版後成為當年全中國十大暢銷好書之一，是公認為研究托洛茨基的權威著作。

總觀王國龍老戰士的一生，許多次被逮捕及監禁，特別是中國解放以後，長期失去自由，坎坷多難，備受迫害打擊，但堅強迎戰，至死無悔。

在最後的晚年期間，他寫下不少回憶。其中由《十月評論》發表過的，先有《曾猛其人》，登載於本刊2007年第2/3期（總第223期）和2009年第1期（總第226期）；該文同時詳述了溫州托派組織的發展。本期則刊出其最後撰寫的兩篇憶述：《1941年至1946年溫州托派的簡況》和《1941年秋至1944年的回憶》。從這些憶述中，可見他記憶力的良好、意志的堅強、不屈不撓的品質。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友好們接到他的來信，依然顯出他的思想敏銳、親切待人的一貫態度，他的逝世，實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2010年5月28日

1941年至1946年的溫州托派簡況

王國龍

1939年針織業罷工被國民黨破壞之後，曾猛、王國龍、錢川等人，有的被捕（曾、王二人），其餘的停止活動。這一段時間內，溫州幾乎無組織活動。

1941年秋天，周仁生到溫州模範小學教書，1942年春又來了林松祺、章濤（宏業），再後黃禹石來了，黃接替余烈夫成為模範小學校長。在模範小學，我們組織了“別了”讀書會，讀書會的成員有胡振東、邱季龍、葉征慶、胡大鏞、陳鶴梅、席時佳、沈艷芳等人，當時他們都很年輕，只有13-14歲。讀書會出版了“別了”牆報，平時要他們多看小說，多寫牆報文章，談不上思想影響。但這個讀書會會員，是以後溫州托派學生中的中堅份子。以上七人先後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四六年後，他們在溫州中學、甌海中學、永嘉聯合中學，都有活動。溫州中學是活動的中心，胡振東、邱季龍成了學生自治會的積極分子。他們發展起來的同學在甌海中學為葉征慶，在永嘉聯合中學里，例如葉春華等，都是學生自治會中的主要負責人。

1942年，模範小學停辦。周仁生、林松祺、章濤都先後赴浙江大學龍泉分校（設浙江龍泉）讀書。這時，浙大分校有一位從蘇聯歸來的安明波教授（杜滄白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安明波雖已脫離組織，但他個人仍有活動，我們都受他影響。1942年—1944年，在安明波指導下，每星期都有一次時事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主要學生（後來均參加托派組織）有周仁生、林松祺、章宏業、洪秀榮、趙養性，其餘參加者只能算是同情者，也有一位共產黨分子陳建新（那時沒有正式參加共產黨）。浙江大學托派運動的種籽，是在那時散播下來的。

馬克思主義挺進隊

1946年春假期間（約4月4日-6日），安明波任溫州英士大學教授，周仁生在樂清中學教英語，林松祺在樂清師範教書，常去安明波家與他討論問題。恰好劉加良此時剛從溫州回上海去，他在溫州治病時我們有三人（周、林、章）常去看他，因此在劉的影響下，有在溫州成立組織的設想。

設想終於實現了。

1946年4月6日-8日（日期記不確切），安明波、周仁生、林松祺、章宏業（以上四人肯定）（是否還有洪秀芳、趙養性、錢思敬不能確定）在溫州西門安明波家裡開了個會，大家一致認定有組織的必要。經過討論，取名為“馬克思主義挺進隊”。主要負責人推安明波，周仁生負責宣傳，章宏業負責組織。當時討論了綱領和組織章程。綱領由周起草，章程由章起草。第二天討論通過了這兩個文件。組織成立後，並未與王國龍取得聯繫。

1946年4月的稍後時間，王國龍、陳幼東（又東）、謝循歡（以上三人是溫州托派組織中的老成員）三人來到我家。這是一個晚上，在我家樓上開個碰頭會，我把成立“馬克思主義挺進隊”經過，向他們作了彙報，他們同意向上海方面聯繫，取得承認。

同年7月間，安明波、周仁生到上海去了，留在溫州的幾個人，後來把“挺進隊”改名為“馬克思主義挺進社”，直到上海托派中央承認溫州的組織之後，這個名稱就停止不用了。

1946年底或1947年初，溫州組織得到上海多數派中央認可之後，便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溫州支部，支部設有中心小組，負責人是王國龍，支部成員有謝循歡、林松祺，後加進趙養性。林、趙兩人先後負責學生支部（1947年暑假後，才設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生支部有溫州中學、永嘉縣立聯中、甌海中學等。此外還有小學教師支部和手工業工人支部。以上情況，猶待補充。

溫州各中學、師範托派活動情況

第三臨時中學

1945年2-3月間，王國龍在瑞安大壩鎮（今文成縣）省立第三臨時中學教書時，經過半年時間，成立了“仰韶讀書會”，成員有徐明烈、吳祖塘、朗起秀、潘公一、諸勉華、朱靜霞、趙高峰、趙義芳等十餘人。後來徐、吳、朗三人都成為S.Y；其他人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在第三臨

悼念王國龍專頁

中，王還影響了諸葛夏、趙青音、趙頤廬、伍恭聖、黃錦標等人，他們以後都成為S.Y.。學生中的同情分子有10-20人左右。他們當中有的是“仰韶”讀書會分子，有的是通過個別談話而成為同情者的。

溫州師範

1945年暑期假後，王國龍從第三臨中轉遷到瑞安鄭樓溫州師範教書，一起到溫師的還有錢思敬、林松祺、梁廷等三人。他們在溫師只有通過個別談話，沒有組織讀書會，半年時間內，他們四人先後影響了葉幼楊、鄭叔杰、王信蜀（以上主要是梁廷影響的）、白素冰、李淑荷，這五人都成為S.Y.同情者，還有陳湘君、鍾毓麟，王高林（？）。以白素冰為首，曾經領導過反對學校不民主的學生抗議活動，但沒有成功，白素冰蒙受莫須有的罪名，曾被國民黨政府拘留過。

樂清中學

1949上半年，王國龍在樂清虹橋縣中，林松祺在永嘉濟時中學都有活動，僅起到一般影響。王在樂清虹橋縣中成立籃球隊，成員有耿禮源、耿禮宣、王克勳、王克禮，但同情傾向較深的是耿禮源和王克勳兩人。

瑞安中學支部

在溫州托派組織及其活動範圍內，瑞安縣（現改稱瑞安市）是一個重要的據點。三十年代的托派成員何止錚（何阿芳）、何樹芬兩人都是瑞安人，他們的活動影響雖不大，但都起了一些作用。1946上半年梁廷到瑞安師範教書時也留下影響。從1949年初，直到1952年為止，瑞安中學成立托派S.Y.支部，與此支部有聯繫的人是鄭叔杰、余振榮。支部的詳細情況猶待補充。由於這個支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仍然積極活動，因此，1952年12月22日事件中，支部受打擊極其嚴重，有三人以上被逮捕，包括徐振榮在內，其餘的送訓練班（學習班）。

與溫州有關的若干支部

一．台灣支部

1947年暑期後，台灣的高雄、基隆、台北有從溫州去的三人，夏延樊在基隆海關工作，洪秀榮在台北或高雄一化工廠工作，凌松民在台北

一汽車運輸公司工作。同年上海動員蘇濤（山東人）到台灣去，因此成立台灣支部，共9人。他們有油印刊物，蘇濤是支部負責人，聯繫的對象有白長生（白素冰的哥哥），永強人張鳴謙，樂清人方x x。但1948年上半年，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了油印機關，搜去油印刊物及上海寄來的文件及刊物。同時蘇濤被捕，判無期徒刑，洪秀榮被捕判刑五年，夏延樊被捕，判15年徒刑；唯有凌松民逃回溫州，然後轉到上海。台灣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下令通緝周阿寶（即王國龍的化名），曾由他表弟沈雲芳通知我，到上海中滙大樓會面，說是香港派人來接洽的。我到了中滙大樓後，離約定時間半點鐘前，我發覺香港來人，只知道我的化名周亞生，而不是周阿寶，顯然有疑竇，我立即離開。十五分鐘後，我表弟沈雲芳被帶走，他用金蟬脫殼的辦法，把特務帶到一個溫州廚師周洪寶的公司里，說這就是周阿寶。洪寶、阿寶特務不管，把周洪寶帶走用刑，但周洪寶確是不識字的工人，交公司担保釋放，這是王國龍一生中最有可能被國民黨逮捕的危機。

1948年後去台灣的還有潘教文（交大學生），陳偉。潘教文住台北鼎泰船務行他堂姨夫余毅夫家，不久林一心（陳代青）、蔣經國被逮捕，令他今後不得再有活動，否則逮捕判刑（此情況，教文可能已寫過回憶）。章濤吳祖塘去過香港，不久在香港工作。

二．金華支部

1947年國立英士大學遷往浙江金華。英士大學有林錦芳、席時佳（女，SY）以及金華郵電局的郎起秀，成立金華支部，林為負責人。每月開會一次，有時不定期開會。因此英士大學有過支部，但活動消沉未能擴大影響。

衢州中學

浙江衢州，有一所中學叫衢州中學，1948年，周朝林在該校執教一年左右，他在學生中有一定影響，受影響的學生共有劉佳、阮堯偉，王廣陵等五人，他們讀過《青年與婦女》、《新聲》、《校內生活》以及托著《中國革命問題集》等。劉佳在1950年考取復旦大學。康溪從香港返回上海，途經衢州時與周朝林、劉佳見面，並在周的房間裡約劉佳及其他受影響的學生舉行長談一次。

開化中學

陳玉琦曾于1945年在浙江開化縣開化中學教書，經周朝林介紹，開化中學教師趙行真與陳接近，但陳在開化中學的影響不大。

浙江杭州組織活動的情況

杭州的托派活動，主要集中在浙大與杭州師範，浙大曾成立一個多、少數派相混合的支部，支部書記是曹毓麟，成員有諸葛富夏，杭師的白素冰，也加入了這個支部。少數派有另一個支部，支部書記仍是曹毓麟。白素冰在杭師成立了托派小組和讀書會，讀書會成員有陳雪琤等人，白素冰還聯繫杭州高中，其中有王高林等人受影響最深。杭州楓林橋小學教師田毓瑛，常與白素冰有聯繫。1947年7、8月間，彭述之來杭州一趟，向上述提到的人，作過一次時事分析。浙大與杭師托派成員在1947-1948年間都積極參加反飢餓反內戰遊行活動。在杭州的托派同情者有周蕙芬、王芝翠、鍾毓麟。浙大農學院的王栩（女）曾讀過托派的刊物。

江蘇靖江縣托派組織及活動情況

1946年8月，彭述之接受江蘇靖江縣蘇北中學校長盛逸白的要求，從上海選聘一位英語教師去任教。彭要周仁生到靖江去。1946年8月到1947年1月，周在蘇北中學任教英語，在此期間內，周在學生中影響了三個人。即孫鈺華、金鑑、陳琪東，另一是教務處的職員展明倫也深受影響。1946年10月—11月，在離城10里左右孫鈺華的家成立了蘇北中學黨團混合小組，展為黨員，其餘三人為S.Y活動分子。小組負責人推孫鈺華，孫鈺華是個十分忠誠而又積極的SY活動分子，他後來在靖江蘇北中學發展一批讀書會分子和同情者，其中包括范廣譽、范成秋，朱麗華（？）等人。1950年後孫考進復旦大學，於1952年被捕。

展明倫1947-1948間到南京郊區任教，曾與當時的中央大學學生熊安東及熊xx（靖江人）有聯繫。

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憶

王國龍

1941年秋，我接歐伯（編者按：即彭述之，下同）來信，信中有歲月如馳，賢者不免之語，鞭策我不要蹉跎歲月，耽誤時間，我當即決定去上海。

當時溫滬航運已完全中斷，我只能從旱路經寧海、渡海到沈家門，再乘船去上海，但走這樣的路徑，我沒有經驗。我打聽到溫州人跑單幫的都是按上述路徑去上海的，經人介紹我終於找到了這樣的旅伴。按照他們的囑咐：不帶行李，穿中式衫褲，裝扮成跑單幫做小生意的商販。

我隨他們，一天步行六十華里，到達海寧縣屬的三門灣。那裏已無國民黨政府，由游擊隊管轄。游擊隊的哨兵把我們一行三四個人，押送到設在山上的隊部，搜了身後把我們送到當地人的屋子裡。要我們上閣樓，但是沒有樓梯，他指示我們從大樹上爬上去，同行中老于此道的，跟屋主人商量去沈家門的事。他答應了，我們在閣樓裡住了兩天一夜，三餐都在閣樓上吃，說好伙食

費和船隻介紹費。第三天天未曉，屋主人領我們到海邊，乘上一艘小帆船，船上已有三四個人。一共七八個人，把船艙都擠滿了。船老大囑咐我們只管睡覺，不管海上有什麼動靜，都不得驚慌作聲，到吃晚飯時他會叫醒我們等等的話。我沒有經驗，聽了他的話反而不能入睡。想不到花了大筆錢，卻是把自己的命運付託給老大。同船的倒都睡得很香，那天下雨，又是逆風，船必須抗風作“之”字形行駛，時船向左舷傾側，一時向右舷傾側。好在我不怕暈船。中午船老大叫我們坐起來吃飯，下飯的只有一樣鹹魚，那頓飯倒吃得很香。飯後同行的安慰我：老大有經驗，放心好了。傍晚，終於平安到達沈家門。

當時沈家門已淪陷，同行的領我到一家他們熟悉的小客棧，等候辦理領“良民證”的手續。因為買輪船票須憑“良民證”，這事都無須我們出面，一概由小客棧主人代辦。我們只要按他說的給錢。第三天客棧主人把“良民證”連同船

票交給了我們。我那次帶的錢不夠，同行的慷慨借給我，要我到上海後還給他們。

從沈家門到上海，不過一夜多點的時間。我們一上岸就要他們跟我去宏華商行。葉正度見我平安到達，非常高興。當即向同行的表示感謝，當場還了他們借給我的錢，他們看到我這樣有信用，非常滿意。

宏華商行

1940年冬在我離開上海後，葉正度經李國棟和黃禹石介紹，已見了歐伯。他向歐伯表示：他做生意為賺錢幫助托派。他不是說空話。說到做到，當時“臨委”要復印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英文版，他當即拿出五百元。因此，歐伯信任他。

由於歐伯的撮合，同情者李華卿、劉祖強（新新公司人事科長）、羅瑟希（道亨銀號的高級職員）和金源錢莊的經理夏杏芳，加上葉正度合夥開設宏華商行于北京路中一大樓（這個寫字間原來是夏杏芳的，投資最多的是夏杏芳，同時其他諸人知道正度會做生意就推葉正度當經理，華卿當副經理，並安排高子良（輩）在該行當職員。他們志同道合，彼此感情極為融洽。

正度當時住在威海衛路《中社》公寓。歐伯在正度住的房間先後開過兩期講座：《自然辯證法》和《俄國社會思想史》。我到上海時，《自然辯證法》已近尾聲，我聽了《俄國社會思想史》的全部，參加聽講的有華卿、祖強、小羅、正度和我外，還有高子良和籍雲龍。

高子良廣東中山人，是中山一所中學的教師，梁廷和羅瑟希都是那所中學的學生。歐伯到香港解決寒君問題時，把高連同劉康、李永爵、楊玉瓊、劉寬德等一批青年帶來上海。高子良和劉加良、劉祖強原都是朋友。

李華卿原是光華大學畢業的學生，留學過日本，在大學時他就是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的熱心讀者，他在中國社會史論戰過程中曾寫信給《讀書雜誌》，（信發表在雜誌上）從信中，可以看出他對論戰中托派作者的觀點，特別是杜畏之的觀點表示贊成，後來他結識杜畏之，因杜很尊重歐伯，華卿到上海來找歐伯。

劉祖強是劉加良的同鄉同學，在北京讀大學時開始受托派思想的影響。他同情托派，願意幫

助托派。他在南京路上三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當人事科科長。新新公司店員中的托派份子都是他的關係進去的。

羅瑟希在中山讀書時受劉家良和高子良的影響，也是一個願意幫助托派的同情者。以後我還要記述他的具體幫助。

那次我在上海的最初幾個月，正度的生意看來比較順手，他也顯得信心十足。有一次他對歐伯說：要承擔歐伯一家的生活，包括子女的入學費用，歐伯只是微笑搖頭說，他的熱情可感，但不能接受這份好意。據歐伯事後對我說：生意不能保證一帆風順，雖然他一家生活費並不很大，但長期承擔，豈是易事，何況他也不能依賴別人的幫助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這件事表明：一，正度當時熱誠固然可嘉，但他沒有考慮他還沒有建立起足以承擔這一責任的可靠物質基礎。二，歐伯不願輕易接受別人的物質的幫助。這點不但歐伯，碧蘭也是如此。不但對正度，歐伯對李國棟幾次提出幫助他也同樣婉言拒絕。但是歐伯卻是真的希望宏華商行能夠賺錢，用以幫助托派組織出版刊物。

不久，日寇佔領租界，上海成了淪陷區。這對正度做生意的信心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他嘆息說：夕陽無限好，意思是他要做生意“只是近黃昏”。宏華的股東們商量了一下，正度提出把宏華資本連同金源錢莊的貸款都拿去購進顏料設法運到溫州出售，因為內地可以獲利，股東們都信任正度的計劃；一方面採購內地需要的顏料，一方面要我先回溫州，準備接貨，其時李國棟已回溫州，黃禹石也要回去。歐伯勸黃不要走，向金源錢莊推薦用黃擔任錢莊的祕書。夏杏芳同意了，黃也覺得這個職位適合，但他要先回溫州一次，出來再進金源，為此夏杏芳設宴為黃餞行，叮囑黃盡早回來就職，因此我和黃一起乘船去沈家門，事前經楊國森的介紹，到沈家門後住宿在一溫州人開設的一家木行裡。木行老闆免費接待我們，有如上賓，黃不願經三門灣從陸路回溫，要等有直放溫州的帆船。我們在木行裡呆了半個月都沒有船。我心急如焚，認為這樣遙遙無期等下去，不是辦法，我決定一個人回上海。後來黃終於等到一艘帆船，上了船才知道是條賊船，乘客都是做小生意的溫州人，他們決定死裡逃生，因為人多，終於戰勝賊

船上的海盜，乘客中有駕駛帆船本領的，把船駛回溫州，黃也是歷盡艱險才得以回家的，但是他一回溫州，卻不想回上海了。

正度見我回上海，考慮了一下說，“你回來也好，就留在宏華裡讓我回溫州，準備接貨”這樣，我便每天到宏華上班。

當時，上海既已經淪陷，像顏料這樣為內地抗戰區所急需的物資是不許任意運出去的，正度到處奔走尋找能負責運輸的公司。經人介紹找到一家叫作“通惠”的運輸公司。該公司保證把顏料運到甌江口外的洞頭，因為該公司的船隻不能進甌江。正度一時大意，沒有先請夏杏芳調查“通惠”的底細，便把顏料棧單交給“通惠”。正度走後，“通惠”打電話來說提不到顏料，夏杏芳要我到出棧單的倉庫交涉，我到了那裡，恰巧那家倉庫是溫州人開設，而老闆又是我在“附小”的同班同學，顏料給我提出來了，但他告訴我這些顏料恐怕會有糾葛。我以顏料既已提到手，也不加細究，不料“通惠”在背後把宏華托運的顏料盜賣給溫州商人黃苗夫，說是船上交貨，給了黃船上提貨的提單。這樣“通惠”的船一到洞頭，正度去提貨，黃也派人來提貨，當場發生糾紛；正度當時臨機應變，和對方說，先把顏料運到城裡再說，同時正度搶先一步，在城內有關機關辦妥了提貨手續，正度提到顏料後電告上海，夏杏芳欣賞正度的辦事能力，但黃苗夫等豈肯罷休，他們和“通惠”勾結，待正度回上海時，約正度談判，正度知道在上海對他不利，拒絕談判。黃等在大報刊登啓事，警告正度，說正度利用抗戰區的地方勢力搶奪顏料，夏杏芳主張正度先回溫州暫避一段時間，免得對方憑借敵偽勢力打擊正度。但正度沒有接受夏的意見，稍後對方終於帶敵偽勢力秘密拘禁正度，結果正度被迫不得不賠償對方付給“通惠”的錢。宏華因此元氣大傷，一蹶不振。正度深自內疚，但合夥的朋友並不責怪正度，因為他們都瞭解在淪陷區做生意，吃這樣的虧是無法避免的。但宏華要賺錢幫助托派的願望，卻成泡影了。

阿棟和禹石離開上海時，把他們的亭子間交給高子良。那房子的二房東是廣東人，可能也是中山人。高和二房東商量，換二房東的前樓。因為劉康、楊玉瓊、劉寬德寬全兩兄弟全都要和高同住。正度離開上海後，我也住到那個前樓裡

去。不過劉寬德當時和劉加良一起回中山，為的是寬德要回家繼承財產邀劉加良去幫助他。

我既和高子良他們住在一起，很自然成為一個黨小組。但寬全因為當時年紀還少，也沒有參加組織的要求，所以寬全並不是小組成員，但我們在那間前樓的組織生活，他都是知道的。

其時上海中央組織已成分裂形勢，1939-40年產生的中央：歐伯、劉加良、蔣振東、陳其昌、王凡西、毛鴻鑑，還有一個在南方的寒君共七人。我們小組目覩組織內部嚴峻的形勢，曾致力挽救分裂，除了和凡西談話時口頭要求他不要分裂外，還專門討論，給他們寫信，提出有不同意見在黨內繼續討論，千萬不要分裂。歐伯知道了，贊同我們寫信，並說可把信刊載在《校內生活》上。歐伯也知道中央形勢的嚴峻，王陳毛已明顯站在一起，寒君早已反對歐伯，剩下一個蔣振東，雖還沒有公開站在那一邊，但實際上已傾向對方。因此，歐伯認為必須竭力爭取蔣振東站在多數派方面。為此歐伯約蔣振東到宏華的寫字間開會（其時劉加良已去南方）。開會的其實只有他和蔣振東，歐伯要我參加會議，對蔣說：現在加良去南方，他們不來出席中央會議的，中央只有我們二人。目前的工作中央需要有一個秘書，提議阿隆為秘書，參加中央的會議。（大意）蔣振東同意歐伯的這一提議。那次，我親眼看到歐伯說服蔣振東時，那樣耐心，態度那樣誠懇，使我感動，但蔣仍不作明確表示和同意歐伯的意見。

但蔣在另一方面不斷約我和凡西談話，談話的地點都是蔣住的機關（一個亭子間），談話內容除由王詳述的抗戰變質論外，還回答我們小組提出的不要分裂的要求，他說不要怕分裂，他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為例，說明分裂的不可避免，他還說分裂責任不在他們，而是歐伯容不得不同意見，是歐伯的史達林主義造成的，愈到後來，他對歐伯由批評到攻擊，甚至人身攻擊。

當他們出版《國際主義者》油印刊物時，歐伯認為這是公開分裂的標記。他們的刊物之所以稱為《國際主義者》，因為他們稱歐伯和劉加良是“保護主義者”他們通過毛鴻鑑是印刷機關的負責人，佔有了印刷《鬥爭報》的那點由格拉斯購置的鉛印器材，致使《鬥爭報》無法再出版，我們小組原來希望於挽救組織分裂，至此我們的

努力也以失敗告終。

歐伯既要求我擔任秘書，我就向歐伯提出版《鬥爭報》，他說沒有器材怎辦？我說：用油印出版，由我來刻印臘版，由小組成員幫助印刷裝釘。歐伯問我能行嗎？我說：我在溫州由曾猛教過。這樣，那個前樓同時成了印刷機關。曾猛的油印用具極為簡單：一塊鋼板，一支針筆和一塊玻璃，連鋼板的木櫃子都不用。印刷時只把油墨塗在玻璃上、把刻好的臘紙和白紙復蓋在均勻的油墨上，用軟毛巾在白紙上均勻抹一下，不但印出來的字跡清楚，而且印數比用印刷機印的要多。既然是印刷機關，我們就得有秘密機關的必要措施：平時把鋼板和針筆藏在牆間裡，玻璃洗淨照樣放在寫字檯，平時都把用的毛巾晾在窗外的竹竿上，一出事，就把毛巾收進來，也不致引起特務的懷疑，這是必要的，這樣，我們的人進來弄堂只要看見窗口有毛巾，就可以放心進來，否則及時回頭就走。當我們在印刷時，派人在弄堂瞭望，一有情況便放暗號示警。

我刻的臘紙，印出的《鬥爭報》和《校內生活》當然遠不及曾猛刻印的那樣精美，但歐伯看了卻表示滿意，我們印的《鬥爭報》不是一大張，而是釘成小冊子的。記得我們出版的《鬥爭報》有一期追悼陳獨秀的專號，內容是由歐伯、王凡西、鄭超麟寫的三篇文章。我們小組在刻印專號的過程曾討論過這三篇文章。歐伯的文章雖放在卷首作為第一篇，但我們認為就文字論，超麟寫的最精彩。凡西的文字也比歐伯寫得生動，我們認為歐伯的文字老化了沒有鄭、王的文字有活力。但三篇中只有歐伯的文章對陳獨秀有批評，文章結論說陳仍舊回到民主主義去了，當時我們同意了這一個說法，鄭文對陳沒有批評，凡西的文章中還認為陳獨秀會自動糾正錯誤。我們認為這一說法對陳獨秀的錯誤作無原則的遷就，還記得有一期《校內生活》發表了歐伯的長文章批評陳獨秀、鄭超麟、王凡西，但我現在只記得批評陳的一節標題是《民主主義的白癡》，批評鄭的一節標題為《長了鬍子的幼稚病》。我們小組致王凡西他們的呼籲不要分裂的信，由我執筆也發表在《校內生活》上，我用的全名是「蕭璜」。

報上刊載蘇聯撤銷紅軍中的政委時，凡西和劉加良都寫了文章，凡西認為這表明史大林進一步背叛布爾塞維克主義。劉加良認為在史大林統

治下紅軍中的政委是史大林統治紅軍的工具，對紅軍是枷鎖，致使紅軍在衛國戰爭的初期不能發揮積極性，認為紅軍痛恨政委。戰爭初期的失敗迫使史大林撤銷政委制。兩種意見針鋒相對。我們討論時，認為劉加良的文章雖然沒有充分的證據，但有新意，凡西的文章只是老套。後我來回溫州和金寰樞的岳父戴樹棠談起這篇文章時，戴認為劉文在邏輯上是站得住的。

金源錢莊

金源的前身是志裕錢莊，葉先芝（輔臣）投資時，改名為金源錢莊。地點在河南路（北京路南邊附近的）一條弄堂裡。總經理夏杏芳，紹興人，錢莊學徒出身。金源董事長為葉先芝，葉和杜畏之是朋友。因杜的關係，葉很敬重歐伯。

在金源裡工作的托派分子，有樓子春和陳其昌。樓在錢莊裡是業務骨幹，有權，陳只是教錢莊的練習生文化，樓上有一個小房間供陳作辦公室。

我那次到上海，和歐伯接觸多了。從歐伯的口中，知道金源資助出版托洛茨基的《蘇聯現狀及其前途》（原文為《被背叛了的革命》）和《俄國革命史》。因為要翻譯這兩部書，請當時住在金寨鄉間的鄭超麟來上海，《俄國革命史》是鄭和凡西合譯的。

金源兩個倉庫，一個在威海衛路，一個在蘇州河邊上，籍雲龍由歐伯介紹進金源，就是在蘇州河邊的那個倉庫工作的。

歐伯是金源經理室的座上客，夏杏芳非常敬重歐伯對國內外經濟方面，特別是金融方面的問題，夏經常請教歐伯，這對夏經營錢莊和增加個人修養很有幫助。夏本人不嗜煙酒，生活毫不腐化，錢莊裡一種風氣，例如每頓開飯，不論經理、職員、學徒、工人，不分上下，都是一樣的伙食。學徒和工人不必為老闆盛飯。歐伯和我在那裡吃飯，也都是自己盛飯；飯後也用不到學徒、工人打臉巾，都自己到盥洗間洗臉，吃完就散席，不耽誤廚房工人的收拾時間。

宏華金源近在咫尺，正度也是經理室的常客，在那裡很隨便，不受拘束，除處理業務外，也聊天，夏知道正度能飲酒，就把別人送給他的威士忌拿出來，沒有下酒的東西，就到弄堂口買點花生，給正度一個人下酒。正度常在閒聊中給

夏出生意點子，夏採納了，效果不錯，因此對正度也很器重。

日寇佔領租界，發行偽“中儲券”，以一元“中儲券”換二元法幣，勒令立即執行。上海的銀行、錢莊爲防止大量提款，都把提款限額，限制在五百元以下，只有金源不加限制，對存戶提款敞開供應。因此金源的信譽頓時家傳戶曉，人們說夏杏芳有魄力，金源的業務隨之興旺起來。

當時李季生活窮迫，和歐伯商量，要把所藏的全套《四部備要》賣了，經歐伯介紹賣了給金源。夏老闆的經理室爲此安裝了書架，書運來裝架的那一天，我都在場，李季把書裝好架以後，夏說：我替您保管，您要用時就來取書，不要以爲書歸我，您和心愛的書便分手了（大意）。他的話是真誠的，李很感動。

從此李季也成了經理室的常客，我在經理室多次見到過李季，記得有一次他向歐伯談起，他已譯好桑戴克著《現代資本主義》，他說到書中引有希臘文的資料，他不懂希臘文，只好輾轉請人翻譯，付一大筆稿費。又有一次他給歐伯一張條子，說是老頭子（指陳獨秀）寫給他的。歐伯看後遞給我，就我還只記得的條子內寫，“季子學弟：布爾什維主義是法國勃朗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的混合物，有生之年，他要爲反對布爾什維主義鬥爭到底……”當時李說：“老頭子實在走得太遠了”。這張條子是歐伯常引用來批評陳獨秀的根據。

亞東書店的老闆汪孟邹也是經理室的常客，亞東和金源業務上的來往，金源對亞東的出版事業熱心支持。亞東出的書也堆存在金源倉庫裡。記得有一次汪老闆在經理室談話，他對凡西翻譯托洛茨基著《兒子·朋友·戰士》的譯筆贊賞備至，就我記憶所及抗戰爆發後，在亞東出版的小冊子有歐伯的《抗日戰爭勝利的必須條件》、《奧國革命是怎樣失敗的》及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小冊子，陳碧蘭的《民族解放戰爭與婦女》，紀德的《從蘇聯歸來》及《爲我的從蘇聯歸來答客難》，凡西譯的《兒子·朋友·戰士》，劉加良（少嚴）譯《大英帝國的兩個基石》，此外還有杜威委員會報告，蘇聯審判真相（書名已記不清），托洛茨基《在新的世界大戰前夜》（譯者不記得是誰），樓子春用“郭和”的筆名譯《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陳獨秀在武漢發表的小冊

子及爲陳獨秀辯護的小冊子，陳獨秀原在《宇宙風》雜誌上發表過的兩章自傳，也由亞東以單行本出版，題爲《實庵自傳》。

因葉先芝和內地的經濟關係，金源在戰時的首都重慶設立了分莊，夏老闆派他的徒弟何明林任重慶分莊的經理。何不是托派，但和劉加良及張樂山私人感情不錯。重慶分莊設立後不久，張樂山即去重慶活動，張在那裡立定了足跟後，上海托派組織的王煥宇（王振華）也去重慶，他們立即發展了四川的托派組織。

王獨清的忌辰，歐伯通知了許多人去殯儀館參加王的忌辰，我記得那天到的人有李季夫婦、華卿、劉祖強、羅瑟希、梁廷（劉加良在南方）、陳碧蘭、我、籍雲龍、高子良、劉康、楊玉瓊、劉寬全、李永爵，還有金源的一位女職員張小姐。但凡西他們都沒有去，可能是黃璧瑤沒有通知，他們不知道，當時組織已分裂，歐伯是不會通知他們的，大家也舉行了簡單的紀念儀式。歐伯第一次告訴我：王獨清死時開追悼會，到的人很多，李國棟代表王獨清的學生在追悼會上作長篇悼念的演說，他沒有發言稿，是即席發言，但講得很好。李國棟有講話的才能，憑這一點，對我們就很有用。

宏華關門後，正度仍留在上海，到處奔走，企圖再創一個局面。有人正在集資創辦「中國投資公司」，不知通過什麼關係，正度和那個人搭上了，對方口頭許諾：公司成立請正度當副經理，爲此正度除自己投資外，還到處去拉投資，這事被夏老闆知道了，他告誡正度不可輕信，並且在經理室裡當著正度的面，打電話調查對方底細，但所得的回答都是其人沒有家底。夏老闆勸正度及早退出，並建議如果他要當一個企業的副經理，明年金源開股東會，他提議聘請正度爲協理，但正度沒有接受這番好意。結果，果然不出夏老闆所料，投資公司開業時，對方不但沒給正度副經理的職位，甚至連營業主任也撈不到。但正度的投資陷進去，抽不回。這對正度的打擊很大，因爲他沒有接受夏老闆的忠告，又感到對不起歐伯的關心，精神極爲痛苦。

此外，夏老闆考慮到劉加良生活困難，特請梁廷作他孩子的家庭教師，月給的報酬可以維持一家生活。

黃禹石回溫沒有再出來到金源任職，但金源

需要秘書。又是歐伯推薦請胡山源當秘書，胡很敬重歐伯。（自從陳其昌被捕，歐伯就沒有自己租住的家。1944年我去上海時，胡山源請歐伯全家住在他的家裡，歐伯對我說：“獨清死後，我就沒法找到一文學界的朋友，現在我找到了胡山源。”

托派中央分裂後，樓子春對歐伯非常反感。因此，在如何對待歐伯的態度這件事上，他和夏老闆發生意見分歧，我聽夏老闆說過：“子春這個人不正派（指樓在背後說歐伯壞話）”。華卿也有同樣的話。後來又由此發展到劉和夏老闆關係鬧翻。樓依靠金源的另一大股東，要擠掉夏老闆，他這一著沒有成功，樓才不得不離開金源。據謝公墨說：樓子春脫離金源後，在南市場露香園賭場門口開設當舖。（按：那些當舖專做在賭場輸了錢，拿手錶手飾及其他衣物去典當的生意，典當期短，利息高。）

歐伯考慮到我為恢復溫州組織，需要我經常在溫滬間往返，他要求夏老闆由金源貸給我一萬元“中儲券”，作為我在溫滬間跑單幫的資本。我在金源辦好了手續。此外，歐伯和華卿商量，華卿夫人又貸給我三千元“中儲券”，住在後樓的醫生有一千元“中儲券”準備匯給連江家裡的，經陳碧蘭說定也交給我做一趟資本，說明到溫州後即把一千元交福建銀行匯給他家裡好了。這樣我一共有了一萬四千元“中儲券”資本，王會中在上海失業，要回溫州，他要求我把貸款中的一部份，在上海購買他家帽店需要的原料，說可以有一倍贏利，這樣，一萬四千元的資本，除購進一百支法國的大建璜藥片外，其餘都買帽店的原料，正度托了一個同鄉木匠做了一對鏡框，把一百支＜大健璜＞裝在鏡框的後面。會中把帽店原料鋪平分裝在兩條棉被裡。一切就緒，我們就動身回家。路上倒都順利。貨物平安到達溫州，我們到樂清時就有人要收購＜大健璜＞價錢不錯，但我們想，樂清和溫州近在咫尺，樂清人頭不熟，恐有意外，為安全計，還是到溫州再出售，不料一到溫州，價錢不如樂清，人家說還會看好，我自己沒有主意，聽信人言，越等價錢越跌，我只好忍痛斬割，幾乎沒有什麼利潤，但倒霉的不止於此，會中把帽店的原料交給他父親，他父親非常高興，但就是不付貸款，我不知道會中有否和乃翁交涉，李國棟和黃禹石知

道事件後，出面和會中父親交涉，才答應付還本錢，而且要分期付清，李黃對我說：看來他家目前確實困難，只好自認晦氣。我說：我怎向上海朋友解釋，阿棟說：他們應會諒解的，我見到歐伯時替你證明。我除了把王會中罵個狗血噴頭外，也別無辦法。那年秋天（1943年）阿棟要我同去上海，並建議我把一萬三千元交給他作為他要設立運輸公司的投資。（我一到溫州，先把x醫生的一千元交福建銀行匯給他連江的家裡。）後來，投資在阿棟公司的本錢拿到三千元法幣的贏利，我把金源的一萬元和華卿夫人的三千元還了，而把三千元贏利匯給歐伯。我這樣做是出於一種想當然的思想，自以為我做生意是為幫助組織，但歐伯卻把三千元交給金源。這件事說明：歐伯不但自己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幫助，即使是給組織的錢，他也是不輕易接受的。但這場經歷，使我始終感到內疚，感到有負歐伯的囑托。

陳其昌被捕

日寇佔領租界後不久，陳其昌被捕。事後知道：陳是在重慶農民銀行設在上海的秘密電台裡被捕的。開始，日寇憲兵司令部只知道陳是重慶分子，但到陳家搜查時發現托派文件，才發現他是托派。日寇憲兵司令部刑審迫陳供出同黨，特別要陳講出彭述之的住處。陳至死堅貞不屈。陳確是一位為革命獻身的烈士。正是這位烈士，曾用“陳仲山”的名字寫信並寄《鬥爭報》給魯迅看的，卻招來一封由馮雪峰執筆，而由魯迅簽名的公開信，人們當時及以後一段很長時間，都以此信去印證之所謂托派漢奸的污蔑。魯迅如果泉下有知，知道陳是死在敵人的屠刀下，不知作何感想。

歐伯知道陳其昌被捕的消息後，立即要我緊急應變。他提出：一、立即設法安頓碧蘭和孩子的住處，把家中的用具儘量搬出。二、設法安放他的全部俄文書籍。他給了我一個金源的存摺，需要用錢時可到金源提取。

我考慮先把碧蘭和孩子安頓在旅館裡，以後再另找房子，當時上海開旅館房間必須持有所謂“良民證”，想不到在沈家門化錢買的“良民證”，卻派上了用場。我憑那份“良民證”在南京路東亞旅館開了一個小房間，可以說是房錢最便宜的房間。然後趕到歐伯家，碧蘭已經把一切

都準備好，專等我來，我一到，問傢俱都整理好了嗎？她說：傢俱用不到我搬，已托後樓醫生了。我當即和碧蘭提著隨身要用的衣物，領了三孩子到東亞旅館，她並不嫌房間小，通風不好，就和孩子住下了。我囑她不要上街買吃的，就在旅館裡開飯，我會隨時來看她們的。我吩咐旅館樓面堂口（即那層樓面的管理處），每餐給她們開飯，我先付了一筆錢給堂口，給茶房小費，他們都非常殷勤，答應一定照辦，事實上也確照辦，因為我的良民證是沈家門的，茶房只知道我們是從沈家門來的客人。

我們在現在的黃河路附近新開路上一個小菜場租了一間小店面，要劉康和李永爵把店面偽裝為舊書攤兼售雜貨，他們二人就輪流看店，用店後的小房間，藏放歐伯的全部俄文書刊。正度幫我從同鄉那裡批了一些雜貨，如溫州的草紙等擺在小店裡出售；劉康和李永爵也會動腦筋，去找些小說連環畫之類供街坊兒童租看。

正度自己掏錢，通過劉祖強在新新公司的旅館開了一個大房間招待歐伯。歐伯在那裡倒不寂寞。那幾位同情分子包括夏杏芳在內都來相聚，歐伯利用這個房間又開起講座來了。

我安頓好歐伯交待的事以後，正要去安頓劉加良一家，歐伯說：加良那邊已由小羅（瑟希）負責辦理。要我去金源錢莊的威海衛路倉庫，把藏在那裡的俄國革命史和《蘇聯現狀及其前途》兩書的紙版搬出來，以免日寇抄查倉庫，牽連金源。我跑到威海衛路的倉庫，看見樓子春正在指點鄭超麟和王凡西揀取藏在那裡的托派文件。這是我第一次認識鄭超麟，我問樓子春“紙版如何處置？”他說：他們不準備搬走，也沒有地方藏放。我說：讓我搬走設法藏放吧。他無異議，我對凡西說：讓我也參加揀取，讓我們也每樣揀一份來保存。鄭王點頭表示贊同。於是我們三人蹲在地上，在一大堆油印文件中揀取。他們揀了每樣一份，我也同樣揀了一份，揀好後，我把我揀的一份捆好，連同幾箱紙版，叫了輪板車，我跟著板車送到事先約好的一個倉庫，到了目的地，羅瑟希已在那裡等我。

關於兩書的紙版問題，歐伯告訴我，金源方面捐助了一大筆錢，是很難得的。他認為出版《俄國革命史》是我們組織的一件大事，“老托這部著作是無價之寶”，“把紙版搶救出來，以後再

版，就無需那麼多資金了”。“再說紙版留在金源倉庫，如果被日寇查抄出來，勢必牽連金源”他說：我們在這義上也不能那樣不負責任。”關於這一點我後來問鄭超麟，為什麼你們當時決定對紙版不予處置？他的回答是：“沒有紙版。可以影印再版。”事實上抗戰結束後，我們就是用影印再版的。”

後來有一次，我和鄭超麟談起這次應變為歐伯搬家的事，鄭說：“我們就沒有搬家，因為我們相信陳大可（即陳其昌）。”意思顯然是指歐伯不相信陳其昌。我覺得這樣說也不中肯，應變是組織的需要，事實上，歐伯也從來沒有流露過任何不相信陳其昌的跡象。

現在回憶起來，歐伯當時對陳其昌的被捕，確實說過如下的話：大可是在國民黨的秘密電台裡被捕的，這件事暴露了他參加國民黨經濟情報工作。當然農民銀行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的銀行，但不能因此就簡單說成是為國民黨工作。農民銀行需要淪陷區的經濟情報，陳參加電台的編經濟情報的工作，不等於就是國民黨特務。而且當時托派既然主張與蔣介石聯合抗日，那麼對為抗日編淪陷區的經濟情報的事，就沒有理由有所非議。何況陳其昌參加這項工作，是因為他的兄弟（在重慶農民銀行工作）要他為抗日做些工作。大前提既是抗日，而他在編經濟情報工作過程中沒有做過任何損害托派組織的事。平心而論，歐伯的話，不能說是實事求是的。

歐伯夫婦住旅館，是應變的臨時措施。他既然沒有自己的住家，只好夫婦分開：碧蘭和孩子們承葉先芝的熱情相邀，後來借住在葉家；歐伯一個人住在金源錢莊裡。

一直到1943年，道亨銀號購下愚園路的一個外國醫生的住宅，這是道亨的地產，準備轉手出售。因此房子空著，羅瑟希以房子需要看管為理由，要求老闆（是羅的姊夫）讓歐伯夫婦暫住。他們夫婦才一同住進那座房子。房子確是花園小洋房。少數派的人對人說：“老彭住花園洋房去了。”他們那裡知道歐伯夫婦是替道亨看管房子。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人窮得無力自己租住房子，不得不依人籬下，甚至以看管房子換得暫時的棲身，而克里姆林宮豢養的奴才卻甚囂塵上，叫囂他受日寇的津貼，顛倒黑白有如此者！

一九四四年夏至同年九月在上海

一九四四年夏，我的妹夫賈楣生要去上海辦貨。我也正要去上海，他邀我同行。去上海的路費和在上海的生活費都由他承擔。

這一次，我們從陸路經寧波，乘輪船去上海。這條路我上次和李國棟走過，已經熟悉。臨行高紹英給我一封介紹信，囑我們到寧波去找一家顏料行，就住在該行，他們不但會招待我們，而且會為我辦去上海的手續。所以，一路都很順利。

我們到了上海，住東方飯店，那裡還有其他溫州的同鄉住在同一樓面。李國棟當時也在上海，他住南京飯店。

我們以前住的小沙渡路的房子，因為劉寬德把弟弟寬全帶走，和我回溫州以後，劉康和楊玉瓊由歐伯另外安排住處，剩下高子良，當時住在李棠的商行裡。事前高已來信告訴我地點。因為我還不知道歐伯住在什麼地方，所以先去李棠的商行裡找高子良。他見到我，首先向我道歉說：

“宏華關門，你走後，我們的生活毫無辦法，只能把你的手提英文打字機和大衣都賣了，維持生活。”我說：不要向我道歉，應向葉正度和李國棟道歉。打字機是葉正度的，他留給我是為了讓我學習打字。大衣是李國棟的，留下來以備我冬季禦寒的，所以“道歉”是因為事前沒有徵得我的同意。老高告訴我：道亨的那座在愚園路的小花園洋房已經出售。歐伯全家沒有地方住，胡山源邀歐伯全家住到他家裡，不但住，而且和他們吃一鍋子的飯。

我要立刻見到歐伯，高子良當即領我到胡山源的家。胡家並不寬敞，騰出一間房間，安頓歐伯一家，當時，琍琍（陳曉霞）已在摩爾堂女中讀書，玲玲也已讀小學，巍巍也要進小學，孩子大了，一家五口擠在一個房間，擁擠的情況可想而知。摩爾堂女中是教會學校；學生大都是闊小姐，獨有琍琍是窮孩子，只能穿一件夾布短旗袍，還是碧蘭自己裁剪，用縫衣機縫制的。縫衣機是夏杏芳買給碧蘭的，買時歐伯一家還住在那座花園小洋房裡。那裡房間大，夏杏芳買機的目的，是讓她在家代工縫製枕頭賣，賺取工資。此時，到了胡家，卻用不上了，因為怕縫衣機的噪聲吵擾胡家。因此連那點微薄的工錢也無法再賺。那時學校將近開學，但琍琍的學費還沒有著

落。李國棟也在上海，但歐伯不願開口要李幫助。開學前一天的早晨，琍琍一個人跑到東方飯店來找我。我驚問“出了什麼事嗎？”她吞吞吐吐說：“學校明天開學，我們還沒有錢繳學費，媽媽要我來問龍叔叔有什麼辦法。”我一邊對她說：“你媽媽為什麼不早說，要多少錢？”一邊要楣生到同鄉房間裡去取現款。楣生把錢給了她，她一數，說：用不到這麼多。楣生說：“還要買書和其他要用的東西。”她笑逐顏開，轉身就走。這裡需要說明為什麼到同鄉處拿錢。紹英介紹給我的寧波那家顏料行的老闆來上海，給我介紹和他有關係的顏料行。說如要辦顏料，可拿他的名片去，不會吃虧。並說他已和他們聯繫好，這是紹英托他的，他說紹英幫過他的忙，他一定要有所報答。這話是真誠的，當時溫州同鄉要辦顏料，不但購辦困難，而且價錢嚇人。我知道了就為他們去找寧波老闆介紹的顏料行，果然不錯，價錢比溫州同鄉要出的低百分之十，溫州同鄉給我百分之二的佣金，作為報答。這就是我所以能要楣生去取現款的原因。

我那次去上海，主要是向上海組織報告，我在溫州恢復組織的活動情況。我向歐伯作出的口頭報告，話很多，現在當然無法回憶。但以下幾點內容我還記得清楚：（一）全面恢復溫州組織面對的困難：一，曾猛口頭雖不反對恢復組織，而且也和我談了幾次，但是沒有行動。陳又東、錢川、余嘉他們總還是唯曾猛的馬首是瞻的。二，上海組織分裂後，他們更有藉口，在那派領導下擴展組織？因此，先要弄清楚究竟那一派正確。目前先研究兩派的意見。三，但是也應當看到，儘管整個組織還沒有恢復，但除個別人叛離，絕大多數的人都還在，而且都堅持托洛茨基主義。（二）少數派派毛鴻鑑來溫州活動，找過他能找的人，李國棟、黃禹石、何樹芬不會聽他的。此外，李綽堅（即李培）時常來李國棟處，毛鴻鑑以李為少數派代表留在溫州活動，但李不能起作用。除了常到李國棟處吃中飯，飯後一同去游泳外，沒有別的收穫。（三）以前在高中是「救亡大聯盟」的學生，此時已入大學，政治思想上更成熟了，他們在中學時，除受溫州托派組織的影響外，還受安明波的影響（安當時是“溫中”的教師），不但原有的人都還在，而且還增加了人。其中特別是周仁生。他的活動能力強，

正如黃禹石說的“仁生爲人熱情。”（四）原來的工人小組，除了樹芬死於霍亂，學廉和阿晚還在，尤其是學廉，他除了仍領導針織業工會以外，在他周圍還有幾個小工會。針織業工會成爲托派工會，在溫州是出名的。我和學廉一直保持聯繫。而溫托組織雖沒有恢復，但我們的影響仍有發展，如在小學教師中，葉正度影響了邵嶽軒，陳博影響了項上川，潘也可影響了他的女婿陳元稹，我把他們組成一個小組，而且定期開會。（六）在老人中，陳又東、王濟通、錢川、任俠中聚在一起，我和他們有經常的聯繫。黃禹石、李國棟、李蔡志聚在一起，當然和我的關係更密切。此外還有謝循歡、董國雄、陳國光等，都和我有經常的聯繫。這一情況表明，溫托組織雖然遭到嚴重的破壞，原有組織雖然瓦解，但托洛茨基主義並沒有死亡。

歐伯聽了我的報告說：“我們當然希望你能儘快把溫州組織恢復起來，但根據實際，即使一時不能恢復原貌，至少應該正式成立一個領導機關：曾猛不願恢復組織，就讓他去，那些受曾猛影響較深的人，也可暫時讓他們在組織外考慮，等條件成熟時再說。最後，有一點必須清楚：成立起來的領導機關，必須是受我們（指多數派）領導。我們不要模稜兩可的組織。”（當然不是原話，只是大意）

楣生早在宏華商行裡已經認識歐伯、加良、高子良和蔣振東。所以除加良當時在醫院動腰子切除手術，蔣振東已參加少數派外，我要歐伯夫婦和高子良常到東方旅店我們住的房間坐，一方面是談話方便，另一方面由楣生招待他們吃飯，改善他們的生活，時常到我們那裡的還有李國棟和楊玉瓊。

歐伯雖然很窮，但他無論穿西裝或長袍都衣冠整齊，儀表堂堂毫無寒酸相。我的朋友劉烈夫婦見了歐伯，事後對我說：你的這位“教授”朋友，風度感人。我對他們夫婦和樓面的同鄉都臨時應付，介紹說“這位是陳教授”。不知底細的人看見歐伯的衣著不錯，以爲他生活寬裕。但他們那裡知道他穿的西裝還是在中共黨內擔任宣傳部長和北方局書記時，黨組織給他置備的，他的長袍是和陳獨秀一起被捕關在牢裡，陳獨秀的學生和朋友探牢時，送給他禦冷的，歐伯自己那有錢置備衣著。

上面提到的爲了臨時應付，我隨口介紹說的“陳教授”，不久，就在那個學期，經胡山源介紹進一所私立X X文學院（校名已忘），真的當起教授來了。據說：歐伯在那所學校影響了幾個學生，1948年爲建黨大會準備會場的嚴雁賓就是其中之一。當上教授，一家生活總算有了著落，但當時教授的生活都是非常清苦的。

那次我在上海，時常上胡山源家，看望歐伯夫婦。有時我去得很早，碧蘭告訴我，歐伯上兆豐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去了。她要我上公園找他，並告訴我到公園的那個角落去找，一定找到。那個角落的籬芭外面就是聖約翰大學。我找到那裡看見夏杏芳也在，大約一共有十來個老頭子，他們都席地而坐，有茶，有煙。他們沒有談笑風生，而是相互交流各自聽到國內外消息。歐伯告訴我：他們家裡有性能極佳的收音機。有幾個是遺老，他們的子女在大陸報和泰晤士報工作，所以消息靈通，有幾個當過外交官，有幾個是銀行家。他們都關心國內抗戰形勢和歐洲戰場及太平洋戰爭的消息。未到兆豐公園時，我原想，夏杏芳上公園是他的一大愛好，歐伯爲什麼也上公園呢？我聽了那些老頭子交換消息和各自的見解以後，才發現歐伯上公園的用意。歐伯也許怕我不理解，從公園出來，明白對我說：我們觀察國內外形勢，只憑幾張報紙，而現在的報紙又都控制在敵寇的手中，我們能有多少有價值的材料？無線電沒有爲我們服務，但在公園裡卻可以聽到報紙上沒有的消息。這些人見過世面，他們的觀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但他們提供的消息，對我們瞭解形勢卻很有用。而且他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德意法西斯，反對斯大林獨裁，和承認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領袖，都是真誠的。這些人當然不可能成爲托洛茨基主義者，但他們有正義感。憑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去爭取他們作爲我們的朋友。（大意）事實上，夏杏芳因爲瞭解那些老頭子的爲人，才邀歐伯上公園的。而且經過幾次聚晤之後，他們對歐伯都很敬重。這是在日寇統治下逼出來的一項活動。

楊玉瓊不時來找我。當時她已參加“工委會”。她告訴我“工委會”成員共三人：阿亨、籍雲龍、和她。開起會來，每次都爭論不休。她希望我留在上海參加“工委會”，我說爭論沒有什麼不好，至於爭論不休，有歐伯和加良在，不會

解決不了的。但你應該尊重他們二人的意見，認真分析，作出判斷，誰對誰不對，而後決定支持誰的意見。二對一不是就可以有結論了嗎？我知道她個性很強，平時就不尊重阿亨和籍雲龍，特別是籍雲龍，但她總算沒有和我爭吵起來。

那次我在上海，加良正在醫院做切除腰子的手術，阿楊領我到醫院裡看望他。手術已做，經過良好。但還沒有拆綫。事前是經赫斯診斷，證明是腎結核，加良身體不好，但他沒有注意結核病始於何時，他一家四口長期沒有正常收入。貧窮使他沒有條件就醫。而且那時國內還沒有結核病的特效藥。即使有，也無力購服。貧窮總是和結核病關聯結。到了赫斯診斷決定時，已經嚴重到非切除一隻腰子不可了。如果不是歐伯的催促，加良不會主動上赫斯診所的。如果不是赫斯診斷，他根本不會想到他的腎部已遭結核菌的嚴重侵入。如果沒有赫斯，他根本無法進入醫院治療。可以說，是赫斯搶救了他的生命，赫斯只知道中國托派人員的貧窮，但不知道加良一家四口只住半間中堂，平時營養不良，梁廷的同學李瓊沒有工作，但眼看加良和孩子身體都不好，常把家裡的雞蛋拿來給加良及孩子，目的是要他們有些營養。

記得我和阿棟決定回溫州的前一天，楊玉瓊跑到東方飯店裡來，約我出去談話，神色有點緊張。我和她到跑馬廳（現在是上海市圖書館）的看臺上，沒有跑馬，那裡很清靜，她告訴我魏秋廠裡罷工已經一個多星期了。魏秋是罷工的領頭人。廠方把她扣留在廠裡，目的是迫使她復工。楊說她自己跑到廠裡去看魏秋，魏秋很堅定。我聽了，當即告誡她千萬不要再到廠裡去找魏秋。因為魏秋是廠裡的工人，而且不知道魏秋的政治聯繫。你是廠外人，又戴了一副眼鏡，一望而知是一個知識分子。廠方發現了你，就會斷定罷工有外人插手。這樣，廠方為了早復工，會不惜去報告敵寇憲兵隊。這樣，非但罷工不能勝利，連魏秋都有被日寇逮捕的危險。你可以通過魏秋家裡的人（指魏秋的瞎子母親）到廠裡傳口信給魏秋，廠方就不會懷疑。我問她是工委會決定要你到廠裡去找魏秋嗎？她說“不是”，是她自己決定去的。“我問：為什麼這樣決定？她說：“魏秋出事，我能坐視嗎？而且魏秋是由我聯繫的”。我有點火了說：“你至少要得到阿亨和籍

雲龍的同意。”她截然的反問：“他們會同意嗎？想不到你也會反對。”最後我說：“我明天回溫州，希望你聽我的勸告，不要再到廠裡去”，要在“工委會”裡決定和魏秋聯繫的妥善辦法，或者立刻去找歐伯和碧蘭商量辦法。她終於點頭，但顯然很勉強。

但她既不在“工委會”裡研究辦法，也沒有去聽取歐伯夫婦的意見，仍然到廠裡去找魏秋，終於被廠方發現，不出所料，廠方報告了日寇憲兵隊，把她逮捕了。以下事實是歐伯告訴我的。

楊玉瓊被捕後，經不住拷打，供出了高子良和劉康的住處。日寇憲兵隊來逮捕高子良時，歐伯正在樓上和李棠談話。高故意提高嗓門和憲兵隊爭吵，好讓歐伯聽見。李棠也很機警，馬上引歐伯到三樓，從閣樓的窗口爬出去。他並囑歐伯在鄰居的屋頂的隱蔽處躲藏。他自己下樓應付憲兵隊。當時他首先考慮的是歐伯的安全。因此，只能看著日寇打高子良的耳光，惡狠狠把高扣上手拷帶走。李棠看看門外無人監視，才上樓喚歐伯下來。

歐伯當時首先想到的是劉加良還在醫院，萬一楊玉瓊供出劉在醫院怎麼辦？必須盡快通知。劉加良接到緊急通知，馬上率全家老少和劉寬德、寬全兩兄弟惶惶出走，這麼一大夥人，住到那裡去？歐伯想到賈楣生，決定到東方飯店找楣生，設法弄條帆船，把加良全家老少都送到溫州再說。住在東方飯店那個樓面的溫州同鄉中有好幾個做帆船運輸生意的，和楣生都有交情。楣生一打聽，剛巧有一艘帆船要開往溫州、洞頭島。楣生當場和船老大說妥，並親自送加良一夥人上船，囑咐他們到洞頭住哪一家商行，給了他們介紹條子。因為當時溫州恰恰第三次淪陷。他料想我和李國棟一定避居鄉間去了，要他們在洞頭等待，勿貿然進城。

加良一行六人總算平安到達洞頭。以下是我知道而還記得的情況：

他們住在楣生介紹的商行裡。商行老闆對加良說：城裡剛剛淪陷，城裡人都逃光了。你的朋友肯定也避居鄉間去了，現在貿然進城也無濟於事，先住下來，再打聽，等聯繫妥當後，再僱船進城。他們住了好幾天，城裡都沒有人來洞頭。還是加良自己想到黃禹石是烏牛人，可能黃在家裡，至少烏牛黃家裡總有人。他托商行老闆設法

弄條小船，把他送到烏牛，加良雖不知道黃的住處，但到烏牛一問，誰不知黃禹石。很順利就到了黃家，禹石正在家裡，他見到加良，驚喜交集之餘，就考慮如何為家良一行安排在溫州住一段較長時間的問題。他對加良說：目前阿棟避居何處還不知道。但我可以和阿棟聯繫，我知道阿棟的避居處。他要加良先住在他那裡等待消息。但加良因為梁廷他們還在洞頭，他如不回去，他們又要擔心，不如先回洞頭等待。加良回到洞頭，事有湊巧，紹英行裡的一個職員叫“道勝”的去洞頭，也住在那家商行。在吃飯時商行老闆向道勝介紹說：“這幾位是楣生介紹來的。”道勝就問他們到溫州找誰？加良說：“找一個叫王國龍的朋友。”道勝說：「找二舅！」（紹英行裡的職員都叫我「二舅」）。當即就對他們說：“明天我就僱船送你們進城，先到我們行裡，他們會把你們送到二舅家的，放心好了。”

事前，我和阿棟不約而同回到城裡，他當時已買下他的舅父吳兆璜律師事務所在地的那座大房子的一半，原準備在那裡開設運輸行的。黃禹石來城告訴劉加良一行已在洞頭。阿棟當即要我去洞頭迎接加良一行人。並表示：他們來就住在那座房子樓下正屋的兩大間。他說城裡淪陷，反正運輸行也開不成了，他們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正準備去洞頭，紹英行裡人來告訴我，上海客人已到，要我即去，我趕到紹英行裡，紹英正在招待加良一行用午餐。我告訴他們：“阿棟已為你們準備好房子，就在阿棟家裡，吃過飯馬上就可以去住。”

這樣，加良一行就在阿棟的正屋裡住下，而且有獨用的廚房間。阿棟自己住在廂房裡，住在那裡有許多方便，不但阿棟在身邊，還有其他人可以隨時照應。

生活算是安頓下來了，但加良倉促離開溫州時，手術後本來沒有復原，經過這樣一場波折，又發燒了，我只能請胡長庚診治，但是沒有結果。長庚主張送董若望醫院住院，由他托該院內科主任王德明照顧。於是加良住進了一人一室的病房。就當時說，條件算是不錯的。王德明醫師非但相當負責，而且有空就到病房和加良聊天，董若望醫院的法國神父也來看望加良，用英文和加良談話，談日寇佔領上海的情況，談國內外形

勢。神父認為加良有學問。

這裡還需要補記：上面提到歐伯事後告訴我關於楊玉瓊供述高子良和劉康的事。當時，我回想到自己那次和阿楊的談話，我想到自己對此事有責任。因此，我在據實轉告歐伯那次談話的內容之後，對歐伯說：事後回想起來，當時我見她已經點頭，以為她即使不同阿亨和雲龍討論，總會聽取你的意見。想不到她竟然如此獨斷獨行。但是如果當時我立即把阿楊到魏秋廠裡的事，在我臨行前即時告訴你，你可能還來得及阻止，使她不致被捕，因而可以避免組織這次的損失。歐伯聽了後說：“這是你的疏忽，像這樣緊急的情況，你本應及時報告的。當然我們事前沒有想到阿楊會經不起考驗。”歐伯這話絕無惋惜之意，他對經不起考驗出賣同志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因此，對高子良和劉康、李永爵被捕後堅持不屈、雖嚴刑迫供仍拒絕供出的表現極為讚許，從此對他們三人信任有加。歐伯還說“當時我們無法知道她究竟供出多少人，凡是她知道住處的人都進行應變。因此，應變的範圍比陳大可被捕時大得多。不過，實際上被捕的只有魏秋、高子良和劉康、李永爵、羅真。監禁幾個月後他們才出獄。至於楊玉瓊，歐伯說：她在憲兵隊看守所裡發瘋，後來，有人看見她死在馬路上。

楊玉瓊的下場咎由自取。我自問事前對她已盡到責任，但沒有及時報告組織，想到老高和劉康由於她出賣，而致使他們和魏秋等人在日寇牢裡受苦，使我更感到當時相信她的點頭是嚴重的失誤。她在牢裡發瘋，說明她供出老師高子良和好友劉康的住處後，精神上所受的鞭撻，在出賣行為為人所不齒之思想折磨下，可能正是促使她發瘋的內在原因，正是因為發瘋，才阻止了她繼續供出別人。

楊是廣東中山人，父母是南洋華僑，在中學裡受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影響，是一個籃球手，在香港時還參加過籃球賽。賀希在1938年從上海回溫說：香港有一批新人，其中有一個女籃球手，即指玉瓊，楊在香港受寒君領導，受寒君影響不淺。歐伯到香港解決寒君問題後，楊隨歐伯來上海，還不時難忘寒君，正如陳又東、余嘉難忘曾猛一樣，估計她死時年齡約25歲左右。客觀地說，她畢竟也是日寇鐵蹄下的受害者。

反對以色列進攻加沙，聲援巴勒斯坦人民

第四國際第 16 次世界大會決議

在猶太復國主義破壞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持續政治陰謀中，一年前以色列軍隊發起對加沙地帶的進攻。三個星期密集轟炸的結果（1300 多人死亡，5000 多人受傷），表現了以色列軍隊的暴力行爲，它使用了毀滅性武器，犯有許多戰爭罪。

這次進攻，策劃已久，不是爲了“阻止火箭襲擊”，也不是爲了“強行實施停火”。火箭襲擊造成的受害者，在 10 年內不到 20 人，而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於 2008 年 6 月簽署了停火協議，這個停火從來沒有得到以色列的尊重，它維持了對加沙的封鎖，並繼續在加沙內外殺害抵抗者。在這種情況下，巴勒斯坦人有權捍衛自己，抵抗佔領，包括用武力。

再一次，以色列的目標是向巴勒斯坦人民和抵抗運動表明，以色列是這場遊戲的唯一主人：唯一可能的“和平”必須符合猶太復國主義政府規定的條件，這意味著否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權利，任何試圖反對這種邏輯的人，將受到以色列軍隊的無條件鎮壓。

最近的事件證實：猶太復國主義政府不會容忍巴勒斯坦人，除非他們放棄他們的民族權利，並願意在巴勒斯坦隔離區或外面的難民營居住。只有在他們準備向不違背猶太復國主義目標和利益的“和平”條件投降時，以色列才會與巴勒斯坦代表進行談判。

一如既往，奧巴馬政府的美國仍然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主要帝國主義靠山。歐洲聯盟國家也繼續公開或暗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聯盟國家，四分五裂，大部分都順從帝國主義，不能採取共同立場，而埃及將繼續發揮其作爲以色列和帝國主義列強合作者的作用，其對去年 12 月加沙自由進軍的破壞，以及在拉法建設一個新隔離牆，再次表明了這一點。

不過，有許多譴責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應。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萬人的示威集會。一些國家，如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驅逐了以色列大使。無處不在，甚至在聯合國的大會，也有人提出了抵制和制裁以色列的議案。

第四國際重申，無條件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爭取其權利的鬥爭：沒有任何外部干涉的自決權；難民返家的權利和要求賠償的權利；1948 年的巴勒斯坦人享有的平等權利。

此外，我們重申，必須解放阿拉伯人民，拆除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因爲猶太復國主義代表了爲帝國主義服務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計畫。我們支持讓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猶太人）可以完全平等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解決方案。

爲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緊急加強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運動，著重於五個主要和統一的、包括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內部的每個人都同意的要求 --- 以色列軍隊無條件、立即和全部撤出 1967 年以來佔領的土地，包括東耶路撒冷；拆除 1967 年以來興建的移民地；拆毀隔離牆；釋放被以色列關押的 11,000 名政治犯；立即和無條件地解除對加沙的封鎖——作爲實現基於平等權利的政治解決方案的初始步驟。

我們還應該特別關注巴勒斯坦人自 1948 年以來的要求，他們要求全面和自由獲得土地和水的平等權利。最近的以色列選舉和高得票率的利伯曼，一個公開主張驅逐巴勒斯坦人出 1948 年土地的人，對巴勒斯坦人民構成了重大危險，對此，聲援運動有責任做出回應。總體上，我們還必須支持反對佔領、戰爭和猶太復國主義政策的以色列人。

最後，我們似乎有必要加強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這一運動在 2003 年由 170 多個非政府組織和巴勒斯坦各方發起。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的要求提供了機會，發展旨在聲討政府和主要資本主義集團勾結的團結運動。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最近和未來的成功，可以發揮削弱猶太復國主義政府的作用，並創造條件，加強巴勒斯坦和反帝國主義陣營。同時，在這場鬥爭中，有必要打擊所有的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仇視伊斯蘭教的傾向。

2010 年 2 月 26 日

國際聲援伊朗人民

第四國際第 16 次世界大會決議

美帝國主義的攻勢，聯合國的經濟制裁，還有以色列在中東傳播的大量反伊朗的好戰宣示，在這樣的情況下，第四國際聲明，只有通過伊朗人民的動員，才能把伊朗人民從伊斯蘭共和國獨裁政權下解放出來。我們譴責和帝國主義的戰爭，佔領和干涉政策，我們站在爭取自由和獨立的人民的一邊。

自從 2009 年 6 月 13 日，總統選舉的欺詐以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陷入空前的政權危機，開啓了青年人，婦女和工人一起表達他們民主意願的空間。過去 8 個月，伊朗人民大量表達了他們的憤怒，呼喊出“打倒獨裁！”的口號。從選舉挑戰，到拒絕伊斯蘭共和國的真正基礎，這一進程持續增長和激進化。

自 1979 年以來，在分享權力的不同派別之間醞釀的衝突，已成為公開的戰爭。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總統內賈德和革命衛隊的領導層決定全面控制石油收入，鞏固其經濟和財政利益。以穆薩維，卡魯比和拉夫桑賈尼為代表的教派，拒絕被驅逐出權力中心，使得伊斯蘭共和國血債累累，加劇了危機。

人民決心消除這種令人窒息的重負，結束對爭取自身權益的年輕人和婦女的日常鎮壓，這個決心變得越來越同工人的具體要求交織在一起。

在過去 8 個月，青少年、婦女和工人抓住每一個機會，反對軍事神權政治制度。他們勇敢的動員已經加劇了政府內部的分裂，削弱了伊斯蘭共和國。

哈梅內伊、內賈德和革命衛隊用暴力鎮壓伊朗人民合法的社會民主要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為了撲滅抗議運動，進行大規模逮捕，在電視上演播審訊、強姦和處決被拘留者的場面。但這並沒有奏效。對現有政府的反對是根深蒂固的；鎮壓不能扼殺政權反對者的決心和憤怒。

在伊朗，在政治危機結合經濟危機的背景之下，一個新的鬥爭階段已經開始。面對失業，裁員，私有化和失控的通貨膨脹，特別針對未支付的工資，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該國已出現了一些罷工。該政權並沒有忘記 1979 年的罷工浪潮，它對君主制的垮臺起到了主要作用；因此該政權粗暴地壓制工人階級的鬥爭。

我們支持婦女、工人、青年和所有那些反對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人。工人的社會需求與民主訴求的結合將是決定性的因素。隨著工人階級介入鬥爭，當前的運動中可能獲得必要的團結和力量，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一個社會民主和非宗教的共和國，她真正地反對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

爲了真正民主權利的鬥爭，爲了政治犯的解放，爲了廢除死刑，爲了結社和罷工的權利，爲了自由選舉，爲了少數民族的權利和社會正義，以及爲了男女的平等，強有力的國際團結是必要的。

他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

2010 年 2 月 27 日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 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 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 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 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 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 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 元

聲援海地

第四國際第 16 次世界大會決議

發生於 2010 年 1 月 12 日的海地地震影響到整個國家，首都太子港和周邊地區遭受的打擊尤其嚴重。人員和財物的損失是巨大的，20 多萬人死亡，成千上萬的人受傷和無家可歸。最近幾十年的極端貧窮，不穩定的生活條件和居住狀況，還有，這是個員警國家，它不關心民眾的需要也不關心地震多發區的預防措施，這就是這場災難代價如此高昂的原因。

這不僅是一場“自然”災害。強權施加並且仍然在施加給海地的統治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後果，使這場災難雪上加霜。

海地是第一個廢除奴隸制，經過鬥爭贏得獨立的殖民地。帝國主義國家，首先是法國和美國，讓海地為解放付出了高昂的代價（1825 年以來，該國背負著法國債務的重荷）。

海地是美洲最貧窮的國家，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幾十年來，海地人民是新殖民主義陰謀和帝國主義列強剝削的玩物，罪魁是法國和美國。這些強權一個接一個地扶植和支持聽話的政權——比如，1957 年至 1986 年的杜瓦利埃獨裁和 2004 年的政變——它們掠奪國家財富和人民，圖利跨國公司和他們安置的統治者。

世界銀行強行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當地的農業癱瘓，迫使數以萬計的農民擁擠在城市的危險居住區。這次地震掃除了這些貧民區的整個地段。

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降低了工資和拆除了所有社會服務，特別是醫療服務部門。震前，超過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沒有健康保健服務；其中婦女的比率高達百分之六十。

2004 年，美國把其軍事統治“下放”給聯合國海地穩定團（MINUSTAH），巴西領導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從一開始，它得到的名聲就是，放下饑餓暴動、謀殺和強姦以及針對窮人的各種暴力不管。其推行的經濟方案，同在加勒比地區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類似——目標是用非常廉價的勞動力建造企業特區。

目前的災難，導致對該島的軍事佔領。媒體散播這樣的看法，即為了防止“混亂”，搶劫和不安，一個龐大的軍力存在是必要，儘管美國軍方官員自己承認，“暴力程度比地震前低。”已派出了超過兩萬人的美軍，用以控制民眾和所有的交通（海，陸，空）。這種佔領，部分地可以解釋為是拉美大陸和加勒比地區再軍事化戰略的結果。事實上，海地位於古巴和委內瑞拉之間，同洪都拉斯（政變已經把被推翻總統塞拉亞擴大的同美國利益的距離，拉了回來）隔海相望。佔領對美國的武器，保安和建築公司也是好消息。該國的重新殖民化——它讓該國倒退 200 年——已經受到了“國際社會”刻意冷漠的問候。

但是，來自海地的第一手資料表明，儘管海地政府的中心可能已經癱瘓，人民自己顯示了巨大的團結和自我組織能力——設立難民營和重建國家，儘管美國宣佈了緊急狀態。

- ▶ 在軍事佔領下，重建工作不可能進行。佔領軍必須立即離開；國家並不需要士兵；它需要醫生，護士和工程師！
- ▶ 邊界應該開放，允許援助貨物的發送和人民的自由來往。不應該把海地人趕回海地；應保證任何希望離開海地島（按照委內瑞拉和古巴的例子）的海地人有穩定的條件。
- ▶ 海地的重建工作不應導致該國的外債增加——應由其他國家，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洲開發銀行全部取消。
- ▶ 法國和美國欠海地巨額債務，因為他們對這個國家進行了掠奪和施以暴力。此外，他們應該歸還杜瓦利埃存在外國銀行的財富。
- ▶ 第四國際呼籲工人階級的組織向海地基層組織提供財政和政治支持，跟進民眾團結的巨流。
- ▶ 致力於向海地工人階級的組織派遣物質援助，這些組織與我們有著相同的目標，要幫助他們在這個遭到重創的國家重建一個新的基礎。

2010 年 2 月 27 日

資本主義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

第四國際第 16 次世界大會決議

1. 眼前的氣候變化，一般來說，並不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產物，是自稱為資本主義替代者的其他制度的產物。人類面臨的社會生態災難之危險是空前的，在人類時間表上是不可逆轉的，而這個制度無法質疑其積累的基本邏輯，正在進行沒有出路的危險的技術冒進。



眼前的氣候變化，一般來說，並不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而是因為這樣的事實：即資本主義制度，基於短期利潤和超額利潤的考慮，不僅把剝削勞動力，而且也把對自然資源，尤其是對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廉價化石燃料儲備的掠奪，一直不停地作為其發展的基礎。

- i. 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和20世紀初期，一些尋求乙太陽能利用為基礎的替代能源系統的合理建議，不是被資本主義盈利律擱置一旁，就是毀於煤炭企業的壓力下。
- ii. 1945年後，為了延續其超額利潤，石油壟斷企業和依賴石油的部門壓制許多技術替代方案，並且迫使運輸、消費和城鄉規劃的方式只能服從於銷售越來越多的商品的願望，特別是汽車和其他大規模生產的個人消費品。
- iii. 在過去40年中，儘管有日積月累的越來越可信的證據，資產階級政府和媒體仍然無視科學家們的警告。相反，它們支持資本主義遊說團體的歪曲宣傳，與此同時，生產和交換的新自由主義

的全球化正在導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爆炸性增長。

- iv. 在21世紀初的今天，全球變暖的原因有完備的資料記錄，危險是政府已知也承認的，技術解決方案是存在的，並且情況的嚴重性隨著專家們的每個新報告而增加。如果不採取義務性的政策，專家估計，從現在到2100年，平均溫度將比十八世紀上升6度以上。然而，3.25°C的上升（相對於前工業化時期），這個數值位於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的中段左右，也就是到2050年，沿海洪水將造成1億至1.5億受害者，饑民高達6億人，瘧疾患者達3億，而水資源短缺將影響到35億多人。儘管這樣，資本主義仍然不顧一切地繼續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非傳統能源（重油，瀝青砂，葉岩油）以及巨大的廉價煤炭儲備。由於構成該制度基礎的是積累邏輯，從而啟動了生產主義的賭博，它意味著危險的技術：發展核電和發展旨在增加生物燃油的有害生產的基因工程，以及發展捕捉儲存億萬噸二氧化碳於深部地質層的“清潔煤”技術。對資本而言，可再生能源，只是一個新的價值積累領域，這解釋了為什麼它們的實施形式會特別地帶有破壞性，它們被用作化石燃料供應的補充而非替代。資本的唯一限制是資本自身（馬克思語）。這一制度的瘋狂競爭，造成兩極分化，在一端積累財富和過度消費，另一端則是貧窮和匱乏，它威脅著促成人類生態災難，這是一個歷史尺度上不可逆轉的災難，會對生態系統，特別是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儘管這一危險臨界點，同前工業化時代相比，大大低於2°C，它已在許多地區（島嶼國家、安第斯國家、北極地區、半乾旱地區...）遭到反對，但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層面上已經通過或正在討論的一些計畫，對應於一個60釐米至2.9米的海平面上升（不計兩極冰蓋的脫位），為均衡起見，卻提出3.2°C到4.9°C之間的變暖。儘管千年發展目標並不足夠，但它卻不能達成，不僅如此，還有千百萬人面臨他們生活條件的嚴重惡化。對於其中最貧窮的人而

言，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特別是來自海岸洪水，淡水資源緊張，熱帶地區的農業生產力的預期下降所造成的風險之威脅。

2. 認為隨著化石能源的耗盡，氣候穩定就會自然地達到，這是一個幻想。這足以激發氣候轉捩點。若要把氣候穩定在可能的最低危險的水準，就需要大量減少能源消耗，從而需要減少物質生產。同時，能源和其他資源必須確保30億男女的發展權利，這些人生活在不符合人性的條件中，是全球變暖的第一批受害者。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分開接受這兩項挑戰的。對於它來說，同時對付這兩項挑戰等於要它做不可能的事。要不計代價地實行世界性的過渡計畫，完全基於可再生能源，基於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建設一個經濟高效的能源系統，要執行這個計畫，徹底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看法，要讓氣候穩定在最小危險可能的水準上，需要全世界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15年之前達到峰值，並從現在到2050年之間，減少到2000年的百分之50至85。按照預防為主的原則，至為重要的是把這些目標最嚴厲的部分作為最低限度要做的事。事實上，氣候模型沒有納入已知的“非線性”現象，特別是格陵蘭島和南極冰蓋的脫位以及永久凍土（凍土）釋放的甲烷，就算納入了也是做得非常不完善的。但是，這些現象已經明顯，很可能會強烈地加速氣候變化，並大大增加今後幾十年的負面影響。

除了這些物質的限制外，還必須加入社會，政治和技術性質的其他限制：

i. 為了計算帝國主義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不同歷史責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估計，參照1990年，從現在到2020年，首先必須減少25%至40%的排放量，從現在到2050年，要減少80%至95%的排放量，然後，2050年在所有地區和從2020年開始在大多數地區（非洲除外），相比目前的預測，輸出曲線必須下降15%到30%。在此，同樣基於上述理由，最低限度必須採取最嚴厲的目標。

ii. 考慮到它們對全球變暖的決定性責任，這些目標中有關發達國家的部份，必須由它們使用國內措施加以實現，即減少它們自己的排放量。

這些排放量削減，不可以代之於通過在發展中國家或經濟轉型國家的所謂“乾淨”投資而購買的污染權，也不能代之於種植樹木---它並不提供結構性的解決辦法，也不能代之於對現有耕地和森林的保護---土地和森林的保護，本身就是必要的，必須停止讓污染者繼續污染。這些京都議定書預期的所謂補償措施和排放權市場，從環境的角度看，已證明是完全無效的，甚至達不到這些協議中根本不充分的目標（2008-2012年期間減少5.2%的排放量）。

iii. 為了氣候正義和償還生態債務，帝國主義國家必須向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轉移知識和技術，使他們在發展的同時，尊重氣候穩定的物理限制。他們還必須資助對不可避免的氣候變化作適應的那部分人，其中貧窮國家的貧困人口，多半是婦女，是主要的受害者。

iv. 從技術角度來看，可再生能源可以充分面對人類的未來需要。但是，由於需要改變能源系統，未來40年過渡的成功的前提是能源消費的重大減少（百分之五十，發達國家更多）。這反過來又意味著物質生產的大量減少，於是關鍵問題是：有必要減少整體生產，同時又要滿足30億人的合理需求，因為他們的許多基本需要仍然得不到滿足。

根據氣候變化造成的破壞成本，給碳賦價，從而讓這些條件得以遵循，這個想法是一個完全的幻想。價值是一個純粹的量化指標，表達通過資本的發展，在某一時刻付諸實施的抽象的人類勞動量：按定義，它不能考量自然財富，不能考量子孫後代的需要，無能力從人的角度區別有用或無用的具體勞動，也無力考慮到氣候穩定的眾多數量和品質參數。這種無能為力，已經體現在實踐中的事實裏，即資本主義壟斷者盡其全力，成功地阻止了全球變暖的帳單放在其門口，歸根究底，他們是根據自己的利益，確定推行政策的節奏和形式。最後，在社會層面，一個碳的世界價格的實行，將使工人和窮人為全球變暖買單，從而加重了北方和南方間的不平等現象，也加重了北方和南方的社會內部的不平等現象。

資本家是無法解決關鍵問題的，因為它在結構上無法做到，更多地為不能消化的需求生產的同時，減少整體的物質生產。要完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礎上，不計成本地、有計劃的、民主的和

合理的實施向經濟高效能源系統過渡的世界方案，同時兼顧人類發展的合法權利，這只有訴諸徹底的反資本主義措施，才有可能。這些措施特別包括：徵用信貸和能源部門；大規模的削減工作時間（半天的工作）以及減緩工作節奏，但不減工資並且額外雇用工人；對資本利潤課以重稅；通過對農民農業的支持，盡可能地使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重新本地區化；改變消費模式，在住房和交通領域提倡公共化；用壟斷利潤資助建立適應期世界基金；為研究作公共再融資，結束其對企業的從屬地位，向南方國家無償轉讓清潔技術；以及在所有這些不同的層次上，由人民和地方政府機構控制的民主參與機制。



3. 200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依賴的是化石燃料，留下有毒的產物，氣候變化之所以集中在文明危機上，乃是因為這個事實，即這個制度的社會生態破壞潛力目前遠遠超過確定人類需求和應對這些需求的能力。在資本主義人口律的框架內，經濟氣候和糧食危機的組合，造成一項重大的人類災難威脅，甚至是一個退回到野蠻時代的威脅。

兩百年資本主義發展遺留的有毒產物，氣候變化，構成了一個制度的全球性危機之最明顯的示範，這個制度的社會生態的破壞潛力現在遠遠超過其確定人類需求和回應該需求的能力。生產力的增長，已成為破壞性力量的增長，這不僅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和生態上的破壞性技術已付諸應用，而且，整體而言，因為破壞氣候的資本主義邏輯，正把人類帶向全範圍的嚴重困境。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意味著特別的人口律，表達了對“產業後備軍”的永久需要。在這個定律框架內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衰落的背景下，經濟氣候和糧食危機的組合，在其中產生了深刻的威脅，一波規模空前的“創造性破壞”（熊彼特），這不僅意味著物質生產力和不可替代的自然財富的大量淘汰，而且也意味著對億萬人類造成身體破壞的重大風險。這地獄的邏輯已經在作用，在聚結投資於農業、能源、汽車和石油化工的各個大資本，把他們的手伸向土地，伸向用作能源的生物資源的工業開發，正在加快小農的破產和農村人口的外流，威脅原住民社區，大大增加了作為慢性饑荒災民的次級無產者。缺乏一個全球性的替代，這個制度的內在動力將前所未有地強力推動全球危機滑坡，這場危機殘暴和野蠻的水準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4. 氣候變化加強了一個世界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和一個同生產主義徹底決裂的社會主義計畫兩者的緊迫性。和以往不同的是，碳迴圈的飽和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實際上意味著，不同時考慮到主要的自然限制，工人的解放是不可想像的。

反對資本主義增長的本身，既不是社會的項目，也不是支持另一種社會的廣泛社會動員的戰略。物質生產和消費的減少對氣候的穩定是即刻必要的，因為在把人類驅向死亡之路這方面，資本主義已做過頭了。但是，這並不以任何方式預先判斷發展的未來可能性，一方面，它只要求先讓氣候系統穩定下來，另一方面，它只是朝無化石碳經濟必要轉型的一個定量標準。如果我們不想被引向反社會的甚至反動的結果，這種定量的標準必須與品質標準相結合：特別是財富的再分配，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工資，公共部門的發展。如果這些要求得到滿足，達到了它針對無用或有害生產制定的條件，那麼，通過對社會部門的投資，一個不同的城市和國家規劃，免費獲得的重要服務，以及重新掌握必要的自由時間，用於各階層的自我活動，自我組織和民主自治，這樣的話，物質生產的減少實際上將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質量、財富和幸福同步增加。

資本主義制度同物質生產和消費的增長是分不開的，但這是效果而不是原因。作為交換價

值之抽象形式的價值的生產，它導致財富在一端無限積累，並同時導致貧窮和匱乏在另一端積累的永久趨勢。沒有考慮到這種雙重現實的氣候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從而，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關鍵點和杠杆，基本上仍然是那些社會主義性質的項目：動員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反對以利潤競賽、生產資料私有制、生產商品、競爭和工資為基礎的制度。但是，對於解釋替代方案，這個關鍵點和這個杠杆是不夠的。碳迴圈的飽和實際上構成了這個事實最明顯最全球性的顯示，也即：不像過去，不考慮自然的主要制約因素，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設想的，這些制約因素有：依照歷史尺度，不可再生資源的儲量有限，再生資源的補充速度，能源轉化的規律，生態系統和生物週期及其節奏的運作條件。

光是肯定社會主義必須接納生態問題，這是不夠的。真正的挑戰，在於創造條件，使社會主義專案同陸地超級生態系統的全球生態相容。發展的設想，不能僅是旨在滿足真正民主確定的人類需要，還要兼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性，更要接受這樣的情況，即：複雜性，未知因素和生物圈的演化特徵賦予這項事業某種程度的不可逆轉的不確定性。應該放棄“人類控制自然”的概念。從現在起，唯一真正可能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滿足真正的人類需求（擺脫商業異化）的社會主義，它是由利益相關的各方自己民主地決定的，做決定的同時，要小心謹慎地反省自己，這些需求對環境會有哪些影響，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方式對環境會有哪些影響。

從社會和生態的相互滲透方面考慮，意味著首先要超越關於自然的分劃、功利且簡單的觀念，不能把它當作人類操作的物質平臺，不能把它當作商店，從中提取對社會存在之生產所必要的資源，也不能把它當作垃圾場，堆積這項活動的垃圾。在現實中，自然同時是平臺、商店、垃圾場和所有的生命過程，由於太陽能的外部供應，使這些環節之間產生迴圈，同時不斷地重組它。因此，廢物和它的處理方式，在品質和數量上，必須同生態系統迴圈的能力和節奏相容，以免破壞生物圈的正常運作。但是，這種正常運作取決於生物操作者的數量和多樣性，以及取決於聯結它們的關係多重鏈的品質和複雜性，取決於最終確定供應給人類的資源的平衡流。

其次，從社會和生態的相互滲透方面考慮，意味著汲取現實教訓，即：生產方式不只是由生產和財產的關係確定的，它還取決於其由能源選擇規範的技術結構。氣候變化清楚地表明：為了滿足人類（糧食，熱，光）的需要，一個生產模式使用的能源和能源轉換的方法，並不是社會中立的，而是有一個明顯的階級性質。資本主義的能源系統是集中的，盲目的，浪費的，效率低下的，物化勞動密集的，基於不可再生能源的，並具有商品過度生產的趨勢特點。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把它逐步摧毀並代之於一個分散的系統，這個系統是有計劃的，經濟的，高效的，活勞動密集的，完全基於可再生能源的，並且其生產指向具持久實用價值的可回收利用的東西。這一轉變不僅關係到狹義的能源“生產”，而且關係到整個工業機制、農業、交通、休閒，以及城市和鄉村規劃。能源/氣候挑戰迫使我們對社會主義革命做這樣的設想：它不僅要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建立就開始儘快地消亡，並且逐步進入人民自治狀態，它還要作為一個老的資本主義生產機制銷毀進程的開始，代之以另一種機制，利用不同的能源，不同的技術和不同的結構服務於民主決定的目標。這種極其深刻的歷史巨變可以開始於一個國家或一組國家，但它必須包含其全部特點，並且完成於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也就是主要的發展不平等的廢除能夠名副其實地滿足每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後。其實，它的前提是能源自主權，尤其是不同國家的糧食自主權的初步實現。遠非人類發展終點的代名詞，它意味著科學技術以及民主運用它們的社會權力的重要進展，在一個“審慎照顧”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內，有每個人的積極參與，對此原住民社區的貢獻將是非常寶貴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認為，一旦人類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人類發展的品質將比發展的數量更重要。這種觀念同馬克思是一致的，對他來說，真正的財富是自由時間、社會關係和對世界的理解。一個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陽能——的共產主義的前景，持續地存在於這個非生產主義的思想中，深化它，並根據需求、任務和綱領擬定出新的結論。這一深化證明了生態社會主義新概念使用的合理性。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剝

削人類勞動和破壞自然資源的共同鬥爭的集中體現代表，生態社會主義不是從一個建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理想和空幻的“和諧”觀出發，而是從管理社會與環境的交流問題的唯物主義必要性出發，同時有意識地，集體地和民主地控制人類需求和生態系統正常運作之間的緊張關係。

5.我們的任務

5.1. 預備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使他們可以幫助群眾意識的發展，有助於就氣候問題發起群眾動員。有關氣候變化的鬥爭需要優先建設社會的力量關係。面臨問題的緊迫性，面對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罪惡政策，我們在各個國家工作，建設一個強大統一的、在世界範圍內協調的群眾運動。這一運動必須看成是現存社會不同階層的社會抵抗網，在最小的共同平臺上，有一致協調的行動與定期的多元示威。它的目標必須是迫使政府至少達到IPCC提出的最基本的排放量的減少，尊重“共同但責任有分別”的原則，尊重社會民主權利原則以及每個人名副其實的生存權的原則。保護氣候的民眾動員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特別是由於現象及其影響之間，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雙重錯位。關於全球變暖及其影響的資訊廣泛的宣傳運動，是必要的。它的目標必須特別針對各種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的活動家核心，因為這些核心，在建立全球氣候威脅和特殊社會問題之間的具體鏈結上，在推動使社會鬥爭同環境鬥爭的結合成為可能的戰略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

5.2. 建立一個連接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的左派運動。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動員和積極參與，必要的變化是不可能取得的。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使這種參與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在社會層面上是不能接受的。事實上，這政策意味著帝國主義統治和資本主義競爭以及暴力的加強；因此也即意味著剝削、壓迫、社會不平等、工人之間的競爭、侵犯權利和資源的私人佔有行為的強化。特別是，對於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各部門的數百萬雇工的就業，工資和社會成果所代表的主要挑戰，這一政策並沒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只能遭遇合法的社會抵抗。大型環境非政府組織試圖激進化各國政府的氣候目標，卻又拒絕承認這個激進化作法同時也會加劇

反社會的攻擊。這是一條死胡同。我們捍衛把氣候鬥爭同社會正義相結合的需要。在廣泛的運動中，我們努力組建一個左翼，它連接這兩個方面，並堅持反對這樣一些建議，這些建議的基礎是市場手段、積累、新殖民主義統治和技術冒進。這個左翼將設法彙集工會成員、生態學者、全球正義運動、女權運動和第三世界左派、“影響力減少的”左派、激進左派組織、批判性科學家組織等。

5.3. 進行反對綠色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思想鬥爭，保護窮人和婦女的權利。根據它的全球性質，和它可能引發的災難程度，全球暖化有利於一整系列的意識形態思潮的發展，在基本生態的掩蓋下，這些思潮試圖修復馬爾薩斯論，把它包裝在一個帶有強烈宗教聲調的世界末日的說法中。這些思潮在統治階級的一些部門中找到最高的回聲，在那兒，幾億人的消失比資本主義的消失更容易想像。正因為如此，他們代表的是對窮人尤其是婦女的潛在嚴重威脅。反對這些思潮的鬥爭，代表了一項重要任務，是我們的組織必須承擔的、並要與婦女運動聯結的任務。人口水準顯然是氣候變化的一個因素，但我們要堅決打擊這個欺騙人的說法，即人口增長是氣候變化的原因。發展中國家的人口結構正處在大規模的轉型中，進展之快，超過預期。它的繼續是可以預期的，但那是社會進步、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結果，是婦女有權處置以及控制自己生育（包括正確條件下的墮胎權）的知識的結果。這顯然是一項長期的政策。除了訴諸野蠻的辦法，沒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能夠應對氣候的緊迫性。

5.4. 把氣候問題引入社會運動的鬥爭平臺。從紮根於現有鬥爭的廣泛動員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行為要使保護氣候成為社會運動的重大關切，並找到所有層面的要求的具體體現。例如：

- ▶ 爭取和平的鬥爭：生產和使用武器對於氣候變化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愚蠢行為...其本身就是增加衝突的一種可能原因；

- ▶ 與貧困作鬥爭，爭取發展和社會保障的權利：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同資源和發展水準是成正比的。社會的不平等會增加遭受攻擊並且妨礙能源的改變；

- ▶ 婦女的鬥爭：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會加強婦女的具體要求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些要求包括

平等權利，社會負責照顧和保護兒童，反對讓婦女作雙重工，墮胎避孕的權利；

- ▶ 爭取就業的鬥爭：從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重組的領土和城市，照顧生物多樣性，發展公共交通，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巨大的高品質的潛在就業機會；

- ▶ 為獲得土地、水和自然資源，為有機農業而奮鬥：實行勞動密集型之有機農業的農村社區，知道如何增加土地有機質含量，減少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 ▶ 反對農業市場全球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是造成農村荒蕪、饑荒、農村人口外流和/或生態系統被掠奪的一個原因，這些市場的自由化，直接（出口產品運輸）和間接地，也是廢氣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

- ▶ 爭取庇護權：面臨環境難民特別是氣候難民的增加，移居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合乎人性的唯一反應；

- ▶ 原住民社區的維權鬥爭：按照他們的知識，按照他們的生態系統尤其是森林的開發模式，這些社區最有能力維護和發展碳沉積；

- ▶ 反對工作的多變性和不穩定性，反對延長工作時間：多變的工作日程表，使勞動力流動性增大的資本主義競爭，迫使工人使用汽車。“及時”生產是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個主要來源。要大規模發展一個消費和休閒的替代模式，工作時間的減少是必要條件；

- ▶ 反對私有化，爭取在運輸、能源和水等領域的優質公共部門。只有優質的免費公共部門才能夠調動每個人的外出權利和碳排的減少。電力生產的自由化，使得間歇性可再生能源網路的引入變得複雜。只有不求利潤的公營企業能夠接受挑戰，在二、三十年內抑制住房方面的整體碳排放量。

5.5. 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鬥爭超越財富的再分配，按照這個觀點，力求使氣候成為工會左翼的一個軸心。大型國際工會聯合會的領導人，隨資本主義氣候政策起舞，交換他們就某些政策模式談判的可能性。這個定位在以幻想為基礎的“綠色新政”的建議中具體化，這個幻想就是綠色技術將有可能吸收失業，並推動繁榮和資本主義擴張的一個新長波。工會官僚接受生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盈利的要求以及主要的氣候政策手段：政府

援助“綠色”公司，“生態稅”，清潔發展機制，排放權市場，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這項政策很可能使工會運動成為災難的幫兇。它分化國際工人，在不同國家的各部門之間製造分裂。考慮到氣候和能源挑戰的重要性，使之成為其爭取改變之鬥爭的一個要素，這對工會左翼是決定性的。這場戰鬥是困難的，因為它不涉及“經濟復蘇”，而是關係到能源消耗的減少，抑制無用或有害的生產，這些行業工人的再轉業等等。由於工人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聯結方式，是他們的日常生存所依賴的，因而此戰有相當大的障礙。為了接受這一挑戰，工會左翼必須離開以財富再分配為中心的狹窄視野，以便駁斥財富的觀念與財富的生產方式，即該模式生產的根基。這種做法會引起一些重要的要求，如減少工作時間（連帶降低工作節奏，不減工資和雇用相應比例的新工人），擴大公共部門，免費獲得基本服務以及工人控制（工作節奏，生產，能源等）。

5.6. 向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大量轉讓清潔技術，和資助這些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影響，需要世界範圍內共用知識和資產，因此，要對資本主義利潤課以重稅。拯救氣候需要在世界範圍內共用知識和資產。因此，它必須涉及：

- ▶ 取消第三世界的債務，和把南方國家獨裁者在西方銀行的資產歸還給人民；

- ▶ 解除銀行保密，抑制避稅天堂，對遺產徵稅，對投機活動徵稅等；

- ▶ 大幅增加帝國主義國家分配的政府的發展援助預算；

- ▶ 除了這種援助外，創建一個單一的世界基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必然影響，並向這些國家的公共部門轉讓清潔技術，而不附加資金條件；

- ▶ 這個基金的來源應該來自稅收，來自對氣候變化最有責任的經濟部門（特別是石油、煤炭、汽車和電力生產部門）的利潤和過度超額利潤的徵稅；

- ▶ 抑制衛生系統的專利權，抑制生產基本消費品和服務（運輸、輕工、水和能源、通訊）技術方面的專利權，使所有的地球人都能獲得基本商品；

- ▶ 對放棄開採其礦物燃料資源的南方國家的財政補償制度。

5.7 同預測相比，帝國主義控制的國家的排放量將無法減少至少百分之三十，除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受到質疑。在把氣候穩定在最低危險的水準方面，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的貢獻，可能只能通過回應大量人口的需求，由內部的發展達成，因此，與有利於農民農業的土地改革有關，同生產的方向轉向國內市場有關。因此，人類發展與氣候穩定的協調，需要採取措施反對地方統治階級，因為他們使用發展權為藉口，拒絕任何對燃燒礦物燃料的阻礙，掠奪自然資源，把森林據為己用，充當碳排放額度買賣中間人，生產生物燃料，並向發達國家市場低價出口農產食品或工業品。為了防止他們助長這種社會和生態有害的模式，置於南方國家處置的資金和技術手段，必須置於人民及其社會運動的民主控制之下。

5.8 原住民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他們與環境的關係類型，在保護森林的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從而總體上也保護氣候和環境。特別地，拉丁美洲人民有一個源於他們祖先文明的概念，它同資產階級思想推動的東西截然相反。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地主人，反而認為他們自己屬於土地 --- 這一觀念概括了他們哲學的主旨，它源於對土地的尊重。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稱土地為地球母親，或帕查媽媽的緣故。他們養育、維護和發展一個以社區團結為基礎的生活模式，這個模式深深地連接自然。因此，原住民的社會政治組織在其領土上不把自己局限於帝國主義強加給他們的邊界。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自然資源和各族人民的威脅 --- 作為無數次侵略他們領土的結果 --- 是對他們不可剝奪權利的攻擊，這促使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抵制跨國公司在自由貿易協定或區域基礎設施南美一體化（IIRSA）框架內進行的掠奪。我們必須支援他們的要求，反對沒有得到這些民族的事先同意，就佔領其領土，建立任何採掘業和水電站，鐵路，公路和水壩。由於環境問題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顯然具有戰略地位和作用，建立城鄉工人和原住民人民之間的聯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在這些鬥爭中，僅存的熱帶森林的保護也是利害攸關的，因為熱帶森林在氣候系統中有重要作用。

5.9 反對技術冒進，並把所有巨大的生態挑戰納入一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前景中。資本主義的歷

史充斥著環境危機，沒有從全球生態角度去“解決”它們，只做了從屬於利潤的部分技術解決，其有害的環境影響稍後隨即出現。而按照這個同魔法師門徒一樣的方法，解決氣候/能源危機，可能有更加危險的後果，特別是在三個領域：增加訴諸核能，轉基因生物，以及煤炭開發新熱潮框架下的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反對這些資本主義的作法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他們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這是瘋狂而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增長的象徵，因為該制度妄圖跳過自己頭，要不顧一切地維持產生利潤的積累。更一般地，氣候挑戰彙集了所有的環境問題。因此回應必須結合所有巨大的生態挑戰，特別是：（一）熱帶森林的保護，尊重依賴那些資源（碳匯）生活的原住民社區的權利；（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三）水資源的合理和公共管理；（四）反對來自石油化工的幾十萬分子對生物圈的毒化，這些分子並不存在於自然界，因而在某些情況下不能用還原劑破解；（五）消除破壞平流層臭氧的氣體，代之於沒有其他危險的生態影響的化合物；（六）反對大氣污染及其對人類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生態系統（酸化，對流層臭氧）造成的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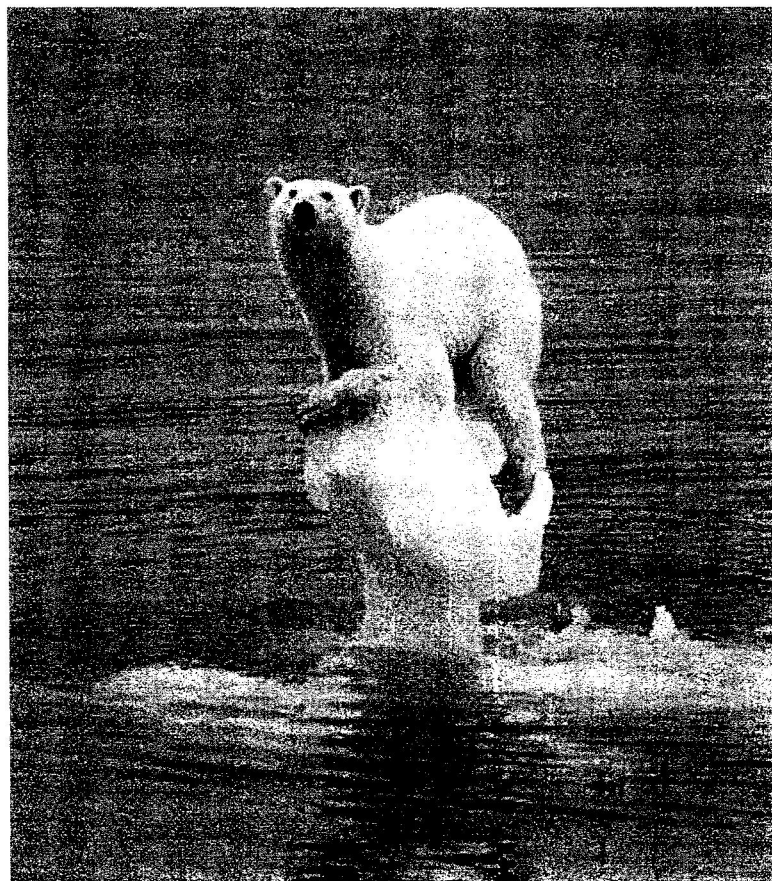
5.10 譴責資本主義計畫和科學家們對局勢的判斷之間的鴻溝。建立與主要科學家的聯繫。提出知識產權和研究的社會作用問題。各國政府正試圖使我們相信他們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氣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必須大力反對這個做法。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譴責把政府目標同從IPCC報告之預防原則得出的結論分隔的鴻溝。這一公開譴責意味著，在批評主導意識形態和由大部分專家傳達的社會成見的同時，充分理解科學知識的本質。左翼必須建立與科學家的關係，邀請他們傳達他們的社會運動專業知識，挑戰他們一般的政治立場，依據他們自己的科學知識，推動他們解說這樣的矛盾，該矛盾的一方面是抗擊全球變暖所需要的全球合理解決方案，矛盾的另一方面，則是為部分資本主義合理性服務的極端各自為政的科學。考慮到政策擬訂中科學知識的地位，建立社會運動和重要的人文研究之間的關係，就是相當重要的。在此框架內，為爭取社會正義框架內的氣候穩定，我們要發展關於科學和研究作用的一個較普遍觀點。我們不拒絕技術解決方案，也不拒絕發展和

進步的概念。相反，我們認為科學研究和技術要從資本的影響力下解放出來，使它們的潛力，可以用於大量和迅速地服務於能源效率方面的進步，合理的資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要求為研究作公開大規模的再融資，終結把大學同企業和金融資本聯結的合同，在轉型背景下，在社會正義的框架內，朝向建立一個沒有化石燃料的社會，民主地決定研究的優先次序。

5.11 反對使個人感到內疚的企圖，但肯定社會上對能源需求盡可能的清醒。政府的說法旨在使人們感到內疚，它把全球氣候變暖的責任置於個人行為上，尋求用魔法驅除社會不平等，掩蓋資本主義的責任，設法轉移人們對必要的深刻結構變化的關注，為“碳稅”這一類的不公正措施鋪平道路。在超過一半的人類生活在長期低消費水準的情況下，相信通過反對過度消費的“文化蔓延”運動，可以拯救氣候，這是一個錯覺。但是，押賭注於假設的革命性科學突破，以避免質疑個人過度消費及其引起的後果，這也是一種幻

想。不是把消費領域的行動同生產領域的結構性變化對立起來，而是必須把前者理解為一種使人們意識到後者之需要的手段。替代性的社會習俗，民主運動和動員，甚至那些只涉及少數人的、對抗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運動，也可以對集體意識的形成發揮積極作用，這個集體意識就是生產領域的結構變化是必要的，而這些變化將伴隨著更高品質的生活。

5.12 實習災難發生時的大眾援助。氣候變化大大增加了災難的風險，特別影響到工人和窮人，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面對這一威脅，我們必須準備在兩個不同的層面干預社會運動：需求層面，也即把國家和政府擺在他們的責任前面，以及直接的、民眾的和相互依存的援助層面，這個由地方居民及其組織負責，加上一個世界範圍的活動分子網絡的援助。事實上，在自然災害中所取得的經驗表明，這些民眾的援助措施更快、更直接地指向窮人和他們的實際需要，而且花費較低。此外，他們贊成發展不同種類的社會關係和既定秩序的論爭。



氣候和反資本主義戰略動員

丹尼爾·坦努樂

30億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需要增加物質商品的生產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要增加能源消耗。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能源來自化石，這是導致氣候系統失衡的一個溫室氣體源頭。

但是，我們不能再允許自己讓氣候失衡。我們離一個“引爆點”可能不再很遠，越過這一點，按人類時間表無法控制的和不可逆轉的現象有可能啟動，它可能導致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地球6500萬年沒有經歷過的狀況：一個無冰的世界。一個世界中，同今天的水準相比，其海平面將上升大約80米。

冰完全的消失，當然不是明天：這個過程可能長達一千年。但它可以在20，30或40年內啟動，涉及在本世紀末海平面數米的上升。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有必要從根本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要做到在兩三代的時間內完全沒有化石燃料。

沒有煤，石油，天然氣，怎麼辦？這是可能的，即：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潛力足以補償一切。但在實踐中，在我們極短的處理時間裏，只有密切連接能源消費的重要減少，能源過渡才有可能。削減如此之大，不能只通過能源效率的提高來實現：物質生產和貨物運輸的減少是必要的。

這足以讓人們瞭解和認識到，人類正面臨巨大的挑戰。一個全新性質的挑戰，將主導21世紀。一個挑戰，有助於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和一般工人運動的干預條件。

無論在社會層面，還是環境層面，資本主義不能接受這一雙重挑戰。更確切地說：它不能以人類可以接受的方式應對它（稍後，我會回到這一點）。這個無能為力的原因在兩個層面上是同樣的：資本主義的目的不是為滿足有限的人類需求而生產使用價值，而是由許多競爭資本，圍繞對手國家組織起來，生產潛在地無窮的價值。

熊彼特說，一個沒有增長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生產的相對非物質化的確是一個現實，但是大量商品生產的增加足以彌補它。積累動力是根本原因，對於它，“綠色資本主義”是一種幻想，“社會資本主義”也是這樣的。毫無疑問，有綠色資本，甚至越來越多，它

們帶來可觀的剩餘價值。但他們並不能取代骯髒資本：它們被添加到骯髒資本身上，因為後者做主導，所以它們確定前者的節奏、技術選擇和引進的方式。

最近的過去不會留下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疑問。看看奧巴馬：在總統競選時，他答應讓污染者付出代價，以大力支持綠色能源（10年1500億美元），並幫助社會弱勢群體階層，以處理能源價格的增加。這項政策可望創造500萬個就業機會。但隨著次貸危機，關於所有這些意圖，仍然是無所作爲。在美國，在歐盟，污染者將得到污染權而無需任何代價，出售污染權而盈利，並將代價轉嫁給消費者。

資本主義的氣候政策強化了破壞氣候的資本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化石能源的說客及其相關的部門，如汽車，造船，航空，石化和其他部門在活動。這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根據該分析，壟斷者們有能力放慢利潤率的均衡化。在化石燃料的情形中，這種能力之所以較強，完全是因為它掌握了礦藏礦山等的所有權，掌握了地租。結果就擺在我們的眼前：在所有國家，氣候計畫所代表的，甚至不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必需的一半。此外，這些計畫正在加深社會的不平等，還伴有危險的技術冒進：核能，大規模的生物燃料生產和二氧化碳捕獲和地質封存（應該使煤變得“乾淨”）。

正是在這個一般的框架內，我們要查看哥本哈根鬧劇：超級媒體化的會議，本來應該導致一個新的制約性和雄心勃勃的國際條約，接替以失敗結束的京都議定書，但結果是：沒有硬性數位目標，沒有期限，甚至沒有衡量排放量之減少的參照年。

此外，哥本哈根很可能標誌著比京都議定書更危險的政策轉捩點。事實上，通過該協議，他們得出結論，25個污染大國基本上擺脫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科學壓力和共同但有責任區別的原則。這是帝國主義和新興的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討價還價協議，它們站在人民，工人和全球窮人的背上分配大氣。非常令人擔心的是，12月的坎昆會議將確定這一轉機。在這種情況下，在當前國家氣候計畫的基礎上，我們可

以預計，2100年平均地表溫度的上升在3.2和4.9°C之間（相對於18世紀）。

我們應該警惕落入一個有末世論意味的災變主義。確實，某些世界末日的說法，只會引發緊迫感，以便主張犧牲，並且驅走資本主義的責任。但是，毫無疑問，攝氏4度的溫度上升將導致真正的社會和生態災難。

此處，這是一個對威脅作準確度量的問題。它不是受到威脅的地球未來的問題，也不是地球生命的問題，甚至也不是人類生存的問題。除了小行星落在我們身上，大規模的核事故可能是唯一能威脅到我們人類生存的東西。氣候變化在任何情況下，不會構成這個威脅。但它的威脅是嚴重惡化30億男女的生存條件，這些人已經缺乏生活的必需品。它威脅到他們中間數以百萬人的生理生存，而這些人對全球變暖的責任最少。

在‘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大浩劫’中，邁克·大衛斯詳細描述了19世紀末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可怕饑荒。這些饑荒是罕見的一系列厄爾尼諾現象和世界農產品市場形成的綜合結果。我們必須估計到，這類悲劇在重演。由於時代的不同，導致這幕戲劇的，完全是大資本對利潤的渴求，特別是基於礦物燃料的壟斷行業。這使我們能夠準確確定資本主義無能應付這個挑戰的原因。

“對於資本主義，不存在沒有出路的情況”，列寧說。的確如此。但這次的出路可能是特別野蠻的。

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是同一個危機

很明顯，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是同一個危機，即：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生態危機”的說法是誤導人的：不是自然處在危機中，而是社會與自然的關係處在危機中。不是氣候處在危機中，而且對氣候的干擾一般並非因為“人類活動”；而是由於這項活動的某些方式，那些歷史決定的、基於化石燃料的活動方式。換句話說，生態危機並非其他，而是資本主義的深刻制度危機的表現。

絕對顯然的是，滿足發展的權利，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同時在未來四十年必須大量削減排放量，要這樣做，只有採取徹底的反資本主義的觀點，才有可能。在本報告的第二部分，以斯帖·維瓦斯將回到我們的政治任務。我只想在這裏列舉必要的主要措施，即：移除無用或有害的生

產，計畫過渡到另一個能源體系；建立可再生能源和發展能源效率，而且不計成本（考慮熱力學的合理性，而非利潤）；通過有關國家的公共部門，向南方人民大規模及免費地轉移清潔技術；成立世界基金，幫助貧窮國家適應全球變暖的影響；支援農民農業，反對農業企業；重新佈局大部分的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通過侵蝕資本的收入，重新分配財富；徹底減少工作時間和工作節奏，但不減工資，額外雇用工人；沒收信貸和能源部門…。

人們說：“知易行難。”毫無疑問，但首先要做的…就是‘說出來’。這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國際，一開始就必須做的，也就是：說出來。這將不會孤立我們，相反，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其實給了反資本主義的選擇方案以相當的可信度。這個問題的實在規模，它的全球性質，它的緊迫性，後果可見的可怕的不公平：所有這些造成這個可能，即以直接的和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引進徹底同廣義的商品生產決裂的需要。

考慮到利害關係的深遠影響，它比一個政策的選擇多得多：它是一種文明的選擇。通過氣候的危險，資本主義使我們有可能恢復共產主義的真像：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工程。一個以理性和謹慎的方式，自我管理共同自然資源的人類社會，其目的是讓大家生活得很好。面臨含糊的反自由主義的項目，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加強了我們明確的反資本主義路線的選擇，正如我們拒絕對管理資本主義的政府的任何參與。

在戰略上，對我們來說，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同一般的剝削和壓迫者的鬥爭是沒有區別的。能有效地進行鬥爭的，只有他們：工人階級，青年，婦女，窮人，小農，土著人。工人階級必須發揮重要的作用，因為只有它可以提供另一種生產模式的基礎，在這個模式中，它將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為何，為誰生產和生產多少。

在同一時間，說一般環境問題，特別是氣候的鬥爭，難以引入工人運動，這是一個保守的說法。這種困難來自工人的現況，他們作為受剝削最深的階級，脫離生產資料，尤其是脫離作為生產資料的自然，並認為由資本佔用的生產資料像敵對勢力那樣面對它。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把生態融入階級鬥爭的可能性，取決於階級鬥爭本身。工人越是被打擊分化和士氣低落，他們就越發認為保護氣候是一

個威脅，資本家階級就會更加真正使用氣候保護為藉口，加倍攻擊他們。在這種背景下，只有在深信行為清醒和負責任方式之必要性的消費者，和憂心於其就業喪失的生產者之間的內在衝突的疏離形式中，生態意識才能夠取得進展。

另一方面，工人在他們的鬥爭中越成功，他們就越對自己的實力有信心，就越能處理生態問題，集體意識到，作為生產者和自己產品的消費者，反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是至關重要的。

有利於被剝削和被壓迫者的，各種力量之間的較好關係，是氣候危機的反資本主義解決方案的必要前提，換言之，是任何可接受之解決辦法的必要前提。但這個前提是不足夠的，並且不允許我們拖延，直到後來為環境而戰。事實上，除了它的緊迫性，生態問題有一些具體特點，以至於一個反資本主義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在這裏比在其他領域遇到了更大的障礙。

三個推論：

- 首先，是建設一個政治工具，一個反資本主義政黨的重要性，這個政黨有能力分析這個雙重危機，即社會的和生態的危機。很少會那麼明顯地要求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個革命的國際，像一個集體知識份子那樣行事；
- 其次，是需求綱領的重要性，它能夠具體聯結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和生態面。這裏的關鍵問題是，就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社會的觀念，氣候危機給出一個新的話題，同時修復過渡綱領的概念，能夠建立當前的形勢和這一全球性替代綱領的橋樑；
- 第三，社會辯證法的重要性，它幫助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以發揮其作用。這不是偶然的，農民，土著人民和青年在為氣候的社會動員前線。青年人在爭取自己的未來，反對一個可怕的社會，在那裏當權者知道正在發生什麼，卻讓它發生。至於農民和土著民族，不同于工人，他們沒有脫離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面對殘忍對待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已經認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是其總體鬥爭的一部分，並賦予它強大額外的合法面。“農民可以冷卻農業商業正在加溫的地球，”哥本哈根會議前一點時候，農民之路的一個正式聲明如是說。工人們也可以讓地球

降溫。通過為需求而不是為利潤生產，大幅度減少工作時間，等。社會運動的凝聚可以幫助他們意識到他們所代表的巨大力量。莫拉萊斯在科恰班巴召開的會議有特別的重要性。

第四國際將自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

通過這項決議草案，第四國際會自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有些人拒絕這個標籤，說：“有什麼用，社會主義足夠了”。在生態社會主義的對手中，還有那種人，對他們來說，沒有任何改變，他們不同意十月革命的單純模式應該染上生態問題色彩。據我所知，他們不是我們隊伍中的。此外，還有些同志，在承認聯合的社會和生態危機的根本創新性的同時，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是對政治生態學的不必要的讓步。這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們可以詳細討論是否有作為馬克思生態學的東西。就個人而言，我認為馬克思是十足的生態學家，以前我們已經說過他是生態學家。但是，這並不是真正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流派都錯過了生態問題，他們中有些人仍然無視它，至今他們都難以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回應它。

首先，稱自己為生態社會主義者，是說：“我們理解”或至少，“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瞭解我們不理解的東西。”這是一個瓶子上的新標籤，有點像列寧說的必須穿上的新襯衫。一個新的標籤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生態社會主義遠比標籤的意義多。雖然這個概念仍在發展中，我們可以指明其一系列與社會主義頗不同的地方，這個社會主義有幾代鬥士構想的社會主義，還有我們自己目前設想的社會主義。

其出發點是，穩定氣候意味著一個不同的能源系統。不僅是生產電力、熱力或運動的其他技術，而且一個不同的農業，一種不同的理性和一個不同的空間組織。這一新體系的建設，必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要求破壞資本主義的生產機器。取得政權只是這個動盪的起點。

必須建立新的能源系統，意味著必須分散電力生產---這特別是合理利用熱量的前提---並遷移其部分的生產。分散和遷移完全與世界社會主義計畫相容，是民主自治管理必不可少的。但是，不會真的有爭議，因為這兩個議題並沒有自

然地出現於我們的規劃慣例中，而後者把重點放在生產和交換的世界規劃上。

另一組新的問題涉及到活勞動的重要性。對於諸如個人護理，教學，衛生等服務業中的活勞動，需要作投資，我們的規劃給這個需要以一個重要的地位。所以這些問題對我們並不陌生。但是，對於所有其他方面，我們依靠的觀念是，機器和機器人將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把生產者從體力工作的重負中解放出來。這種觀念必須受到質疑，因為對生態系統的照護需要智慧和敏感，這只有通過人的勞動才可能。在農業的情形中，這是特別顯而易見的：爲了“冷卻地球”，就像農民之路組織所說的，有必要，用農民農業或合作有機農業取代農業綜合企業。這必然意味著更多的投資用在人的勞動上（這既不意味著回到原始農業，也不意味著停止進步，但是，這是另一種進步的形式）。

最後，需要重新審查自然的真正含義。在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的確不能再滿足於單從生產的角度看自然，也即把自然看作爲一個資源倉庫，一個工作平臺和廢物垃圾

場。我們還必須學會如何從自然本身的角度來看自然，從事物大規模交流的角度，從生態系統運行條件的角度看自然，後者也即生態系統運行條件，將決定人類的生存條件。馬克思關於這個主題留有寶貴的指示，我們必須抓住它們，發展它們。

有關所有這些問題，該決議只是爲理論工作的進行開路，第四國際還要回到這項工作。但重要的是，現在發出一個信號，表明我們正在前進。在12月的哥本哈根，一個突破打開了。這是第一次，在全球環境問題上的群眾動員有了反對該制度的社會鬥爭的特性：“改變制度，不變氣候”，“要地球不要利潤”。這種國際主義運動將得到發展。它爲我們提供了相當大的潛力。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趨勢沒有等待我們去發展。我們必須加強它。

► 丹尼爾·坦努樂，經過認證的農學家和生態社會主義的環保主義者，爲“左派”雜誌（社會主義工人黨(LCR-SAP)的月刊，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撰稿。

~~~~~

## 反資本主義與氣候正義

埃斯特·維瓦斯

今天，氣候變化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首腦會議的政治，社會和媒體的影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首腦會議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對於它自身製造的危機，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綠色資本主義提供的技術解決方案（核電，大氣碳的捕獲封存，生物燃料等），會有重大的社會和環境的影響。這些都是氣候變化的虛假解決方案，試圖隱瞞那些導致我們目前危機局勢的結構性原因，引發資本的短期計算和生態平衡的長期節奏之間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這樣一個運動，該運動瞭解當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的影響和責任，把全球氣候威脅同日常社會問題聯繫起來，能夠挑戰綠色資本主義主導的話語權。哥本哈根會議看到了氣候正義運動的表達有增加，恰好配合了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運動十周年紀念日。在“改變制度，不變氣候”的口號下的抗議，表達了氣候與社會正義、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之間的這個難解關係。但是，哥本哈根抗議運動的成功與世界各地示威的衰弱形成對比，除了一些例外，如倫敦的示威。

當前的危機提出了自下而上改變世界的迫切需要，並從反資本主義和徹底生態社會主義的角度著手。反資本主義和氣候正義是兩個必須緊密相連的鬥爭。任何與當前經濟模式決裂，而不考慮生態危機重要性的想法註定會失敗，任何一個與當前制度決裂而無反資本主義方向的环境觀，將只處理問題的表面，並不再是一個為綠色市場政策服務的工具。

減緩氣候變化必須涉及到修改目前的生產、分配和消費模式。表面的妝飾沒有任何意義。要消除生態危機，這意味著要著手改變現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如果我們想要改變氣候，我們就需要改變這個制度。因此，正如丹尼爾·本薩義德在他的前一篇文章上所說的：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生態社會主義觀點，或生態共產主義觀點。

而且，我們必須打擊綠色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論點，該論點指責南方國家的高人口增長率，尋求控制婦女的身體，破壞著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決定權。對抗氣候變化意味著與貧困作鬥爭：社會不平等越大，氣候脆弱性也越大。有必要轉換有嚴重社會環境影響（軍事，汽車，採掘業等）的生產部門，創造生態公正的社會性部門的就業，如有機農業、公共服務（保健，教育，運輸）。

制止氣候變化意味著肯定人民的糧食主權。目前的農用工業模型（非地區化，集約化，里程密集，依賴石油）是最大的溫室氣體發生器之一。一個生態的地區性農民農業，加上短捷的行銷網路，正如國際農民聯盟‘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所說的，可以讓地球冷卻。它也應該納入當地人民的需求，他們控制自己土地和自然物品的要求，還有他們的世界觀，即：對“地球母親”、“大地母親”的尊重，以及“美好生活”的維護。加強這些貢獻，推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

新型關係，是解決氣候變化和地球及生活商品化的關鍵。

從南北角度看，氣候正義涉及到無條件取消南方國家的債務，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債務，並要求承認北方在社會歷史和生態上欠了南方的債，那是幾個世紀掠奪和剝削的結果。在災害情況下，有必要促進“民眾救濟”機制。我們已經看到，氣候變化增加了大眾階層的脆弱性，特別在南方國家。海地和智利地震是最近的兩起案例。這些威脅使得普通人民運動的國際團結網路變得必要，該網路可向當地居民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援助。這一主動性不能落在一個政治內容空洞的國際“人道主義”的手中。

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是反對目前工業生產模式的鬥爭，這個模式是非地區化的，“分秒必爭”的，大規模依賴礦物資源的，等。工會官僚尾隨著把“綠色資本主義”與綠色技術“鬧劇”的政策合法化，以創造就業機會，產生更大的繁榮。有必要消除這種神話。工會左翼必須質疑目前的無限增長模式，代之以另外的“發展”模型，這個模型同地球上的有限資源相關聯。氣候變化和環境要求必須是戰鬥工會的中心軸。工會會員不能把生態學家當作敵人，反之亦然。所有遭受氣候變化苦果的人和我們必須採取集體行動。

認為只要通過個人態度的改變，而且當一半多世界人口生活在“長期消費不足”的條件下，我們就能夠戰勝氣候變化，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同時，認為只要用科學與技術的對策，我們就能夠對付氣候變化，也是錯誤的看法。對於商品，能源等的生產模式，結構性變化是必要的。在這方面，以地方為基礎的主動倡議提出替代‘消費，生產，能源’的主導模型的實際方案...他們有一個示範性質，提高作為基礎的認識。

根據其性質，討論如何面對氣候變化，意味著討論策略、自我組織、規劃、以及我們這些自認為反資本主義者的人的今後的任務。

✦ 埃斯特·維瓦斯是龐培法布拉大學社會運動研究中心（CEMS）的成員。她是西班牙文著作“站起來反對外債”一書的作者，也是西班牙文著作“不用謝謝，超市”和“公平貿易朝向在哪裡？”的合作者。她也是‘南風’（Viento Sur）編輯部的成員（[www.vientosur.info](http://www.vientosur.info)）。

## 第四國際的作用和任務

### 第四國際第 16 次世界大會決議

1. 我們所處的形勢，其標誌是全球經濟危機和全球生態危機前所未有的結合，是空前的多重性危機，它將資本主義家長式文明置於危機中。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這種雙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並把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運動的改組和重建提上了議事日程。

反對大眾階級的社會經濟攻擊和新自由主義改革行動將增加。這些攻擊會特別影響到婦女，因為她們的處境（比男子高得多的貧困率、失業率和臨時工作）原本就更糟糕，爲了彌補公共服務和社會津貼的削減，她們將不得不增加其無償的家庭勞動。將會有更多的戰爭和衝突。宗教原教旨主義將日益成爲思想支撐，用來攻擊大眾階級，特別是針對婦女的身體自主控制權的攻擊，也會被用於國家和族裔之間的戰爭與衝突。特別是在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以及助長伊斯蘭恐懼症的‘文明衝突論’的思想方面，一個非歐洲中心的性壓迫解放做法是重要的。生態災難將特別打擊較貧窮地區的數百萬人民，使作爲一家之主的婦女情況不成比例的惡劣。

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出現在地平線上。世界經濟政治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新力量關係正在成形，並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勢力，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美國霸權的削弱，同歐洲、俄羅斯、亞洲和美國之間資本主義競爭的尖銳化相結合，加上北約的更大作用，對新的政治和軍事結構和新的國際緊張局勢，也有地緣戰略影響。美帝國主義重新部署其在世界各地的軍事霸權，以彌補它的經濟疲軟。在美國，社會經濟的矛盾導致喬治·布希的共和黨團隊聲名狼藉。作爲美帝國主義的一種替代解決綱領，選舉奧巴馬，是對這種惡劣聲名的回應，雖然他的選舉也是對美國一個社會階層的變化要求的回應，這個社會階層將會失望，但這就是現實。

總之，這場危機使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變得很明顯，儘管各個力量的關係仍然有利於資本。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它表明自己沒有能力提供一個解決綱領，這就是爲什麼20國集團的建

議退回到了以前刮起金融風暴危機的時期，爲華盛頓共識畫下句號，但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置於決策中心，有其明確的新自由主義優先性。沒有社會民主和能夠做出充分反應的中左派，這一社會制度的所有固有矛盾都會受到壓力。即使是尚未實施的新凱恩斯主義措施，也不足以解決這場危機。這樣，在宣傳說法及統治階級的偽裝，同造成各民族和工人痛苦的災難現實以及施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之間有隔閡，這個隔閡製造出社會緊張和政治危機加劇的條件。

這場危機對婦女，對被家庭排斥（或選擇不過家庭生活）的性別少數民族，有特別嚴厲的影響，他們因而被切割排除在資源以外。這場危機把許多最邊緣化的人，比如變性人，驅入更嚴重的貧困裏。這種情形在不發達國家尤甚，在這些地方福利狀況是薄弱的或不存在的。

2. 全球範圍內社會反擊繼續上升，但反擊方式很不平衡，仍然處在防守階段。全球正義運動失去了它直到2004年都具有的動力。然而，貝倫世界社會論壇表明，在鬥爭更加零碎和分散的框架下，國際凝聚的需要和可能性。在歐洲，反對20國集團和北約的成功動員是全球正義運動復蘇的跡象。伊斯坦布爾的歐洲社會論壇（ESF）可能是另一個重要的時機。世界婦女運動提出了在2010年共同倡議的新機會，這可能成爲重建和加強這一國際女權運動的步驟。

►在某些歐洲國家——法國、希臘、德國、波蘭、義大利——社會鬥爭對政治舞臺有中心影響，但這些鬥爭都不足以阻止或扭轉資本主義進攻和危機影響中的基本趨勢。他們還沒有成功地克服工人運動的四分五裂進程。這些鬥爭仍然是防禦性的。他們還沒有找到用反資本主義覺悟作表達的方式。在此框架內，在缺乏反資本主義左翼反對派的情況下，甚至排外和種族主義的綱領和趨勢能夠變得更有力。

►在中東、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繼續抵制西方和以色列的佔領和侵略。侵入黎巴嫩

兩年後，猶太復國主義政府在加沙地帶施行的殺人侵略戰爭，一直無法挫敗抵抗運動。雖然哈馬斯和真主黨目前是抵抗運動的主要政治代表，在這些組織以外，還有不只追求民族解放而且追求社會解放的左翼潮流，他們反對剝削人民，斷然拒絕分隔婦女。這是我們要加強的部分。

▶ 拉丁美洲仍然是抵抗新自由主義的中心，並且是最具爆炸性局勢的大陸，儘管情況在各個國家之間是不平衡的。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經歷最爲激進的進程，同帝國主義做了部分的決裂，這意味著其各級政府以及/或者社會運動的一些重要的進展。還有一些地方，其未來情況尚不清楚，像巴拉圭，這些地方都以古巴爲一個參照點。其他地方則維持各個版本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阿根廷是新發展主義，在烏拉圭和巴西則是社會自由主義。後者儘管與美國有尖銳矛盾，特別是在國防政策，其南美國家聯盟( Unasur) 的成員資格以及同委內瑞拉的協定方面，然而它與美國的基本政策合作，旨在獲得區域的領導地位。對他們來說，哥倫比亞，秘魯，智利和墨西哥仍顯然是新自由主義的。

然而，一個新的政治局勢正在顯現，那就是帝國主義的威脅，也即美國的第四艦隊重新出現該地區，有洪都拉斯的政變，美國在哥倫比亞的七個新軍事基地，在阿根廷的美國大使館多年直接干預重要的貿易聯盟的衝突，對海地的政治和軍事干涉。所有這些，其目的是拉回政治的進步，和發展國際的反應。這意味著，在拉丁美洲的今後一個時期階級鬥爭還將強化。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政府正在撤回他們最根本的建議，這顯示兩個特別引起關注的走向：面向自然資源的攫取和社會階層的有限的民主參與。在玻利維亞，有一個變化過程的激進化，它直接依賴社會運動。

雖然這些過程是進步還是退步，尚有爭議，但在其演變過程中，它們有不推進反資本主義立場的風險，除非工薪階層、原住民和其他被壓迫社會階層的自我活動加強，加大對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政府的壓力。

與此同時，激進的社會運動，特別是原住民和農民運動鬥爭，正在對這些政府施壓，同時提出鮮明的反資本主義觀點，保護自然資源 --- 土地，水，生物多樣性等等 --- 並且提出發展模

式的改變，這在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發表的社會運動大會宣言中有表達，在美洲玻利瓦爾省聯盟( ALBA) 的人民貿易協定( TCP) 最近的大會上也有表達，大會在其最後聲明中譴責資本主義，號召推翻它。社會運動中的國家，區域和國際會議展示出拉丁美洲南部所含的基本潛力。

各個組織的一個緊迫政治任務，是激勵群眾的自我活動，普遍化工人對群眾權力機構的控制和創造，否則，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有這樣的危險，即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確定的反撲以及鞏固聯合，目前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是跛腳的。

第四國際拉丁美洲支部和團體的活動都必須考慮到這些趨勢 --- 該地區的民族問題，以及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之間的聯繫 --- 並確定對一個進程的干預戰術，這個進程的特點是美洲玻利瓦爾省聯盟成員國和具有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之強大歷史的社會運動之間的內在關係。這兩股力量有時聚集一起，有時相互衝突。這意味著促進統一的鬥爭，保護原住民的權利，反對把抗議活動當作刑事犯罪，反對私有化，反對掠奪性攫取自然資源，反對大男子主義以及經濟和生態危機，從而在我們的社會激起有關權力和霸權的戰略性政治辯論。

▶ 在一系列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復辟國家 --- 中國，俄羅斯和前東歐集團 --- 全球化的旋風正驅使數以億計的人無產階級化。但這一在今後幾年可以發揮關鍵作用的新社會力量，尚未形成獨立的群眾組織 --- 能夠面對全球重組之挑戰的工會，協會和政治組織。

▶ 爲圖利於資本主義的大跨國公司，與現有政府合謀的，對非洲資源的掠奪，正日見增加。近幾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持續增長並沒有利於人民，只有社會不平等現象在增加。面臨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出現了一些重大的鬥爭，例如幾內亞大罷工，多哥的示威，南非公共部門的大罷工。糧食危機在2008年底引發了許多示威。然而，政治選擇的缺乏是鬥爭取得成功的一個沉重障礙，比如在幾內亞或在喀麥隆。它們要麼改行資產階級政治，比如在馬達加斯加，要不他們就迷失於宗教死角，比如在尼日利亞和剛果(金)，甚至更糟，訴諸民族或種族主義，就像在肯雅或南非。



民主的人民和工人組織的建立，對鬥爭的成功，仍然是絕對必要的。

• 在亞洲，資本主義在中國和印度以及南亞大多數國家的快速發展提出了重要的政治問題。全球大約一半的工人階級生活在亞洲，建立或加強世界這個部分的革命政黨的必要性，是至關重要的。各個國家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

• 中國最爲重要。經歷了幾十年的壓迫後，中國革命政黨的建立要重新開始。有必要把國際勞工運動的經驗和傳統引進中國，以激勵革命政黨以及國際團結的產生。第四國際必須要特別注意目前的國際危機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帶來的社會和政治發展。

• 在印度，到2050年其人口將超過中國人，其加快的工業化，增加了工人數目，農村危機在加深，其政治局勢和我們的任務是不同的。工人運動非常發達，很有組織，但是由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政黨主導。要建設一個捍衛我們綱領的革命政黨，不能只是忽視他們。

• 在東南亞，情況很不平衡。在泰國和緬甸這樣一些國家中，其工人運動非常薄弱。在這些國家裏，既沒有社會民主黨也沒有激進的左翼政黨。在這些國家，我們的任務是，與那些積極保護農民、婦女和工會工人的社會運動建立更密切的聯繫。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情況則居中。那兒有一些小的革命政黨，我們可以與他們進行建設性的政治辯論和合作。

• 在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第四國際具有較強的組織，它們可以成爲我們在亞洲政治活動的基礎。

在這些國家我們都面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我們反對阿富汗的塔利班和菲律賓像阿布·沙耶夫那樣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因爲他們是反動勢力。我們不能以反帝的名義同他們有任何協議。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家，我們也可能面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第四國際必須加強其分析。

• 在斯里蘭卡，經過幾十年的戰爭，政府已在軍事上打敗了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但泰米爾人問題的根本原因尚未得到解決。此外，拉賈派克薩政府用公開而殘酷的鎮壓，讓他的對手和媒體沉默。第四國際應該是泰米爾人民團結國際運動的一部分。在所有亞洲，第四國際捍衛民族群體和原住民的權利，支援他們爭取自決的鬥爭。

• 在日本，兩個與第四國際有聯繫的組織正在融合過程中。9月以來，他們聯合出版了一份共同的報紙。在南韓，工人運動強大，也有不同勢力的聚合，要建立一個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因爲這個國家有工人階級鬥爭的強大傳統，第四國際必須密切注意這一事件。此外，第四國際應組織聲援運動，支援革命政黨的中堅戰士，目前他們遭到政府的鎮壓。

3. 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當前危機的動力，也改變了傳統左派的演變和發展框架。改良派官僚機構已經看到他們的迴旋餘地大大減少了。從沒有改良的改良主義到反改良的改良主義，一系列不發達或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和類似的力量，正在經歷一個朝向社會自由主義的演變；也就是說，這些力量在直接支持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政策。所有在政治上或制度上與社會自由主義或同中左派相連接的力量，包括婦女運動，特別是在制度化形式的非政府組織中的婦女運動，婦女援助協會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拖入了工人運動裏這些質的變化中，無法制定擺脫危機的計畫。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一些政策，例如巴西盧拉政府的政策，正在惡化生態危機。同這些政黨的衝突較爲困難，因爲他們保持了對一部分工人運動的控制，特別是選舉方面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可信的政治替代綱領。

傳統的共產黨正繼續其長期下跌的趨勢。他們試圖打破這一下跌的趨勢，抓住自由主義左派和體制機構中領導勢力的大衣尾擺，要不就會落回到他們懷舊情懷和自我肯定的境地。雖然有一些分支或流派希望與反資本主義力量一道建立社會運動，比如聯合希臘的左翼聯盟(Synaspismos)，但因爲其改良主義本質，他們註定有矛盾和分歧。實際上，決定建立反資本主義政黨，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認識到激進的，反自由主義的，左派改革主義潮流的存在，他們有作用，有選舉公信力。因此，他們仍然是競爭對手以及/或者政治對手。他們的地位可以得到加強，方法是偶爾策略性地——一般是基於選舉考量——轉向左翼，用社會自由主義，經常能重新確立其在勞動階級和大眾團體中間的共識。這向我們提出了執行統一戰線的挑戰，這個統一戰線要能

夠主動回應男女工薪工作者的需要。同時，如果基於明確的政治條件，我們決定干預反自由主義的改良主義左翼政黨（例如德國左翼黨DIE LINKE）內部，我們不會對這些政黨的性質抱有幻想，我們會建立社會運動的反資本主義傾向，同選舉至上主義、制度主義以及向資本主義妥協的任何試圖作鬥爭。

4. 我們希望參與重組進程，建立一個新的左派，它能滿足本世紀的挑戰，重建工人運動，重建它的結構、它的階級意識、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對於資產階級的獨立性。

- 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國際主義、生態主義和女權主義的左翼；

- 一個左翼，它是社會民主黨及其政府的一個顯然替代者；

- 一個左翼，它為 21 世紀的社會主義而奮鬥，這個社會主義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並且有達到目標的一致綱領；

- 這個左派意識到，為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同資本主義和它的邏輯決裂，因此它不能與它想要擺脫的東西一起執政；

- 一個多元化的左派，植根於社會運動和工作場所，整合工人的鬥志，植根於婦女和 LGBT（同性或雙性戀者）自由解放和生態的鬥爭；

- 一個非體制左派，建基於無產階級和被壓迫者自我組織的戰略，其原則是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務；

- 一個左派，它促進一切形式的工人和大眾階級的自我組織，鼓勵為自己 and 依據自己的決定進行思想，決定，做事情；

- 一個左派，它整合新的社會階層，整合如貝倫世界社會論壇所表示的新主題，最重要的是整合新的一代，因為你不能用舊材料做新東西；

- 一個國際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左派，它反對統治和戰爭，為群眾性的民主國際奠定框架；

- 一個能夠把關鍵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寶貴遺產同女權主義、生態社會主義和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的發展聯繫起來的左派。

- 一個獨立和階級鬥爭的左派，它爭取廣泛的聯合行動，對抗危機，為工人和所有被壓迫者爭取權利，爭取收益和願望的實現。

我們的方向是建設反資本主義的有效新手段，同現行制度作鬥爭，在這方面有一些準則和一般任務。

5. 這是個願望，它把建設第四國際和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以及新的國際運動的問題提了出來。我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它，從1992年起，在過去兩次的世界大會，以“新時期，新綱領，新政黨”三部曲，在國際文件中演繹展開。在2003年的上次世界大會，關於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我們確定了我們選擇的本質。整體而言，第四國際正面臨一個新的階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核心、運動和組織，必須以新的視野提出建設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政治組織的問題，這個視野就是，考慮到工人階級的多樣性——性別、種族、居留身份、年紀、性取向——為保護一個斷然以階級為基礎的計畫，建立工人階級的新獨立政治代表性。建立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是我們對工人和左翼運動當前危機的回答，也是其重建的需要。該計畫依據群眾鬥爭，把群眾運動帶向前列，展現給新一代人。當然，這並不會消除我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主義的、女權主義的國際主義者身份，也不會剔除我們的基本目標，也就是戰勝資本主義，在民主和直接參與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的統治秩序：即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在每個國家規模的水準上，在國際的水準上，這是真的。在階級鬥爭經驗的基礎上，過去十年的全球正義運動，防衛鬥爭和反戰動員之發展，尤其是巴西工人黨（PT）的演變和義大利共產黨的重建的經驗教訓，以及從法國的反自由主義左派、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辯論中所引出的經驗教訓，都應用於近年來的巴西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義大利左翼批判黨，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英格蘭的尊重黨的建設。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在繼續積累葡萄牙左翼和丹麥紅綠聯盟的經驗。通過不同的路徑，共同的目標是廣泛的反資本主義黨派。這不只是一個採取重組或革命運動的舊公式的問題。遠大的目標是，除了革命力量，還要彙集革命力量以外的力量。這些可以是力量凝聚過程中的一個支援，只要他們的確是要建立反資本主義黨派。雖然沒有模式，因為每個集聚的進程考慮到國家的具體情況和力量的關係，因此，我們的

目標必須是尋求建立獨立於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建立這樣的組織，該組織拒絕對階級通敵政府，也即今天的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政府的任何政策的參與或支援，這個政治力量認識到，爭取婦女權利鬥爭的勝利，例如葡萄牙的墮胎問題的公投，會加強徹底的反資本主義力量。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觀點，我們必須作調整。我們所知道的非洲和亞洲的分化和重組的經驗，指向同一方向。不過，在拉美國家，廣泛反資本主義政黨的建設，應該從一開始就整合進一個明確的社會主義立場。正是通過這一複雜而分散的過程，我們才能取得新的進展。

如此廣泛的政治力量內部是我們工作的地方，重要的是在這些政黨內部爭取婦女和LGBT（同性或雙性戀者）自我組織的權利，並讓此自我組織在各黨派的綱領和實踐中反映出來。這種自我組織是對選舉至上主義和制度主義的抵制手段。在幾個拉美國家的新激進政治組織中，爲了21世紀的社會主義，自下而上地反對重複20世紀的獨裁傾向和誘惑的錯誤，自我組織的權利是很重要的。一般情況下，在這樣廣泛的力量內部，從開始就要理解一個必要性，它是我們社會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有必要對所有的偏見表現做出集體和果斷的反應，這些偏見包括性別歧視、種族主義、伊斯蘭恐懼症、反猶太主義、同性戀和變性戀恐懼症。我們還爭取給予青年組織特別的注意；爭取把黑人、移民、婦女和同性雙性戀問題納入黨的公開聲明和日常事務中，以及爲被壓迫同志特別爭取在黨的領導層及其發言人和競選候選人的代表權。

6. 在該框架內，我們必須處理這個問題，即：在國家、地區和國際層面，第四國際建設和反資本主義政策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討論如何加強和變革第四國際，以便從新的國際分組的角度上看，它是有效的工具。雖然它必須被接納的結果有限，但我們已經啓動了反資本主義的左派會議，以及其他國際會議。在國際層面，根據這個政治基礎，我們發起了許多會議和國際認同的倡議，並與葡萄牙左翼集團，丹麥紅綠聯盟和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一起達成了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EACL）的章程。我們與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SWP）那樣的組織一起工作。其他黨派 --- 甚至是時而會政治演變成“左派”的左翼改革派，像義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Tor Synaspismos），也參加了這些會議。在印度孟買和巴西的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會論壇之際，我們還舉行了革命和反資本主義組織的國際會議。在這個層面上，在巴西社會主義自由黨（PSOL）同盧拉的巴西工人黨（PT）決裂時，我們建立了與PSOL的團結紐帶。我們支持義大利同志的努力，他們努力爲共產主義重建黨的政策建立一個反資本主義的替代綱領。這幾個因素顯示我們想要的執行方向的類型。今年，如巴黎或貝倫那樣的不同會議表明，在歐洲，大量的組織和反資本主義左派運動的聯合行動及討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現在有必要繼續這樣的政策，即：就戰略和綱領的思想與通過國際動員而激發的聯合行動這樣的議題，召開各種會議。

7. 第四國際及其支部扮演著維護、促進和實施一個綱領的重要道路，該綱領包含朝向社會主義的即時而又過渡的需求；它們擔負著一個統戰政策，其目的是爲工人和他們組織的大規模動員；它們維護促進和實施工人階級的團結獨立，反對任何類型的與國家資產階級戰略結盟的政策；反對任何參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行爲，因爲這些政府僅僅照顧國家和資本主義經濟而放棄所有的國際主義，或者爭取結束性別、種族、民族、宗教或性取向的不平等和歧視。。

第四國際已經發揮並仍在發揮一個功能作用，就是保持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歷史活力，“瞭解世界”，處理革命戰士、各個派別和組織的分析和經驗，把各派別、運動和積極分子召集起來，在革命的基礎上，共用相同的戰略眼光和廣泛一致的同樣選擇。一個使人們有可能“思考政治”的國際框架的存在，對於革命者的參預，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資產。一致的國際主義必須提出一個國際框架的問題。但是，由於其本身已分析過的歷史原因，第四國際本身不具備代表我們需要的新群眾國際的合法性。因此，當這是反資本主義力量的聚集向前邁步的一個問題時，這些新的組織，特別是在歐洲和拉丁美洲，不能聯繫到並加入某個同第四國際等價的運動潮流，無論從什麼參照點看 --- 各種阿根廷社會主義工



人運動 (Socialist Workers Movement of Argentina, Morenoites)，工人黨 (the Workers Party, 林伯特派 Lambertists)，社會主義工人黨或其他類型的托洛茨基主義黨，這都是真的。儘管如此，讓我們注意第四國際和所有這些運動之間超越政治立場的一個重大區別，第四國際的信譽是，它立足於各個支部和中堅分子民主協調的基礎上，而其他國際運動是“國際派別”或協調基礎上的“黨的派別”，它們不尊重民主運作規則特別是運動傾向的權利。這些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歷史限制，“像其他前毛派或前共產主義的運動，今天阻擾我們在新的國際凝聚的結晶中前進。查韋斯關於組建第五國際的呼籲，引出了有關其起源，其框架的其他問題，也即其可行性問題。第四國際宣佈，它願意參加辯論，並可以組織籌備會議。我們將貢獻自己的歷史性成果，以及我們對可能的新國際及其綱領基礎的看法。只有所有成員共用一個綱領計畫，共有一個干預社會的能力，共用一個民主多元形式的運作，以及明確的獨立於政府以便同資本主義決裂，這個時候，一個真正的新國際才能誕生。



在目前的力量關係中，通向大眾國際的政策，必須公開和定期的，就主要政治問題——活動，具體的主題或討論——召開會議，使得反資本主義和革命的支柱力量有可能聚集和出現。新的反資本主義黨派在今後的歲月裏可能形成，它們表現最致力於尋求反資本主義替代綱領之團體的現階段的鬥志、經驗和覺悟，在這些黨派中，一個新的共產國際的問題會提出，或將會提出。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將繼續採取行動，要使它不以意識形態或歷史選擇的方式提出來，因

為那樣做很可能導致分裂。它必須在一個雙重水準上提出來，一方面，在國際干預的任務上有真正的政治凝聚一致，另一方面，新組織的多元化，必須把各種起源的流派聚集在一起，這些流派有：各種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革命工團主義者，革命民族主義者，左翼改革派。因此，一般來說，如果有邁向新黨派的具體步驟，我們建議新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黨派有操作運動傾向或方向的權利，並且這些新黨派中的第四國際支持者應當根據各黨派的具體情況，按既定方式組織起來。我們左翼集團的葡萄牙同志，我們的紅綠聯盟的丹麥同志，我們社會主義自由黨的巴西同志，作為第四國際運動，按特定形式組織起來，或在有其他政治傾向的階級鬥爭運動中組織起來。

8. 在這個運動中，我們面臨各國內部黨派的建立和新國際集團的建造之間的非同步性問題。在目前情況下，或在未來幾年內，新的反資本主義黨派可能出現在一系列的國家，但是新國際力量的出現，尤其是一個新的共產國際的出現，在現階段尚看不出來。一個新的共產國際，只會產生於長期的聯合行動，和對推翻資本主義的活動和任務的共同認識。在我們肯定一個國際凝聚政策的同時，它證實了共產國際的特別責任，因此有加強它的需要。我們可以而且也謀求展現一個組織框架，對於有著同我們一樣的政治計畫的革命組織來說，該框架是有吸引力和民主的。菲律賓的同志，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同志正是處在這種動態中，而且可以成為例如波蘭或馬里同志的明天情況。

9.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為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所承認的特定作用。我們可能是唯一可以使各種起源的政治力量凝聚起來的力量。舉例來說，這是拉丁美洲玻利瓦爾省進程左派運動的委內瑞拉同志對我們說的。在歐洲，在歐洲反資本主義左派 (EACL) 和其他運動的關係框架內，情況也是這樣。因此，未來的世界大會，對所有這些力量的聚會，必定是一個重要步驟。這次大會將是一個第四國際的大會，在這個階段，不會有組織的增長。但是，我們希望第四國際扮演新的國際集團前景中的凝聚性的“推動者”角色。

10.因此，爲了加強自己和發揮這種作用，第四國際的所有機構必須加強：定期會議，國際委員會，各分部之間的互動交流。有必要加強過去幾年裏共產國際已經部署的活動：第四國際領導班子--- 歐洲執行局會議的正常運作。該國際委員會（IC）會議，每年都舉行，代表約30個組織，必須確保我們國際運動的組織連續性。

缺乏資源，以及在過去一段時間婦女參與的減少（一個強大的婦女自治運動之活動下降的結果，這個運動曾對我們的全國組織從而對共產國際有影響），特別是在我們的領導層中的減少，意味著我們沒有維持婦女委員會的運作，以及相應的區域會議和國際學校網路。自2000年以來已經舉行了三個婦女討論會，而且婦女同志還參加了每個國際委員會會議。這些維持著有限而脆弱但並非真正女權主義的國際主義觀點。在今後一個時期，鑒於我們對婦女壓迫之理解的重要性，以及同該壓迫作鬥爭的戰略性質，要按照反資本主義的觀點，努力興建自治的婦女運動，我們就必須找到必要的資源，保證這問題發展爲我們提出的反資本主義觀點的核心要素。在這一框架內，我們必須同時加強我們的內部委員會，主動向我們的合作夥伴提出討論，包括參加我們機構的研討會和學校。這個進程還必須找到全國性的反應。

同時，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組織裏--- 以及我們正在組建的新政黨裏 --- 的婦女找到她們完全的位置，不要認爲領導機構或選舉名單上直接採用對等或配額，就足以應對婦女在充分參政進程上的障礙。在1991年世界大會的積極行動決議中，提出了組成一個積極行動計畫的一系列措施。

每年一度，約500同志參加的青年營，必須是我們歐洲支部青年工作的一個中心，要著眼於培養年輕的國際主義幹部。隨著越來越多的我們在歐洲的組織進入到廣泛的反資本主義陣營，我們繼續鼓勵同志們邀請更廣泛的組織參加青年營，參加每年復活節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籌備研討會。青年營也是歐洲的青年同志會見來自其他洲的同志的重要場合，而且歐洲以外的組織派同志參加青年營所作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年營作爲第四國際唯一的定期公開活動，它也用

來邀請一些組織的更年輕的人，而這些組織與我們正在建立關係，情形就如2009年希臘的青年營一樣，在那裏，有來自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和克羅地亞的小型代表團參加其中。

阿姆斯特丹的教育機構已取得了新的動力。我們現在必須確保學校和研討會開辦，確保其管理和組織的平衡。第四國際也必須開放其會議，開放其學院。該學院具有中心地位，不僅要教育國際支部的幹部，還要促成各個流派之間的交流，造就各種國際經驗。氣候變化研討會向一系列國際專家開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像其他的會議一樣，它表明這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我們是一個各種觀點的熔爐，可以系統地闡述反資本主義革命流派處理的基本問題。

菲律賓的國際學校的存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它能培養新一代亞洲各地的革命骨幹，並分享他們的經驗。在不久的將來，將有一個新的學校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開辦，擴大我們在南亞培養骨幹力量和組織政治辯論的能力。第四國際已經給予在馬尼拉和伊斯蘭堡的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以全力支援。

我們正在與一些組織建立關係，而我們的學校一直是邀請這些組織參與活動的場所。在今後一個時期，通過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網路，這一作用必須得到加強和擴大。

總之，在今後一段時間，方向是建立新的國際力量或一個新的共產國際，而第四國際作爲一個內部框架，代表著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資產。

#### 關於戰略辯論、黨的建設和21世紀社會主義

國際委員會的任務是與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它的一個分部，一起準備一個研討會，主題是反資本主義政黨和第四國際的分部的建設：面臨的問題，與社會運動，特別是同新一代的關係，同聯盟的關係，以及同其他流派的關係。

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也有權舉辦21世紀社會主義的國際研討會，向外部嘉賓開放，要編寫一份文件，表達第四國際對這次辯論的貢獻。

## 國際形勢報告

洛朗·卡拉索

此報告並不打算詳細分析世界現狀，但會嘗試強調最重要的東西，那些我們認為最具共識的事件和任務。關於許多地區形勢，同志們將通過他們的工作大大地豐富討論的內容。

### （一）世界形勢的特點是危機

有史以來人們第一次確知這場危機的範圍，這要用資本主義全球化來解釋。沒有地方得以倖免。所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是全球相互關聯的。這個經濟危機不是一個商情危機。這是一個系統性、結構性危機：是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美國已經失去了35%的金融財富，而歐元區是25%。而且，政府揚言要“擺脫危機”，我們不同意。可能會有短期的復蘇，這同各個國家的支持經濟活動的政策有關，但中心國家——美國和歐洲——並沒有擺脫危機。歐洲南部公共債務的爆炸，——在希臘，西班牙——以及銀行和金融的不確定性，表明至少歐洲局勢是不穩定的，顯示危機的一個新階段。

“危機還沒有結束！”

當前的危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週期性商情危機。這是長期的結構性危機的一部分，是“生產秩序”的危機，這個秩序是新自由主義的反革命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恢復”和“衰退”的階段已經交替了幾十年，但危機正在日益加深，它們深化趨進的步伐日益加快，它們現在打擊制度的心臟，其總成本越來越高。

目前的危機顯示了矛盾的深化和該制度的“歷史性局限”。

這場危機始於金融領域，但它不能被簡化為銀行和金融危機。它的產生結合了過度商品生產的危機，過多的資本積累以及不足的消費：，20世紀70年代末，前30年的增長階段到頭了，統治階級發動恢復盈利率的進攻，降低工資，大規模私有化，製造大規模失業，以及放任社會關係。對工資，就業和社會支出的壓力導致需求減少，進而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因此造成工業生產的盈利能力問題。於是投資下降，因為工業投資利潤低，而更具成本效益的做法在金融市場。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歐尼斯特·曼德爾已經分析過這個雙重危機，即工業盈利能力的下降帶來的剩餘價值生產危機，以及消費下降帶來的實現剩餘價值的危機。為了彌補這種雙重危機，該制度做出了輕率的冒進：透過私人 and 公眾兩者的金融化和債務，增加搜索私人金融市場的利潤，這裏私人即家庭，而公眾即國家。

這在2008年破裂了。銀行和金融市場首當其衝。這場危機的一個方面是銀行業的和金融的，即所謂的“虛擬資本”的貶值，但所給出的說法是，這個螺旋式演變是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追求利潤，為投資資本追求最佳的盈利，資本之間的競爭，關鍵經濟部門的私人所有。

這些機制導致的長期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世界約3-4%的一個有限增長，各地有顯著的不同，歐洲的增長只在1-2%之間，美國為2-3%，而金磚四國為8-10%，雖然我們不能把印度，中國和（比如）巴西的增長放在同一水準上。如果沒有中國和印度，世界經濟增長是很低的。

（二）失業的維持：在經合組織國家有五千多萬人失業，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全球失業的人超過2.17億。在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家，失業率達到20%。在美國和歐洲，不可逆轉的就業職位損失率，在3至5%之間。

（三）由於工資壓力導致消費的減少和限制。在美國和資本主義歐洲，所有的緊急食品援助服務在淨增加。在27個美國主要城市，增加了超過26%的食品援助。

（四）控制危機造成龐大的公共赤字（在8至13%），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為國內生產總值的70%和80%。

（五）流動資金和新投機泡沫的爆破：資金流向新興國家，不利於中心國家的投資、股市上升、原材料投機。

（六）遠未清理有毒資產的賬目。不能排除新的銀行倒閉。

這導致雇主和統治階級對工人和人民加倍攻擊。危機時刻是資本發起新攻勢的時間：

（a）現在有一個全球性的勞動力市場，它要求加



劇資本與工人之間的競爭。2008年的危機加快了企業重組，其計畫往往早已設想好了，通過裁員，加大靈活性和不穩定性，重新策劃安排主要產業分支的生產。這就施加壓力在工資和工人的權利上。這些打擊將繼續並進一步降低億萬職工的生活條件。

(b) 對公共服務的打擊正在增長。目標是加劇打擊整個歐洲的社會保障、衛生、退休金制度。

(c) 這些社會打擊的必然結果，是不斷惡化的安全政策，增加國家暴力，對人民做員警控制和社會控制，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的軍隊和員警的暴力行爲就是證明，在那裏，窮人、兒童和婦女是這種暴力的首先受害者。

希臘和西班牙是一個實驗室。他們宣示了一波遍及整個歐洲的緊縮政策。爲抵消債務和赤字，統治階級、金融市場和歐洲央行要求削除公共服務，減少政府雇員、工資和社會保障。在希臘，政府用“債務恐怖主義”推行這些社會退步，挑戰仍然重要的服務系統和公共部門。

經過一刻的恐慌後，在超越意識形態的手勢“國家回來了”[好像它消失了!]以及“金融市場和資本主義的說教”之後，新自由主義政策得到了確定。

這引起了關於凱恩斯主義轉向可能性的辯論。這不是要回到歷史的辯論，而是要瞭解這場危機的機制。同1929年相比，有國家大規模的干預，以遏制危機 --- 新自由主義中央集權 --- 但在這個階段，無論是社會力量關係，還是統治階級的選擇，都沒有移向新的公共政策，新的社會保障，需求的復蘇，新生產行業的創造和大量就業機會的創造，如同1945年之後的情況一樣。不存在相當於那個時代的“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新階段的觀點，該觀點見於那個期間所建構的社會政治報告。

## (二) 在這個背景下氣候危機將惡化

就像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表明的那樣，我們知道，資本主義解決不了環境危機。在我們需要考慮“社會需求”的地方，資本主義考慮的是“利潤”。在協調、規劃、長期的選擇是必要的地方，資本主義考慮的是“資本和私有財產的競爭”。

但哥本哈根會議表明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無法轉化爲“綠色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不希望

或無法達成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以滿足危機的需要。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目標沒有得到尊重。要緊的是資本主義的利益，發現新的市場，特別是污染的權利，而不是重組“綠色”能源、城市規劃和交通運輸。綠色資本主義，並不是作爲2010年的“新政”出現的。除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妨礙一個平衡的生態危機反應外，綠色企業估計在10年內有勉強超過2%的就業崗位。綠色資本主義的復蘇，“綠色生產和大量消費”沒有出現在地平線上。雖然各國政府和各主要集團操縱生態問題，要實行核能，或編造理由在整個亞洲或拉丁美洲地區驅逐土著人民。

(三) 當前危機的具體特點之一，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框架內，一個“世界崩潰”的組合。

這既非完全的也非不可逆轉的進程，而是世界形勢的重心正在移動。

美國在相對衰落。有兩個方面是重要的。原因如下：

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下降。在歐洲，它正在經歷一個非工業化進程。其債務已達到令人目眩的程度。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惡化，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僵局。統治階級選擇奧巴馬，正是爲了奪回主動權，但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遇到的困難，接受某種形式的多邊主義的需要，在在都說明了其政策的局限性。1980-2000年期間，顯然有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奧巴馬無法成功扭轉該趨勢：不過是“相對衰落”，因爲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強權。美國市場是巨大的。由中國和日本的投資支持的美元，仍然是參考貨幣，最重要的是，它的軍事霸權是不容置疑的。中東，小亞細亞和拉丁美洲是其目標。在這個經濟衰退的局勢下，軍事干預，以及試圖做地緣戰略方面的控制，即控制領土、自然資源、原材料，如石油等，是資本的重要性。阿富汗、洪都拉斯或海地的軍事選擇見證了美軍的侵略性。這也是調整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手段，特別是通過北約作調整。同美帝國主義有政治和軍事對抗的區域，應是我們集中全部注意力的地方。

用我們的運動參與反戰的重要性因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團結一致的動員起來，要求美軍撤出這些國家，捍衛這些國家的主權，捍衛民主自由。靠著美國的支持，以色列政府作爲中轉站服務於

這個侵略戰爭政策：在3年內，對黎巴嫩發動兩次侵略戰爭，並在加沙地帶造成2000多的受害者，以及持續發出對黎巴嫩的新威脅。這些戰爭是整個“反恐戰爭”的一部分，並需要我們繼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並承認其合法的權利。在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這些國家，我們把撤軍要求、中心任務、同進步團體和活動分子的支持，以及面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別統治的戰鬥，結合起來。一個類似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媒體炒作運動正在營造，這個時候，我們反對威脅伊朗，同時我們支援反對艾哈邁迪內賈德統治和爭取民主的群眾。

但是，世界形勢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中國、印度、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正在建立的新關係。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約為1-2%，而中國2009年的增長為9%，在2010年應該會記錄到大約10%的增長率。在商業方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的商品進口國，有第七和第五的服務業。中國商品的出口現在占世界商品出口的8.7%（同美國相當），進口占全球的6.7（對比之下，美國占14.1%）。它已經與日本肩並肩作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和最大的出口國。中國巨頭在諸如航空或運輸這樣的關鍵部門同跨國公司競爭。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開發數百萬公頃的土地。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現在的“世界工廠”，中國的增長是出口導向的。但它也正在經歷一個迅速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及其內部市場的擴大，該市場在近幾年有長足的發展。在政治方面，中國無疑是亞洲主要的力量。這個地區的特點是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干預，以及諸如中國和印度這樣具有全球野心的強權。近年來，正是中國，最大地擴展了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與鄰國凍結或締結了大量的解決領土衝突的決議，增強了與韓國的關係，與日本的關係正常化，加強臺灣經濟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度，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增加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中國勢力，等等）。10年左右，中國已增加在世界各地的夥伴關係，尤其在非洲，以減少能源的依賴性。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開發數百萬公頃的土地。原材料的長期合同連帶著中國的承諾，以有利條件發展供應的基礎設施。中國還提供了非常低利率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貸款。然而，中國正面臨著結構性的弱點：

- 它的增長高度依賴出口。
- 它必須進口大量原材料和元件。
- 它的內部需求是非常不平衡的，基本上依賴投資，而家庭消費水準是很低的。為了更好地逃避危機，就必須重新平衡有利於家庭消費的經濟增長，為此，有必要大量增加購買力，減少不平等和創造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

強烈的不平等，直接地反映在越來越多的社會緊張和種族衝突中。中國的GDP可能是世界第二，但其人均收入仍然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水準。人口迅速的老齡化，加上一個幾乎不存在的養老金制度，在未來幾十年將構成一個嚴重的問題。每一個中國青年婚後必須撫養他們的四位父母和八位祖父母。

復蘇政策建立在信用的大規模發展上，信用則由房地產市場和證券交易所的投資的顯著復蘇反映出來。存在淪為投機泡沫的危險。

還必須指出其軍事機器同美國相比的弱點。儘管如此，中國已成為一個具有核打擊能力的區域性主要軍事力量。中國政府希望隨其經濟力量的發展而發展其軍事力量。幾年來，中國政府已經大幅度增加了軍費開支。其陸軍力量已躋身於世界最強者之列。但海軍和空軍仍存在嚴重的缺陷，政府正設法補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引起了關注，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的關注。

兩個大國 --- 美國和中國 --- 受用一個相互依存又相互衝突的關係。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希望中國政府給人民幣升值，以減少其與中國的貿易赤字和振興經濟。但是，中國的貿易盈餘使其能夠積累大量的美元儲備，用它投資美國國債，讓美國有錢救助其經濟。

美國和中國之間這些勢力關係的修改，讓中國經濟現在拉動世界經濟增長。這是世界形勢中一個新的基本因素，應注意它的有限性：中國經濟仍遠不能夠提供足夠的管道，把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經濟帶出危機。它還遠沒有取代美國的這個角色。

#### （四）全球金融危機也影響拉丁美洲

這個影響情況，雖然對於一些經歷增長的國家並不相同，但也在特殊形式中，如生態危機方面的“文明危機”，或社會、民族和種族鬥爭之間的關係方面的“文明危機”。

南美洲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社會政治對抗亮

點之一。

我們想強調三點，見證今天在該地區工作的三個專案：

•顯著特點是美帝國主義和拉丁美洲右翼反對人民的進攻。在美洲自由貿易區失敗後，重新發起了直接和間接的進攻：如在特裏尼達“美洲首腦會議”上的外交進攻和在洪都拉斯及海地的軍事進攻。

•這可以達到重新殖民化的地步，就像海地的情形，同時，美國軍隊就在離委內瑞拉幾百公里的地方炫耀武力。哥倫比亞在這一計畫中有重要作用。

•這次攻勢也反映在智利的選舉勝利，和阿根廷、委內瑞拉及巴拉圭的右翼政治攻擊中。

第二個要強調的因素是巴西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地位。在基礎設施、自然資源開發和農業出口方面，巴西扮演重要角色。巴西的跨國公司由政府支持，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它們顯然地在鄰國發揮帝國主義的作用。巴西維持一個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徵，從而工業產品的出口下降而原材料的出口則相對增加。但是，美國和巴西之間的勢力新關係也必須加以注意。這給巴西以新的政治能動力。巴西對洪都拉斯的立場表明這一點。在針對海地的帝國主義聯盟中，巴西同美國並起並坐，也表明了巴西的新地位。

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有“次級帝國主義”的說法了，有些人則使用“帝國主義週邊”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討論，我們在這一點上受到拉美同志的啟發，但那無疑是巴西的新角色。

美洲玻利瓦爾聯盟（ALBA）的主要國家：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古巴，構成第三組國家。在政治對抗、進步的社會措施和憲法改革進程等方面，這些國家都與美帝國主義有不同程度的局部決裂。但每個國家都有具體情況。在厄瓜多爾，已經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土著社會動員，從科雷亞政府手中贏得了新的民主權利。而這是通過一系列的對抗得來的。玻利維亞的經驗，連帶社會運動所創造的社會主義運動

（MAS），結合了社會的、土著的以及全民的動員和進步的措施。莫拉萊斯贏得了選舉。大眾階級和社會運動十分看好這一勝利。委內瑞拉還處於十字路口。

要麼在玻利瓦爾省過程中有一個革命突破，

回應右派的攻擊，但也從社會成果、國有化和工人控制方面，處理經濟的基本結構。這涉及促進民主和群眾動員。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計畫，還是該政權的“波拿巴”的特徵，同該政權的內部官僚機構結合，將扼殺該進程。可能有類似國有化或社會援助這樣的積極措施，但這一進程的一般步伐，顯示出一系列令人擔憂的跡象。

至於古巴，它佔有特殊的位置，值得在我們的討論中作更徹底的處理，它仍然是美國的目標，需要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積極作為。

但除了這些政治分類外，在拉丁美洲存在群眾鬥爭和帝國主義之間兩極分化的動態。社會和政治的緊張局勢有更加尖銳的性質。在過去的時期，這個大陸高度積累了社會反抗和革命經驗。其不平均和聯合的發展，可能創造工農和土著民族聯盟的條件，爭取他們的基本權利，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徹底的或革命民族主義的反帝聯盟。

（五）亞洲是世界的組成部分之一，在那裏，蘇聯的崩潰有特別深刻的後果，即把冷戰期間建立的聯盟“解凍”。

北京顯示其雄心，而從斯里蘭卡到阿富汗，新德里起著日益增長的政治和軍事作用，並進一步動搖巴基斯坦。整個地區已進入了一個地緣政治的動盪階段，有利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興起，例如在日本，也助長種族間緊張關係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地區和世界大國（美國、日本、中國、印度等）之間的力量關係懸而未決。有一個新的危機弧形帶出現，從朝鮮半島伸展到阿富汗和中亞，穿過棉蘭老島或斯里蘭卡，潛在的戰爭地點倍增，而幾個有關國家（美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某種程度的北朝鮮，和明天的日本？）擁有核武器。在此背景下，從迪戈加西亞到沖繩，美帝國主義正在加強其基地，從而讓它有更普遍的存在和行動的可能性，比如在菲律賓（尤其是棉蘭老島）。

在全球範圍內，亞洲比其他地區更能抵抗目前的經濟危機，其平均增長率仍然較高。但是這不應該掩蓋國家之間差異，不應該掩蓋資產階級和一些中等階層的富裕，同千百萬工人農民遭受的過度剝削對比，造成了尖銳的社會緊張局勢。自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普通民眾的社會和環境權利遭受了一系列有累積影響的攻擊。一些國家正在經歷嚴重的體制和社會危機，如泰國或菲律



賓。

民眾的抵抗和反應能力，根據具體情況是非常不平等的。一些國家的左翼力量，起初薄弱，最近發生了重大和令人鼓舞的發展（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但在其他國家，較大的勢力仍然分歧，如印度或菲律賓。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一直無法克服分裂的狀態（印尼），而其他地方有必要在階級獨立的基礎上重建政治和工會運動（泰國，中國）。但是，除了這種情況的多樣性，該地區政治聯合的社會運動之間的連接已經大為加強了，這些連接有：團結的認定，反帝和反戰運動，農民和其他勞工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抵抗，取消債務的要求和對糧食主權的尊重，聯合社會需求的鬥爭，民主權利和對生態危機的回應。這些區域網路的加強及其同世界運動的融合，構成了今後鬥爭的支持點。

#### （六）同時，非洲仍然是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全球危機影響破壞的大陸。

氣候危機和糧食危機尤其嚴重。通過帝國主義國際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了幾十年的結構調整政策（國家經濟部門的私有化，市場自由化，出口和還債優先），非洲仍然依賴對中心國家的農產品，能源和礦物原料的出口。這就是它受到這些國家需求下降的衝擊的緣故。儘管中國的需求很大，增長從2007年的9%下降到2008年的5.1%，和2009年的1%。

伴隨著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是這個大陸身上的食品危機重擔，食品危機則是食品價格上漲造成的。大眾階層被帝國主義資本家和地方資產階級排除在增長成果的分享之外，他們的情況進一步惡化：較低的實際工資，難以獲得肥沃土地，數以萬計的所謂“部族的”或“宗教的”新殖民主義戰爭的受害者，青年失業，對婦女的暴力，與氣候變暖有關的自然災害。該新自由主義暴力在各個國家產生了一個民眾動員的動力。反對高昂生活費用的鬥爭，爭取獲得飲用水，電力，衛生和受教育的權利，這些標誌著非洲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分子和各組織中間支援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人，超越不同傳統，進行聯合工作，是迫在眉睫的。在北非，近年來出現了倍增的社會鬥爭，起因是歐盟的欲望，想要把這些國家用作其後院。

#### （七）歐洲是帝國主義鏈裏“最薄弱的環節”

危機削弱了歐洲聯盟。它表明歐洲“治理”結構上的無能：歐洲預算極度虛弱 --- 不到1%--- 沒有歐洲的工業政策，沒有債務的機構，沒有歐洲社會政策。根據每個國家在全球經濟和分工中的地位，“分散動態”是非常明顯的。英國有金融實力，德國有其工業設備產品，法國有基於國家工業的專業，比如核電，武器，航空和運輸。因此，遠非“為歐洲資本主義創造歐洲集團”，大公司把其資本技術與其他全球性集團合起來，使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爆炸的債務對歐洲的打擊特別深刻，希臘的危機和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弱點表明了這一點。東歐國家也受到經濟危機影響，加深了其發展的不平等，加深了他們的赤字和依賴性，尤其是對德國依賴。

在一個日益強大的全球競爭的背景下，為了彌補這個弱點，歐洲資產階級必須“打破仍然是歐洲社會模式的東西”。因此，他們攻擊民主自由，特別是移民的權利。但這些攻擊並沒有機械自動地導致社會抵抗以及勞工和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發展。

有社會抵抗，但不是在攻擊的水準上。在20世紀30年代，在危機和社會政治反應之間有一時間差。我們可以說：“等等”，在這個階段，沒有一般的社會鬥爭。

但在右翼，經濟危機提出了統治階級的代表權問題。這也侵蝕著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會基礎，引起內部的緊張和矛盾，有利於民粹主義或法西斯政黨的出現，這一危機已經削弱了傳統的右翼。

但是，它也削弱了傳統的左派，從根本上說，左派應對危機的政策同右翼沒有什麼不同。這場危機並沒有導致社會民主黨派轉向左翼。它加深了他們的社會自由主義的適應過程。社會民主黨保持同勞工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政治關係，但它同政府和資本主義結合最密切。它可能會受益於選舉鐘擺的新擺動，但它正在經歷一個機體的衰弱和因危機而突出的新自由主義社會變革。在東歐，在斯大林主義的破壞後，工人運動仍未復蘇。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的恢復已經惡化了數百萬人民的生活條件。在2008年，因歐洲主要信託的作用，把生產源分包的做法是嚴重的打擊。到處有新形式的勞工運動組織興起，它們同源於

斯大林主義的舊國家機器不相干，但它們正在起步。這也是小型反資本主義團體或組織的情況。

因此，統治階級的利潤操縱不在於右翼黨派的力量，而是在於左翼的衰弱及其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

對這種形勢的觀察，也使我們對工人運動重組過程進行冷靜的評估。這種雙重領導危機 --- 右翼和傳統的左派 --- 為新左翼政治組織開闢空間。但這些空間更多的是，舊的左翼傳統政治組織向右轉化的產物，而非階級鬥爭的新興起。這必須要我們去抓住機會，但也要懂得，在這些空間中，在反資本主義者和左翼改革派，後斯大林主義者，左翼生態學家之間，有政治鬥爭的需要。因此，我們自己的干預和我們政治反應重要。

### （八）圍繞反資本主義的和生態社會主義的反應，需要一個政治鬥爭

（一）通過一個緊急方案，提出立即的反資本主義要求：拒絕裁員，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捍衛延長或創建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和教育系統。

在世界上，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麼龐大過，但它在社會和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有必要圍繞基本要求重組反對危機的社會鬥爭，特別是通過統一的行動政治和統一戰線，重組工會組織和社會運動。

（二）有必要推行挑戰利潤邏輯的財富分配，取回近幾十年來資本從雇工身上剝去的附加值，優先考慮社會就業需求，健康，教育，合理收入，休閒 --- 以及干預資本主義的財產...因此，為這些社會需求的預算籌集資金，必須從根本上質疑帝國主義強行的結構性調整政策，這意味著對資本徵稅和把對銀行部門的公共撥款置於工人的控制下。在一系列受危機影響的部門，出現了生產和公司管理的重新啟動，如阿根廷或委內瑞拉的控制經驗。這些經驗值得推廣。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自然資源的集體所有權是一個根本要求。

這個反資本主義方案還是生態社會主義的。特別是面對氣候變化，它意味著，一個倘佯在新城市規劃上的新政策，一個交通政策，一個有利於可再生能源之能源部門的改組，一個所有經濟分支的重組。中期和長期的這些選擇同利潤動機和資本主義競爭是不相容的。它們（這些選擇）會捲入民主的辯論和決定，在計畫協調的經濟背

景中，這些決定由工人和民眾控制，民眾的控制就會提出公共和社會經費問題，提出同地方民眾的需求相應的生產選擇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人民控制和民主的問題是中心。

（三）在危機面前，我們都知道，更因為這場危機是經濟和生態危機的組合，我們的反應不能被減到只有需求的復蘇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改革，一句話，減到凱恩斯方案。一個全面的改造是必要的。

（四）最後，這些方案也必須被視為工人管理任務的一個方面。我們沒有在所有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但是在出現這種情形的地方，捍衛這個方案，同支持或參與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政府機構是不相容的。這是一個關鍵的戰略問題。在受控制的國家，民族和人民主權的問題和爭取制憲議會的鬥爭，必須與爭取民眾反資本主義政府的需求相結合。

總括來說，這場危機再現了“制度的歷史局限性”。另外，有必要超越鬥爭的迴圈，在該制度的政治思想危機的後果上建立反資本主義勢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落入災變論。不存在資本主義不能擺脫困境的情況。該制度可帶著危機生存和運行，但生態，社會和人類的代價會很高。這正是應受到譴責的地方，在滿足社會的需求方面，它有結構上的無能，正是這種無能，把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改變，以及同資本主義決裂的需要提上了議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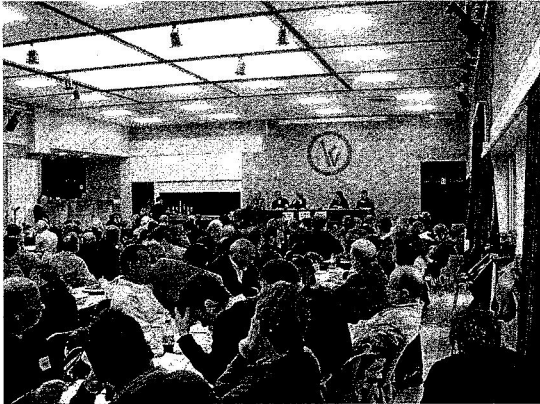
在社會主義視野上的辯論是最重要的。不推翻剝削和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沒有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就沒有出路。但這場運動並不會簡單地從該制度的矛盾中產生 --- 要推翻這個制度，在國家，區域和國際範圍內，我們需要一個特別的革命動員，而首要的是，在覺悟，組織和領導上有一個可信的替代方案。這是歷史和現實的，是將要實現的，而且我們將在其中充分發揮作用。

洛朗卡·拉索是工會活動家和反資本主義新黨（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全國領導層和第四國際政治局成員。曾任第四國際法國支部政治局的成員（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

## 國際與願景相配合

薩爾瓦托·雷坎納沃

敘述第四國際第十六次世界大會，我們可以從第四國際俄羅斯支部的重組開始談起，這個重組回歸到源頭：隨著1920年代和1930年代俄羅斯左派反對史達林主義的鬥爭受挫後，根據里昂·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倡議，建立了第四國際。



第十六次世界大會

我們也許能繼續看著許多拉美組織的出現，首先是‘社會主義潮流’（Marea Socialista），這是查韋斯的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的一部分，並且建議加強政治和國際團結，以便共同回應委內瑞拉總統發起的第五國際倡議。我們可以強調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誕生的重要性，而不管其矛盾和不斷增長的痛苦，它構成了歐洲政治的主要新鮮點，以及其他政治選擇下德國左派的動力。

然而，爲了反映第四國際第16次世界大會——2010年2月28日在比利時北海的奧斯坦德結束——所代表的成功，我們願列舉三項因素：

\*第一，參與。來自40多個國家的代表，觀察員和嘉賓展開了一場辯論，從澳大利亞到加拿大，阿根廷到俄羅斯，中國到英國，剛果到美國，所有大陸都有人出席推動這個辯論。要成功地把這麼多組織聚集在一處，超過5天時間，經濟上完全自理，沒有任何財金機構的支持，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這個事實，即：在這次會議上，新選出的國際委員會成員中女性第一次超過40%。還有許多年輕的成員。國際委員會是一個“聯邦”機構，這意味著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不存在中央機構的“重新平衡”——歷史教育了這一國際潮流，一個政治路線不能從上面規定，更不

用說由一個“領導”黨指導——國際委員會的組成，因此反映了一個世代更新，一個心態變化，一個新的政治和社會現實。

\*第三個因素是，主要的政治組織上的討論都著眼於未來。通過菲律賓組織發揮的基本作用，還有已提到的俄國組織（社會主義運動‘前進’）的與會，波蘭的勞工黨（PPP）的應邀與會，以及中國香港小組和正在建設中的日本新組織的培訓，大會轉向東方，朝向亞洲。但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工黨（LPP）的重要和決定性的與會，巴基斯坦工黨是一個重要的組織，其全國代表大會在1月份結束，集會人數超過一萬人，有工人，農民，尤其是婦女。

### 復興

對於第四國際，這是一個更新，是克服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困難的徵兆。經過一連串的失敗或分裂以及遠景的迷失，討論有關一個“新國際”的可能性，或至少考慮一個“新國際”的意願，這是一個政治進程的可能結果，法國提出的選擇，巴基斯坦組織這一類的出席者，以及發生在拉丁美洲的辯論，這一切發動了該進程——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新的內部辯論。這個必須仔細注意的政治進程，是“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的建設，它是廣泛的和有群眾影響的，包括“對工人運動的危機及其重建必要性的當前回應”。這個願景具備有機的國際性，但並不會自動造成一個應到處盲目遵循的“路線”。

我們應該強調，一個政治派別已存在七十多年，這個願景，同加強這個派別的願望和計畫相符合，但保留了相當的機動活力，比如，考慮到氣候變化是新世紀的主要新問題之一，而且是一個“勞資”衝突的決戰，它有能力用會議——並通過一項新決議——來辯論氣候變化就是證明。此外，對衝突的新主題和新議題的這種關注，在以前的大會上就已經表明了，那次大會通過了關於反全球化運動和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問題的決議。並沒有多少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可以甚至想要把勞工運動史上有爭議的問題整合進他們的綱領中。事實上，並無



第二者。

顯然，我們必須保持一個分寸：我們所談論的是小政治組織世界的各部分，有時是小團體，即使一般他們都是安置在自己國家、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活動分子團體。但是，同屬於一個國際框架，這個事實有助於保存一定的活力，以及維持一個思路和一個共同討論的能力。從而現在就對目前的挑戰做出回應，例如委內瑞拉政府可能召集有關第五國際的辯論。這項建議的宣傳性質，以及由政府首腦發出邀請的複雜性，誰都不會忽視。在同一時間，已作過多次強調，新的假說賦予共產國際的理念一個新的信譽和知名度，即這個事實：要同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危機對抗，它這方面是至關重要的。除了查韋斯的提議外，還有另外一個提議，源於美國Znet網站，在其第一批簽署者中，有諾姆·喬姆斯基，蜜雪兒·阿爾伯特，旺達那·希瓦，邁克爾·洛伊，約翰·皮爾格以及其他許多人，所以它不是偶然的。

大會決定參加本次辯論，同時保持其國際理念的完整，也即國際是一個機構，它立足於一個綱領，一個共同的願景（即超越資本主義），內部民主，社會有效性和對於各國政府的絕對獨立。同時，‘社會主義潮流’（Marea Socialista）呼籲在加拉加斯舉行一個國際會議，時間可能在6月，我們積極歡迎這個呼籲。還有，社會運動的

問題是討論的中心，連帶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呼籲召開的科恰班巴的全球暖化“峰會”的承諾，各種社會論壇——亞松森的美洲論壇，伊斯坦布爾的歐洲社會論壇，和2011年達喀爾世界論壇，明年5月在馬德里的歐洲-拉丁美洲高峰會議和2010年11月在里斯本舉行的反北約論壇，都在討論之列。阿姆斯特丹研究和教育學院也有了新的動力，它將在馬尼拉和伊斯蘭堡獲得兩個新的“區域”中心的支援，其象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在歐洲方面，除了上述的馬德里和里斯本首腦會議重點外，重要的是把反資本主義左派的團結過程付諸行動，超越公式形式，必須推進共同思考，首先要發動共同的政治運動。為此，為了採取共同行動，大會投票贊成組織專題會議討論各種問題。第一次會議將專門討論經濟危機，特別是如何有效地在三個方面反對它，這三方面是：裁員，削減養老金和削減公共服務。

▶ 薩爾瓦托·雷坎納沃是第四國際執行局成員，義大利‘左派批判’的領導成員。在2009年11月‘左派批判’決定宣佈與第四國際政治結盟，從而把自己的政治經驗和力量引入了第四國際。

## 得與失

潘娜洛普·達根

爲了歡迎參加第四國際第十六次世界大會的嘉賓和同志，我想簡單回顧一下，上次世界大會以來我們所做的工作。



我們上一次大會舉行的時間是2003年2月，在全球最廣泛動員的前夕，我們都知道，這次動員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反對發生在伊拉克的帝國主義戰爭。

然後，我們注意到，自2000年把‘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理念放回到議程上以來，這是全球性正義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標誌，那個理念是包括第四國際在內的一些勢力在阿雷格里港倡議的結果。

從那時起，這一運動的發展就不平衡，運動有區域性的，分部性的和世界社會論壇的，而

最近則有針對 2009 年 12 月 1 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動員新高潮。

認識到這一運動的重要性，我們第四國際，出現在世界性和區域性的社會論壇上。我們與其他力量進行了有組織的討論，特別是討論關於實現另一個世界的戰略問題，並捍衛了一致的階級鬥爭和國際主義觀點，為此，以我們出版物的名義，還專門發行了多種語文的報紙和傳單。

然而，這種新希望運動的出現，以及在拉丁美洲的發展，並沒有改變總體的力量關係，該關係仍然是不利於工人和被壓迫者的。

來自不同行業和不同大陸的工人們的英勇回擊，並沒有顛覆新自由主義的議程，在軟化新自由主義攻擊的藉口下，勞工運動的傳統組織沿合作路線走得更遠。

在帝國主義中心的各種強大反戰運動和受攻擊人民的抵抗活動，並沒有停止帝國主義戰爭動機。巴勒斯坦人民更是繼續遭受到超常的攻擊和鎮壓。

對婦女權利，尤其是選擇權的攻擊，儘管有抵抗，而且存在一個運行中的世界婦女進軍運動的女權國際網路，但是攻擊一如既往仍在繼續。

第四國際已經是所有這些抵抗的一部分，尤其要提到的是，我們參與了最近的加沙進軍。

在工人和被壓迫者運動中，能領導這些反擊並提供新政治觀點的新力量之興起，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在歐洲一系列反資本主義的集會中，或在世界社會論壇上，我們帶頭建議，為這些徹底的反資本主義力量舉辦論壇，讓他們走到一起，討論他們的共同立場和可能的共同行動。

#### 加強我們的政治存在

為了加強我們對必要的政治討論的政治貢獻，我們已採取了一些步驟：

2005 年，我們重新開辦了一個英語線上雜誌，國際觀點，把我們的觀點和資訊送達比印刷雜誌讀者更廣泛的觀眾。這特別使我們的形象在亞洲大部分地區更加突出，在亞洲那裏，新的政治勢力在發展和尋找政治關係。

在 2007 年，我們還推出了卡斯蒂利亞姊妹網站，國際觀點（Punto de Vista Internacional），確保第四國際也對拉丁美洲的廣大觀眾說話，它如今是全球最重要的激進群眾運動的網站。

這些網上雜誌是由法語‘國際新聞通訊’完成的，而法語‘國際新聞通訊’仍然每月有印刷本發行，還有自己的網站。

儘管有嚴重的組織弱點，使得這些工具遠非完美，然而它們提供了機會，讓我們的觀點傳向世界各地。這些網站的訪問資料顯示，有觀眾群尋求我們的觀點。

2007 年，我們重啓了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作為開放的教育會話中心，服務於我們自己的同志和其他的組織，這些組織同我們有兄弟關係，它還被用以作為研討會的組織中心，對徹底的馬克思主義運動要求進一步發展的課題作研究。關於氣候問題，巴勒斯坦和經濟危機的討論會，以及婦女和性別越界（LGBT）問題的討論會，都產生了另外的材料，豐富了這次世界大會討論的準備。

與我們的英國同志合作，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IIRE）維持著出版計畫，使我們能及時發佈關於全球正義運動和氣候問題的戰略辯論文章。

意識到革命運動必須持續更新，要引入先進同志領導當今世界的戰鬥，第四國際以今天的視角，給青年的工作以特別的重視。每年在歐洲舉辦的青年營，匯集了數百名年輕的同志，參與一個獨特的活動，在那裏，青年同志組織一周的政治討論，討論當今的問題，以及階級鬥爭的理論與歷史。這個機構超過 25 年之久，每年都得到一代代新人的讚賞，這裏的許多同志，在某些方面也是青年營的畢業生。

這些對於一個小組組織是重大的成就，我們為它們感到自豪，希望也打算在今後一個時期建設和擴展它們。

#### 向逝去的同志致敬

但是自從我們上次的世界大會以來，我們也遭受了一些傷心的損失。可惜在這裏我不能全部提及他們。

2003 年的大會剛剛結束，我們就聽到王凡西的逝訊，他是中國僅存的首批托洛茨基主義

者之一，享年 95 歲。在國民政府監獄服刑數年後，他因共產黨的壓迫離開中國，在英國度過餘生，對中國事物，他保持了活躍的興趣與評論，直到年事已高。

利維奧·邁登同志，任國際和義大利支部的中央領導人多年，是我們同那一代人的最後連結，這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困難時期，維持了第四國際。他於 2004 年去世，為建立國際和義大利支部積極行動，戰鬥到最後一刻。

羅蘭·廖，前比利時支部成員，一直是我們的報刊合作者，特別在關於中國問題方面與我們合作，逝於 2005 年。

利當那·納卡巴同志，學生和教師工會活動家，1980 年代以來是阿爾及利亞教育部門鬥爭的領導人，2008 年突然去世。

葛列格·塔克的去世，是英國支部在 2008 年遭受的重大損失，他是著名的鐵路工人工會全國領導人和政治活動家。他對國際的貢獻在兩方面：一是在他的國際支部建立了國際聯繫，二是啟動了‘國際觀點’網站，是網站負責人。

彼得·卡梅霍是美國反戰運動的群眾領導人，並加入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在社會主義工人黨裏，他很快成為一個主要的公眾人物。在 1980 年他同他們分手，繼續投身於進步政治，成為加利福尼亞州綠黨的一個領導人。他逝於 2008 年。我們還記得加洛琳·隆德和埃德·科瓦奇，原社會主義黨（SP）人。

2009 年，有一些領導同志和前國際成員去世：

Hoan Khoa Khoi，也叫羅伯特，當時活著的最老的越南托洛茨基主義者，流亡法國的越南托派組織的長期領導人以及國際前領導成員。

納利斯·帕洛莫，墨西哥工人革命黨創建者之一，特別是在女權主義工作和恰帕斯州的工作方面，是核心人物。

安德列·費雪特，布列斯特工人運動和 LCR（革命共產主義聯盟）自其前身 PCI（國際主義共產黨）以來最著名的一個歷史人物。

萊尼·容格拉斯，德國托派潮流的歷史人物，從 14 歲起就活躍在進步運動中，持續於整個納粹時期，是國際的成員，直到她去世。

彼得·高恩，20 世紀 70 年代英國支部的前領導人，一直是個反帝國主義的作家和分析家。

安吉爾·凡胡爾，被稱為埃雷迪亞，和女權主義者朵拉·科爾茨基，兩人都是阿根廷托派運動在任領導人，包括其在 1984 年流亡法國後返國期間。

2009 年 12 月底，四位巴基斯坦勞工黨（Labour Party Pakistan, LPP）領導人在交通事故中喪生。這對他們在俾路支省工作的擴展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斯瓦特和白沙瓦的自殺性爆炸事件中，還有其他勞工黨同志被殺害。

雨果·崗薩雷斯·莫斯科索，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人物，參與過 1952 年玻利維亞的革命，因為他的政治活動，多次遭到監禁，酷刑和流亡，但至死不渝，逝於 2010 年 1 月。

此外，丹尼爾·本薩義德在 2010 年 1 月的逝世，我們遭受的這個損失，觸動世界各地幾千名同志的心靈。他是法國 68 年五月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整個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他是國際和法國支部一個積極的中央領導人。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他把其卓越而強大的精力集中在他的寫作和發言上。儘管他體弱多病，他仍舊到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特別是拉丁美洲旅行。他到最後還是 LCR（革命共產主義聯盟）的一個積極成員，然後是 NPA（反資本主義新黨）成員，定期參與 --- 我作為同一支部的成員可以作證 --- 本地的討論和活動。

為紀念所有這些同志，紀念那許多我未能提到的人，以及紀念所有那些在反壓榨、反迫害、反剝削的鬥爭中喪失生命的人，我請你們起立默哀。

▶ 潘娜洛普·達根是第四國際執行局成員，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的骨幹，以及地方和國家選舉的定期候選人。她還是阿姆斯特丹國際研究和教育學院（IIRE）研究員，專門負責青年和婦女項目。



## 泰國“階級戰爭”的新階段

達尼埃爾·薩拜

“紅衫軍”在曼谷街頭的示威已經一個多星期了。主要來自北部和東部各省的15萬示威者，以平靜及良好的精神狀態，進行了整個星期的遊行，要求早日舉行議會選舉並回歸民主。

示威者聚集在“反獨裁民主聯盟”（UDD）的旗幟下，這個廣泛的運動，由前總理他信·西那瓦（他被2006年9月的政變推翻）的支持者，為恢復民主而鬥爭的共和黨人和活動家組成。

示威者稱其為“階級戰爭”，它表明了泰國自2006年9月政變以來的深刻危機。該國的曼谷精英和最貧窮的大眾階層之間的分裂對立比以往更加嚴重，後者主要是該國生活在北部和東部各省的農民和工人。

在發動2006年的政變後，泰國軍方在皇室的認可下，要恢復舊的政治議程 --- 由君主，官僚，軍隊和民主黨的控制 --- 這個議程已被他信政府嚴重削弱了5年：作為一個億萬富翁，他信上臺以來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在幾年的時間裏，成功地控制了政治和經濟生活。在一個商業和政治密切交織在一起的國家，他信直接威脅王室的經濟和金融利益，也威脅那些同他自己家族無關的“大金融家族”的利益。同時，他巧妙地推行有利於窮人的政策，這在泰國是前所未有的。這為他贏得了大眾階層的堅定支持，直接與國王的民眾支持率相匹敵，曼谷精英無法忍受這個情況。國王是“國家統一”的保證者，實際上直到最近，他已干預扼殺了大眾階層的所有要求，維護有利於保守權勢集團的制度。

他信吃足了苦頭，懂得了打破泰國政治體制的力量平衡是困難和危險的。在投票結果同傳統秩序的維護相違背的情況下，精英們還沒有準備接受投票箱的判決。

自2006年春天以來，三個民選政府，都與他信有關，全被皇室支持的軍隊或與司法機關拉下來。本屆政府由民主黨黨魁阿披實領導，是由軍方推動的2008年12月議會聯盟逆轉才掌權的。這個黨在該國是少數，十多年來沒有贏得過選舉。它支持2006年的政變。從那時起，阿披實已被證明在許多問題上是軍隊的寶貴盟友。但是，對於

軍隊和皇室，問題來了。議會選舉將在一年內舉行，而民主黨似乎不大可能獲勝。

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我們應該察看到2月底的司法機關決定：屬於他信和其前妻波乍曼財產的766億泰銖中，有466億泰銖，自2006年政變後被凍結，現已經被法院扣押。這是保守權勢集團反他信運動的新插曲。軍方首次訴諸泰國司法的濫得離譜的權力，摧毀他信的政黨。2007年的新憲法，是在軍方的監視下寫的，確實給了法官解散政黨的權力，只要他們認為政黨裏有一個成員犯了錯就行。自2006年，這種可能性已經被用了兩次，反對他信和他的黨，泰國愛泰（TRT - 泰國人愛泰國）黨，及其後的繼承者人民力量黨（PPP）。儘管他信在流放，但皇室和軍方未能從泰國政治裏消除他信的影響，所以他們現在要對付他的其他權力手段，即金錢，以防止出現任何其他政治選擇。

這一司法判決已經讓大眾階層看到了極度的不公正，表明了泰國的司法是如何玩弄兩面手法的。對支持政變而襲擊素旺那蓬機場的那些責任人，經過一年半的時間，還沒有被繩之以法。

由於這一判決，“反獨裁民主聯盟”（UDD）領導人決定組織目前的動員。動員100萬示威者到曼谷的目標，遠沒有達到，政府也沒有對解散議會的要求讓步。但同不少傳達統治階級資訊的評論家所寫的相反，這一運動已取得許多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標。首先，“紅衫軍”已經明確地走上了國家政治舞臺，舊的精英人士再也不能忽視他們的重要性和他們的要求。通過凝聚150,000人，“反獨裁民主聯盟”（UDD）顯示了其動員能力及其真正的廣泛代表性。根據一些分析家的說法，這個運動是歷史性的，自從該國1932年成為君主立憲制以來，還沒有出現過。該陣線還擴大了它的社會基礎。再也不能說，這個鬥爭把農村的烏合之眾同曼谷的精英和中產階級對立起來了。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已經意識到，政變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代價高昂，它現在支持旨在重建民主的運動。目前的政治制度在完全瓦解中，現年82歲的國王，已經因呼吸困難住院數月，他的死

亡可能導致該制度崩潰。“紅衫軍”不單單相信，只有自由選舉，以及極少的權力下放給各省，就可以開始解決政治危機。

“紅衫軍”的人氣，運動所獲支持的擴大，是恢復民主和社會正義的長期鬥爭的新一步。目前的事態發展表明，現在已不同於以往經常所顯現的情況，目前的情況不再是資產階級各個團體之間的對立，不再是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分

裂是深刻的，它基於對統治階級特權的質疑，換句話說，基於階級差別。泰國大眾階層仍然缺乏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一個政黨。這個運動是終結在政治領域內對工人排斥的第一步。但是，對於泰國社會的真正民主化，他們需要完全從他信式的民粹主義中解放自己，實施真正的社會變革政綱。

## 對曼谷“紅衫軍”的暴力鎮壓

達尼埃爾·薩拜 讓·散奴克

這周在泰國，阿披實政府曝露了其真面目。兩次與“紅衫軍”代表的談判會議迅速破裂。在他的保守派選舉團隊的壓力下，阿披實仍然拒絕解散議會，拒絕把他的黨，即民主黨，交由選票箱作判決。

首先押賭在紅衫軍示威者的分裂上，結果政府和支持它的精英們感到失望。經過一個月的示威，數以萬計的示威者繼續要求更多的公正和民主。不知道如何迫使示威者返回家園，阿披實最終於4月7日星期三宣佈曼谷和周圍省份進入緊急狀態。然後，他關閉了紅衫軍聽眾最多的電視頻道‘人民電視頻道’（“People's Television Channel”），還關閉了30多個不為政府做宣傳的獨立網站。他的理由是，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停止歪曲的資訊”，阿披實點燃了示威者的怒火，他們接管了泰廣（Thaicom）總部，恢復廣播。對紅衫軍主要領導人的逮捕令並不能阻止示威者的集會和示威活動。星期五和星期六仍然有數以萬計的人在曼谷街頭。

政府，軍隊和官僚的精英們手握權力幾十年，他們拒絕放棄任何一點權利，對於他們，上述行為太過頭了。許多觀察者看到，上週六，軍人瘋狂地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有時候甚至使用實彈。已經確定，有超過20人死亡，800人受傷，其中大多數人是紅衫軍成員。這是1992年政變以來最糟糕的死傷人數統計。在4月10日星期六晚上的電視秀中，阿披實表演了他對受害者家屬的慰問，但為鎮壓辯護，說紅衫軍是衝突背後的原因。他掩蓋了軍隊罪行，並聲稱，雖然他們武裝有真槍實彈，但他們朝空中開槍。

儘管使用了這些辦法，軍隊無法挫敗示威者，軍隊不得不撤出。未來情況非常不清楚：這一失敗後，軍方震驚。軍隊分裂，許多士兵表示同情紅衫軍。這導致了軍官搜捕那些有異議的士兵，他們稱之為“西瓜”的人，即外穿綠制服裏面卻是紅色的士兵。

鎮壓可能會導致更多騷亂活動的蔓延和難以預料的後果。還不能肯定，政府現在是否正在考慮這個方案。同時，阿披實作為總理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數了。軍方和官僚精英把他推上權位，他能否存在下去，取決於軍方和官僚精英找到一個他們能接受的替代解決方案的能力。不排除發生一個新的軍事政變。

還有一個重要的未知問題：關於宮廷，迄今為止，哪里發生了些什麼呢？去年9月以來，國王就在醫院，已不再能夠像過去那樣試圖干預，扼殺抗議。王室成員自己正在為繼承獵物而內訌。每個覬覦王位者都竭力與某些的軍隊和員警結盟，這部分解釋了，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政府做不出決定的原因。

紅衫軍要求恢復民主。這涉及到要雙手沾滿鮮血的阿披實立即辭職，並舉行新的議會選舉。這是泰國歷史的關鍵時刻。泰國全國人民大會（NPA）同泰國所有的工人，農民和窮人站在一起，支持他們為社會正義和民主的合法鬥爭。

✦ 達尼埃爾·薩拜和讓·散奴克是“國際觀點”駐東南亞的記者。

## 泰國解決危機，不能訴諸鎮壓手段，只能通過民主途徑

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PSM），印尼勞動人民聯合會（PRP）  
印尼人民民主黨（PRD），左派泰國黨，澳大利亞社會主義聯盟  
區域聯合聲明

我們深為關切泰國當前的形勢，該國軍方支持的總理阿披實宣佈緊急狀態，並開始了血腥鎮壓越來越多的要求舉行新選舉的抗議者。局勢令人擔憂的是，泰國政府關閉了所有反對媒體，並給了安全部隊廣泛的新權力，準備對紅衫軍抗議者進行暴力鎮壓。泰國軍隊正在濫用武力，包括坦克和真槍實彈，對付曼谷的民主示威者。泰國人民反獨裁民主聯盟（UDD）或更為有名的稱呼‘紅衫軍’再度發起了大規模行動，抗議軍方去年3月扶植的非民選的阿披實政府。這一民主運動包括農村和城市的窮人，他們站了出來反對軍事寡頭統治回頭。當前的危機展開於2006年9月，當時軍方發動政變，反對他信政府，取消了1997年人民憲法，代之以軍方認可的憲法。親他信的政黨在2007年的選舉中獲勝的時候，保皇派黃衫軍開始組織法西斯示威。在黃衫軍法西斯動員及法院發動的政變後，軍方扶植了目前的阿披實政府。政府，軍隊和黃衫軍不敢面對真正的民主選舉，因為他們知道，由於多數的窮人支持紅衫軍，他們將會敗選。阿披實和統治階級精英都拒絕訴諸選舉，正在努力爭取時間，甚至準備暴力鎮壓。現在越來越清楚，阿披實和舊

的精英們正在把國家帶向法西斯獨裁。泰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級鬥爭階段。舊的統治精英攜帶其軍人支持，正在使用一切手段取消泰國的民主。民主的紅衫軍由工人階級、農民和窮人的大量人民組成，表明了他們真正的廣泛性和動員力量，它已經無疑地動搖了保皇黨和軍方。隨著紅衫軍的群眾支持的擴大，它可以成為泰國普通人民爭取恢復民主和社會正義的鬥爭的新而重要的一步。

我們呼籲：

-----軍人扶植的阿披實政府立即辭職，立即舉行新的民主選舉。

-----停止對紅衫軍抗議者任何形式的暴力鎮壓。尊重人民結社、抗議和罷工的權利。

-----停止鎮壓民主權利，停止取締媒體。

-----泰國政府不要訴諸任何軍事政變。泰國目前的危機只能通過真正民主和人民的力量加以解決。我們支持和聲援反對反民主政府的鬥爭，支持和聲援爭取恢復真正民主的所有泰國的工人、農民和窮人。

2010年4月10日





## 對紅衫軍的鎮壓必須立即停止 停止謀殺！阿披實辭職！

### 第四國際

5 天的時間裏，泰國士兵們在籌辦一個新的“黑五月”。阿披實政府派遣部隊實彈射殺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授權狙擊兵埋伏射殺對手，比如“紅衫軍”領導人卡迪亞·薩瓦滴蓬將軍遭狙擊殺害就是一例。

爲了把無理之事變得有理，政府指責一些遊行示威者爲“恐怖主義”，並組織了對拉差巴頌購物區的可恥封鎖，水和電都被切斷。生活用品不能送達示威者。區內的廣播和電視都被掐斷停止。這些“恐怖分子”是成千上萬的男人，婦女和兒童，他們是反對泰國統治階級的司法系統，爲重建民主而戰的老百姓。他們的口號是：阿披實辭職，他的政府並沒有合法性，因爲他是軍人在議會聯盟於 2008 年 12 月改變時被推上臺的。

如果阿披實是合法的，他就會同意紅衫軍關於尊重投票箱裁決的要求。相反的，他正在顯示他的政治弱點。他正試圖通過壓制和鎮壓

而讓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消逝。他保住權力的唯一機會在於軍隊暴力鎮壓破壞紅衫軍運動的能力。自 4 月初以來，有超過 65 人被殺害，暴力還在持續。

阿披實必須立刻辭職，向法院解釋他負主要責任的死亡事件。必須開啓同紅衫軍代表的談判，解散議會，儘快組織選舉。

第四國際向勇敢的紅衫軍致敬，他們進行了幾個星期的模範鬥爭，正在遭受軍隊的攻擊。第四國際堅決站在他們一邊。

第四國際執行局，2010 年 5 月 17 日

► 第四國際：一個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國際組織，由接受和運用其原則和綱領的骨幹和分支組成。組成部份有獨立的各國分部，它們統一於一個單一全球組織，在主要政治問題上共同行動，同時尊重民主的原則而進行自由討論。



## 控訴泰國政府的鎮壓罪行

達尼埃爾·薩拜 皮埃爾·魯塞

對泰國反對派的鎮壓和濫用權力的行為，沒有遇到團結一致的反應和形勢需要的國際譴責。這個政權於是可以自由地操弄和扼殺民主運動。

來自泰國的消息是令人震驚的：數以百計的人，包括兒童在內，因為觸犯緊急法令而被拘留；受傷的人被拴在病床上，發生了一些對紅衫軍領導人的暗殺。這個國家正在更深地陷入軍事獨裁統治。精英甚至考慮違反泰國大多數的民意，推遲選舉 6 年，從而讓總理阿披實有可能執政十年。

泰國社會的各個方面，是深深不平等的。紅衫軍已經響亮和明確地表達了決心，反對他們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們表達了一個階級運動以及對地區多樣性的維護，反對曼谷的特權集團。

紅衫軍運動也不是沒有分歧和問題的。一些人支持前總理他信·西那瓦的回歸，他信是一個腐敗的政治家。但壓倒性的是，運動體現了社會被壓迫者的反抗，他們的要求是民主和社會正義。

通過在曼谷街頭遊行示威，紅衫軍只是行使一項基本權利：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要求的權力。阿披實應為鎮壓和傷亡承擔所有責任，因為他不舉行有意義的談判，而是徒然地下賭注於運動的解體。然後，他用法律武器鎮壓（指控對方有反對君主政體的陰謀和恐怖主義），最後組織了大屠殺。

這一呼籲有兩個簡單的目標：立即發動國際聲援，呼籲泰國政權停止對紅衫軍的鎮壓，並且尊重基本自由。

來自世界所有地區的 100 多人，由講師，研究人員，作家，記者，工會和政治活動家，

以及當選代表都在下面的呼籲上簽了名。預計還會有新的簽名。

### 反對發生在泰國的鎮壓行動

超過兩個月的時間，紅衫軍果斷與堅決地動員在曼谷街頭，聲援支持他們的民主與社會正義要求。

阿披實政府選擇用暴力和鎮壓應對這些要求。它犯有嚴重的侵犯人權罪，因為它授權使用軍事工具解散示威。其結果是極其嚴重的：至少有 89 人死亡，近 2000 人受傷。

今天，民主權利得不到尊重：有 99 個逮捕令。大部分被拘留者的地方是保密的。政府現在對其他媒體實行審查。實行的懲罰特別嚴重：從 3 至 15 年的“冒犯君主罪”到死刑的“恐怖主義”。

政府把紅衫軍當作“恐怖分子”來處理。這是一個複雜的運動，其成員主要是普通的貧窮人民，他們最起碼的政治權利，如尊重選舉結果的權利，都被忽視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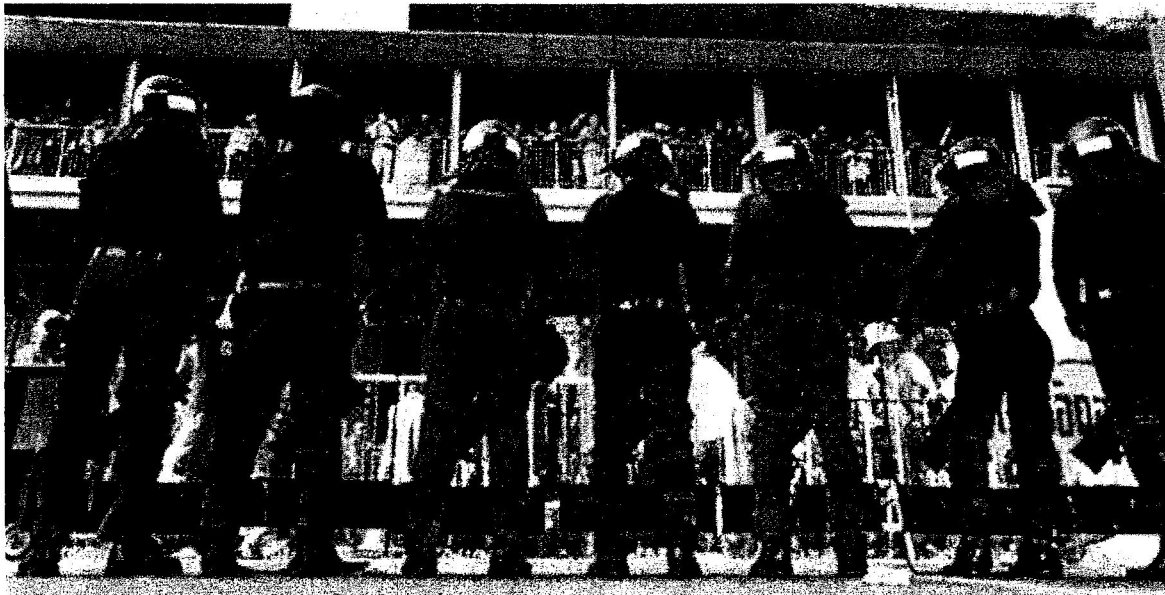
泰國政府可以繼續任意地鎮壓泰國人民，因為其對人權的不斷侵犯沒有遭受到國際譴責和對人權的聲援。我們呼籲一切進步和民主的組織，要求結束在泰國的鎮壓和尊重基本人民權利；啟動一個國際運動，讓政治犯獲得自由，結束對紅衫軍的恐嚇和加罪。

我們要求泰國政府停止實行緊急狀態法，立即重建該國的民主自由；結束對紅衫軍的鎮壓，立刻釋放所有人。

【初步已有 247 個簽署，其中有許多是各國社會組織的代表，詳細名單從略】

## 泰國：血洗之後？

達尼埃爾·薩拜



5月19日星期三，阿披實·維乍集瓦政府終於向拉差巴頌路營地附近的紅衫軍營地發起了突擊。世界各地電視臺播出的恐怖畫面表明，突擊坦克摧毀竹子和輪胎路障，荷槍實彈的士兵實彈射擊示威者。戰爭畫面和示威者的面孔之間的反差，是驚人的，其中大部分示威者是農民和城市工人。

關於紅衫軍中間的暴力分子，媒體有許多的話要說，然而當人們看到軍方用來“清洗”周圍地區的武器資源，那麼他們的暴力就是極為可憐淒慘的了。自示威開始以來，政府已經使用了各種暴力來對付示威者，包括狙擊手，以及在“最後一擊”中，授權士兵們屠殺。示威者用暴力表達他們對軍方和財富象徵的仇恨和憤怒，在這個情況下，這一切就不奇怪了。

正如在1973年，1976年和1992年那樣，執政精英用大屠殺回應泰國人民的民主和社會正義的願望。自從1932年絕對君主制結束以來，已是血債累累。當局承認，自3月12日在首都的示威開始以來，有80人死亡，近2000人受傷。

大約4月中旬，為解決危機，政府提出了5點路線圖。它包括在11月14日舉行選舉的考慮。紅衫軍，在接受該計畫的同時，要求保證

並起訴副總理素貼·突蘇班，他要為4月10日鎮壓造成的平民死亡負責。但對於政府來說，提供路線圖的條件是‘要麼接受它，要麼離開它’。用一種奇怪的方式來尋求解決這個尖銳的政治危機。所提出的選舉日期，11月14日，將允許阿披實在軍隊最高指揮部重建的戰略時刻保住權力。此外，維持對紅衫軍領導人的恐怖主義和陰謀反對君主制的指控。

這種戰術證明了阿披實的成功。他得益于反獨裁民主聯盟內部關於應對方法的分歧，似乎他很民主，向示威者伸出了手，而被拒絕了。因此，在有了聯盟夥伴的支持保證後，他可以運用強大的武力方法，把侵入首都的“農村群氓”發回農村。

但是，仍然有可能在5月19日前夕，避免軍事鎮壓，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大約50名參議員同反獨裁民主聯盟的領導人在討論安排停火。但是，這種嘗試被阿披實拒絕了。從一開始，他就是政府主張鎮壓的一方，而不同意開放談判。請記住，阿披實和民主黨拒絕參與在2006年4月組織的提前選舉，當時他信在反對派示威要求他辭職幾個月之後，尋求新的授權！



由於聯合國所採取的立場，政府加強了決心。從5月13日至16日，經過幾天的對抗，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納維·皮萊在一份新聞稿中說：“爲防止進一步的生命損失，我呼籲示威者從懸崖邊緣退回來，而安全部隊則按照政府的指示做最大的克制”。這再清楚不過了，她給政府開了使用武力的綠燈。同皮萊聲稱高級專員是各地受害者之代言人的聲明，相差甚遠。

在國際上，沉默佔據了主導地位。泰國不是中國，伊朗和委內瑞拉。在曼谷的街道屠殺農民和工人，不會引起像在天安門廣場殺害示威者那樣的許多憤慨。對政治危機或殺害平民，奧巴馬一句話也不說，但美國政府卻譴責紅衫軍“破壞私人財產”。這是真的，無論發生什麼事，泰國的精英人士都可以指望美國政府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把泰國變做主要基地，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的發展。這涉及建立和資助專制政權和軍事獨裁。20世紀70年代撤出軍事基地並不意味著這種合作的結束。軍事協定繼續起作用，一年一度的聯合軍事行動，以及2003年烏隆他尼軍事基地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被美國用於非法審問（和拷打）拘留者這個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對於美國，泰國仍然是一個戰略國家，美國擔心它在該地區的勢力受到中國的威脅。

隨著在拉差巴頌路營地的摧毀，傳統精英們可能已經獲得了喘息，但鬥爭遠未結束。泰國的危機根源是深刻的：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在亞洲屬於最高之列，一個兩種速率的司法系統，一個日益獨裁的政權。充斥紅衫軍及其同情者心中的憤怒和仇恨，是所有這些中更根本的，他們是該國的多數，渴望民主。泰國無疑不是一個獨裁體制，而“泰國風格”的民主是一個專制的民主。民主自由的條件是服從既定的次序，這依靠監查體制，緊急法律以及針對精英不滿的政府的司法或軍事政變。暴力鎮壓和運用不恰當的手段，這表明，如果有任何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這個運動已經動搖了權勢集團，該運動已經解放了一個國家的政治言論，在這個國家宣佈自己是共和黨人或是共產黨員是法律所禁止的。5月19日的血腥鎮壓是政府弱點的信號。

泰國社會目前陷於僵局。專制民主的泰國風格是病態的。泰國人不再相信可以組織真正的民主選舉，幫助解決危機。一方面，“開明的精英”認爲只有他們知道，對於社會和未受過教育的以及不文明的公民，什麼是好的和必要的。他們肯定會失去下一次選舉。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壓制，以圖繼續執政。在另一邊，社會的多數，渴望一個真正的民主並尊重投票箱。因爲沒有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因此他們的鬥爭是殘缺的。他們的投票已經被他信利用，給他的權力提供一個基礎，促進他自己的利益，其代價是許多權力的濫用。

最後，舊的政治秩序依賴泰王的象徵作用，統一的擔保人和最後仲裁者的權力受到了威脅。最近幾周發生的事件，很可能非常嚴重地動搖了舊君主幾乎神聖的形象。在一個國家裏，公共場所的國王畫像無處不在，而在紅衫軍拉差巴頌路營地卻見不到它們，這揭示了他們對王室幻滅的廣度。他們一再呼籲國王普密蓬仲裁，一直沒有反應，於是國王支持現行政權的說法，正日益傳開，儘管不能公開辯論。這個國家真正民主化的障礙之一，正在於君主立憲制的作用。在1990年底出現了“主權在民”的信念，爲了對付這個想法，保皇黨提出“主權屬於人民”的想法…，雖然最後它屬於君主制。普密蓬的繼承者，他的兒子哇集拉隆功是人民厭惡的人，如果動員不先來的話，可能會引發新的衝突期，挑戰現存秩序。

精英贏得了戰鬥而不是戰爭，歷史並不站在他們一邊。或者像泰國諺語說的，他們“逃脫了老虎爪卻落入了鱷魚口”…

### 結束檢控！

大多數紅衫軍領導人在襲擊中投降，以避免進一步流血。如果他們的恐怖主義罪名成立，有被判處死刑的危險，或至少因褻瀆君主罪被判3至15年的監禁。數百名示威者被軍隊逮捕拘留。至少可以說，他們的命運是不確定的。他們唯一的罪行是反對現存秩序。我們應該支持所有被拘留的示威者和領導人，並緊急組織聲援活動，爭取他們的立即釋放和結束刑事檢控。

2010年5月23日

達尼埃爾·薩拜是第四國際駐亞洲記者。

## 關於歐洲危機的聲明

### 四十個反資本主義團體

1. 全球經濟危機仍在繼續。大量的資金已經注入到金融體系 --- 在美國，英國和歐元區注入 14 萬億美元，中國去年發放 1.4 萬億美元的新銀行貸款 --- 努力讓世界經濟回穩。但這些努力是否足以產生可持續的復蘇，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先進經濟體中，增長仍然非常疲軟，而失業率繼續上升。人們擔心，這次是以中國為主的新金融泡沫在發展。這次危機的長期性 --- 是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 --- 反映了作為一個制度的資本主義本質根源。

2. 經過嚴酷的裁員浪潮後，在歐洲，危機的重點現在是公共部門和社會福利制度。由於救助方案，金融市場得救，正是這個金融市場現在起而反對政府涉入這項借款給社會福利的行動。他們都要求大量削減公共開支。這相當於一個階級試圖轉移危機代價，把危機代價從它的製造者——首先是銀行——轉嫁給勞動人民，不僅僅是公共部門的就業者，還有所有那些使用公共服務的人們。緊縮和公共部門的‘改革’的要求，是最明顯的標誌，說明新自由主義，儘管被危機愚弄，仍繼續主導決策。

3. 希臘目前處於風暴眼。它是幾個特別脆弱的歐洲經濟體之一，部分原因是其繁榮期債臺高築，部分是因為他們發現很難同德國這個歐元區的巨人競爭。在金融市場，歐洲委員會和德國政府的壓力下，帕潘德里歐政府撕毀競選承諾，宣佈相當於百分之四的國民收入的支出削減計畫。

4. 幸運的是，希臘有強大的社會抵抗運動歷史，可溯源至 1970 年代。繼 2008 年 12 月的青年反抗後，希臘工人的運動用一波罷工和示威，對政府的削減方案做出了回應。在冰島的公民投票中，人民拒絕償還銀行徵收的債務，對此我們也表欣慰。

5. 希臘工人需要各地社會主義者，工會成員和反資本主義者的團結。希臘只是第一個被金融

市場盯住的歐洲國家，但它們還盯上很多其他國家，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6. 我們需要一系列能解除危機的措施，這些措施優先考慮人民需求而非利潤，實施對市場的民主控制。我們要支持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回應，即：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就業優先於利潤。

- ▶ All cuts in domestic public expenditure to be halted or reversed: stop pensions 'reform'; health and education are not for sale; 國內公共開支削減必須全部停止或回轉：停止養老金‘改革’；健康和教育不能出賣；

- ▶ 保障工作權利和對綠色工作做公共投資計畫 --- 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產業，調整私人 and 公共建築，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 ▶ 把公共銀行服務和金融系統置於民眾控制下！

- ▶ 移民和難民不是替罪羊：讓他們身份合法化！

- ▶ 對軍事支出說‘不’：西方軍隊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大幅削減軍費，解散北約。

7. 我們決心組織歐洲團結活動，反對削減公共開支，反對資本主義攻擊。希臘工人的勝利，將加強其他地方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抵抗力。

希臘：新左派（Aristeri Anasynthesi），反資本主義左派（Aristeri Antikapitalistiki Syspirosi），共產國際希臘支部（Organosi Kommuniston Diethniston Elladas - Spartakos，Sosialistiko Ergatiko Komma），激進左派聯盟（Synaspismos Rizospastikis Aristeras）；

葡萄牙：左翼陣營（Bloco de Esquerda）；

奧地利：左派轉折（Linkswende）；

比利時：革命共產黨聯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 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

英國：社會主義抵抗運動（Socialist Resistance），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克羅地亞：拉德尼茨卡戰鬥報（Radnička borba）；

捷克共和國：社會主義團結運動（Socialistická Solidarita）；

賽普勒斯：工人民主黨，新賽普勒斯黨；

丹麥：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isk Arbejderparti）；

巴斯克：巴斯克人雜誌‘Gogoa’；

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

德國：國際社會主義左派（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Linke），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Marx21），社會主義革命聯盟（Revolutionär Sozialistischen Bund）；

義大利：左翼評論報（Sinistra Critica）；

愛爾蘭：人民高於利潤聯盟（People Before Profit Alliance），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社會民主黨（Socialist Democracy）；

荷蘭：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n）；

波蘭：波蘭勞動黨（Polska Partia Pracy），工人民主黨（Pracownicza Demokracja）；

俄羅斯：前進黨（Vpered）；

蘇格蘭：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

塞爾維亞：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marks21）；

西班牙國家：恩盧恰/恩盧伊塔，左派 Anticapitalista，革命工人黨；

瑞典：社會主義黨（Socialistiska Partiet），國際社會主義者（Internationella Socialister）；

瑞士：反資本主義左派（Gauche anticapitaliste），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社會主義團結運動（Mouvement pour le socialisme /Bewegung für Sozialismus, solidaritéS）；

土耳其：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Devrimci Sosyalist İşçi Partisi），自由與團結黨（Özgürlük ve Dayanışma Partisi）。

~~~~~

重新定義並測量美國、日本和中國的失業率

趙京

1. 重新定義失業率

經濟分析不在本文的關注範圍內，本文只是指出必須用一個新的指數來把握就業狀況。與美國或別的主流經濟學一樣，日本的經濟學者與政府配合，編造出人為的失業率來誤導公眾和政府的經濟政策。日本用“完全失業率”這個概念來代替普通人的“失業”常識：按照日本統計局的定義，只要你在上一個月的最後一周得到任何一點工作報酬（例如，臨時幫忙一小時得到750日元報酬），你上個月就“被雇用”了。

以這樣的定義，日本2003年4月的“完全失業率”是5.4%。讓我們向日本政府和御用經濟學者們道賀：你們編造的資料與美國的同行們製造的資料很接近。

日本政府聲稱這個定義是按照國際勞動組織ILO的標準制定的。且不提ILO是個什麼樣的機構（反正不是為勞動者利益服務的），ILO提到在一天或一周內工作一小時來衡量一個人的雇用狀況，但並沒有說一個月的最後一周工作過一小時就算“被雇用”了。

比起日本政府，美國勞工部製造的失業率（被稱為BLS失業率）也是一個“偽科學”的典型。它把那些沒法進入政府統計資料的失業者（新到的移民、主婦、因絕望放棄或從來沒有正式申報工作申請的人，等等）稱為“不在勞動市場”NILF而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非法移民”和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在社區學院登記的學生們，以及處於半失業狀態的“自營業家族”。

當然，如果我們認識到失業率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就沒有必要廢除日本和美國政府以及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主流經濟學的發明。如果有人定義“在一個月內掙到足以養活自己或家族的最低報酬”為就業狀態，明顯更合乎常理。這裏，我的邏輯很簡單：每一個人最清楚他是否失業，測量任何時候的失業率也很簡單：

$$\text{失業率}U=100\%-\text{就業率}E$$

感謝各國政府的大量就業的雇員，我們知道有多少人就業，就業率E容易測量到。

[注：此文摘要譯自筆者2004年8月1日提交於West Coast Japan Economic Seminar at UC-Santa Cruz的論文“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以及2010年1月12日補充。詳細的展開和引用資料請參照原文：Jing Zhao, “Re-define and Measure Unemployment in Japan, the U.S. and China,”《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ISBN: 978-0-557-05663-7. Morriville, NC: Lulu Enterprises, Second Edition, First Printing. January 14, 2010。]

2. 測量日本的失業率

我現在只能找到2000年的資料。按照日本統計局，日本15-64歲人口為85,997,000人，其中8,833,000人是學生。所以勞動力是85,977-8,833=77,164,000人。這時，工作人口是62,894,000，其中包括超過65歲的4,910,000人。所以，15-64歲的工作人口是62,894-4,910=57,984,000人。

這其中，有4.9%的人一周內工作1-14小時。可以認為這些臨時工不能養活自己或家族，不被稱

為就業。所以，如果我們勉強斷定每週工作15小時以上可以養活自己或家族，日本的就業人口是 $57,984 \times (1-4.9\%) = 55,143$ 千人。這樣，

$$\text{就業率}E=55,143/77,164=71.5\%$$

$$\text{失業率}U=100\%-\text{就業率}E=28.5\%$$

這是日本政府公佈的“完全失業率”4.7%的六倍。

3. 測量美國與聖何西市的失業率

按照美國普查局2000年（美國經濟高峰期）資料，美國16歲以上人口為217.2（百萬，下同單位），其中非軍事部門雇用129.7，軍事人員1.2，學生33.9。所以就業率是 $129.7 / (217.2 - 33.9 - 1.2) = 71.2\%$ ，失業率是28.8%。美國普查局的關於雇用的問卷與日本類似：“上周你做過任何得到收入或利潤的工作嗎？”如果你回答“是”，你就被算作“就業”了。

讓我們來看矽谷的中心聖何西市的2000年的失業率。按照美國普查局的資料，有436,890人就業，而BLS失業率是2.9%，因為這已經排除了“不在勞動市場”的225,511人（占33.1%）。

聖何西15-64歲人口是61,487 (15-19歲) + 64,418 (20-24歲) + 160,945 (25-34歲) + 155,751 (35-44歲) + 111,383 (45-54歲) + 38,770 (55-59歲) + 29,163 (60-64歲) = 621,917。其中53,813是高中生，73,669是大學生，所以勞動力應該是 $621,917 - 53,813 - 73,669 = 494,435$ 人。這樣，

$$\text{失業率}U=100\%-E=100\%-436890/494435=12\%$$

這裏也有進一步的因素：有許多在聖何西工作的人住在附近的小城市，無家可歸或大量的“非法”移民不在統計之內，沒有工作、英文不好的人不太合作回答問卷，等等。考慮了各種因素，可以說：在美國經濟的高峰期，最發達的矽谷中心的失業率不低於12%，這雖然遠低於全美的平均29%，但卻是政府資料的4倍多。

4. 中國的失業狀況

中國政府的資料表明2001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是3.6%，同時勞動力“就業率”是77%，是否可以說失業率為 $100\%-77\% \times (100\%-3.6\%) = 25.7\%$ 呢？不。

因爲“就業”的730,000,000人口中，有67.2%是農村戶口。我無法知道“就業”的農村人口如何養活自己或家族，只好假定平均在一年中有一半時間“就業”。這樣，中國的就業率是 $(32.8\% \times (1-3.6\%) + 67.2\% \times 50\%) \times 77\% = 50\%$ ，失業率是50%。

5. 結論

用符合常識的新的失業率定義，我們大概知道美日這樣的發達工業國家的失業率近30%，而中國這樣的經濟成長大國的失業率爲50%左右。如果能夠以這樣的結果告知公眾並以此制定相應的政策，整個世界經濟和社會將得到多大的改善呢？

6. 補充（2010年1月12日）

Barry Brooks讀到我的這篇文章後，曾送給25個美國國會議員。如果國會知道美國失業率近30%，他們一定會採取新的立法改變美國的經濟政

策，至少可以避免這一次經濟大蕭條。其實，早在1994年，Dembo和Morehouse就提倡“無工作比率”Jobless rate（加入臨時工和因絕望放棄或從來沒有正式申報工作申請的人爲“失業者”）代替BLS失業率。他們的對1969-1993的研究表明，美國的“無工作比率”比BLS失業率高7%。

經歷了這次大蕭條，華爾街日報也不得不採用“更廣義的失業率”（接近“無工作比率”）來報導美國的失業率。如2010年1月9-10日在“還在失去工作機會的美國經濟”的報導中，就承認美國2009年12月的失業率是17.3%，與11月（17.2%）差不多，比依然堅持“10%失業率”的美國政府還進步。同時，該文又圖示出美國的實際被雇用率從1999-2000年的64%左右降到2009年的58%，說明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在17%到40%之間。要改善美國經濟，首先必須從這個事實出發。

~~~~~

世界社會論壇

## 我們不給危機買單 富人必須付出代價！

2009年世界社會論壇社會運動大會貝倫宣言

反帝，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抉擇是必須的



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匯聚在第8次世界社會論壇的舉辦地，亞馬遜河流域的貝倫，這裏的人民一直在抵制掠奪大自然，以及篡奪他們的土地和文化的企圖。我們此刻置身於拉丁美洲，過去十年來，這裏的社會運動和土著運動已聯合起來，並且從他們的宇宙觀對資本主義制度做出根本的質疑。在過去的幾年裏，拉丁美洲高漲的激進社會鬥爭導致了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垮臺，施行許多積極改革——如核心經濟部門的國有化和民主憲政改革——的各國政府則增強了。

在這種情況下，拉丁美洲社會運動已經做出了適當反應，決定支持這些政府採取的積極措施，同時保持一個批判的距離。這些經驗將

有助於以加強人民的堅決抵抗，反對政府、公司和銀行轉嫁危機負擔到受壓迫者身上的政策。我們全球社會運動正面臨一個歷史性的挑戰。國際資本主義危機以各種方式顯現為害人類：它影響到食品，金融，經濟，氣候，能源，人口遷移...和文明本身，還有國際秩序和政治結構的危機。

我們正面臨一場全球危機，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直接後果，因此不可能在該制度內找到一個解決辦法。迄今已採取過的克服危機的所有措施，僅僅著眼於社會化的損失，目的是確保這種制度的生存，該制度的基礎是戰略經濟部門、公共服務、自然資源和能源資源的私有化，是生活的商品化，是對勞工和自然的剝削，以及把資源從週邊向中心，從工作者向資產階級的轉移。

現存制度的基礎是剝削，競爭，促私利而損公益，以及少數富人的瘋狂斂財。它導致血腥戰爭，鼓動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它加劇了對婦女的剝削和對社會運動的犯罪。在目前危機的情況下，人民的權利被制度性的否定了。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野蠻侵犯是對國際法的踐踏，是一項戰爭罪，一項反人類罪，是也見諸世界其他地區的剝奪人民權利的象徵。必須制止可恥的無法無天的橫行霸道現象。社會運動重申其對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積極支持，對世界人民所有反壓迫行動的積極支持。

為了克服危機，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根源，儘快推動建設一個會取消資本主義制度和等級統治的根本替代方案。我們必須努力實現這樣一個社會，它滿足社會需要，尊重自然權利，支持在充分政治自由環境中的民主參與。我們必須確保同我們不可分割的公民權有關的所有國際條約都得到實施，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個人和集體兩方面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必須致力於可能的最大民眾動員，實施一系列緊急措施，比如：

- ▶無償地國有化銀行部門，並進行全社會監督；
- ▶減少工作時間但不減少薪金；
- ▶採取措施，確保食品和能源的主權；
- ▶阻止戰爭，撤出佔領軍，並拆除外國軍事基地；
- ▶承認人民的主權和自主權，確保他們的自決

權；

- ▶保障所有人在土地、領土、工作、教育和保健方面的權利；
- ▶媒體和知識使用的民主化。

21世紀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所實行的社會解放進程的目標，是通過有助於社會利益的所有制形式的支持，把社會從生產工具、通訊手段和服務方式的資本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達成的社會利益是：小型家庭不動產，公共的、合作的、社區的和集體的財產。

這樣的抉擇必將是女權主義的，因為不可能在權利的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社會，其中卻有一半人是被壓迫剝削的。

最後，我們將接受原住民的積極參與和貢獻，致力於建設一個生活得與自己，與他人和周圍的世界和睦相處的社會（“良好的生活”）。

我們社會運動，面臨著一個發起全球解放運動的歷史性機會。只有通過群眾的社會鬥爭，人民才能克服這場危機。為了促進這一鬥爭，重要的是努力提高覺悟和動員基層人民。社會運動所面對的挑戰，是實現全球動員的融合。這也將加強我們採取行動，支持所有努力抵抗壓迫和剝削的運動的能力。

因此，我們承諾：

▶2009年3月28日至4月4日，發起反對資本主義和戰爭全球行動周，行動有：3月28日反20國集團動員集會，3月30日反對戰爭和危機的動員集會，3月30日這一整天聲援巴勒斯坦人民，促進對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和制裁，4月4日針對北約60周年的動員集會，等；

▶全年增加幾次動員集會：3月8日，國際婦女節；4月17日，國際糧食主權日；5月1日，國際勞動節；10月12日，全球動員保衛地球母親，反對殖民化和生活商品化。

制定反對薩丁島八國集團首腦會議，哥本哈根氣候首腦會議，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美洲首腦會議等的行動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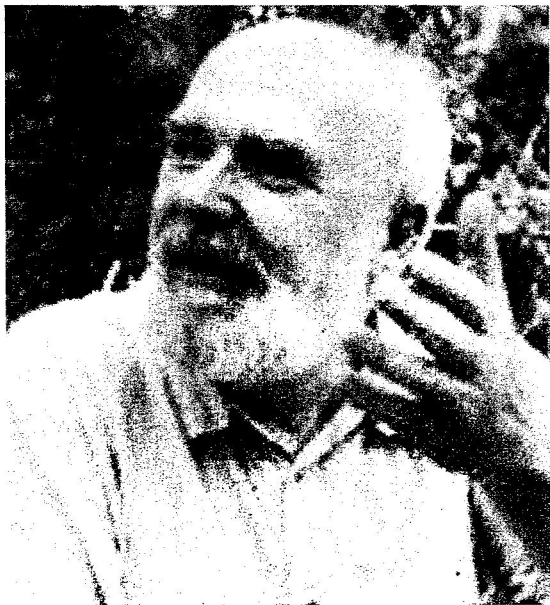
通過這樣的要求和倡議，我們以根本脫困的解答，對危機做出反應。



## 2009年世界社會論壇的新開端

埃里克·圖山特  
波利娜·伊巴契 採訪

貝倫宣言是不同的。它包括對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一個基本診斷和如何擺脫它的一個明確立場。它的大小標題概述了這個新方法：*我們將不會給危機買單！富人必須為它付出代價！反帝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措施必須取而代之！*



埃里克·圖山特

*在貝倫世界社會論壇上，一些人談論另一個全球化運動的新開始。你認為是這樣的嗎？*

自世界社會論壇（WSF）經歷了2006年，2007年和2008年的困難時刻以來，我們可以把這第九屆會議真正地稱為一個新的開端。在許多方面，它都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首先，它吸引了大量的參與者，有十三萬三千人，也可能是十四萬人註冊與會。這是了不起的，它使得貝倫世界社會論壇成了一個最廣泛的集會。它可同2004年1月在孟買會議或2005年在阿雷格里港組織的一個會議相比較。事實上，我們必須注意，與巴西的主要城市，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貝洛奧里藏特，或阿雷格里港而且還有

一些南美國家相比，貝倫地處偏僻。到達貝倫並非易事：飛機票價昂貴，乘巴士從聖保羅來則需要三天，自阿雷格里港來需要五天，以及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蒙德維的亞或亞松森來需要六天。孟買是印度人非常容易到達的地方，而阿雷格里港是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人極其容易到達的城市。

此外，大多數參加者在30歲以下。所有這些年輕人大規模地參加了各種活動。

促成論壇成功的另一個因素，是土著民族明顯和積極的參與出現，他們主要是來自亞馬遜河和安第斯山脈。

表明一個新開端的徵象是，在急於採取行動和實施解決辦法的同時，大多數與會者希望找到目前危機的各個方面的深入解釋，並得出自己的結論。

同2007年內羅畢世界社會論壇相比，這是一個明顯的變化，在那裏運動似乎已經精疲力盡，無法提出根本問題。

這把本次論壇變成反對開始於2007年的資本主義危機的第一次重大的國際動員。

世界社會論壇的這個新開始和另類全球化運動與在瑞士達沃斯的哀悼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盧拉總統，曾在幾年前花了一天時間在世界社會論壇，然後再飛往世界經濟論壇，這一次他決定只出現在世界社會論壇上，不去達沃斯。這是極重要的，因為它說明了危機的深刻程度。盧拉瞭解他的社會自由管理已經導致了來自基層的很多質疑，如果他去了達沃斯，會引起更大的負面看法。為了剔除來自他的左翼的任何批評，他選擇留在巴西。同樣，也沒有其他拉美左翼或中間偏左的總統前往瑞士滑雪勝地，儘管其中有幾個獲得邀請。這次經濟論壇是一個遺憾，因為奧巴馬政府沒有任何要角願意撥冗出席。只有弗拉基米爾·普丁，中共總理（說了很多！），和安格拉·默克爾在那裏討論資本主義的生存。薩科齊本人決定反對前往達沃斯。如果盧拉去了，或如果奧巴馬派出一名

高級官員赴會，薩科齊就肯定會在那裏！

我們還必須強調新聞媒體的偏見。其中有一個世界領先的金融日報，金融時報，沒有一行字涉及在貝倫的世界社會論壇，但關於達沃斯有兩個專輯，並在其日常版上有超過10頁的篇幅涵蓋了它。相比之下，一些報紙，電視和廣播頻道派出了特派記者（大約有3000新聞記者）報告了這次活動。一些人正確地強調另類全球化運動的'覺醒'或'第二風潮'。帕拉州的所有日報每天有五到七頁談到論壇。國際電視頻道AlJazira大量報導了這次活動，並給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代表以發言的機會（見英文視頻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012>）。

### 甚麼是世界社會論壇的主要關心問題？

有三個主要問題。第一，資本主義危機的各個層面，即金融，經濟，環境，能源，糧食，移民和'統治'，也即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的明顯的合法性危機。如20國集團的替代解決方案，其合法性的缺乏也是關鍵性的。

第二，以色列軍隊反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儘管貝倫遠離巴勒斯坦達一萬二千公里，但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與我們聯繫非常。從第一天開幕式的遊行開始，巴西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的極左派ENLACE的年輕人展開攜舉20米長的巴勒斯坦國旗。一些人舉著聲援巴勒斯坦人民鬥爭的標語牌。儘管與會者具有不同的關切，但他們都堅持表明其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在這個特殊情況下，所有的侵略戰爭，如伊拉克戰爭或阿富汗，都成了反對目標。大家都同意，要求撤出軍事佔領。

第三重要的是亞馬遜和安第斯山脈的原住民的鬥爭。論壇第一天的工作完全致力於亞馬阿瑪遜地區（這個區域跨越巴西，包括的一部分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委內瑞拉、秘魯和哥倫比亞---不要忘記還有圭亞那，法屬圭亞那和蘇里南）。原住民問題涉及到與自然的關係和他們保護自然的角色作用，以及他們文化特徵的肯定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影響他們的方式。原住民有很多東西教給其他民族，尤其是他們對世界的做法（這已經部分地納入了厄瓜多爾2008年和玻利維亞2009年投票的新憲法）。原住民代表對論壇的討論和建

議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發揮了重要作用。當他們集中討論亞馬遜和安第斯山脈的問題，把氣候變化的挑戰放在社會主義和環境考慮的核心時，他們給論壇以其特別的觸動。

除了三個核心問題外，我們還討論了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由於世界婦女進軍運動的作用，女權主義者的做法比以前的論壇更加明顯。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瞭解跨國公司不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所發揮的掠奪作用。由於我們是在貝倫，許多行動針對的是巴西公司，如石油或淡水河谷（採礦業）。至關重要的是，約90 %的與會者是巴西人，他們應認識到，作為公民，他們有責任，即便不是全球範圍內那也要在該大陸的範圍內，結束設在本國的企業的邪惡行動。

### 社會運動大會的宣言有什麼意義？

這宣言有全新的東西。我們必須記住，從2001年1月第一次論壇以來，一直有一個社會運動大會。社會運動大會準備工作從論壇的第一天起就持續籌畫，而大會則在最後一天舉行會議。在會議結束時對宣言進行表決。它由來自一系列社會運動的代表起草。截至目前，這些聲明僅僅是社會運動所感受到的一些重大問題的清單，和未來事件的列表。社會運動和各種活動展示了它們動員的重大時刻。貝倫宣言的是不同的。它包括對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一個基本診斷以及如何擺脫它的明確立場。它的大小標題概述了這個新方法：我們將不會給危機買單！富人必須為它付出代價！反帝反資本主義的、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措施必須取而代之！

因此，這一宣言是替代措施的議程。更具體地講，它表明，如果我們考慮到受壓迫者的利益，那末，僅僅恢復一些調節機制，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無法得到解決的。解決危機的辦法涉及擺脫資本主義制度。為了克服危機，我們必須儘快抓住問題的根源和進展，建立一個根本的替代方案，以便消除資本主義制度和家長式統治。[1]

此外，宣言傳達直接的要求：我們必須促進最大可能的民眾動員，以便執行一些緊急措施，如無補償地國有化銀行部門，並對它們作充分的社會監督，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任何薪資；採取措施，確保食品和能源主權；停止戰爭，撤出佔領部隊和解散外國軍事基地；承認人民主權和自

主權，並確保他們的自決權利；保障所有的土地權，領土權，工作權，教育權和保健權；通信和知識工具使用的民主化。[2]

本文提出了一個全球性的年曆，它特別側重於2009年3月28日至4月4日的全球行動周。它包括我們拒絕為當前的危機買單，我們反對2009年4月2日在倫敦舉行的20國集團會議，在2009年3月30號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反對紀念北約成立60周年並要求解散它。這必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全球行動周，因為我們在日期和主要議題兩者上都達成了一致。此外，年曆也包括經常性的動員日期：3月8日婦女節，4月17日農民日，10月12日的原住民日（在1492年的這一天，哥倫布登陸歐洲人所謂的美洲）。

最後該事件年曆還包括2009年7月初撒丁的馬德伽勒納島的八國集團會議期間的大規模動員，2009年12月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首腦會議的大規模動員，還有2009年10月八號至十五號全球一周的行動，反對債務和國際金融機構。

最積極參與起草宣言的社會運動集團有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它為集體起草提出了建議，有世界婦女長征運動（WMW），威盛農民（尤其是其巴西分支無地農民運動），拉丁美洲暨加勒比學生大陸組織（OCLAE），來自歐洲，非洲和亞洲社會運動的代表，和亞馬遜和安第斯山脈土著協會的代表。

通常，在論壇上，社會運動大會（ASM）的結論在最後一天公佈。今年，因為最後一天專門用於各主題會議和全體大會（詳下文），社會運動大會召開於1月30日，即論壇結束前的兩天。在聆聽社會運動大會（ASM）的結論時，來自MST（無地農民運動）的昂·佩德羅·斯特代爾說，這樣的聲明證明了社會運動大會（ASM）在制定明確議程上的成熟。在這個論壇上社會運動大會ASM仍然發揮了鼓動作用，因為它用根本條件界定了問題，並加強了出現在整個論壇過程中的動力，即尋求全球和根本的解釋和解決辦法。

如果閱讀2月1日上午大部分11個專題議會採納的聲明，我們會注意到，該危機作為資本主義的危機已作了反復分析。當我們閱讀原住民的反戰運動宣言，或婦女大會通過的宣言時，尤其引人注目。根據市場邏輯應對這些危機，得出姑息答案，對此我們不感興趣；這只能導致同一個系

統僵持下去。我們需要在構建替代品中前進[...以便對付]壓迫和剝削我們的資本主義和家長制體系。[3]

原住民的宣言使用的條款類似ASM宣言用來制定反種族主義，反家長制和尊重地球母親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要求的條款。這個資本主義的、歐洲中心的、家長制和種族主義發展模式的危機是完全的，並開啓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和環境危機。財政、經濟和能源危機助長了結構性失業、社會排斥、種族主義暴力、馬赫主義和宗教狂熱。如此多深刻而同時的危機闡明了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機，即危害所有生命形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和現代化'的危機。然而，即使處境如此困難，一些人仍然夢想依據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同質性、西方的積極法律和生活商品化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模型，改善這種模式，也不會承認目前的危機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產物。[4]

雖然一些社會運動或鬥爭（特別是歐洲國家的）對於是否要不情願地提及用社會主義取代措施，仍猶豫不決，但原住民大會的態度卻是很明確的。而且必須要強調的是，兩個文本由不同的人的論壇的不同會場起草，即使ASM宣言由所有代表運動的代表大會作了討論，其中當然也包括原住民（他們踴躍地出席了ASM）。

在起草委員會我們討論了如何說明土著組織對於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鬥爭的貢獻。初稿提到了在過去15年裏土著運動的'再現'，對它我難以滿意。而且一旦在大會上宣讀草案文本，一些土著運動的代表就要求修改文字，提及過去幾年的土著和社會運動之間的'新相遇'。原住民正確地指出，在開始自己的鬥爭以前，他們沒有等待其他社會運動瞭解發現他們。5個世紀之久，他們一直抵制資本主義和強加給他們的各種形式的統治。大會認為他們是對的，並對草案作了相應的修改。

**對於政黨和某些政府在世界社會論壇的存在，有什麼可說的？**

政黨參與是一個新的發展，因為在以前的巴西和非洲論壇上沒有太多的政黨參與的跡象。無論在2004年1月印度孟買的世界社會論壇，或者在某些區域或大陸論壇，特別是在卡拉奇，加拉加斯，或在2006年的雅典的那些論壇，他們都沒有



太多的出現。

首先，應該說，左翼巴西政黨（工人黨（PT），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和聯合社會主義工人黨（PSTU））特別參與了論壇計畫本身，但是他們的參與性質各異。對於工人黨（PT）來說，盧拉政府和行政當局的出席（幾位部長出席）比工人黨這樣的參與更有意義。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與自由黨（PSOL）和聯合社會主義工人黨（PSTU）這兩個在野黨，都積極支援工會的利益，他們尤其接近全國鬥爭協調會（ConLutas ---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Struggle）和國際工聯（Inter Syndical）。

各政黨出現在論壇區內，在我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的，因為論壇應該是政黨，社會運動，公民組織和基層運動之間的一個辯論平臺。每屆社會論壇，如果連接論壇進程的各政黨參與出席，這將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把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和公民運動“隔離化”，似乎他們無法與願意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政治組織作辯論，更不用說積極合作了，現在是結束這種做法的時候了。

請注意，第一次有四位總統積聚在那裏：莫拉萊斯（玻利維亞），科雷亞（厄瓜多爾），費爾南多·盧戈（巴拉圭）和雨果·查韋斯（委內瑞拉）。總體上，他們代表全球正義運動的願望，特殊地，他們代表拉丁美洲社會運動的希望。我們應該記得，2005年在世界社會論壇期間有兩次有拉美總統的會議---第一次查韋斯參加了，稍後，盧拉總統參加了第二個。此外，在2006年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多元中心論壇之際，查韋斯出席了另一個大型公開會議。

貝倫的新現象是：第一次，社會運動向四位總統作了演講。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把一些現實攤在總統面前並設法讓他們承諾採取措施，在拉丁美洲實行替代模式和區域一體化——一個有利於人民，尊重自然，而不屈從於跨國公司資本主義利益的真正一體化。還應當強調指出，特別地按照MST（無地農民運動），國際農民運動和世界婦女進軍運動（WMW）的倡議，社會運動邀請了四位總統，所有前三個運動，因為盧拉的反社會主義政策內容（當地媒體極力排斥），都曾決定排除盧拉。

盧拉總統的政治立場接近英國的布朗，或西班牙的薩派特羅的自由社會模式。它主要有利於

建立在整個拉丁美洲的巴西資本主義大公司，強大的巴西農業部門，私營銀行系統，以及設在巴西的大跨國公司。這個政策，以促進出口作為基本的發展，特別是以生產乙醇為目標的甘蔗產業，以及轉基因大豆的出口。然而，在生態方面，它帶來的後果在過去五年裏是災難性的。自2003年以來，盧拉總統的政策在亞馬遜造成的森林砍伐面積相當於委內瑞拉。

在世界社會論壇上，盧拉政府的目標，是利用左翼部門和反對盧拉新自由主義政策但政治上合作的年輕人，奪回一些合法性。在盧拉政府的資訊是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同時，與會本身已是一個進步，它把全球性危機的責任乾脆地歸於資本主義制度。

1000個社會運動的代表出席了這一次有四個總統參加的會議。還有更多的世界社會論壇與會者希望能在這裏，但必須由代表團處理。這次會議開始時，海地另類發展平臺（PAPDA）秘書長卡米·查莫發表政治講演，另類發展平臺（PAPDA）是南方千禧年免債運動（Jubilee South），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和加勒比社會運動聯盟（COMPAS）的會員。他強調厄瓜多爾科雷亞政府的審計倡議和部分中止商業還債的正面性質。然後，他勸說查韋斯和莫拉萊斯在各自的國家設立債務審計，並提醒他們，他們在阿爾巴次會議後已著手於此，時間是2008年11月尾，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場的有科雷亞。

總統發言前，兩個女權主義者也發了言：經濟轉變拉丁美洲婦女網路（REMTE---Red Latinoamericana de Mujeres Transformando la Economía）的馬格達萊納·萊昂和世界婦女進軍運動（WMW）的娜露·法利亞[5]。

發言的第一位總統是科雷亞。他的抵達該論壇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他來的前一天，厄瓜多爾印第安民族聯盟（CONAIE）發出了一個資訊給世界社會論壇，要求將科雷亞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因為其外商投資該國採礦業的政策直接影響到土著居民。為回應這一根本性的挑戰，科雷亞在講話中採用了一項關於21世紀社會主義的非常左傾的言論。雖然他的講話可以被看作是完全積極的，在其範圍內，似乎是重新獲得合法性的一條路，該合法性已經受到了一定的損害，損害來自於他正在其國家設立的那種資本主義的，生產主義的國家模式。此外，他沒有提到債務問題，

而卡米·查莫在他的開幕詞中強調了債務審計和自2008年11月厄瓜多爾部分中止償還債務的正面性質。

費爾南多·盧戈然後發表了講話，他強調，對於巴西，絕對重要的是承認，伊泰普條約的應用造成了巴拉圭的可怕和不公平的債務負擔。兩國的伊泰普公司的總債務200億美元，其中一半的款項將由巴拉圭償還，另一半由巴西償還。幾乎95%的債務是欠巴西公司的。盧戈解釋說，他預計，巴西會採用友好和體面的立場，承認一個單方面性質的條約。巴拉圭當局和人民希望他們的舉債根本上減少。他們希望能夠提高其供應給巴西的電力價格，並出售電力給該地區其他國家，以增加國家的收入，從而能夠啟動讓盧戈2008年4月當選的社會改革。

盧戈還打算成立一個委員會，對伊泰普條約作國際審計。他已經決定，同盧拉就伊泰普條約的談判將公開進行，但巴西政府希望這些談判是在機密的和外交基礎上的。

莫拉萊斯接著發言。他的講話很有意思，他定位自己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他申明，如果沒有深刻的社會鬥爭，如果社會運動沒有經常地推翻贊成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總統，今天來到這裏的總統中，就無人可能成為總統。他對社會運動說，他們應毫不猶豫地經常召集總統，這樣，他們將不得不作出報告。莫拉萊斯提到，新憲法通過2009年1月27日（即世界社會論壇的第一天）的全民投票後他國家的情況，這是邁向玻利維亞的一大步。

最後，他解釋了玻利維亞天主教特權階級的完全反革命作用：繼續用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他喊道：“另一個教會是可能的”。他用這樣的方式對他的同事費爾南多·盧戈講話，盧戈是天主教前主教和解放神學家，在觀眾中則有弗朗索瓦·鄔達，他也是解放神學家，為窮人的教會工作。

輪到查韋斯，他堅持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方案，還增加了一個女權主義者的層面，宣佈他已成為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

這些講話後，無地農民運動（MST）主席昂·佩德羅·斯特代爾，以非常出色的方式致閉幕詞。他不是向總統表示祝賀，而是說到他們已失去的時間，以及這個事實，即面對這場危機他們已被證明無法採取有利於人民的措施，這些是令人遺憾的。通過這種方式，他批評聚會在12月的薩爾

瓦多·巴伊亞的所有拉美總統。向在他面前的四個總統講演，他宣佈，由於缺乏所有總統的共同應對，社會運動期望四個左翼總統採取根本性，結構性的措施，毫不拖延地應對資本主義危機。

此外，他建議他們不要等待被社會運動邀請，而是要定期邀請這些運動去他們那兒，然後聽取他們要說的話。

在世界社會論壇上，本次會議是一個重要事件，並朝向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對話邁出了一步。這種類型的交流只能發生在拉丁美洲，在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左翼政府已從聯結世界社會論壇動力的激進的社會鬥爭中顯現：在2008年4月當選總統以前，在2005年作為巴拉圭代表，費爾南多·盧戈出席了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會論壇，他從亞松森乘公共汽車前往那裏。

在結束的這一天，總統盧拉在貝倫另一地點召開了另一次會議——更多介紹了他的政治理念。他邀請了查韋斯，科雷亞，莫拉萊斯和盧戈，這些人都發了言。本次會議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背景下開的。沒有與社會運動對話的問題，也沒有聽取對他的政策或其他總統的最終批評的問題。

我們可以注意到一些拉美國家政府轉向左翼嗎？在區域一體化方面是否有任何進展？

我們不能確實地說，應邀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四國政府正在轉向左翼。委內瑞拉在2008年，已經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國有化措施，例如經過延伸的社會衝突後，國有化大鋼鐵公司Sidor，或國有化屬於兩個最大西班牙私人銀行集團之一的委內瑞拉銀行。評估盧戈的工作是十分困難的，因為他只是2008年8月才開始執政，即不到6個月。為了能夠形成意見，有必要讓他有更多的時間。然而，可以說的是，鑒於危機開始直接影響拉丁美洲經濟和人口，四國政府還無法實施協調一致的替代性政策。

靈感的來源應該是會議建議，會議是委內瑞拉當局於2008年10月召集的，即“南方對全球經濟危機的反響”。這次會議產生了一項宣言[6]，其中包括了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建議，遺憾的是，直到現在，尚未有決定接續其後。至於一體化而言，它必須指出的是，南方銀行2007年12月以來已經正式存在，但還沒有開始營業。顯然陷入了僵局。

在這些非常重要的批評意見後面，一些積極因素值得強調。首先，在2008年12月薩爾瓦巴·伊亞多主辦了一次所有拉丁美洲總統的會議，這標誌著古巴重返拉丁美洲共同體。在此之際，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右翼政府）和勞爾·卡斯特羅（古巴）會見了，而美國政府沒有被邀請參加本次首腦會議。然而，自從1959年古巴革命後，美國曾經設法在外交上把古巴孤立到這樣的程度，大陸規模的主要會議美洲國家組織（OAS），該組織包括北美和拉美各國，但把古巴排除在外。現在，拉丁美洲國家，包括右翼政府，正在形成一個沒有華盛頓的聯盟，以便解決自己的一些區域問題，如2008年3月1日哥倫比亞軍隊干預厄瓜多爾領土引發的衝突。這是積極的。有關一體化進程的其他積極因素是ALBA（玻利瓦爾省替代美洲）的不斷擴大。一開始，它包括古巴，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2008年，它擴大到洪都拉斯和多明尼加島。幾個月來，我們已經注意到厄瓜多爾謹慎的友好態度。

### 有關債務問題情況如何？

幾個會談涉及債務問題。最多的一個約有500人出席集會，議題涉及拉丁美洲債務審計和巴西國會成立一個議會調查委員會。在世界社會論壇網路中，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和南方千禧年免債運動（Jubilee South）是最具代表性的。債務和發展拉美網路（Latindadd），債務和發展歐洲網路（Eurodad）以及債務和發展非洲網路（Afrodad）也出席了會議。正如債務運動最後宣言中提到的，一項公共債務的新國際危機正在形成。[7]

### 關於論壇的組織有什麼新東西嗎？

有。由各個分會組成的大會，它遵循了分會主題自我管理原則，是一項重要的創新。從一開始，世界社會論壇的社會運動已經建立傳統，即最後的全體大會，與論壇正式議程同時召開。幾年來，論壇一系列的組成部分，已要求論壇本身積極自覺地促進各參與組織的團結，從而提出共同的辦法，採取共同的行動和建議。在國際理事會（IC）內部有一些阻力，但今年是一個轉捩點，隨著召開各個會議組成的大會，標誌著世界社會論壇的一個進步。

第一天（1月27日）論壇開始與街頭遊行。第二天，所有的活動集中在亞馬孫地區，突出了土著民族的貢獻。這個泛亞馬孫日之後的兩天所有議題可自我管理選定。然後，在最後一天（2月1日）上午，舉行了議題自我管理的專題分會，隨後在下午舉行總集會，這之前（1月30日）每個專題分會的結論以及社會運動大會-ASM-的最後宣言提交大會。顯然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選擇。雖然如此，它必須是合格的：國際理事會（IC）和當地組委會並沒有做足夠的事去協調第三和第四天的議題自我管理活動。這導致太多的分散，因為幾乎有2000活動者要組織安排。在論壇的4至6個月之前，一組志願者和長期工作人員要接觸所有的組織，為活動者註冊登記，以便對他們作分組合併。這將避免許多重複工作。在這方面，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8]作出了特別努力，因為它的所有活動與其他活動安排在一起。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本身沒有組織任何活動。至於應對危機方面，CADTM參與了聚集數十不同組織的兩個活動[9]。同樣，舉行債務問題活動的有南方千禧年免債運動（Jubilee South），債務和發展拉美網路（Latindadd），以及活躍在這個問題上的全國運動，特別是巴西的全國運動。

另一個薄弱環節：舉行全體的物質條件不便利。它在室外舉行，沒有任何翻譯系統。與會者不能向宣讀各專題集會結論的人提問。下一次大會需要一個室內會館和一個翻譯系統，以便就可能的結論作實際交流。

*與2007年1月內羅畢舉行的會議相比，是不是更多的被壓迫人民更容易參與論壇？當地居民積極參與了該論壇嗎？*

該地區人民很好地出席了該論壇。約有100,000來自巴拉州的人出席了會議，巴拉州的首府就是貝倫。巴西人的入門費達30雷亞爾，也即10歐元，大眾食堂裏8至10餐膳食的價格。因此，對於百分之八十的收入用於糊口的人們來說，這是個高昂的價格。門票應該更低，以促進更多的參與。

另一個問題，與組委會無關，但與聯邦政府和巴拉州政策有關，就是對城市最貧窮街區的歧視。200名防暴員警駐守在兩個最貧窮的街區和當局施加的法納西卡，即一項法律，禁止在夜間



銷售酒精。因此，用19世紀的說法，這是對“危險階級”的明顯歧視性政策。在其餘的城市，員警的存在非常謹慎，而且酒精可以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時間出售。

還必須說，生活在大學周圍脆弱房屋裏的人，論壇開會之前被趕走，以“清理”場地，因為那些地方要舉行論壇會議。

在國際理事會，CADTM向組織委員會提出了門票的問題，並批評州政府對貧困人口的態度。組委會的成員表示，他們也深為關切這樣的政策。

最後，世界社會論壇應充分開放給當地居民，而不帶有任何資金的障礙。一個論壇的組織不應當附有保安措施，其中員警針對下層階級，而這些階級，在如世界社會論壇和另類全球化的變化過程中，應該是中心角色。

### 什麼是國際理事會（IC）內部的發展？

已經注意到，圍繞這個世界社會論壇，國際理事會（IC）內部有積極變化。一方面，在論壇開始前，有召開一次包含分會的大會的戰略選擇，而另一方面，在世界社會論壇以後，有為期兩天的國際理事會。論壇成功地導致了IC的冷靜辯論和建議的氣候。這次會議包括伽斯·馬三提出的一份檔所引進的戰略討論。[10] 沒有舉行任何關於議題的投票，該IC明顯地願意讓行動計畫取得成功，特別是社會運動大會（ASM）期間達成同意的全球行動周。而在過去的論壇會議上，一些成員，其中包括一些論壇的創始會員，反對把組織大規模的示威特別是2003年和2004年組織的反戰遊行示威，作為論壇一部分，這一次，他們批准了遊行示威行動議程。很顯然，資本主義全球性的危機已經把情況改變了。現在每個人都面臨著行動的需要。

這就提出了幾個問題：它反映了國際理事會（IC）的反應能力嗎？要知道，它過去在沉睡並不願意推進行動。貝倫論壇後所觀察到的變化，是持久的還是臨時的？

可以朝良好方向積極推動國際理事會（IC）的組織，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是重要的。在這方面，CADTM堅決打算與其他願意改善國際理事會（IC）運作的組織一道承擔責任，從而使國際理事會（IC）有助於面臨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挑戰。

此外，一項必須支援的建議，在國際理事會（IC）期間起動，即2010年在加沙地帶舉行一次會議，伴隨著旨在為數百名參加者的公眾活動。這個計畫將在2010年上半年付諸實現，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

### 社會運動的行動計畫有機會成功嗎？

為了社會運動大會（ASM）號召的成功，所有參加了本次論壇或支持這一呼籲的所有組織必須團結起來，以便在各自的國家或地區，使這一號召變成動員行動。還有一些我們必須參與進來的其他活動。當然，一些當前或最近的鬥爭（在希臘，在法國，哥德普洛和茅利塔尼亞…）可以幫助這個議程取得成功。在整個經濟部門，受大裁員計畫影響的工人和工會，必須參與進來。

埃里克·圖山特是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主席。

### 附注

[1] 見<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087>

[2] 見<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087>

[3] 見<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104>

[4] 原 西 班 牙 文：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133>

[5] 閱讀：伊格納西奧·拉蒙特，真正的左派和社會運動。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102>

[6] 完 全 的 宣 言 見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3802>

[7] 見債務運動的最後宣言，卡米·查莫（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和南方千禧年免債運動（Jubilee South）成員）在大會期間宣讀了該最後宣言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128>

[8] 世界社會論壇的第三世界免債委員會CADTM代表團由近三十的代表組成，來自14個國家（阿根廷，比利時，貝寧，巴西，剛果民主共和國，厄瓜多爾，法國，海地，印度，象牙海岸，日本，摩洛哥，巴基斯坦，多哥。與會代表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突尼斯無法到達貝倫）。

[9] 其中一個動議導致宣言“讓我們把資金融放歸其位！”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120>

[10] 見整個文件，題為“全球性危機的危險和機會”  
<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4099>

## “小”疏忽與“大”謊言 ——評歐美媒體對拉美國家的態度 埃里克·圖山特

本文試圖分析歐洲及北美各大媒體公司最近報導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及委內瑞拉的新聞，如何有系統地採取敵視的態度。

與此同時，對於那些密謀參與洪都拉斯軍事政變的人，或者鎮壓亞馬遜原住民的秘魯軍隊，它們卻採取尷尬的默許。

爲了引證以上的說話，我提供以下新近的新聞報導紀錄：

1) 2009年6月5日，秘魯軍隊屠殺了逾50名的亞馬遜原住民，他們抗議艾倫·加西亞(Alan Garcia)政府出讓土地予外國人，主要是歐洲跨國公司。全世界主要的媒體都沒有對鎮壓提出抗議。[1]這些媒體都將焦點集中在伊朗的抗議行動，報章不單沒有譴責秘魯的鎮壓，更未報導事件。還有，秘魯群眾怨聲載道，迫使政府宣佈撤銷亞馬遜原住民所反對的總統法令，可是，媒體也幾乎完全沒有報導政府的讓步。我們必須要問：假若因爲委內瑞拉或厄瓜多爾軍隊或員警介入，而導致大量亞馬遜原住民死亡，媒體會如何報導這類事件？

2) 當洪都拉斯民選的合法總統塞拉亞在6月28日遭軍隊驅逐後，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報導與現實矛盾的新聞，指塞拉亞修改憲法以繼續掌權，士兵因而群起反對。還有另外幾家媒體更指他仿效查韋斯(Hugo Chavez)的獨裁及民粹領導作風。實際上，塞拉亞建議洪都拉斯人民投票組織大選，以成立國民立憲議會(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那才能令國家真正走向民主進步。塞西·拉馬克(Cécile Lamarque)和傑羅姆·杜瓦爾(Jérôme Duval)參加〈廢除第三世界國債委員(CADTM)〉訪問洪都拉斯的外交團之後，把事情解釋得很清楚：“發生政變的同一天，塞拉亞組織了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諮詢’會議，詢問洪

都拉斯人民是否想在2009年11月29日選舉後召集國民立憲議會。

問題是這樣：你是否同意下一屆2009年的選舉中，設有第4個投票箱去收集人民召開國民立憲議會的意見？同意或不同意？如果這次諮詢能得到大部份選民的支持，總統便會在會議前頒布法令，在11月29日洪都拉斯人民將可透過第4個投票箱來投票，召開國民立憲議會(前3個分別用作爲選舉總統、議員及市長)。國民大會與最高法院與軍隊合謀，爲了使政變具有合法性，宣稱這樣的投票不合法，並且聲稱塞拉亞違反憲法，藉修憲謀取連任，“仿效查韋斯的獨裁作風”。可是，塞拉亞向人民諮詢，並不是要求連任，因爲總統任命只有四年，不能連任。塞拉亞因此不可能連任總統職位。[2]

隨著民間對政變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多，7、8及9月的抗議與衝突，主流媒體只是在報導中提到一兩句而已。在罕有的情況下，即使重要的報章有一篇洪都拉斯的特別報導，也會造謠中傷合法總統，並且說成這是民主的軍事政變。像2009年7月1日〈華爾街日報〉社論便提到：“6月28日洪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導致總統被逐離這個中美洲國家，這是很特別的民主行動。”社論還加了一句：隨著軍事行動展開，“立法與司法權力都不會受影響”。著名的法國《世界報》(Le Monde)以比較微妙的態度，也加入打擊塞拉亞的行列。這裡有一個例子。2009年9月12日，《世界報》駐洪都拉斯特約記者米歇爾·卡魯瓦(Jean-Michel Caroit)引用一位住在洪都拉斯的法國僑民的話，並將之連接到千篇一律的指責塞拉亞的邪惡意圖的謊言：“瑪利亞安·卡魯(Marianne Cadario)說：‘對洪都拉斯人民來說，塞拉亞回國是不可接受的，因這意味著國家可能會進入二十年查韋斯式的獨裁統治。’瑪利亞安·卡魯指的

是委內瑞拉總統——他的盟友塞拉亞嘗試做的一一修改憲法，以便再度合資格參選。瑪利亞安·卡魯女士來自法國，在洪都拉斯住了超過 30 年，她對國際社會譴責政變的反應感到非常驚訝。[3] 9 月底後，參與政變的人開始加強鎮壓的措施，《世界報》和《解放報》報章便開始轉變語調，改而批判那些參與政變的人。然而，《解放報》的委婉措辭應該獲獎。2009 年 9 月 28 日（政變發生三個月後），有一則報導的標題為“獨裁之味”，解釋政府如何介入政變，並聲明“禁止任何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拘捕任何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人”，“驅散”一些在地區內從事任何危害公眾秩序的媒體資訊發佈人士及示威者”[4]

3) 2009 年 8 月初，委內瑞拉政府試圖質詢 34 間電台及電視頻道的播放權，我方國際新聞標題：“有證據顯示，所有對這獨裁國家的評論及批判力量都差不多消失了”。各大新聞傳媒對於處理委內瑞拉的新聞題材的立場都是一面倒的敵視，而事實上有 9 成的媒體屬於私營，大部份都散佈與現實不符的資訊。“全球視野”（Globovisión）是其中一家重要的私營電視頻道，2002 年 4 月 11 日積極參與推翻查韋斯的軍方政變。“全球視野”在軍事政變當日及以後，向世界發放的紀錄片完全是故意扭曲事實的。

其中一幕有查韋斯支持者在橋上向著不知名處放槍，“全球視野”記者在旁白中說，查韋斯的支持者正在槍擊一些在橋下的街上和平示威的異見人士。委內瑞拉司法部分分析 4 月 11 日推翻查韋斯的政變當日現場人士的報告及相片，已重整了事件。在“全球視野”的新聞紀錄中，支持查韋斯的戰鬥者被描述為向請願者開槍，而實際上他們是向開槍的城中警車予以還擊，當時員警也參與軍事政變。街上開火的時候，已經沒有查韋斯反對者。許多資料來源無疑證明，軍方政變人士設計陰謀，以“暗殺反對查韋斯的示威者”為由，將罪名歸咎於查韋斯，藉此合理化政變。2008 年 4 月 11 日，委內瑞拉的觀眾再次看見由參與政變的軍隊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當時仍未有任

何示威者被殺。但是軍隊卻公佈，因為查韋斯支持者行兇，他們才發動政變奪權。這清楚引證那是有預謀的暗殺，以合理化軍方煽動性的計劃。

政變發生後第 2 天，即 2002 年 4 月 12 及 13 日，有數以千百計的民眾包圍政變人士的軍營，要求查韋斯重新掌權，之後包圍監獄，但“全球視野”沒有報導這些請願者的訴求，只解釋國家已回復正常狀態，及查韋斯已正式提出請辭，並正前往古巴。在發生政變的最後一小時，這個頻道只播放卡通片及不同類型的表演節目。[5] “全球視野”在好幾個關鍵時刻都與政變人士串通，這令受害者的父母及傷者的協會要求頻道認錯。至今，查韋斯政府仍沒有回應這些要求，以防國際上的污衊行動會逐步升級來打擊他。好幾個人權組織在這件事上，都對委內瑞拉政府的被動取態表示不滿。

最近，“全球視野”對洪都拉斯 6 月 28 日政變的主事人表示同情。該頻道的幾個節目主持人在開始時已支持政變，同時把查韋斯政府對它的指責視為幹預。例如：“全球視野”主席吉列·蘇洛阿加 (Guillermo Zuloaga) 在 7 月 17 日發表聲明：“米契列地 (Micheletti) 政府【譯注：政變後上台的政府並無違反】憲法。我們想，說實在的，如果在委內瑞拉這裡，憲法能夠像在洪都拉斯那般獲得尊重，我們會感到高興”。這樣便表明了他支持政變政府。

“全球視野”從未試過被禁播。哪些歐洲或北美洲的主流媒體曾經報導這個事實？哪些歐洲或北美洲的主流曾讓公眾瞭解絕大部份委內瑞拉的媒體都被私營企業操控？又或他們擁有 9 成以上的觀眾？又或他們猛烈攻擊政府，把政府呈現為獨裁政府？又或他們有些人積極地驅趕一位合乎憲法的民選總統，以及在過去 7 年無中斷地？誰能想像戴高樂將軍 (General de Gaulle)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當中，未能抑止報章、電台和電視台積極支持「美洲國家組織」(OAS) 發動政變？西班牙政府採取措施控制那些支持特赫羅中校 (Lieutenant Colonel Antonio Tejero) 的媒體，當時他



發動軍事政變，帶領士兵衝入國會大樓（the Cortes），挾持國會議員，而西班牙政府的做法不會視為正常嗎？[6]假若塞拉亞恢復合法總統位置，他與政府難道沒有權力要求媒體接受問責，以及採取措施控制洪都拉斯那些支持政變的傳媒集團主腦，他們有系統地扭曲事實真相，並且掩飾許多軍隊侵犯人權的事例。

4) 有關軍事開支：當你閱讀歐洲或北美的報章時，會有以下清晰的印象：委內瑞拉的軍備開支龐大（主要購自俄羅斯），這對拉美地區構成威脅。若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報導[7]，情況便很不同。委內瑞拉軍備預算在拉美地區排第6位，排在巴西、阿根廷、智利（人口少於委內瑞拉，並作為範例）、哥倫比亞及墨西哥之後。以各國GDP計算，委內瑞拉軍備預算在拉美其實只排第9位！然而，有哪些主流新聞公佈這方面的資料？

另一方面，2009年8月，我們在報章上看到在哥倫比亞政府再次指責鄰國向遊擊隊“哥倫比亞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 FARC）提供武器之後，瑞典將矛頭指向委內瑞拉，瑞典告知哥倫比亞在FARC發現的SAAB飛彈是由委內瑞拉提供的。但假若閱讀查韋斯的詳細回應，便會清楚知道飛彈是在1995年在委內瑞拉碼頭被偷竊的，這是早在查韋斯當總統4年之前發生的。

總結：我們需要留意的是，主流媒體一面倒地報導新聞，因此需要採取非常批判的角度作評估。抹黑查韋斯、柯雷亞（Rafael Correa）和莫拉萊斯（Evo Morales）的名聲的報導非常過份，造成國際社會對政變事件感到麻木，或者引導公眾容許像美國政府以武力強行介入。在很多隱喻與毫無根據的指控中，我們能在西班牙的報章（如《國家報》*El País*）上讀到厄瓜多爾總統柯雷亞的選舉活動是由FARC贊助的，我們也會讀到委內瑞拉政府並沒有對毒品交易採取任何行動。對於洪都拉斯總統塞拉亞的報導，則是不停地中傷，以防止國際輿論幫助他回國重新掌權。

【艾瑞克·圖山特，比利時CADTM（廢除第三世界國債委員會，[www.cadtm.org](http://www.cadtm.org)）主席，比利時列日大學（University of Liège）及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政治科學博士，著作包括《南方銀行：另類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印度孟買：VAK出版社，2007；《世界銀行－批判性的導讀本》，倫敦、多倫多、Cape Town，冥王出版社，2008；《金錢或生活－在全球金融暴政中》，芝加哥：Haymarket，2005。】

法蘭西斯·登利（Francesca Denley）與裘蒂·哈里斯（Judith Harris）英譯，莎莎中譯。

註釋：

[1] <http://www.cadtm.org/Le-CADTM-est-pleinement-solidaire> and <http://www.cadtm.org/Perou-le-massacre-de-Bagua>

[2] Cécile Lamarque and Jérôme Duval, « Honduras : Why the Coup d' Etat », 《洪都拉斯：為何會出現政變》17 September 2009,

[www.cadtm.org/Honduras-Pourquoi-le-coup-d-Etat](http://www.cadtm.org/Honduras-Pourquoi-le-coup-d-Etat)

[3] Jean-Michel Caroit, « Au Honduras,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s'ouvre dans un climat de haine », *Le Monde* 《世界報》，p. 8, Saturday 12 September 2009.

[4] <http://www.liberation.fr/monde/0101593847-le-honduras-s-enforce-dans-la-crise>.

[5] 在2008年4月1日，即政變的6年後，查韋斯政府的做法是有趣的。政府在公私營的電視台重播一套由反查韋斯的私人電台（如“全球視野”、“加拉加斯廣播電視台”RCTV等）所製作的實地報導，內容包括了正式的總統就職典禮及政變政府在米拉弗羅爾（Miraflores）總統府接待室的情況。那節目是早在2002年4月2日全委內瑞拉就能看到，現在重播，而查韋斯政府不作刪剪或者評論。

查韋斯依靠委內瑞拉觀眾的批判能力，評論合謀軍事政變的私營媒體，可確定的合謀者包括全國天主教會當局、發動政變的軍事將領、反查韋斯工會CTV（委內瑞拉工人聯合會）領袖、私人企業的行政總裁和委內瑞拉商會聯合會（Fedecámaras）主席佩德羅·卡莫納（Pedro Carmona）。他可以說是位只擁有三十六小時權力的總統，並得了留傳後世的綽號“匆匆佩佩”。

[6]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consulted in March 2009

[7]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consulted in March 2009

## 世界經濟危機對拉美的影響

克勞迪奧·卡茨

我認爲，關於世界危機對拉美的影響，要做不同的討論。眼前的政治經濟影響和社會措施必須面對金融的崩潰。

這場危機使得拉美股市普遍崩潰，使得資本外逃而致信貸減少。商品貶值導致經濟衰退，失業擴大，主導過去5年的不平等增長的週期結束。此外，同危機切割的期望已經被沖淡了。而且一些國家的三個經濟盾牌——大量儲備，低額債務或財政盈餘——的保護已經不夠用了。一些經濟學家估計，拉美的財政狀況看起來比東歐好。他們還估計，出口的減少也將比非洲容易吸收掉。但這些評價的主要問題是其短暫性質。它們在新聞故事中來得快也去得快。某一天，它讓拉美走出風暴，但第二天，它就讓拉美處在風暴中心。

在我看來，拉美受到三個全球危機的影響。首先是全球過度積累危機，它產生于金融領域中虛擬資本的集中。鑒於該地區內個人債務的規模縮減，到現在這種影響還沒有變成銀行的不良貸款影響。然而，裂紋已經爲中心經濟體的資金流動創造了必要性，產生了大量資金的回撤。特別是，外資銀行把資源從拉丁美洲轉移到其中央辦事處。

其次，拉美支持過度的商品生產，過度生產是目前危機的特點。這種盈利產生於新自由主義推廣的、立基於減少工資的全球競爭模型。這種不平衡的影響，特別在區域行業裏最爲全球化的分支中得到證驗。例如，商品過剩打擊都市經濟，同樣的商品過剩也讓汽車業受害。

但最大的威脅來自本地區原材料價格的下降。這一價格的下挫顛覆了過去五年的增長，因爲該增長是由貿易的顯著改善而支撐的。在過去兩個月中，拉丁美洲的經濟形勢已經見到了一個財經上的緩解。由於商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的恢復，也出現了一些商業上的緩解。但是，從這些週期性波動，還不能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

以下是在芝加哥社會主義 2009 大會上的講話。

### 社會影響

核心問題是危機的破壞性社會影響。世界銀行預計，由於經濟停滯，拉丁美洲將有 600 萬個新的窮人，他們多半會落在正式市場中的工作者和中產階級工作者身上。墨西哥的情況更加嚴峻，它是拉美國家中受危機影響最巨者。墨西哥面臨市場的崩潰，因爲它要吸收其 90% 的出口，而這後面的背景是爆炸性的移民回流，社會悲劇和有組織的犯罪。它還受到豬流感的打擊和隨之而來的旅遊業的癱瘓。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舊戀情已經成爲一場噩夢。依賴匯款流入的中美洲小國的情況也非常嚴重。

許多經濟學家認爲，如果採取適當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拉美也可以抵抗颶風。特別是在該地區三個主要經濟領域，改善流動性，擴大公共信貸和補貼的產業，這些措施已經在實施。但這些措施的真正用意，是用無助民眾需要的資源拯救地方資本家。

這些方針依賴有權者的正面回應。他們假定，政府的資金流向會引導資本家維持活動水準。但他們忘記了，這個決定取決於有問題的保利方式。該計畫還尋求支持消費，但卻沒有收入的再分配措施。

在那個時刻，關於這些措施是否足夠和有用的討論，贏得了新聞版面。但實際上，可行性取決於危機的嚴重程度，而不是聰明的補救辦法。貨幣和財政的反週期性政策的影響有限。在經濟衰退的環境中，需求可能會恢復或停止輸出的下降，但在大蕭條的情況下，其影響不大。

拉丁美洲和中心經濟體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美國，西歐和日本有資源，可以試圖限制危機。他們可以用財政部的支持和印刷美元、歐元和日元，安排再啓動經濟。但拉美並沒有這些資源。我們的貨幣在國際上軟弱。這是那些差異的另一個例子。在經濟危機中，中心經濟體的財政赤字增加，而我們的區域依然

附著在盈餘規則上。總而言之，在經濟層面上，危機增加了拉美經濟的所有傳統問題。

### 政治效應

在所有拉美國家，在經濟風暴的負面後果裏都有一個巨大巧合。但一些分析師認為，當前的逆境如果重複了 30 年代發生的情況，它會有正面的影響。他們記得，兩次戰爭間隙期的災難為隨後的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創造了祥和條件。

但他們忘記了大蕭條的最初影響是痛苦的商品貶值。國產化政策作為保護主義和世界戰爭的結果，是後來才出現的。並在一個能夠避開這場火害的區域付諸實施了。今天，戰後框架的任何複製，會因缺乏兩戰間隙的衝突情況而格格不入，也會同經濟的日益國際化相碰撞。

重要的是要看到，發生在資本主義中心的經濟崩潰，並不一定會延伸影響到周邊範圍。70 年代的危機表明，相反情況可能發生。起初，那場衝擊符合有利於第三世界的框架。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進攻下，這個進程突然在 80 年代停止。國際不平等的短暫緩解，已被全球兩極化的新階段取代，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末。這個情況說明邊緣地區自治期是多麼的有限和脆弱。

拉美未來的一個中心點是美國的統治危機。這些危機源自政治區域以外，是其中東的軍事失敗以及該地區的反帝國主義動亂。在經濟方面，美國統治一直受到自由貿易協定的失敗和停滯的非常影響。

此外，作為重大政治和社會動亂的結果，大部分南美各國政府已遠離其順從北方的舊做法。例如，過去一年，在糾正哥倫比亞對厄瓜多爾領土的軍事入侵和玻利維亞的右翼政變的談判中，美國袖手旁觀。在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兩國，更是連大使都被驅逐出境。

我認為，奧巴馬對拉美的政策，可以解釋為兩個過程的結果：盛行於 80 及 90 年代的極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以及 2000 年至 2005 年的人民抵抗運動。基於這些原因，我們今天看到，同布希比較，奧巴馬有了態度變化和言論轉變。

揭示這種新形勢的最佳事實，是美洲國家組織通過的決定，放棄阻止古巴成為該組織一員的限制。這一決定意味著古巴的政治勝利。該國領導人正確地指出，他們不希望回到一個總是服務於帝國主義利益的組織。然而，這一事件說明了 1990 年代革命所遭受到的政治上的孤立已結束。

一些分析家估計，這個背景將迫使美國減少其對拉美的控制。但在現實中，奧巴馬沒有計劃在拉美地區實行重大變化。他將撤出關塔那摩的囚犯，但不會返回古巴的飛地。他將有一些前往該島許可，但不會解禁。他將尋求古巴問題的外交解決，但他會避免承認帝國的失敗。而且目前還不清楚他是否會繼續包庇哥倫比亞的國家恐怖主義和玻利維亞及委內瑞拉的政治騷擾。當然，奧巴馬將選擇一個胡蘿蔔加大棒的組合，更多的外交操作而非厚顏無恥的殘暴做法。但他將維持以門羅主義為基礎的帝國政策。在販毒或恐怖主義的藉口下，復活第四艦隊，復活邁阿密南方司令部的巨大軍事實力，復活哥倫比亞的軍事基地，復活在秘魯和墨西哥做軍事干預的新假說，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策的連續性。

對於一些分析家來說，所有這些事實都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令人遺憾的東西。他們認為，拉美將受益於美帝國主義結構性的和不可避免的衰落。我不同意這種看法。美國軍力仍然看不到任何對手，其競爭對手都甘拜下風。缺乏歐洲或亞洲的軍事替代者，這一點特別重要。美國霸權正在經歷一個終點未知的危機。沒有任何理由說，它將隨著一個對手的興起或收回自己的領導權而結束。美國是在經歷一個有限的衰落抑或永久的衰落，這是現在無法確定的。

的確，在拉丁美洲，美國強權同其歐洲競爭對手相比，過去十年失去了一些經濟引力。但歐洲聯盟並不熱衷於取代他的對手，並一直局限於測試它們以 FTAA（美洲自由貿易區）為藍本的自由貿易協定。這也是事實，即美國不得不忍受中國的第一次商業嘗試介入，但這些現象，對傳統的美國統治的威脅少於歐洲。最後，暫時沒有資料支援美國放棄在拉美的老大地位的說法。

右翼和中左翼



對於不遠的將來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右翼的政治策略。我認爲，保守派和新自由主義分子準備在所有國家發動反攻。他們正試圖抓住金融危機的機會重新取得攻勢。他們會用吸引外資的藉口，提出的財政調整政策。他們也會說，在這個困難的形勢下，變得更加需要做出犧牲讓步，以利於資本家。

我們可以看到右翼進攻的許多跡象，尤其是通過媒體鼓勵中產階級的保守回應。這一運動的例子有哥倫比亞政府試圖無限期地掌權，右翼收復在智利和墨西哥的選區，阿根廷農業企業的政治勝利和對巴拉圭新總統的辭職壓力。

但一些分析家誇大這一趨勢。他們估計，整個政治環境已經成爲負面的。到目前爲止，右翼已經在南美的重大戰役中受挫。玻利維亞政變失敗了，哥倫比亞向厄瓜多爾的軍事進攻失敗了，任何企圖達成區域分裂的嘗試也失敗了。

我認爲，很難恢復我們在 90 年代看到的一致而純粹的右翼統治環境。因爲各國人民還記得 20 世紀 90 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壞性後果，這個右翼運動的成功機會非常值得懷疑。最近的選舉結果顯示一種矛盾的情況。巴拿馬新政府被右翼收回，但法拉本多·馬蒂陣線在薩爾瓦多獲得重大的選舉勝利。即使是洪都拉斯，這個傳統上與美國保持一致的國家，現在已經發展了一個非常獨立的外交政策。

一個同樣重要的政治事實，是中左翼的保守回歸。這個保守轉向的最明顯例子是巴西的盧拉，他是在 1980 年代工人組織圍繞著工人黨長期的積累過程以後獲得政權的。盧拉政府已經把人民解散並且非政治化了，阻止了所有的社會鬥爭，並且持續前幾屆政府的資本主義政策而無任何重大改變。盧拉特別照顧農產企業。他批准了驅逐小自給農民而圖利於出口商和地主。這使無地人民運動產生了深深的失望，並提出了批評。

然而，一些左翼分析家建議支持中左派，希望他們將來會爲人民提供一些改進，並有助於增加人民的力量。但他們的經驗表明，他們錯了。中左政府顯然代表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並再造資本主義。

但是他們中間有些人說，這些類型的政府將有利於多極化的戰略。他們認爲，拉美可以利用這一地緣政治方面的變化優勢，採取更加自主的政策。我認爲，在地球上出現一個資本主義勢力更加分散的時期，這個可能當然有。但關鍵的是要強調，它本身不會讓多數民眾受益。相反，它會聯手霸權加強當地的統治階級。在多極化的情況下，一種新夥伴的可能合作關係會重新壓迫和阻礙人民解放。

在南美，巴西是領導這一壓迫性多極力量的大候選者，因爲儘管最近幾年的增長低下，巴西的跨國公司已經把整個地區合縱了起來。這些公司的主要項目---由政府資助---是一串規劃好的公路和水路。他們以激進的商業外交方式行事，這種政策導致了與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巴拉圭的許多衝突。

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在海地，巴西爲首的佔領軍取代了海軍陸戰隊。它確保有一個使用員警方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加劇了饑餓、貧困和移民的悲劇。這些行動也促使巴西公司進入加勒比海地區。盧拉重複了西班牙 90 年代發展出來的政策，以便有利於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公司。巴西甚至把南方共同市場的延續性置於它的領導下。

在全球商業的許多談判中，巴西放棄他們的盟友，尋求與發達國家達成妥協。要做南美聯盟的領袖，巴西需要在政治上讓委內瑞拉中立化，並解決與阿根廷的貿易爭端。在統治階級的這個戰略中，巴西旨在填補美國統治危機所造成的空間，但不與第一強權碰撞。

依我的看法，巴西在其新角色中，扮演的是一個次級帝國主義統治角色。次級帝國主義的概念有助於克服簡單的中心-周邊模式的缺點，並說明了世界市場上的各種關係。它表明中間形態的存在，有一些思想家把它理論化爲半邊緣的概念。

巴西的盧拉是中左派回歸保守派的最重要例子。但是，我們可以在其他南美政府中看到同樣的方式，像智利的蜜雪兒·巴切萊特或阿根廷的克莉絲蒂娜·基什內爾。他們與美國共同行動，籌備最近的倫敦 20 國集團會議。

他們支持美國提出的經濟議程，該議程要維持美元並用世界其他地方資源為美國銀行提供緊急救助資金。關於對危機做集體反應一事，要進行辯論，他們的政治阻擋這種辯論的可能性，這就是發生在聯合國的事。

但最重要的是，中左翼政府維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它視為應當對世界金融重組負責的機構。當唯一可能進展的政治是關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從頭開始建立另一機構時，他們用機構改革的幻想這樣做。

我認為，有一種統治階級的社會諂媚低賤轉型可以解釋這一切的政治倒退，特別是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倒退。這種變化是舊民族資產階級—國內市場的推動者—當地資產階級的轉型，它們優先點在出口以及與跨國公司建立夥伴關係。在過去的20年，這個統治階級的跨國轉變已經鞏固了。把南美洲看得像一個新殖民區，比如就像非洲的一些地區，這是一個錯誤。把地方主要統治階級看作為帝國傀儡，也是不正確的。他們在一個相當不同於舊半殖民地狀態的框架內，作為有自身利益和戰略的集團而行動。

### 徹底的民族主義政府

但是，在左翼方面，重要的是要看到另一個變化。在我看來，拉丁美洲最有趣的政治轉變是：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特別是在選舉領域內，急進民族主義政府得到鞏固。他們在委內瑞拉贏得了十五次選舉，在玻利維亞贏得了三次選舉，並在厄瓜多爾贏得了五次。

這些政府不同于中左政府（塔瓦雷巴，克莉絲蒂娜，盧拉，巴切萊特）的有三個層面：他們使用的群眾動員，同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衝突，以及尋求收入再分配的措施。在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取得了重要的民主進步，在強烈的反對右翼的選舉爭端之後，通過了新憲法。例如，在玻利維亞，政教分離了，外國軍事基地也被禁止了。這三個國家的政府依據於公共投資和改善購買力，正在嘗試改革的經濟政策。

這些措施中一個關鍵方面，是委內瑞拉的國有化，它嘗試在民族資產階級缺席的情況下去

實現經濟的工業化。重要的是，查韋斯呼籲工人動員起來，行使工人對國有化企業的控制權。但急進的民族主義政府面臨重大兩難問題。他們維護人民的支援，但對資本的一些讓步，往往會產生拖累。例如，在玻利維亞，農業社會變革的速度很慢。選擇了把幾項要求納入寡頭政治憲法（特別是關於土地所有權限制的不究既往原則）。在委內瑞拉，社會不平等回籠和腐敗再次滋生。在厄瓜多爾，在政府與土著運動之間出現了緊張局勢。

但我認為，全球性危機以新的衝動開啓了一個克服這個內耗的機遇，同古巴一起加強區域政治軸心，以及振興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方案（ALBA）。這個聯合引入了早期團結交流，重申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行動並提出社會改革。

現在是克服這些困難，徹底化民族主義進程的時候了。當然，當務之急是消除右翼的作用和防止保守派的回頭。但是，還必須避免社會變革的凍結，因為它會穩定在民眾運動過程中萌發的壓迫者階層。我們必須避免民眾政治進程的衰退，正如墨西哥革命後發生的那種情況。我認為，徹底的民族主義進程是這些國家最進步的前景，但那將是一個非常不同和矛盾的進程。我們必須明白這種複雜性，避免宗教派別姿態。這一立場忽略了盧拉和查韋斯之間的差異，排除了徹底民族主義的進步，放棄參加選舉，最重要的是，沒有為建設社會主義確定一條可行的道路。我認為，左翼發展的最佳途徑，是社會主義同革命的民族主義結合，這條道路曾經導致古巴革命的勝利。我們有一個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牢固傳統，它解釋了這種融合的理論基礎，其所依據的是生活和古巴的梅利亞，秘魯的馬里亞特吉，阿根廷的切·格瓦拉這樣一些思想家和活動家的經驗。

### 社會鬥爭

最後，強調社會鬥爭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地區的未來取決於這一仗。在任何未來的情況下，如果人民未能加強對資本的抵抗，他們將受到嚴厲的打擊。這一結論是該地區在過去十年受害於金融崩潰的主要教訓。這些崩潰導致動亂反抗，從而積累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經驗。

玻利維亞的起義推翻了一個右翼政治長週期，解除了幾個厄瓜多爾新自由主義總統，在委內瑞拉造成了明顯的政治分極，導致 2001 年在阿根廷的歷史性起義。他們還普及了反私有化，自然資源的國有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戰鬥。

拉丁美洲被壓迫者警覺到對資本家的巨額救援，必須準備對付伴隨著對銀行家的新社會救助而來的侵略。同 2000 年至 2005 年發生人民起義的大舞臺相比，該關鍵時刻顯示一個低強度的人民抵抗。但是在加勒比地區的瓜德羅普島和馬提尼克有一個顯著的上升，而且我們在上周看到了秘魯土著人的鬥爭。

但是，人民抵抗需要一個對抗經濟崩潰之社會措施的綱領。重要的是要知道，在過去幾個月，一些社會運動、政治組織和激進經濟學家，在加拉加斯、布宜諾賽勒斯和貝倫開了幾次會議，討論另外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方案拒絕用調控和國家控制措施，把資本家的損失社會化。呼籲動員起來，監督公共資源是如何使用的。已概述過的綱領把維持就業，禁止解雇，分配工作時間而不影響工資，和國有化那些關閉或解雇工人的工廠，列為優先事務。

針對政府與雇主裁員的同謀，這些措施是必要。就減少工資以維持就業而安排談判，這種情況，是持續性社會暴行的另一面。三個所討論的措施，特別嚴重。首先，所有金融體系的無償國有化。其目的或這項措施是為了確保在目前的爆炸性局勢中對信貸的控制。應沒收銀行家的財產取代救援他們。各國必須收回維持銀行運作的費用，收購其股東及董事的財產。禁止國家接管私人債務的厄瓜多爾新憲法，為這一行動提供了基礎。

第二個關鍵步驟是暫停、修改或取消外部和內部債務。儘管這場危機清除了中心經濟體的億萬富翁的負債，但拉美卻在繼續還債。在美國使用的重新計算債務數額和償還時間的系統性風險條款，並未使用於拉美地區。

現在是時候走厄瓜多爾開啓的道路了，實施全面的審計，確定實際的偽劣債務。如果以一致的方式實施，即暫停償還非法債務，將對本

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它將用主權決定取代重複的默認，把債權人置於被告席。

第三項措施是危機造成的，就是石油、天然氣和採礦的國有化。這會保留拉美需要保護的免受全球性震盪的資源。這條路已經由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啓動。但是，國有化的實行是相當猶豫的，而且使用錯誤的補償金。在原材料價格的下跌中，這類支出可能是致命的。例如，對於要國營化的企業，支付給其所有者的賠償金目前是非常不利的，到現在為止，已花費了 150 億美元。

最後我認為，關於什麼是通常的嚴厲措施，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人們對此的一般看法。在一個破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中，沒有人害怕訴諸國有化或暫停償還債務。利用這一優勢，做出硬性的決定，保護拉美民眾，現在正逢其時。

### 社會主義

最後的結論。拉美扮演了反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主角，但目前的危機帶來了另一個挑戰：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中擔當先鋒。這個制度應對當前的災害負責，它的延續需要人民遭受進一步的苦難。只有消滅剝削、浪費和不平等這一個方法，才能抵消貧困和失業。這條道路要求反帝、反資本主義的行動。對照所有調節資本主義的專案計畫，如果它有利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答案將是有效的。經過人民負擔的艱苦救援以後，流行的國家主義傾向於重新製造危機。

只有社會主義理念，才能使一個經濟體服務於人民的需求，用民主形式的規劃減少（並且最終剔除）資本主義迴圈的痛苦動盪。社會主義的未來，不會保存任何與 20 世紀官僚極權主義之失敗經驗的聯繫。這將啓動集體自我管理意識，對建立一個平等的社會，這是有必要的。最後，我想對這次會議再次表示祝賀。在這類活動中，我們，拉丁美洲和北美的人民，開始一起工作，為社會主義共同戰鬥。

【克勞迪奧·卡茨是經濟學家，阿姆斯特丹研究和教育國際研究所研究員，並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任教。卡茨參與了阿根廷網路‘左派經濟學家’（EDI，‘左派經濟學家’）。】



# Exacerbation of Corruption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Zhang Kai

In 1989, Chinese students and workers fought against the authoritative bureaucracy and corruption,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struggle had been brutally suppressed, but over the past 21 years, the reality has shown us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continue the struggle. It has also adversely proven that the repression has exacerbated the many abus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repression.

## Anti-corruption as the Primary Public Concern

It is evident that,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laim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at corruption, the situation is gradually deteriorating and now it has become the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According to a survey, 60% of interviewees consider that official corruption is the problem causing the most damages to the national reputation in 2009. It ranked first on the list in the past consecutive three years. The number of interviewees is the largest one recently, which shows that common people are discontented about the issue (1).

Similarly, as the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official media like People's Daily and People's Net state, anti-corruption ranks top on the list of public concerns,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control of the price of property estates rank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replacing food security and medical reform in 2009 (2).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in 2009, more than 19 provincial officials stepped down due to corruption, which is the largest number in recent years. Among those, we find some well-known names such as Huang Songyou, the Deputy Head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Zheng Shaodong, assistant to the Head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ang Huayuan,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chairme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andong Province and Guizhou Province.

The statistics are incomplete as they only refer to some of the corrupt and stepped-down officials.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corrupt officials remaining in power.

In March 2010, Cao Jianming, the Head of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reported to the National Congress that in 2009, the number of cases of commercial bribes and crimes committed mainly by officials was 10,218, with 18,191 cases of corruption, and 2,670 division heads were involved. Both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he people involved have increased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early 2010, Li Changchun, the head of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Zhoukou Municipal of Henan Province, was suspected of taking advantage of billions of money of the Committee on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then was under detention and interrogation. It is another case of corrupt officials in the juridical system.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t has fought corruption, but in reality, corruption is still rampant. For example, recently, both the national and local session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ave been criticized for huge expenditure and exploitation of intensive labor, and this phenomenon is challenged even by the official media that call for change in the practice. The media in the mainland once estimated that the expenditure on food,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 for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two congresses every year is at least over 100 million yuan. This year every deputy is given a free notebook, so the total direct expenditure will be 127 million yuan (3).

After attending the sessions, 5,224 deputies and committee members can take away the notebooks. The public is outrageous about this kind of 'generosity' as it abuses public money.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that in this sense, the deputies are corrupt in another way, under a beautiful name (4).

Officials of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re not only corrupt in everyday life, they als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authority for making profits. There is a sharp increase of personal wealth. Many cadres get involved in doing business and then become one part

of the Red Capitalists.

In big contrast,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has yet to share the frui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 **Injustice of low-paid jobs for the working class**

Over many years in the past, China's economy has rapidly increased with 8% or above, but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income in the GDP has continuously dropped for the last 22 years. It fell from 56.5% in 1983 to 36.7% in 2005, which was almost a decrease of 20%. In contrast, the proportion of capital income in the GDP has increased by 20%.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by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23.4% of workers have obtained no increase in their wages for the last five years. 75.2% of workers thought that the current soci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as unfair. 61% of workers considered that workers were comparatively low paid, which was the most serious social injustice.

Zhang Jianguo, the head of Department of Collective Contract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pointed out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extreme cases of mass events caused b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The essential causes are low income and little benefit. Based on an unfinished two-year statistics, capital-labor disputes caused by problem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benefits and insurance has counted for 65% of cas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endangering social stability (5).

Even the high ranking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official trade union publicly recognize the problem. As there were serve discontents among the masses, it could be understood that the national union was under great pressure.

Now in China, the disparity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very serious. Some scholars stated that the gap between 10% of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highest income and 10% of the population with the lowest income has increased from 7.3 times in 1988 to 23 times in 2007 (6). This is why this issue becomes the second public concer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ported by People's Net. The workers are comparatively low paid which exacerbates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reality, the mass incidents of capital-labor disputes are increasing (even if they are labeled as

'extreme cases'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8, the author quoted a news report from *Ming Pao*, dated 15 March 2008, tha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Committee of Enterprises and Coordination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there were 406,000 cases of capital-labor disputes in 2007. The figure did not include the statistics of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juridical system. Zhang Mingqi, the vice chairman of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disclosed that the number of capital-labor disputes rapidly spiraled, with an annual rate of 20% (for the details, please see *October Review*, No. 224).

In March 2010, Wang Shenghou, the head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 also publicly reported that in 2009, the courts at different levels have handled 317,000 cases of labor-capital disputes, with an increase of 10.8%.

In 2008,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China Labor Bulletin*, the mass incidents of working class in China had reached 127,467 cases (quoted from *October Review*, no 227).

### **Exacerb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some places, the working class used strikes to fight for wage increase and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But some workers were desperate and committed suicide due to ba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always being under great working pressure. In Foxconn, a Taiwanese enterprise in Shenzhen, within four months, from 23 January to 26 May, 12 workers had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off the building, causing 10 deaths and 2 injured.

The enterprise is a typical capitalist corporation. There is rigid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tightly controlling the workers. Its management is criticized for inhumane and high exploitation. Workers are considered as machines, without privacy in daily life. They are exhausted out of 12 working hours daily. The wages are merely around RMB 1000 but they always have to do overtime work. There is hierarchy within the corporation. The management do not pay respect to the workers, and always scold at and insult the workers. Worse still,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workers are indifference. They not only have to endure the pressure of production, but also to work with such indifferent human relationships. All these led to the feelings of powerlessness, hopelessness and despair among the workers. Not

surprisingly, some of them committed suicide.

The suicides of Foxconn workers are only an iceberg of the plight of workers in China. Behind the booming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there exist plights and struggles of workers at the sweatshops.

The suicides also disclose the deeply rooted soci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other hand, some innocent people were murdered out of any particular reason. Particularly, there were murder cases happening in primary schools, due to bitter anger and revenge. From late March to mid May, there happened six cases of killings, leading to nearly 100 casualties.

Professor Hu Xingdou of Beijing Polytechnics University claimed that there were two reasons of social violence: one, the marginal and vulnerable social groups do not have access to make their complaints and appeals recognized; two, the mindset of taking revenge on society by the lowest stratum of society, through victimizing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s.

In addition, there are numerous cases of "people getting insane out of official oppression". In July 2009, a rural woman from Shaoxing Municipal of Zhejiang Province was under detention after making an appeal about demolishment. Her house was demolished by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Her daughter-in-law was too shocked and then became mentally disordered. Moreover, Ma Jiwen, a peasant from Luliang Municipal of Shanxi Province, appealed that his land was invaded. It turned out that the court sent him to jail based on "his crime of blackmailing the government". I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cannot be solved, there will appear more and more social violence.

After several cases of violent attacks on children, Wen Jiabao, th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has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but also to solve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of social violence, such as to tackl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s well as to reinforce the function of coordination at the ground level.

Being one of the top rulers of the country, the Premier would clear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ocial conflicts. This is caused by the bureaucracy system which enables the bureaucrats to abus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and become corrupt. They adopt the path of capitalism which causes exploitation of workers, social polarization,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despread unemployment, and escalating price of property estates. In addition, many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worsened the situation. Therefore, if one want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effectively, one should change the existing bureaucracy system completely.

26 May 2010

Notes:

- (1) *Ming Pao*, 4 January 2010
- (2) *Wen Weipo*, 24 May 2010
- (3) *Wen Weipo*, 13 May 2010
- (4) *Apple Daily*, 3 March 2010
- (5) *Wen Weipo*, 13 May 2010
- (6) *Ming Pao*, 14 May 2010

#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7卷第1期（總第228期）

2010年7月15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mailto: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 Hong Kong

- 2 Does the Political Reform package lead Hong Kong to democracy?..... Zhong Ming
- 4 On the Democratic Party's revised scheme on Political Reform..... Juan Di
- 5 A proposal for the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 in Hong Kong ..... Ng Huen Yan
- 6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policies intensify social contradictions ..... Zhen Yan
- 8 Hong Kong people commemorated the June 4 Anniversary ..... Wei Bo
- 9 Some thoughts on the 21<sup>st</sup> Anniversary of June 4 ..... Qiu Yue
- 10 Anonymity of Yang Quyun for a hundred years ..... Ng Huen Yan

## China

- 12 Exacerbation of corruption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 Zhang Kai
- 14 Why do the Chinese masses suffer from housing problem? ..... Jun Xing
- 16 Warning from nature ..... Po Mi
- 19 GM crops causing hazards in China ..... Qing Yan
- 21 Lyrics on irregularities ..... Yi Yao

## Special page on Wang Guolong

- 22 In sad memory of Wang Guolong (1914-2010) ..... Yang Lin
- 26 A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of integrity – in memory of Wang Guolong (reprint) ..... Duan Yue
- 30 Obituary on old militant Wang Guolong ..... Li Bing
- 31 A brief account of the Trotskyists in Wenzhou from 1941 to 1946 ..... Wang Guolong
- 33 Memory of the days from Autumn 1941 to 1944 ..... Wang Guolong

## Feature on the 16<sup>th</sup> World Congres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FI)

- 44 On the Israeli offensive against Gaza 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FI
- 45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s of Iran ..... FI
- 46 Solidarity with Haiti ..... FI
- 47 Capitalist climate change and our tasks ..... FI
- 55 Mobilization for the climate and anti-capitalist strategy ..... Daniel Tanuro
- 58 Anti-capitalism and climate justice ..... Esther Vivas
- 60 Role and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 FI
- 67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 Laurent Carasso
- 73 The International becomes a perspective ..... Salvatore Cannavò
- 74 Gains and losses ..... Penelope Duggan

## Special Page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Struggle in Thailand

- 77 A point of no return ..... Danielle Sabaï
- 78 Violent repression of "red shirts" in Bangkok ..... Danielle Sabaï and Jean Sanuk
- 79 Thailand: Resolve the Crisis through Democracy, not Crackdown ..... Regional Joint Statement
- 80 Repression against the Redshirts must cease immediately! Stop the assassinations! ..... FI
- 80 Launch of an Appeal against Repression in Thailand ..... Danielle Sabaï, Pierre Rousset
- 82 Thailand: a bloodbath and afterwards? ..... Danielle Sabaï

## International

- 84 Statement on the crisis in Europe ..... 40 anti-capitalist organizations
- 85 Redefine the measure the unemployment rates of USA, Japan and China ..... Zhao Jing
- 87 Belem Declaration of the 2009 World Social Forum ..... World Social Forum
- 89 A new start with the 2009 WSF An interview by Pauline Imbach ..... Éric Toussaint
- 96 "Small" oversights and "big" lies ..... Éric Toussaint
- 99 The impact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 Claudio Katz

## Article in English

- 104 Exacerbation of corruption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 Zhang Kai

|      |                                                                |                |
|------|----------------------------------------------------------------|----------------|
| 香港   | 2 政改方案是邁向民主政制的方向嗎？ .....                                       | 仲明             |
|      | 4 關於民主黨的「改良方案」 .....                                           | 涓滴             |
|      | 5 人至察則... —— 一個出路建議 (來稿) .....                                 | 吳萱人            |
|      | 6 港府施政不當，加劇社會深層次矛盾 .....                                       | 振言             |
|      | 8 港人踴躍參加悼念六四晚會 .....                                           | 微波             |
|      | 9 六四21周年有感 .....                                               | 秋月             |
|      | 10 英烈冷傲百年 —— 一座無名墓 (來稿) .....                                  | 吳萱人            |
| 中國   | 12 腐敗和社會矛盾劇烈化 .....                                            | 張開             |
|      | 14 中國人民何以要捱居住難之苦？ .....                                        | 軍行             |
|      | 16 大自然的警笛 .....                                                | 破謎             |
|      | 19 轉基因作物爲害人間 .....                                             | 青岩             |
|      | 21 《無常行》之書情記、珍希記 .....                                         | 伊藥             |
| 悼念   | 22 深沉悼念王國龍 (1914 - 2010) .....                                 | 楊林             |
| 王國龍  | 26 一位純粹的職業革命者 —— 悼念王國龍先生 (轉載) .....                            | 段躍             |
| 專頁   | 30 沉痛懷念王國龍老戰士 .....                                            | 李冰             |
|      | 31 1941年至1946年的溫州托派簡況 .....                                    | 王國龍            |
|      | 33 1941年秋天至1944年的回憶 .....                                      | 王國龍            |
| 第四國際 | 44 反對以色列進攻加沙，聲援巴勒斯坦人民 .....                                    |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       |
| 世界大會 | 45 國際聲援伊朗人民 .....                                              |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       |
| 決議特輯 | 46 聲援海地 .....                                                  |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       |
|      | 47 資本主義氣候變化和我們的任務 .....                                        |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       |
|      | 55 氣候和反資本主義戰略動員 .....                                          | 丹尼爾·坦努樂        |
|      | 58 反資本主義與氣候正義 .....                                            | 埃斯特·維瓦斯        |
|      | 60 第四國際的作用和任務 .....                                            |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       |
|      | 67 國際形勢報告 .....                                                | 洛朗·卡拉索         |
|      | 73 國際與願景相配合 .....                                              | 薩爾瓦托·雷坎納沃      |
|      | 74 得與失 .....                                                   | 潘娜洛普·達根        |
| 泰国民众 | 77 泰國：“階級戰爭”的新階段 .....                                         | 達尼埃爾·薩拜        |
| 斗争專頁 | 78 對曼谷“紅衫軍”的暴力鎮壓 .....                                         | 達尼埃爾·薩拜 讓·散奴克  |
|      | 79 泰國：解決危機，不能訴諸鎮壓手段，只能通過民主途徑 .....                             | 區域聯合聲明         |
|      | 80 對紅衫軍的鎮壓必須立即停止 停止謀殺！阿披實辭職！ .....                             | 第四國際           |
|      | 80 控訴泰國政府的鎮壓罪行 .....                                           | 達尼埃爾·薩拜 皮埃爾·魯塞 |
|      | 82 泰國：血洗之後？ .....                                              | 達尼埃爾·薩拜        |
| 國際   | 84 關於歐洲危機的聲明 .....                                             | 四十個反資本主義團體     |
|      | 85 重新定義並測量美國、日本和中國的失業率 .....                                   | 趙京             |
|      | 87 2009年世界社會論壇社會運動大會貝倫宣言 .....                                 | 世界社會論壇         |
|      | 89 2009年世界社會論壇的新開端 .....                                       | 埃里克·圖山特        |
|      | 96 “小”疏忽與“大”謊言——評歐美媒體對拉美國家的態度 .....                            | 埃里克·圖山特        |
|      | 99 世界經濟危機對拉美的影響 .....                                          | 克勞迪奧·卡茨        |
| 英譯   | 104 Exacerbation of Corruption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 | Zhang Kai      |